



極端年代的公民政治

——群衆的文化大革命史

◎童小溪 著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文革研究叢書



極端年代的公民政治

——群衆的文化大革命史

◎童小溪 著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文革研究叢書

極端年代的公民政治
——群衆的文化大革命史
童小溪 著

責任編輯：柳 陽
封面設計：胡 冬

ISBN 978-988-19703-8-1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2011
Copyright Chin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ess 2011

香港新界粉嶺安全街 33 號豐盈工貿中心 5 字樓 G 座
Unit G 5/F, GOOD HARVEST CENTRE,
33 ON CHUEN STREET, ON LOK TSUEN, FANLING,
NEW TERRITORIES, HONGKONG
Tel : 00852-3921 6033
Fax: 00852-2528 5333

發行：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德士古道 220-248 荃灣工業中心 16 樓 1609-1616 室
Tel : 00852-23818251
Fax: 00852-23971519

定價：HK\$ 90 元

目 錄

前言 文化大革命與群衆.....	1
第一章 文革前夕的領導與群衆：以四清為例.....	19
劉少奇與群衆：1961年湖南蹲點調查	21
彭梅秀事件	29
劉少奇與毛澤東：兩種群衆觀和兩種群衆運動方法	38
王光美與“桃園經驗”	46
“四清”群衆運動中的“左”和“右”	57
第二章 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61
有關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62
劉少奇、鄧小平與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66
北京市高校的群衆事件	75
全國各地大中學校的群衆事件	84
五十天落下帷幕	95
第三章 “十六條”與新的公民政治：	
話語、衝突和集體行動.....	107
話語轉變：十六條與群衆大民主	111
工作組影響的延續：以北京兩所中學為例	117
北京高校：派別分裂，人身迫害與集體行動	122
第四章 首都之外：官方高壓政策與大規模群衆抗爭…	141
學生運動與黨委政策	142

“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與“九月反撲”	152
派別、事件、自然史與文化大革命研究	160
第五章 批判“資反綫”和群衆平反運動	164
《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和軍委緊急指示	168
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官方政治迫害的記錄	176
“保護人民的自由”	186
階級與專政：修辭儀式與歷史現實	191
第六章 圍繞“黑材料”的鬥爭	198
有關“黑材料”	199
整黑材料的案例	205
鬥爭過程：談判、搶奪與肉搏	209
文化大革命與“公民不服從”	231
第七章 從“對聯”到“聯動”：	
血統論、特權與保守（上）	237
“老紅衛兵”與“對聯”：發生和發展	240
“高幹子弟要掌權”：階級路線與血統論	253
高幹子弟與特權	262
“西城糾察隊”和暴行	270
“野獸般的性情”，還是“激進的反動”	288
第八章 從“對聯”到“聯動”：	
血統論、特權與保守（下）	292
陳伯達講話、十二月黑風與西糾的垮臺	292
聯動的成立與終結	303
首都之外的“聯動”和相似的社會集團	328
階級、統治與革命（之背叛）	333
第九章 奪權案例：1966–1967年《北京日報》的 群衆微觀政治	339

從文革開始到奪權前夕	340
《北京日報》兩次奪權的經過	347
互相的指控	354
兩派的關鍵分歧	360
第十章 “兩個文革”，或一個文革？	372
文革是“十年”，還是兩年？	375
“徹底否定”論和“兩個文革”論	385
文化大革命的複雜和曲折	398
結語 精英、群衆和文化盟主權：文革的理論與實踐 ..	405
馬克思與巴枯寧：政治與統治	406
葛蘭西：盟主權、統一戰線與說服群衆	419
文化、盟主權與人民內部矛盾學說	426
後 記	435

前言 文化大革命與群衆

站在二十一世紀的歷史制高點來看，中國六十年代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歷史範圍內具有分水嶺意義的事件。這個事件不僅影響了億萬中國人，也波及到了全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文化大革命不僅從親身經歷者那裏長久地召喚出悲愴、憤怒和傷感之情，也引發當代人們對中國文化、對所謂“歷史共產主義”、對現代性狀況下的群衆，乃至對永恒的“人性”問題進行熱烈討論。從近現代的歷史長河看，文化大革命屬於霍布斯鮑姆所說的“極端年代”的產物，它是那個戲劇性年代的高潮和反高潮；今天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商品、資本和群衆積怨都衝破國界而全球流動的時代，文化大革命也為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準備好了序幕。

“群衆”一詞是典型的現代性的產物。群衆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臣民”、“百姓”，正如同現代的動員型政治體制不同于傳統的權威型政治體制。二十世紀是動員政治和群衆政治蔚然興起、走向頂點、走向極端的年代。“群衆”不是中性的詞彙，它帶有強烈的政治內涵和豐富的行為樣式的假設。“群衆”的二律背反是“精英”，“群衆”和“精英”的劃分，不同于有產者和無產者的劃分；和階級理論并立，有關群衆與精英的理論，是另一種有關社會分層的社會學理論，這個理論通常和馬基雅維里、帕累托等人的意大利學術傳統有密切關係。和這個帶保守主義色彩的傳統相對

立的，是二十世紀受激進主義影響的批評傳統，如來自下層的歷史學派等，也極為關注群衆這個角度和角色。

受激進主義影響的批評傳統，習慣于將歷史本身也問題化，比如：區分“動物的歷史”和“人的歷史”；對同一事件的歷史記載，由於批評傳統的推動，又區別出權威版本和向權威版本挑戰的各種另類版本；等等。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西方史學界出現了一個十分活躍的“走向下層”的運動，其中代表人物就是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愛德華·湯普森、埃理克·霍布斯鮑姆、喬治·魯德等人，他們共同提倡了“來自下層的歷史”新範式，和這個新範式相呼應並有密切聯繫的，是有各自不同強調的“新歷史”、“社會史”、“新勞工史”、“新文化史”的涌現，在一定程度上，“年鑒學派”由於其疏離精英政治、偏重社會、經濟的長期演變的取向，也參與了這個運動。自然，這個“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變化，是和二戰後世界範圍內舊的政治範式的衰落、以及在各個領域來自下層的抵抗運動和騷動浪潮有關。

“來自下層的歷史”勘探出了一個新大陸，這就是一直被“正史”所忽略和掩蓋了的下層普通人的體驗，展現了他們和她們的聲音、渴望和搏鬥。這是一個全新的、迥異的人類故事，它和以往的歷史學形成鮮明的對比。“來自下層的歷史”的精神和方法，激發了我寫“群衆的文革史”。特別是因為：“下層史”的一個主要關懷，就是下層階級的抗議政治，即他們為了共同的理念和集體的利益，為了

基本的生存權，爲了反抗權威勢力的迫害，所採取的各種各樣的抗爭行動。正是這個主題，使西歐的、北美的、亞非拉的，十九世紀的、二十世紀的那些曾被忽視的、被邊緣化的小人物，和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普通群衆有了聯繫。在湯普森的筆下，貧苦的製襪工，路德派農業工人和抱著烏托邦信念的手工業者，等等，不再是粗魯和低下的群氓，而是具有“道德經濟”的高貴的人群；在霍布斯鮑姆那裏，被傳統歷史所蔑視的民衆“騷亂”，也不再是烏合之衆的情緒化、非理性的本質寫照，而是下層階級唯一能够使用的談判策略。魯德則首次把法國大革命的人群，從一個抽象、蒼白的概念，分解成一個個生動具體的社會面孔，比如：行會師傅、幫工、短工、婦女、小生意人，他們的冤屈、訴求和行動方式都千差萬別。霍華德·津恩則以兩百年來印第安人、黑奴、婦女、勞工、逃犯、抗議者的遭受屠殺、剝削和迫害的體驗，來構成一部美國人民的歷史^[1]。最重要的是，“下層史”將人類對自己流逝歲月的回憶權和敘述權，從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變成一個高度爭議性的問題，揭示出：不同社會主體的不同歷史體驗，能建構出不同的乃至對立的意義詮釋。

這意味著，人類記載歷史、詮釋歷史的活動，並不存在一個中立透明的、普遍適用的公式。人們對過去歲月的想像，要透過他們所特有的當代體驗、敘事語言和意識形態棱鏡；歷史學者面臨著選擇：記載什麼，又忽略什麼。歷史記憶，同時也就是歷史遺忘；因而歷史知識的建構，

[1] E.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63. E. J. Hobsbawm: *On History*. New Press. 1997. George Rude: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滲透著“記憶與遺忘的政治”。

有關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史學現狀，可以和法國革命的史學或西班牙內戰的史學相比較。對於後兩者，有著和國家的行政權力，比如對書報的審查，對研究的限制，對文獻資料的壟斷，等等相關的問題；但圍繞著這些歷史研究的政治鬥爭，主要還是以學術範式、叙事話語、大眾記憶、出版市場等為場所，而不再是國家的行政強迫機構。從這個角度說，文革之後的文革歷史研究，和西班牙內戰後的西班牙內戰研究有很多相似之處。

實際上，在和文革拉開了一些時間距離之後，開始出現了民間和社會敘述角度的有關文革的文本，比如燕帆的《大串連——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旅游》，楊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和王明賢、嚴善淳的《新中國美術圖史：1966—1976》等^[1]，這些著作第一次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中存在著相對自主的群衆和社會生活，而這種存在往往都被掩蓋了。不過，現有文獻所遺留的一個最大空白，就是文革中的群衆政治，正是這個缺席，使得文革的群衆政治在當代人們的意識中，成為最難以理喻、最荒謬絕倫的歷史往事。

顯然，文化大革命和群衆有著深刻關係，這一點是不會有爭議。一方面群衆的激情像洪水猛獸般四處泛濫，群衆的語言、行為花樣翻新，千奇百怪，另一方面，群衆的狂歡帶著有形的和無形的鏽鏽，群衆的渴望、追求，充滿了矛盾、混亂、受挫折、被叛賣等悲劇色彩。群衆和精英、

[1] 燕帆：《大串連——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旅游》，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年；《新中國美術圖史：1966—1976》，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

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孰是孰非，有關爭議將會持續下去。無論歷史的再闡釋活動今後如何演變，群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佔據的特殊位置將繼續發人深思。研究法國革命的史學家林·亨特談到：法國革命受到女權主義的嚴厲批評，因為革命中婦女的反抗活動受到嚴厲鎮壓，暴露出這場“革命”的父權壓迫性質，因而法國革命的解放意義也受到質疑。革命留給後世的記憶，是解放，還是鎮壓？很多革命歷史恐怕都有這個沉重的包袱。亨特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法國革命和十八世紀美國獨立、1787年荷蘭革命有重大區別，法國革命中“令人感到新奇的，不是政府的反對和鎮壓，這些都是能預料到的，令人感到新奇的，是1789直到1793年革命的激進化所產生的出乎意外的開放的政治空間，新奇的是，婦女的高度自我意識，和她們對政治權利的要求^[1]。”這個評價對於我們理解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性有所啓發。

“群衆”一詞本身是文化大革命中人們自己所使用的關鍵修辭，這裏作為研究，使用群衆概念就不應該不加以批評和反思。有關群衆的政治歷史，是帶著各色意識形態眼鏡的學者們所關注的對象，特別是群衆在革命中的作用；革命中的群衆也具體化為一個生動形象，這就是人群。比如，對於法國大革命中的人群，就有兩種對比強烈的研究傳統，一種是以法國學者泰納和勒·龐為代表，將革命中的群衆看作是擁有“畜群本能”，易受暗示感染，常常是噬血和野蠻的，并具有爆炸性、毀滅性力量（泰納所描繪的“canaille”），

[1] Lynn Hunt: "Forgetting and Remembe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n and Now,"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October 1995.

一種是以索布爾和魯德為代表^[1]，把群衆政治放回到理性政治、集體行動的框架之內，展示出群衆為了其自身的政治訴求，訴諸他們擁有的資源和熟悉的手段，與任何其他政治行為無差別。

“群衆”這一概念，在現代西方社會科學中，通常是指缺少聯繫、組織，沒有分化的社會大多數，和它相對的概念，是精英，即少數在經濟、思想和權力方面比大多數人都具有優勢的人群，他們通常互相熟悉、緊密聯繫，結成內部小圈子。本書所使用的“群衆”一詞的首要意義，和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的用法有所區別。在中國革命的漫長歷史中，對群衆一詞積累了濃厚描述，我所關心的群衆，就是這個濃厚描述的意義內核。現有的文化大革命史文獻，大量的足有關最高層的政治變動，以及高級幹部、高級知識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的文字，這些是最典型的“上層的文化大革命史”、“精英的文化大革命史”；相比之下，本書所謂的“群衆的文化大革命史”，就是將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中下層、“高幹”和“高知”之外的行業人群以及不出名的普通人。

在中國政治範疇裏的“群衆”和“領導”，除了成員數量、資源佔有上的差別之外，也大致等同于“市民社會”和“國家”的二分法。任何社會，包括新中國社會，都劃分為優越的少數，和下層的多數，在這個意義上，中西方不同的定義在實際中大致重合，但也會有發生歧義的時候。比如，高幹子弟集團是社會精英的最典型化身，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主要由一部分高幹子弟組成的“西糾”、“聯動”在政

[1] 這一派別顯然繼承米歇萊的浪漫主義的民粹傳統，強調普通人在歷史中的作用。

治範疇上仍然是“群衆組織”，亦即群衆大民主中的結社。然而，這是一個特殊的議題，會在本書的多個地方進行分析，包括對精英、新階級與保守主義行爲方式之間聯繫的討論。本書的一條主導線索，則是文化大革命中群衆和領導之間的矛盾鬥爭。

本書的主旨也不在于回答“文化大革命是什麼（如何評價）”的問題，而在于理清基本事件的發展線索，或者說，主要任務不是闡釋，而是敘事，即將龐雜的歷史事實講述成為清晰可辨的發展情節。當然，闡釋的活動已經蘊涵在以“群衆”為主體和視角的敘事結構中了，這牽涉到歷史如何書寫的大問題。另一方面，這裏却必須討論“什麼是文化大革命”，或者說“如何界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最明顯的，就是時間的界定。而時間界定上的分歧又聯繫到對文化大革命的內涵、意義，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什麼”的看法分歧。官方于1977年和1982年分別宣布了“十一年”和“十年”的定義，除此之外，劉國凱、陳佩華認為文化大革命只進行了三年，費正清與麥克法克爾合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95)中，文革時期包括了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二年的十六年，比爾·布拉格所關注

的文化大革命，是從 1962 到 1979 年之間中共領導層產生分歧、直到分歧結束的十七年。而阿里夫·德里克則認為文化大革命從 1956 年到 1976 年進行了二十年^[1]。當然，這裏還可以指出，在個別的國粹派那裏，“文化革命”的起點，要從共產黨取得國家政權算起，甚至從五四運動算起，從那時起，中國革命就在愈演愈烈地毀滅傳統，六十年代的文革只不過是其最高潮而已，而至今也沒結束。

因為有上述歧義，而有關分歧又基于闡釋的衝突而難以有技術上的解決，所以這裏不再本末倒置去參與這個爭論，而只對本書，作出人為的時間段限制，這就是從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六七年年初。顯然，這不僅是一個異端的斷代方法，也暗示著作為編年史的不完整性。然而，我在寫作過程中，又越來越感到有理由去這樣做。

本書希望建立新的敘事時間結構，這個時間結構必需和當時最廣泛的群衆所體驗的公共意義有關，它不一定是建立在國家的官方政治之上，而有時恰恰是以群衆的主動性為標誌的。比如：本書不準備討論有關《五·一六通知》的產生過程，不僅是因為這個過程是在政治精英層秘密進行，而筆者並不具備特權查閱內部檔案，而是因為《五·一六

[1] 分別見：華國鋒：《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劉國凱：《文化革命簡析》，《人民之聲》1980 年 12 月特 2 期；Chan, Anita, 1992. "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 in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 no.1, Fall 1992, pp.61–85. 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John Fairbank. 199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 15. The People's Republic. 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198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ill Brugger: China: Radicalism to Revisionism, 1962–1979. Croom Helm, London, 1981. 阿里夫·德利克：《世界資本主義視野下的兩個文化革命》，《二十一世紀》總第 37 期，1996 年 10 月。

通知》直到其起草完成的一年之後的 1967 年才公布于衆，在此之前它和群衆的關係是間接的、隔膜的。相反，同樣出自政治精英手筆的《十六條》，本書將花一定篇幅討論，因為《十六條》和群衆的互動是立即的、直接的，它在群衆意識中的地位、對群衆行爲的影響，是遠遠超過《五·一六通知》的。又比如：我也不會過多關注林彪與陸定一之間的爭吵，這已被許多嚴肅的或非嚴肅的主流著作所過度研究過了。拒絕這類宮廷秘史性質的內容，不僅是因為我不佔有這類內部資料，而是因為它們和廣泛群衆所體驗的意義不太相關。相比之下，另一樁事件，即清華大學“八·二四”事件，為主流著作所遺漏，我將加以詳細考察，并把它當作群衆的文化大革命歷史叙事中的一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標誌性事件。

如何進行長時段的歷史斷代，直接影響著對歷史的闡釋。而在一個長時段內部，如何書寫中觀和微觀的進程，也事關到誰被寫成歷史上的英雄或惡人。如何篩選往事的細節，何時讓歷史人物出場，如何追蹤事件的順序發展，從而呈現出因果鏈條，這些話語過程恐怕都很難保持中立客觀。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主流的文革回憶錄和歷史中，常常會發現混淆時間順序、混淆人物派別的錯誤，比如：混淆 1966 年和 1967 年，混淆“破四舊”和“奪權”，混淆“紅衛兵”和“造反派”，或者，為了配合宏大叙事和故事主題，有意無意地回避、模糊有關派別、聯盟^[1]，這幾乎形成了一種文革史的穩定的文體。

任何編年史性質的材料，都蘊涵著某種“自然史”的

[1] 楊小凱：《再談“文革”》，《中國之春》一九九二年十月號。

敘述結構。現有的接近于文化大革命編年史的文獻，包括《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12–1967.10.1)》、劉國凱的《文化革命簡析》、嚴家其、高皋的《中國“文革”十年史》、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簡史》，和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1]。比較一下這幾個版本的文化大革命歷史，就可以發現：對 1966—1968 年群衆運動階段的處理，《中國“文革”十年史》、《“文化大革命”簡史》和《大動亂的年代》不同程度上以精英上層的人事變動為線索（特別是《簡史》），而《大事記》和《簡析》則一定程度上呈現出造反派群衆和黨委領導的衝突發展的線索。這個區別意味著：是將文化大革命中群衆的行為歸約於精英操控，把下層群衆的經歷、感受、言論和行動的記錄基本勾銷，還是充分估計下層群衆的獨立訴求和主動作用，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群衆政治在歷史上佔有一席地位。

本書自始至終所關心的，是群衆的政治，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人群的政治。為了敘述上既具有精確性又具有可讀性，應用了一些當代社會科學概念，其中比較中心的就是“集體行動”（不能不承認，從英文來的直譯是蹩腳的，一些中文文獻所用的“群體行動”也許更適合些）。略微不幸也略微反諷的是：這個術語是通過奧爾森著名的《集體行動的邏輯》而更加流通的，而他對“集體行動”的

[1] 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12–1967.10.1》，1967 年，北京。嚴家其、高皋：《中國“文革”十年史》，中國問題研究出版社，1987 年。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 年。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

實現可能性是悲觀的。不過，這個詞已成為社會運動研究的關鍵概念，廣義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也具有了正面的、積極的和可行的意義，亦即“具有共同的冤屈、共同的訴求的人們，協調一致，在公共的空間裏表達意見、爭取權益的行動”。在讀者讀了本書對有關靜坐、請願、抗議、絕食的活動的描寫之後，對“集體行動”這個詞所概括的意義就會更加清楚了。為了分析和理解，我有選擇地運用了其他一些當代概念，包括當時人們並不曾使用過的詞彙，比如：話語、公民政治、保守主義、陰謀理論等等。另一方面，本書也難免使用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一些詞彙，比如“群衆大民主”、“造反”、“保守”、“當權派”等帶著較強態度色彩的詞彙，當然，會在適當的機會對它們的意義加以批評和反思。

六、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歷史研究的“轉向語言”，為本書提供了啓發。因此，本書對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原始文獻、人們當時的文字和言語表達，當作歷史活動的一部分來研究，而以往的文革歷史研究常常輕視這種話語活動^[1]。本書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文化大革命群衆運動本身所創造出的大量原始文獻、人們當時當地的主體訴說，構成了歷史行動者在當時所體驗的意義，這是真實的歷史，這種真實性，是當代人們以今天的體驗、今天的語言和今天的意識形態

[1] 比如有代表性的，是印紅標的《1960年代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二十一世紀》一九九六年八月號，第三十六期），文章涉及大字報文本的，只有這樣一句：“大字報的標題是《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甚麼？》文章通篇政治攻擊，其內容早已是衆所周知，這裏不再贅述。”印紅標似乎認為大字報本身的文體、修辭特點，不是“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整個故事的一部分。

偏見來詮釋過去所無法獲得的。在強調意義構成歷史、語言創造體驗的同時，我也拒絕那種以後現代主義名義來否定一切宏大叙事、否定一切歷史真實的觀點，群衆的文化大革命史，旨在提供一個另類的宏大叙事，即至今為止其聲音被排斥的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故事。

為了得益于社會史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本書還採取了在時間、空間上廣闊開放的比較視野。文化大革命被稱為“史無前例”的事件，在很多意義上說，這是確實的，但這不應成為跨時空比較的障礙。實際上主流的文革歷史研究也一直採用著比較的視野，其比較參照對象就是納粹德國的法西斯運動，和蘇聯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本書不打算和這類比較直接對話，而是提供另類的比較視野，供讀者參考對照。在閱讀文化大革命歷史和其他世界歷史時，我發現中國文化大革命和三個歷史時空有豐富的類比和對比關係，即：十八世紀法國革命、二十世紀西班牙內戰，和美國六十年代民權運動。

已經有學者注意到法國革命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對比關係^[1]。對我來說，法國革命最有意義的一面，是其複雜和多層次：不同的階級、等級之間的關係之複雜，各群體和革命的關係及其變化、轉向之複雜；貴族、中等階級分別進行了自己的革命，隨後群衆也進行了自己的革命，群衆中還出現了極端激進派別。法國革命中政治語言的矛盾、激進主義、“道德統治”、大恐怖的興衰，都促使我們思考中國文化大革命和法國革命中相似現象的共同社會基礎。

[1] Edward Berenson: “A Permanent Revoluti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1789,” Modern China, Winter 1995.

其次，法國革命所激發的左、右兩派的政治辯論，法國革命研究中所出現的“社會解釋”、“修正解釋”以及其他學派之間的鬥爭，也對我們今天闡釋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有所啓發。

從 1936 到 1939 年間的西班牙內戰，也具有高度的複雜性和多層次性。在這裏，西班牙內戰中的政治派別，分別屬於二十世紀的幾個典型的意識形態，特別是左派陣營內部的激進派別和保守派別的分裂，已經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大革命政治分野的端倪。瞭解西班牙左派陣營內部衝突所導致的巨大悲劇，為理解文革對中國人所造成的同樣巨大的創傷有所幫助。西班牙內戰從第二共和國的體制內改革到右派軍事政變，從內戰到來自下層的社會革命，對於理解文化大革命及其所引發的全面內戰，具有啓發作用，儘管在作這種類比時，類比的限度、歷史和社會背景的特殊性需要加以注意。

美國六十年代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民權運動，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聯繫就更密切了，許多人認為它們屬於世界範圍內的同一個激進運動浪潮。這裏所關心的，是民權運動所採取的社會弱勢群體特有的鬥爭策略，比如：靜坐、佔領等“公民不服從”的行為模式。在本書中，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集體行動方式，將和西方資本主義背景下受壓迫、受迫害群體的“公民不服從運動”相比較，另一方面，白人種族主義團體以暴力恐怖來鎮壓、迫害黑人民權運動，這是資本主義歷史上右翼保守主義的典型行為方式。這種保守主義的集體行動方式，也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找到它的社會學對應物。

下面談談材料來源問題。

現有官方權威史著的一個明顯特點是：對原始材料和事實來源的極度輕視。關鍵性的事實陳述通常是沒有註解和引文的（王年一的《大動亂年代》相對好一些）。當然，官方史學家能看到內部的、秘密的檔案，因其秘密性質，註明來源本不可能，也沒必要，因而，我們必須相信官方史著中所有未註明出處的論斷，我們必須服從信息壟斷者對真理的壟斷。然而，這正是問題的所在：在這個意義上，文革的鬥爭還不是“過去”，還在以權力的不平等為基礎、以對事實和真相的忽視和遺忘為方式在持續著。

這個問題並不限于官方史著，而是在非官方色彩的主流文字中發展到極端。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國所特有的紀實文學。高默波對此評論說：“葉永烈和戴晴屬於這類紀實文學作家，他們很少引證文獻資料。他們很自信，以為相信他們的話就像相信文獻資料所證明的一樣的天經地義。”^[1]

史料問題是一切群衆史、下層史所歷來面臨的問題。有諷刺意味的是：群衆史的資料來源恰恰最離不開國家機器，因為最豐富的有關普通人的信息通常是由國家所收集和掌管的，比如：居住和稅收記錄、生卒嫁娶記錄、警察機構的檔案等等。魯德所作的法國大革命中的人群的研究，就主要是根據巴黎各區警察的逮捕審訊檔案。另一類資料來源，是各種各樣書面的和口述的民間回憶材料。公開出版的、已經成為一大文學部類的文革回憶錄文學，其視角、文體上的缺陷，前面已經有所提及。而群衆的口述史工作，

[1] 高默波：《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是否該偏正一點兒？》，楊建利編《紅色革命與黑色造反——1960年代三十周年紀念研究文集》，二十一世紀基金會，1997年。

雖然已經有所展開，但存在著對官方和精英話語的嚴重依賴，同時也面臨著審查、商業化等等問題^[1]。

還存在著一個中間層次的資料來源，這就是報紙和民間出版物。大眾印刷和西方資本主義同時興起，也成為研究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史的一個重要來源。查爾斯·提利的《英國的民衆抗爭：1758–1834》和相關的開創性研究，是依賴報紙對群衆集體行動事件的報道作為數據主要來源的範例^[2]。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情況稍有不同，這裏關注的重心，是作為文化大革命獨一無二的特殊產物——群衆出版物。這不僅是最豐富的信息來源，而且本身就是歷史，是必須發掘、研究、和評價的對象。如果以對群衆出版物的研究作為衡量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尺度，那麼，今天的文化大革命研究還處在蒙昧落後的狀態。最基本的第一步，是把群衆出版物作為文化革命歷史的首要原始文獻，對其進行登記、整理、分類、出版，只有對群衆出版物的全部面貌有了大致的瞭解和掌握，嚴肅認真的、學理意義上的文化大革命研究才有可能^[3]。

本書的材料來源，絕大多數屬於群衆出版物這一類，而且僅以我所接觸到的為限：大部分是美國大學圖書館所

[1] 有關回憶錄的批評，見：Mobo C. F. Gao, "Memior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7, No. 1, (Jan.–Mar. 1995), pp. 49–58. 口述史方面，馮驥才的《一百個人的十年》（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年）就是一例。

[2] Charles Tilly: *Popular Contention in Great Britain: 1758–183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 網上仍在建設之中的“文化大革命文獻館”就是為了有系統地收集、陳列文化大革命初期群衆性原始資料。網址在：<http://geming.20m.com/wenge/wenge.htm>。

收藏的幾個系列的《紅衛兵資料》，一小部分是個人的收藏。在寫作本書過程中，作者在材料佔有上並沒有任何優勢——相信我所採用的絕大多數原始材料都是主流文革史學家已經掌握的。對於這些原始材料，本書採取的兩個策略是：文字為憑、懷疑主義。文字為憑，就是歷史事件的敘述，儘量以原始文獻為依據；對於其他著作中沒有給出處的信息，一般不去引用。懷疑主義，即對原始文獻所提供的信息，一般採取懷疑的態度，而不是假定為事實。

不過，仍然存在著如何界定“原始文獻”的範圍的問題。而追究這個問題可能又會追回到文化大革命如何界定的問題。對我來說，1966年到1968年間的官方文獻和群衆出版物，是“原始文獻”的主體，這個時間段之後不久所出現的回憶、信件和文件等，也部分地屬於“原始文獻”，而時間相隔十年以上的回憶、評論等，就難以算作“原始文獻”，儘管它們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仍具有史料價值。

也許本書的一個顯著缺欠是口述材料。這裏，有我上面提到的原因：當前有關文革歷史的民間口述實踐，還難以擺脫官方文字史，也就是精英文革史的影響，作為反體制、顛覆性的群衆口述活動，正如同當前其他形式的市民社會活動一樣，處於或受壓抑、或被收編的狀態。其次，目前這本書的目的十分有限，主要是一個編年性質的簡史，或者是一部編年性質的材料索引，加上初步的意義闡釋。因而本書可以較多地依賴以事件為中心的文字記載，而不是以社會生活為中心的口述記載。希望這個工作能夠為今後更多的社會史方向的研究作必要的準備。

在這個問題上，我相信：語言來自體驗，同時也建構體驗，並規定著人們對意義的理解。群衆若想親口講出他

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的故事，還必需把這樣作的權力交給群衆，這個權力，除了言論、出版等方面必要的消極自由之外，更重要的是，群衆在說什麼、怎樣說的問題上，要獲得積極的自由，即擺脫屬於精英、來自精英、為了精英的思維定式，創造來自群衆自己的闡釋框架，在話語實踐方面爭取賦權和解放。海登·懷特有關歷史的修辭的叙事化、故事性的論斷，不應該成為放棄追求真相的原因，而應該成為在言論表達領域賦權給人類最大多數的動力^[1]。

本書的章節是這樣安排的：前四章大致按照時間順序，記載文化大革命前夕到 1966 年底的事件發展。第一章以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四清”運動引入領導與群衆的主題（作為例外，這一章較多地涉及政治精英）；第二章考察對文革發展路徑具有決定意義的 1966 年 6 月初開始的 50 天；第三章、第四章介紹 1966 年 8 月十六條發表後的一個多月內各地群衆與領導的矛盾衝突；第五章、第六章講述 1966 年 10 月開始群衆運動內容的新變化，即“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開始，包括群衆性“搶黑材料”運動，直到“一月風暴”的前夕。第七章、第八章以高幹子弟群體作為關注重點，重新從 1966 年的夏天開始，梳理文革中的保守主義從“對聯”到“聯動”的演變過程。第九章有關一月風暴中《北京日報》的奪權過程，則是對 1967 年 1 月全國性的大動蕩進行的一個局部的特寫。第八章在前面的編年資料的基礎之上，對文化大革命的斷代問題進行專門討論，并指出斷代問題和文革實質問題其實是同一個爭論。最後，

[1] 海登·懷特：《後現代歷史敘事學》，陳永國、張萬娟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結語部分試圖對長時段意義下的中國文化大革命進行一個理論上的闡釋。

第一章 文革前夕的領導與群衆： 以四清為例

在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國家歷史中，新中國的群衆運動是獨一無二的。一段時間裏，中國人把群衆運動當成實現國家建設與社會變革的主要手段。從更廣闊的近代世界歷史看，群衆運動起著民族國家建設和現代化的助產士的作用。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群衆運動這一詞彙，使人們想起民主的擴大、工人成立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權利、婦女和少數民族的民權等等，意味著獨立于體制權勢和秩序之外的民間力量，總之，它代表著人類進步和啓蒙的方向。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後的中國，群衆運動一詞所喚起的，是完全相反的意義，它代表著一段令人痛心的歷史，一場“浩劫”，象徵著人性中狂熱、非理性、自私和殘忍的一面，它的形象就是大轟大嗡、社會動亂、以及人民的水深火熱。在中國主流知識分子的語彙中，市民社會這一詞被賦予神聖的光環（這光環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和群衆運動緊密相關），而相比之下，群衆運動則意味著打砸搶、瘋狂盲動，帶著再也擺脫不掉的耻辱印記。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不僅如此，和群衆運動相聯繫著的，是一組對立著的歷史人物的形象，在文革過去

後的幾十年中，在官方的和流行的文字中被塑造出來。一方面，是錯誤地發動群衆運動的領導人，和利用群衆運動的野心家，他們迫害好人、製造冤案、陰謀整人，乃至推行封建法西斯主義。另一方面，是和群衆運動相對立的、進行抵制的溫和人物，或受群衆運動殘害的蒙冤者，這些包括知識分子、老幹部，許許多無辜的好人，而其中最為顯赫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劉少奇冤案”成為文革冤案的理想型，成為聲討文革、控訴群衆運動的主題。此後，在中國，群衆運動就成為違反理性、違反正義、違反人民意願的同義語。

自九十年代末以來，來自世界各地的反對資本全球化、推動另類全球化的運動不斷發展，群衆性的集會、串聯、經驗分享、直接行動，群衆運動又再次出現在更大的舞臺上。儘管階層和團體多元并存，議題和訴求多種多樣，這種新型的群衆運動延續了 1960 年代世界“革命大演習”^[1] 的主題：反壓迫、反專制、爭取人類尊嚴和自由。連體制內的統治者，包括世界銀行、西方各國領導人也迫于形勢，不得不對群衆運動表示寬容，甚至吸收、竊取群衆運動的語言和詞彙。在世界各地，群衆運動都和積極的社會變革聯繫在一起，無論是在西雅圖，在開羅，在巴西阿里格雷港，在印度海德拉巴德，在瑞士達沃斯，都是如此；然而，却有一個重大的例外，這就是在中國。

如何理解和解決這個鴻溝？這同時也意味著，如何理解和解決一個時間上的鴻溝，那就是主流話語對群衆運動

[1] Arrighi, Giovanni, Terence K.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1989. “1968: The Great Rehearsal,” pps. 19–33 in Revolution in the WorldSystem, edited by T. Boswell. New York: Greenwood.

的偏見，和發生在四十多年前的中國群衆運動的歷史之間的鴻溝。

這裏，我們先來回顧一下有關新中國群衆運動的一兩件歷史公案，將要涉及的重要人物就是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因此，通過本章的內容，讀者能够大致瞭解到新中國成立以來形成的政治運動模式及其和群衆的關係，而這些又如何為即將來臨的文化大革命做了政治標籤、話語、和行動模式等方面的準備。

劉少奇與群衆：1961年湖南蹲點調查

劉少奇是最極端的群衆運動——文革群衆運動的直接受害者。1963–1965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可認為是文革運動的前奏，而這個運動，主要是由劉少奇領導的。文革群衆運動造成了劉少奇的巨大的個人不幸，同時也暴露出群衆運動的嚴重問題，造成後來人們對群衆運動的厭惡和冷淡。而常常較少被論述的，是劉少奇本人的工作作風對文革群衆運動的影響，特別是通過他所直接領導的四清運動，其政策、方法和遺留下的矛盾，對後來文革中矛盾衝突的影響。事實是，劉少奇、王光美在四清運動中的工作方式和他們在文革初期的表現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對中國群衆運動經驗教訓的總結，離不開對劉少奇與群衆、劉少奇與群衆運動的關係的考察。

先從四清之前發生的一個故事中來考察劉少奇和群衆

的關係，這其中包括劉少奇的群衆觀，劉少奇執行“群衆路線”的方法，劉少奇對待幹部、群衆的方式、處理矛盾衝突的方法，等等，這一故事，就是 1961 年劉少奇的湖南蹲點調查。

這件事的來由是：1960 年 1 月 13 日，毛澤東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廣州會議結束後，劉少奇于 4 月 1 日至 5 月 15 日到湖南的寧鄉、長沙兩縣農村進行了 44 天蹲點調查。劉少奇先在寧鄉縣東湖塘公社王家塘生產隊呆了五天，9 日到湘潭市郊荷塘公社許家壘生產隊，三天後，即 4 月 12 日，來到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在這裏劉少奇蹲點 18 天，是他整個湖南之行蹲點時間最長的地方，也是他在後來的多次講話中反覆提到的地方。之後，劉少奇回到故鄉寧鄉縣花明樓炭子沖，作了七天調查，又繼續看了一些地方後，回到長沙，結束了調查。^[1]這次調查，成爲劉少奇“模範執行中央決定、帶頭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的重要資歷，成爲他後來在各種會議上發表講話的題材，也成爲他制訂政策、簽發批示的參照。1962 年 1 月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劉少奇提到：“我到湖南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其依據就是這次調查。

在這裏加以特別考察的，是劉少奇在天華大隊長達 18 天之久的蹲點調查，這不僅是因爲很多文章和傳記材料較詳細地記載了劉少奇在天華大隊的活動情況，也因爲劉少奇在這裏蹲點時間最長，對當地事務涉入最深、影響最大。

[1] 曾昭宣：《劉少奇 1961 年湖南農村調查的重要意義》，原載《劉少奇和他的事業——研究選粹》，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年。

這裏所根據的材料來源，多數是文革後公開發表和出版的文獻，個別是文革當中群衆組織的出版物上所發表的相關材料。

天華大隊原來是湖南省農業合作化運動以來樹立起的一面“紅旗”。劉少奇來以前，中央曾派出胡喬木和人民日報的調查組在這裏調查了一兩個月，調查組認為這裏是生產生活搞得比較好的典型，并向中央寫了報告。然而，劉少奇通過 18 天的蹲點調查，却得出了和中央調查組不同的結論，認為這個隊有問題，生產和其他工作并不是最好的，而是中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劉少奇和天華大隊總支書記發生了嚴重的面對面的衝突。下面，我就根據有關材料，篩掉其中明顯帶主觀判斷的部分，將有矛盾衝突的信息加以分析、取捨，將材料還原成儘量完整的、帶有事件發展來龍去脉的故事。

這個故事中的個別細節，在 1980 年以來公開發表的文獻中，和劉少奇在有關四清運動的幾次講話中所透露的略有出入。先來看前者。

按照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1998 年出版的《劉少奇傳》和其他官方記述，天華大隊受“左”的錯誤的影響，糧食連年減產，平均主義、虛報浮誇現象嚴重存在。當地幹部採取統一口徑、弄虛作假等手段，隱瞞實情。因此，先前的胡喬木和中央調查組沒有反映真實情況。劉少奇在蹲點

的 18 天中，首先連續召集大隊幹部座談會和生產隊幹部座談會，徵求對公共食堂的意見。開始時，幹部們都言不由衷，欲說又止，廣大幹部、群衆受歷次政治運動鬥爭擴大化的影響，不敢講真話。為了克服幹部們“左”的思想的束縛，劉少奇努力打消他們的顧慮，反覆誠懇地請求他們說真話，幹部們終於被劉少奇的誠懇態度所感動，紛紛訴說公共食堂的壞處。劉少奇還走訪了社員家庭，把群衆對食堂的批評歸納為八條，講給社員聽，大家都很贊成。于是，劉少奇在天華大隊總支委員會會議上說，食堂辦起來是大錯誤，“不是我們提倡散，而是群衆要求散，要允許群衆有這種自願。”之後，劉少奇正式對當地公社、大隊的幹部說：“請你們立即宣布解散食堂^[1]！”

這裏，我們關心的不是公社食堂成敗的問題（而天華大隊食堂是否和其他地方的食堂一樣徹底失敗，這是有疑問的，下面將要談到），而主要是政治精英和群衆的互動方式的問題。讓我們特意來看一下有關記述對當時情景的生動描寫：

“食堂解散了！”消息傳出，許多群衆興高采烈地歡呼起來，大家都當作特大喜訊奔走相告，很快就傳遍了附近的社社隊隊。

“這是什麼人開的恩？”

“聽說是省委工作隊。”

“沒有聽說傳達中央文件，省委工作隊有多麼大的權力？”

“是劉主席親自下的命令！”

[1] 劉振德：《我為劉少奇當秘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

感激、喜悅、疑惑。但“食堂解散了”確是實實在在的。

束縛在群衆身上的枷鎖被砸開了，人們能不笑逐顏開，能不歡呼雀躍嗎^[1]！

.....

天華人民從心裏感謝劉主席。他們說“這回真是來了青天”，“劉主席和我們想到一起了^[2]”。

這樣的典型人物的典型情節的描寫，很自然地就納入了中國封建傳統的“清官”乃至“明君”話語：一位高高在上的皇上或大官，微服私訪，深入民間，體察民情，才發現民生艱辛，且恐于當地惡吏的橫行霸道，敢怒不敢言。皇帝（或清官）的臨幸驚訝和感動了苦難中的小民，他們跪地痛哭，一股腦地將苦水倒出，皇帝（或清官）開恩，憑舉手之勞，就解決了民衆的倒懸之苦，萬衆歡騰，齊呼“皇帝萬歲”，或“真是來了青天”。

有關劉少奇湖南調查的官方記述，和以上話語的各個細節都是吻合的：比如：輕裝簡從，住在老百姓家裏，睡門板鋪禾草，親自到社員家中訪察，啓發誘導社員講真話等等。還有兩個細節突出地表現了人民共和國的這位“青天大老爺”的“體察民情”的形象：一是在東湖塘公社調查時，用腳撩開山坡上一堆風乾的人糞，來察看有多少沒消化的草和草根，二是在天華大隊施家沖社員座談會上，取下藍布帽，露出滿頭銀髮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躬。共和

[1] 曾昭宣：《劉少奇 1961 年湖南農村調查的重要意義》，原載《劉少奇和他的事業——研究選粹》，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年，p135。

[2] 中共長沙縣委員會：《實事求是，為國為民》，原載《懷念劉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p326。

國主席察看農民的糞便、向社會最底層鞠躬的描寫，表現了在九天之上的高級官員對九地之下的民間躬親訪問的反差，更從反面突出了精英和群衆之間的森嚴等級。

劉少奇的湖南考察被譽為深入群衆、走群衆路線的典範。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有著強大的依靠群衆、走群衆路線的傳統。翻開劉少奇的著作、講話，他對群衆和群衆路線的論述比比皆是，看上去似乎和毛澤東的差別不大。然而，仔細解讀，並參照劉少奇在湖南調查中的工作方法，我們能看出一個微妙但重大的差別。

美國學者洛厄爾·迪特默在 70 年代寫作的《劉少奇與中國文化大革命：群衆大批判的政治》一書中已經精闢地總結了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和群衆關係上的差別：

[劉少奇] 的大部分時間都是作為一個工會組織者在為工人工作，或與工人在一起度過的，他對此感到自豪。即使身居高位之後，他每次到農村“視察”總是堅持“參加生產勞動”。……毛並沒有比其他領導人花費更多的時間去深入群衆——毛實際上可能是官僚主義的“脫離”的最典型的受害者，因為他常常長時期地與世隔絕，據說，他的死也與此有關。但是，與其說毛為促進領袖與群衆之間的直接關係所做的努力是非常零碎和偶然的，不如說他比劉更注意給那部分社會地位低下、“愚昧無知”的人以更多的權力^[1]。

迪特默的這個觀察是有洞見的。的確，毛澤東 1959 年 6 月到家鄉韶山，並沒有像劉少奇那樣作蹲點調查。1955 年，毛澤東號召領導同志都下去調查農業合作化運動時，自己

[1] 譯文引自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蕭耀先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 年。

並沒有去實地考察，而是根據各地的調查報告編寫《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另一方面，毛澤東除了強調深入群衆、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之外，他更強調：將傳統意識中的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等級觀念顛倒過來。他說，群衆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應該是指共產黨領袖和一般的精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軟弱、愚昧的群衆，需要開明的政治精英去領導和拯救，而問題在於讓民衆永遠脫離軟弱、愚昧的狀態，讓民衆組織起來、學會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一種是救民于水火，一種是增加民衆自己手中的權力，前者是拯救，後者是賦權，雖然都能給民衆創造福祉，但却是兩種非常不同的方法。在中國革命的民主革命階段，這兩件事並沒有衝突，都體現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造反之中。在共產黨以人民的名義掌握國家權力之後，兩種群衆觀、兩種不同的對群衆的工作方法，就漸漸顯露出來，並發生矛盾衝突。

在毛澤東心目中，“給那部分社會地位低下、‘愚昧無知’的人以更多的權力”的方法，就是讓群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解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言論的解放，因此，賦權的主要手段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而在其他很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心目中的群衆路線，是經過封建傳統的“明君”、“清官”的棱鏡折射過的“愛民如子”意識、“爲民請命”意識和“青天老爺”意識。

劉少奇湖南調查的官方記載，無論是否準確、是否片面，都反映出：劉少奇傾向于將群衆理解為可憐無助的子民，而他很樂于以至高無上的中央領導人的力量去解民于倒懸，使他們恢復到“安居樂業”的理想狀態。官方記載的描寫也加強了這種渲染，比如下面這段描寫：

少奇同志聽著社員們的這血與淚的控訴，再也坐不住了，他氣憤地說：“既然已到了這個地步，你們過去怎麼不提意見，現在還是膽戰心驚不敢直說？”

“誰敢說喲，上面說公社食堂是社會主義陣地，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橋梁，誰說食堂不好，就是拆橋，就是破壞社會主義陣地，就要被戴上右傾分子帽子，就要受到無休無止的批判，如果今天不是你劉主席，我們的這些心裏話只能讓它爛到肚子裏……”

這位社員的哭訴，又使少奇同志冷靜了下來，是啊，不能怨這些善良而寬厚的群衆。我們的群衆多好啊，他們已經到了饑寒交迫的地步，還在默默地忍受著^[1]。

接下來的情節，就是劉少奇宣布解散食堂，群衆奔走相告。感謝大慈大悲的領袖，將饑寒交迫的群衆，復原到感激涕零、安居樂業的群衆，仍像以前一樣善良而寬厚，繼續忍受著其他世間的不平。這一段描寫，與其說是對公社食堂的控訴，不如說是對下層群衆安于被宰割的謙恭態度的贊美，劉少奇對黨員必須作馴服工具的論述，和這種精神是完全一致的。^[2]

劉少奇沒有安排讓更多的社員去控訴，更沒有安排不

[1] 劉振德：《我為劉少奇當秘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p134。

[2] 劉少奇：同北京日報社編輯的談話，1958年6月80日。

同意見之間的辯論。控訴和辯論並不是劉少奇的目的，從上至下施行大慈大悲的仁政，才是目的。控訴和辯論將賦予群衆權力，將使他們自信，將使他們擺脫“善良而寬厚”、“默默地忍受著”的狀態。但這不是劉少奇所要的。

既然不讓群衆自己解放自己，就要由黨和精英來“體察民情”，來“為民做主”，劉少奇指示調查組講究工作方法，注意群衆情緒，注意他們說話的語氣，從中發現問題。如你提出一個問題，群衆“是鼓著眼睛，還是眯著眼睛，是笑臉，還是哭臉，是昂著頭，還是低著頭”^[1]。群衆變成了不會說話的嬰兒，要由父母官們去解讀其表情。幹部群衆一開始說的話，都是不可信的，因為或是被當地幹部所脅迫，或是被“極左”所禁錮，不敢說真心話。這真描繪出一個封建傳統秩序下的民衆狀態。總之，群衆就是這樣一群軟弱無助的不幸者，一些沉默的群氓。

彭梅秀事件

劉少奇在天華大隊的調查，也遇到了一些矛盾鬥爭。這就是發生在大隊總支書記彭梅秀和劉少奇之間的衝突。文革後的官方文獻中，趨向于將此事件輕描淡寫，可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劉少奇和當時長沙縣委在此問題上的矛盾，比如劉少奇的秘書劉振德和長沙縣委就對彭梅秀的褒貶程度不一。有關文獻記載，劉少奇發現天華大隊的一些問題並著手解決時，大隊總支書記彭梅秀和劉少奇產生了對立

[1] 王中杰、陳清林、葉建軍：《試析 1961 年劉少奇湖南蹲點調查》，原載《劉少奇研究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 年。

情緒。劉少奇的調查顯示彭梅秀有講大話、搞浮誇、欺上瞞下、壓制民主的錯誤。而彭梅秀則公開對國家主席發表不敬的言論，說：“劉鬍子不是來抓生產的，是來找岔子的。”一次劉少奇正在同工作隊談話，彭梅秀在外面大聲叫罵，劉少奇只是微微一笑，若無其事地繼續談話。在離開天華大隊那天，劉少奇找彭梅秀作了最後一次談話，說：“我作為國家主席，是領導；作為共產黨員，我們都是同志。我這次到這裏來，群衆都說過去大隊工作有成績，有一些好的經驗，同時也給上面，給你們大隊總支，包括給你提了很多批評。我看這些批評很正確。”據記載：“彭梅秀同志坐在慈祥的劉主席身邊，又激動、又愧悔。她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衷心感謝黨組織，感謝劉主席對她的教育和幫助。”“後來，彭梅秀同志愉快地服從黨組織決定，調到黃花公社擔任黨委副書記。她仍然積極地為黨工作，一年後被可惡的病魔（淋巴癌）奪去了生命。^[1]”

然而，從劉少奇在四清中的多篇講話中，我們發現這件事情遠比上面所描述的複雜、嚴重，儘管劉少奇的講話本身並沒有交代事情的全部來龍去脈。以下是劉少奇 1964 年 7 月 13 日在安徽地、市委書記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片段：

一九六一年我在湖南天華大隊住了十八天，在我
去之前，胡喬木和人民日報工作組在那裏住了幾個月，
寫了一厚本調查報告，大多數材料是不確實的，他被
基層幹部騙了。天華大隊是湖南一個多年的模範大隊，
支部書記是個女勞模。這個隊生產也不錯，比其他隊

[1] 中共长沙县委员会：“实事求是，为国为民”，原载《怀念刘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p326。

少許好一些，但不是一類的，也不是三類的，是中等。我相信，胡喬木的報告，也找勞動模範彙報了，又找貧下中農座談了，住了十多天，才發現這個隊有問題。那裏真正當家的，是一個地主的兒子，當她秘書，勞模是出面的，勞模也並不是那麼真，並不那麼模範。發現問題後，給長沙寫了個信，叫縣長帶了一個工作組去了，召集貧下中農開會，扎根串連。開了一個用湖南的話叫三部份人的會議，即貧農、雇農、下中農，沒有叫支部書記參加會，沒有按照她的安排去做，於是這個勞模生氣了，要趕我走。我是國家主席，又有幾十個人一道，她趕我走，我就不走。我用打游擊的辦法，住老百姓家裏，困臥草。公安廳長也去了，還有帶槍的，她要趕我走，說我把她的秩序搞亂了。湖南稱年紀大的叫鬍子，你姓李，叫你李鬍子，她叫我劉鬍子，說劉鬍子呆這麼久，把她秩序搞亂了……。我只是發現問題，問題並沒有完全搞清楚，更沒有解決問題，解決問題是交給縣長，搞了半年。”

這件事，劉少奇在不同場合的講話中反覆提到（如：《在河北地委書記座談會上的講話》（1964年7月2日）、《在華東局、上海市負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4年7月21、23日）、《在湖南省直屬機關及地市委負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4年8月10日）、《關於社會主義教育問題和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問題的報告》（1964年8月1日）），內

容大同小異，我們從中可知：雖然劉少奇這次調查活動號稱不要領導人陪同，但實際上湖南省公安廳派了幾十個人的武裝隊執行保衛工作，帶著槍，用劉少奇的話講，“聲勢浩大”^[1]。說劉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這次蹲點調查興師動衆不為過，除了劉少奇叫縣長帶一個工作組去扎根串連之外，中南局、湖南省的主要頭面人物陶鑄、王任重、張平化以及胡喬木都專程前往天華大隊。^[2]作為一個小小的大隊總支書記的彭梅秀，不僅當面和國家主席發生衝突，（劉少奇在講話中憤憤地說：“我是國家主席，帶著武裝隊去，都要趕我。”^[3]）而且在陣容強大的官僚的壓力面前也沒有屈服，劉少奇派省委一位處長找她商談，她避而不見。事後，劉少奇派了省婦聯主任易湘蘇去做彭梅秀的思想工作^[4]。

有關彭梅秀被調動工作，以及後來病逝的情況，官方文獻沒有詳述，這裏參考文革運動時期發表在群衆組織報刊上的一篇調查報告所提供的信息。根據這篇彭梅秀的愛人萬國華口述的報告，彭梅秀被調動工作是出于劉少奇對彭進行打擊迫害，而彭梅秀的病逝，省、縣的領導人負有一定責任。

這篇題為《血淚的控訴——劉少奇是怎樣害死優秀的共產黨員彭梅秀的》的調查報告說^[5]，自從劉少奇認定彭梅

[1] 劉少奇：《在華東局、上海市負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4年7月21、23日）。

[2] 張平化：《回憶少奇同志在湖南蹲點》，原載《我眼中的劉少奇》，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3] 劉少奇：《關於社會主義教育問題和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問題的報告》（1964年8月1日）。

[4] 唐振南、王文珍、賀正：《劉少奇與毛澤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5] 原載紅代會南開大學《衛東》1967年7月1日，南大衛東赴湘調查組整理。

秀是壞幹部之後，就下了一道命令，責成省、市、縣委派來一百多人的工作隊，劉少奇自己任分隊長。省委張平化、王延春帶著三個廳局長級幹部、十多個處級幹部、幾十個一般幹部也聞訊趕到，長沙市委農村辦公室副主任汪季雲，長沙市委副書記，縣長李滿城也帶著大批幹部報到，一場以“整風整社”之名來打擊、陷害彭梅秀等人的運動開始了。彭梅秀聽說劉少奇決定開大會鬥爭她，就氣沖沖地跑到王家塘找劉少奇講理。她責問劉少奇：“我犯了什麼法，有什麼錯誤，包庇了什麼壞人，你就指出，你不指出，不搞清我就不走。”這時胡績偉（應該是和劉少奇一齊來的）跑出來叫人捆彭梅秀，說：“彭梅秀反對劉主席”，並罵彭梅秀是混入黨內的壞傢伙。而彭梅秀板著臉說：“你捆吧，我沒犯法，我沒有錯誤，你嚇不了我，你不敢捆，你以為我會怕劉鬍子呀，不怕哩！”當時很多社員在田裏做活，聽說要捆彭梅秀就都跑過來了，將她勸著拖走了，並對她說：“彭書記，好漢不吃眼前虧，你鬥得過他呀？他是國家主席哩！”彭梅秀仍大聲說：“怕什麼，國家主席吃不了人，我不怕，捆就捆唄，我沒犯法，他不敢捆。”

從此，劉少奇就將彭梅秀“一脚踢開”，大小會不讓她參加，而彭梅秀有兩次硬要衝進去參加，一進去就質問他們：“你們要開什麼會？為什麼不通知我？誰決定的？現在我還沒有被撤職，就是撤了我大隊書記的職務，我還是公社副書記，還有權力參加哩！”

劉少奇想打擊彭梅秀，又抓不到她的小辮子，就決定把她調到金山橋大隊去，但彭梅秀決定抵制，她說：“我的問題是在天華大隊出的，應該在天華大隊搞清楚，劉鬍子不搞清我的問題，我就不去。”最後，劉少奇將彭梅秀調離

反省，還派兩個幹部長期監視她，連吃飯、大小便、睡覺都派人跟上。住在彭梅秀家監視她的人，或躲在窗戶下，或溜進屋內放下蚊帳睡在床鋪上，偷聽彭梅秀和家裏人的談話，監視半年之久，不准和社員談話見面，連住一個屋的親兄弟也不能見面談話，後來又藉口保護她，調到縣裏反省幾個月，她仍堅持不寫半個字的檢查。那時，彭的愛人患重病住院，彭梅秀在縣反省，抽空去看她愛人，也有人偷偷跟上，躲在外面花臺樹下偷聽。面對打擊，彭梅秀說：“劉霸子來，我不怕哩！我沒貪污弄弊，沒做壞事，你把我們大隊班子解散，把我搞走，我不同意。”

劉少奇在講話中曾提到“一個地主的兒子當彭梅秀的秘書”，根據萬國華的口述，這是指天華大隊的秘書彭登奎，被劉少奇認定為漏劃破落地主，并把一大批幹部劃入“彭登奎集團”加以排斥，一概打倒，成立工作隊把權接了過去，整理了彭梅秀等人的黑材料，并讓“有問題”的幹部調公社反省，把彭梅秀當“石頭”搬開。

後來，彭梅秀被調到黃花公社不久，即含冤患瘤病而死去。萬國華的口述說：“在她患病治療中，省衛生廳和長沙縣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搞了不少陰謀詭計。當時湖南醫學院附屬醫院說要立即轉武漢，但是省、縣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同意，同時還將患者放在婦產科住了一個月之久，使患者病情越來越重了，才轉入內科治療。後來內科又要轉北京協和醫院，經縣打電報請示劉少奇，劉少奇這個壞傢伙回電不同意，彭梅秀就是這樣活活地拖死了。劉少奇的魔爪就這樣惡狠狠地奪走了彭梅秀年青的生命，她死時僅三十一歲。”

天華大隊貧下中農對彭梅秀調走非常惋惜，對她的死

非常難過。彭梅秀死後，晚上十一點鐘尸體才能送回去，貧下中農一千多人站在公路上等候。第二天追悼會又是一千多人，很多人痛哭流涕。

以上敘述，和文革後的官方文獻出入較大，但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的講話所透露的信息基本吻合。綜合所有的材料，我們可以大致作出一些觀察：

首先，天華大隊的食堂並不是最差的，而劉少奇下令立即解散食堂，倒是給生產和群衆生活帶來很多困難。在第一次座談會上，彭梅秀說：“馬上散食堂，社員炊具有困難，鍋碗什麼都沒有，這樣一來會搞糟的。”但劉少奇不聽，說：“我說你不要談了，你不老實，不講真話，為什麼群衆要散，你不要散哪？”不出所料，很多地方解散食堂後，社員家裏吃小鍋飯的炊具都沒有，問題嚴重。解散食堂，本來是糾正政策一刀切的錯誤的措施，但這個措施本身，也採用了粗暴專制、不顧地方實際情況的一刀切的方法。

其次，彭梅秀基本上是一個“好幹部”，沒有貪污，這是連官方文獻都承認的；對這樣一位年輕幹部，動用上百人的工作隊、幾十人的武裝隊，長期地監視、迫害，這就是國家主席、人民的大清官所為。這裏，我們看到的，是劉少奇的另一面，那就是歷次政治運動的老運動員，善于搞鬥爭、善于整人，敢于動用“大兵團作戰”來對付反對他的人。

彭梅秀事件展示給我們：在政治運動的殘酷打擊迫害下不幸死亡的劉少奇，本人也是在政治運動中打擊人、迫

害人的內行裏手。如果說，劉少奇死亡的原因，是文革運動對他的打擊迫害，那麼，根據同樣的邏輯，劉少奇亦應該為彭梅秀的死負一定的責任。

毛澤東晚年對群衆運動有一些著名的論述。他主張：群衆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是群衆運動的主要形式。這就凸顯出毛澤東和劉少奇在群衆運動如何搞法上的差別：毛澤東主張群衆自己起來展開不同意見之間的辯論，這就是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所開創的先例；而劉少奇則慣于依靠黨的官僚機器來展開運動，即向基層派遣工作組、工作隊，它們在基層就代表黨，可以以黨的名義、以運動的名義打擊一切敢于發表不同意見的人。群衆只是為他們壯大聲勢的侍從。下面將要論述的劉少奇領導四清運動的情況，將更進一步證實這一論點。

當然，這裏也不是把歷次運動所造成的打擊人迫害人的罪過都推到劉少奇身上，在基層用打擊迫害的方式搞運動的，是許許多多的黨的馴服工具，和一些機會主義者。比如：像胡績偉這樣的黨員，僅僅因為別人頂撞了劉少奇，就要把人捆起來，他們是劉少奇式的政治運動的積極推行者。而諷刺的是，幾十年後詛咒群衆運動殘忍暴虐的，正是同樣他們這批人^[1]。

在劉少奇蹲點的地方，也有類似這樣一個人物，這就是王升平。50年代，他在劉少奇的故鄉炭子沖任過村長、農業社長，人民公社化時任黨總支書記。1952年起曾多次寫信給劉少奇，反映家鄉的情況，被稱為是劉少奇的“農民通訊員”。劉少奇在國事繁忙的情況下，還給他寫過三封

[1] 胡績偉：《胡績偉自述》，四卷本，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

回信。在大躍進中，王升平犯了“五風”錯誤（即所謂“共產風、浮誇風、幹部特殊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被上級宣布撤銷職務，停職反省。但他不服氣，認為當時一切要大辦、大躍進都是上面號召的；鼓幹勁“放衛星”、“一天等于二十年”動機是好的。劉少奇在家鄉考察期間，請來王升平，向他詢問對公共食堂的意見。在劉少奇的啓發下，王升平說：“實話講給劉主席聽，大鍋飯再吃下去，就會人路死絕，國破人亡。^[1]”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王升平本來是緊跟“極左”路線的幹部；很多像他這樣的幹部在大躍進中，大搞“五風”，大搞“極左”，這是導致公共食堂失敗的因素之一；而這些幹部很容易從“極左”變到極右，成為群衆新生事物的最激烈的詆毀者。文革後的許多官方文件，犯了張冠李戴的錯誤：“人路死絕，國破人亡”這句話，本來出自寧鄉縣花明樓炭子沖大隊前“五風”幹部之口，卻被說成是湖南群衆的聲音，特別是強加給食堂搞得沒那麼糟的天華大隊。諷刺的是，劉少奇在迫害彭梅秀的同時，却在為這位搞“五風”的幹部平反，從而成爲劉少奇落實黨的政策的一項功勞。

胡績偉、王升平的共同點就在於：積極參與劉少奇式的政治運動，用“極左”的方式把運動推向荒唐的極端，造成普遍的惡果和群衆的厭惡之後，再調過頭來攻擊毛澤東發動運動的初衷，把群衆運動的形象徹底敗壞。

[1] 柏福臨、陳紹籌、王作坤編：《一代公僕劉少奇》，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劉少奇與毛澤東：兩種群衆觀和兩種群衆運動方法

十九世紀末，法國社會學家加布里埃爾·塔爾德提出了“公衆”與“人群”這一對二元對立概念。“公衆”和“人群”都是一群人，但它們具有本質不同：“公衆”裏面的人具有獨立思考、冷靜批評、理性討論的能力，而“人群”中的人則不具備這種能力，因此，“公衆”裏的人是多元的，各不相同的，而“人群”中的人則是人云亦云、衆口一致的，因為他們不具備獨立思考能力，而只會隨聲附和領導和大多數人的意見。比塔爾德的論述更通俗也更著名的，是古斯塔夫·勒龐的《烏合之衆：大眾心理學研究》，該書在二十世紀之初影響極大，勒龐同樣認為：人群是被情緒所控制的，易于受暗示和催眠術所感染，比如人群中的個別過激行爲就會互相傳染，導致整個人群趨向瘋狂，難以控制。塔爾德和勒龐的人群心理學，不是建立在嚴格的實證基礎上，在當今的社會科學中，早已成爲陳舊簡陋的古董^[1]，相當于十八世紀的“放血療法”在當代醫學中的地位。然而，其觀點論述很接近人們的日常直覺，因此，我們能發現當下許多人對群衆的理解都近似塔爾德的“人群”。

這裏，是想引用這種對人群的理解來說明劉少奇與毛澤東的兩種不同的群衆觀。劉少奇在其著作、講話中，從不忘強調群衆路線，但再仔細解讀，研究他所提出的工作方法，不難看出，他心目中的群衆，很接近塔爾德的“人群”。在劉少奇那裏，群衆很容易被權勢階層所脅迫和欺騙，

[1] Clark McPhail, *The Myth of the Madding Crowd*. 1991. Aldine De Gruyter.

他們的言論經常是被地方幹部所操縱，從而衆口一致，不敢表達自己的真心話。而一旦在正確領導的勸慰、誘導下，就會紛紛打開心扉，向黨交心。在劉少奇心目中，群衆的最主要優點，就是人多力量大，聲勢大，但缺點是：一旦發動起來，就容易有過火行動。

而毛澤東的群衆觀更接近塔爾德的“公衆”。毛澤東同樣也強調群衆的數量優勢，並經常在“群衆”前面加以數量冠詞：“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衆，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衆”，“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等等^[1]。同時，毛澤東還說：“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把“議論多”作為群衆的一條首要優點，這裏所稱贊的，不止是議論的聲勢大，而且是群衆的七嘴八舌、議論紛紛，亦即一種意見的多元性。毛澤東重視群衆的智慧和群衆的首創性，珍視人群中的異端思想，期待群衆中不同思想之間的辯論，主張在這種辯論中，“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于說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2]”

和這種群衆觀相聯繫的，是毛澤東所主張的群衆運動的搞法。假如說，劉少奇時刻強調群衆的現實利益，那麼，

[1] 分別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關心群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介紹一個合作社》。

[2]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毛澤東則更關心群衆的言論權利、思想權利，這和毛澤東一貫重視文化藝術、教育媒體等上層建築領域相一致的。因而，毛澤東把言論表達視為群衆運動的中心：“大字報、座談會和辯論會，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動人們進步的三種很好的形式。”“大字報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鄉村、工廠、合作社、商店、機關、學校、部隊、街道，總之一切有群衆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經普遍使用起來了，應當永遠使用下去。”“像我們這樣的國家，人民內部的矛盾，如果不是一兩年整一次風，是永遠也得不到解決的。許多問題的解決，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條文，是誰也不怕的。大字報一貼，群衆一批評，會上一鬥爭，比什麼法律都有效。^[1]”

在劉少奇那裏，群衆運動的重心在於政治精英的領導和駕馭，群衆運動的搞法主要是從上至下的。言論、信息在劉少奇的群衆運動中，主要不是由群衆來掌握和表達的，而是需要由政治精英控制甚至保密、透過官僚等級有序地向下傳達擴散。因而也需要對群衆實行分類排隊，區分核心、外圍和異類，採取內外有別的政策。這一點，將在下面對劉少奇領導四清運動的回顧中說明。

毛澤東和劉少奇心目中的“群衆運動的發展規律”也非常不同。在毛澤東看來，群衆運動是從魚龍混雜的不同觀點開始，經過辯論，群衆進行思考和自我教育，觀點進一步轉化、分化，逐漸克服思想上的混亂，從而出現陣營分明、是非分明的結果，這個過程也是鍛煉人們的鑒別能力、

[1] 分別見：《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介紹一個合作社》、《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清樣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

明確對立面、將落後、反動的因素孤立、暴露出來的過程。比如毛澤東所描繪的一個群衆辯論的典型發展過程：“石家莊那個學校，把那三個口號（即：‘打倒法西斯！’‘要戰爭不要和平！’‘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一討論，七十個代表，只有十幾個人贊成，有五十幾個人反對。然後，又把這幾個口號拿到幾千學生裏去討論，結果都不贊成，這十幾人就孤立了。^[1]”

劉少奇也反覆提到“群衆運動的發展規律”，但他所指的，完全是另一回事：群衆在一開始，是惰性的，需要政治精英反覆耐心的啓發、誘導，他們才敢于講出他們心中的真話，一旦將大部分群衆都啓發、勸導成功了，群衆就發動起來了，這時的群衆就會類似於一種情緒化的、服用了興奮劑的人群，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過火的言論、過火的行動，這時政治精英的任務就是以其清醒的頭腦，限制群衆的過火言行，強調政策，也就是對運動進行“糾偏”。因而，在運動初期“寧左勿右”，在運動後期“寧右勿左”，就成為領導運動的一個要訣。容易看出，劉少奇心目中的“群衆運動規律”，和塔爾德的“人群”的盲目性、非理性形象，是非常吻合的。

這裏，提到了“左”和“右”，這是一對多義的、經常被搞得混亂的概念。比如，在當今主流和官方的回憶錄文學中，毛澤東所特有的對“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黨變修、國變色”危險的強調，對兩條路線、兩條道路鬥爭的強調，是謂“左”，同樣，在政治運動中，採取簡單粗暴、暴力體罰的辦法對待幹部群衆的作法，也謂“左”；但問題

[1]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在於：毛澤東強調前者，却從未提倡後者，是政治運動的各級推行者，把“階級鬥爭”的主題庸俗化、歪曲化為對幹部群衆的殘暴迫害，在這些推行者之中，就包括劉少奇和王光美。而恰恰是毛澤東，才糾正了四清中的第二種“左”：即簡單粗暴地打擊迫害一大片幹部群衆。下面，就讓我們通過對四清運動的一些回顧來說明這些複雜問題吧。

1963年開始的四清運動，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在當時中共領導層的共識下發動的。這個共識就是：通過運動，解決經濟困難時期出現的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腐化墮落等社會生活的陰暗面，緩解一度比較緊張的幹群關係，鏟除滋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土壤、反對和防止產生修正主義^[1]。1960年起，毛澤東退居中央領導層的二線，由劉少奇領導日常工作。因此，四清運動主要是由劉少奇推動的，特別是1964年5—6月中央工作會議後，中央決定由劉少奇挂帥，親自坐鎮指揮四清運動。劉少奇在各種會議上的講話、在不同場合下對各地領導人的談話，以及在劉少奇主持下制定的文件，對四清運動起了主導作用。

1962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久，劉少奇則提出了更有操作性的說法：“對貪污、腐化、墮落的幹部，要大張旗鼓地處理。”1963年5月2日至12日，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是四清運動的第一個正式文件（簡稱四清前十條），這個文件，除了認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之外，在操作層次上，並沒有強調劉少

[1] 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傳》，p952，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奇主張的“大張旗鼓地處理”，而是提出比較溫和的“說服教育、洗手洗澡、輕裝上陣、團結對敵”，“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衆，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

1964年春節期間，劉少奇同到河北撫寧縣蹲點的王光美的談話中說：犯有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幹部，在上面都有根子，要切實查一下上面的根子。由此，打開了層層追查幹部、人人過關的大門。

在1964年5—6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插話說：“我看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裏，掌握在敵人手裏。”劉少奇於是就接過這句話，不斷發揮、加碼，說“三分之一打不住”。毛澤東提出一個一般性的尖銳看法，劉少奇就接過來把它解釋成、操作化成為一個“打擊一大片”的具體政策，這個互動形式在文革前幾年一直持續著。

1964年9月，由劉少奇負責修改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簡稱後十條）最後定稿。劉少奇修改後的這份文件的主要特點是：對農村幹部中的問題估計得嚴重多了，並明確改變了原來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作法，規定在每個開展運動的點上都必須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隊，“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對基層組織和幹部要在扎根串連、調查研究之後，分別情況區別對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能依靠。所謂“扎根串連”，是指像土改時那樣，由共產黨的工作隊進村訪貧問苦，找到村裏最貧窮、最受壓迫的人，從而“扎正根子”，作為建立基層組織和基層政權的基礎。當時領導江蘇省四清工作的江渭清後來檢討說，這種秘密扎根串連的作法“是土改時提出來的，那時候在貧雇農中扎根串連，

是爲著反對地主。今天如果只講在貧下中農中扎根串連，那就只能是反對我們的幹部了。^[1]”薄一波認爲，劉少奇的作法“是導致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迅速向‘左’轉，嚴重擴大打擊面的一個重要措施和步驟。^[2]”這裏薄一波所說的“左”，就是指粗暴打擊迫害一大片幹部和群衆。

8月16日，劉少奇在給毛澤東和黨中央的一封信中，強調了他所特別偏好的另一個工作方法，即“大兵團作戰”：“一個縣可以集中工作隊員數千人上萬人，聲勢浩大”，“力量集中，領導加強，便於打殲滅戰，便於掌握運動的火候”^[3]。

在《後十條》和劉少奇的多次有關四清的講話中，也強調把放手發動群衆發在第一位，但在劉少奇的上下語境中，發動群衆的主要作用是爲了對付那些不聽話的基層幹部，一種“上層聯合下層對付中層”的權術。和一切精英的看法都略同，劉少奇把動員起來的群衆，看作是一種“雙刃劍”：“放手發動群衆，要瞭解和掌握群衆運動的火候，注意不要燒過頭。燒到多少度了，就要勸群衆、積極分子，不要繼續搞了，要實事求是了，是多少就是多少。群衆運動過火時，是有些徵象的。群衆運動過了頭，群衆中有些就不贊成，但不敢講話，因爲空氣是那樣，怕說了右傾，是庇護地主、富農，庇護四不清幹部。講的話都是一樣的。^[4]”這裏描述群衆的主要參數指標，是其“熱度”、“火候”、“空

[1]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p505，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p112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

[3]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p1119，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

[4] 劉少奇：《在華東局、上海市負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4年7月21、23日）。

氣”等等——典型的塔爾德或勒龐式的語言，在這裏群衆更近似愛起哄、隨大溜的“烏合之衆”，而不是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和集體智慧的、作為歷史創造者的群衆。

劉少奇所提倡的其他幾條工作方法，也帶著他所特有的精英主義群衆觀的深深烙印，以及套用白區地下工作經驗的痕迹：“你們下去最好保守秘密，不要說自己是地委書記、縣委書記、廳長、局長、師長、政委，叫工作人員，讓基層幹部輕視你，對你估計不足好些。^[1]”這是再次重複他1961年“微服暗訪”的主題。劉少奇起草的關於印發《後十條》的通知中，特別強調：“這個通知只發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和工作隊，不要在群衆中宣讀。^[2]”後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二十三條》對劉少奇這種向群衆封鎖信息的作法提出批評，認為“運動一開始，就必須向幹部和群衆說明來意，把政策交給他們”。

在另一次講話中，劉少奇說：“你們省委書記、市委書記或者華東局書記下去，不見得搞得過基層幹部，不見得鬥得贏公社幹部、大隊幹部，因為你什麼也不知道，他有一套，你們一舉一動他清楚，他的一舉一動你們不清楚。你們開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你們的工作布置不要漏出去。……強龍難鬥地頭蛇。^[3]”

幾乎和印發《後十條》同時，劉少奇以中央的名義將《關

[1] 劉少奇：《在安徽地、市委書記座談會上的講話》，1964年7月13日。

[2] “中共中央關於印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的通知”（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3] 劉少奇：《在華東局、上海市負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4年7月21、23日）。

于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正式轉發給全國縣以上各級黨委，這就是著名的“桃園經驗”。這份洋洋六萬多字的冗長文件，是王光美 1964 年 7 月 5 日在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介紹她在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進行四清的經驗。這篇報告所介紹的“桃園經驗”，將劉少奇所主張的各種運動方法，如領導蹲點、訪貧問苦、扎根串連、保守秘密、大兵團作戰、掌握群衆運動火候等等，都集之于大成，因此給了我們一批生動的例子去瞭解劉少奇的群衆觀和群衆運動方法。

王光美與“桃園經驗”

王光美先後三次到河北省基層蹲點，分別在撫寧、新城、定興等地搞四清。第一次是 1963 年 11 月到 1964 年 4 月，在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1964 年春節期間曾返回北京，9 月又曾重返桃園），化名董樸，擔任工作組副組長，第二次是 1964 年 10 月到 1965 年 8 月，在新城縣高鎮，化名魯潔，職務為“一般隊員”，第三次是從 1965 年 9 月到 1966 年 5 月，在定興縣周家莊，化名林立。這幾個地點都靠近鐵路沿線，其中“桃園經驗”所在地——盧王莊公社就在北戴河車站西面，離休養勝地海濱不遠。

下面將參考《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以下簡稱《桃園經驗》）這份文件，來分析“桃園經驗”這一劉少奇式政治運動的典型案例。將對照其他相關資料，主要是文革期間群衆出版物上透露的有關材料，和文革後官方出版物中的有關材料。雖然這兩類材料在意識形態上是對立的，但對四清運動實際過程的描述和評價，

差別並不很大，因此沒有理由否定這兩方面資料來源各自的真實性。

《桃園經驗》的確是王光美花費了心血的，這個錄音報告聽一遍就要五、六個小時。該文件共分五大部分，按運動發展的時間順序講述：（一）扎根串連；（二）清經濟，包括查帳、揭發，要幹部放包袱交代問題等等；（三）清政治，即重新登記成份、揭露地主富農等；（四）組織建設，即村幹部撤職、改選等；（五）四清成效和總結。下面就來看看這些過程的實際內容如何。

（一）秘密扎根串連

《桃園經驗》開頭說到：“到了村子裏，要搞訪貧問苦、扎根串連，就得找人。但是，好人、壞人臉上都不寫字，不像演戲那樣，一出臺他就亮相，再看他的服裝打扮，就給我們個印象，這個人八成是好人還是壞人。可是，到了一個生地方就不同了，一下子看不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其神秘化心態鞠然可現。根據王光美的報告，當地幹部為工作隊提供了 26 個“根子”，工作隊認為其中只有 14 個是合格的，工作隊自己又發展了 11 個。“開始時，根子不好找，老實的貧下中農不敢說話，選他們作根子，他們却躲著我們。”經過半個多月的工作，才有了二十多個根子^[1]。可以想像，一批陌生的外來者進村後，神秘莫測地、簡單機械地、強加式地給村裏的人口作分類、打標籤，當地人會做出什麼友好反應。

[1] 《劉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區四清運動中的罪行調查報告》，北京礦院《東方紅》，1967 年 5 月 7 日。

有關資料透露出實際的情形：王光美的工作隊從一開始便陷入了“光榮的孤立”，王光美抱怨說：“貧下中農見到工作隊帶答不理的，甚至吃飯都找不到地方。”“吃飯時把你擋在那裏根本不不管你，根本沒有感情。就是到一些根子家裏吃飯也不熱情。^[1]”

王光美按照劉少奇“工作隊開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的指示，進村後讓大量的工作隊員局限在少數人當中搞神秘活動，物色所謂自己的根子，而把其他群衆放在一邊，對中農也不交代政策。尋找一個根子，往往半個月。工作隊進村一個月，才找到了幾個根子，有的工作隊員由於清規戒律特多，就一個也沒找到，其中還出了不少笑話。在新城縣高鎮的一個生產隊有五個工作隊員，所扎根子對象都是同一個老頭（貧農），五個人又都互相保密，扎了二十多天，鬧得這個老貧農莫名其妙，說：“四清就是這樣搞法？！”使得五個工作隊員哭笑不得^[2]。

不難看出，這種“秘密扎根串連”的方法，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和主觀性。《桃園報告》裏的一個主要正面人物，是後來被提拔為大隊書記的關景東，此人一開始，就被王光美選為“根子”。然而，王光美和關景東的交往其實在很久以前就開始了，可以說，關景東是劉少奇、王光美在桃園早就“扎下的根子”，王光美來到離北戴河海濱不遠的桃園大隊蹲點，不是偶然的。

一九五八年，撫寧縣東方紅高級社副主任關景東，因浮誇高粱每畝打九千三百斤而在當地出名，當時劉少奇一

[1] 同上。

[2] 同上。

家恰好在不遠的北戴河休養。一個晴朗的下午，劉少奇夫婦專程趨車去拜訪這位大躍進的英雄，從此結下了友誼。劉少奇回京後，關景東後來帶著社裏的花生和苞米，專程赴京看望劉氏夫婦^[1]。

當王光美 1963 年到桃園大隊時，關景東因為頗多劣迹，如毆打社員、貪污糧食、侵吞現款和耕地等，遭到社員反對，已經降為沒有領導生產實權的民兵連長了。進村不久，化名為董朴的王光美秘密接見了老朋友關景東，並保證“我保你下樓，從輕處理”。不知是諷刺還是必然，關景東這位搞“極左”浮誇的幹部、群衆聲望不佳的人物，成為王光美的根子，並成為她極力扶植的正面典型。

（二）對待幹部和群衆

《桃園經驗》說，工作隊發現：當地二十幾個主要的小隊幹部，他們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聯結在一起，而且拿躺倒不幹來嚇唬工作隊。工作隊的對策就是：發動群衆，前後三次掀起放包袱的高潮。下面就來看，這些操作是怎樣實行的。

據文革中群衆組織的調查，桃園四清一開始，就把全村幹部通通趕上了樓，大搞人人檢查過關。桃園大隊幹部共 46 名，其中被趕上樓檢查過關的 43 名，被批鬥的 39 人。有的幹部只是私分了兩斤挂麵，有的幹部只是吃了幾頓夥飯就長時間不能下樓，有些給隊裏燒火、做飯、賣菜、趕車的社員也被列為“四不清”對象，統統靠邊站^[2]。

[1] 《劉修外傳》，清華大學《井岡山》，1967 年 5 月 21 日。

[2] 《徹底揭發批判在桃園四清中王光美“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反革命復辟罪行》，南開大學《衛東》，1967 年 6 月 16 日。

《桃園經驗》的冗長敘述的一條主線，就是工作隊教育、幫助關景東，聯合他一起把主要的四不清幹部、壞分子、原桃園大隊支部書記吳臣打倒、並追查他的反動出身背景的過程。王光美在報告中，曲折地承認了吳臣在村民中威望較高這個事實，而文革中群衆出版物也承認，吳臣是有缺點錯誤的幹部，主要缺點是對待群衆的方法簡單粗暴。但沒有材料證實王光美對吳臣是國民黨特務、偽警長，開過大烟館的指控^[1]。這裏關心的問題，不是吳臣是否清白，而是王光美對於一位基層幹部，在未有充分證據、未經法律程序的情況下，以群衆運動的名義進行無情打擊、殘酷迫害的事實。

我們來看文化大革命中群衆調查資料所透露的王光美“桃園經驗”的具體作法：清經濟開始後不久，王光美決定召開三級幹部大會，把吳臣當“活靶子”來鬥爭。這一天，吳臣剛到會，桃園工作組的二隊組長趙XX便掏出手槍，把吳臣看管起來，并威脅說：“你老實點，不許亂說亂動。”

1964年3月15日，桃園大隊召開了批鬥處理吳臣大會，沒有經過支部和貧下中農討論，就宣布開除吳臣的黨籍，戴上“壞分子”的帽子，就地監督勞動改造。公社負責人宣布處分吳臣的理由是：“雖然沒有確鑿證據說明吳臣是國民黨特務、偽警長，開過大烟館，但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

調查資料還指控說，王光美是武鬥的積極吹鼓手。她看到二隊工作組鬥爭本隊副隊長關希彥，對該隊的工作組長說：“你們火力不足，給你們調些人來。”後來，二隊發

[1] 《歪曲，捏造，陷害——關於吳臣問題的一些調查材料》，中共河北省委機關紅色造反團《紅衛報》，1967年12月29日。

生了武鬥，一隊工作組長知道後，提出意見，王光美大為不滿，說：“人家武鬥不好，你做出幾個說服教育的樣子來！”在王光美所包的四隊武鬥現象最嚴重。在鬥爭四隊隊長趙彥臣時，王光美到場見到趙正在罰跪，她不但不制止，反而鼓動說，“你們搞得好，搞得對”，“堅決支持你們，就用這個辦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慫恿下，桃園大隊體罰成風^[1]。

吳臣沒有被徹底屈服，工作隊對桃園大隊的介入，沒有能完全解決原有的矛盾，實際上激化了矛盾，挑起了一部分幹部群衆去鬥另一部分幹部群衆。王光美臨走，留下原桃園工作隊小組長趙厚玲和一批得力的工作隊員作為鞏固組，在桃園坐陣。但是，王光美出村不到半年，鞏固組就已經招架不住了，事情越來越糟，組長只好電報王光美告急，這時《桃園經驗》已經流傳全國，又被劉少奇“捧上了天”，王光美于1964年9月急忙趕回桃園，召集原班人馬，進行第二次四清。這次回村，王光美改變原來平易近人、實行三同的作法，進村之前，先派公安部隊進行偵察與掃清“障礙”，把民兵的槍支彈藥全都收繳了。并在鄰近各村都布置了偵察員。然後，王光美在便衣武裝人員護送下到原來的住處，前門有哨，後門有崗。^[2]

王光美返回桃園後，成立“吳臣問題專案組”。對吳臣進行了四十五天的政治迫害：王光美坐陣指揮，採取晝夜不停的疲勞戰術，又打又罵，甚至用手槍威逼，強迫彎腰、罰站等等。群衆對此意見紛紛，工作隊內部也有分歧。當

[1] 《打倒王光美，解放吳臣》，南開大學《衛東》，1967年6月16日。

[2] 《劉修外傳》，清華大學《井岡山》，1967年5月21日。

時撫寧縣監委的一個幹部奉命核實吳臣的問題，向工作組提出了 33 個疑點，馬上遭到無情打擊，說他喪失階級立場，責令他多次當面檢討。為此事，縣監委和縣委也作了書面檢查。王光美派人去東北調查，派去的工作隊員查遍了全長春市，也沒有查出吳臣當過警察、特務，開過大烟館等。但是，王光美仍然堅持根據不足的證據給吳臣定了案。

王光美生怕吳臣翻案，1964 年專程到唐山，對原桃園工作組長說：“我對桃園是耽心的，今後時間長了，壞分子可能復辟，這個問題你可得注意，要是忘記，桃園出了問題，我那報告已經出去了，就會出問題的。”劉少奇怕王光美壓不住臺，親自出馬，就撫寧四清問題對中央監委說：“監委審批只能同意，不能翻，有的可以加重，不許減輕。這樣做有的人可能冤枉些，如果冤枉就再讓他冤枉一兩年再說。^[1]”

王光美蹲點過的其他地方，整人、迫害幹部的凶狠程度也都大致如此。她搞過四清或過問過的單位，直至縣一級，四清結束後都來了一個幹部大換班。新城縣原有七個常委，四清後僅留一個，公社一級的幹部（正副書記、社長）撤換了五十多名，佔全縣這一級幹部的百分之七十三^[2]。

在幹部受打擊迫害的同時，受衝擊的群衆也不在少數。據桃園統計，群衆“放包袱” 512 個，“受教育”者達 95%。

高鎮小學有四個教師，本來被認為沒有什麼問題，王光美却對工作隊員說：“小學教師在咱們村裏有問題，照樣

[1] 《劉修外傳》，清華大學《井岡山》，1967 年 5 月 21 日。

[2] 《劉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區四清運動中的罪行調查報告》，北京礦院《東方紅》，1967 年 5 月 7 日。

要搞，在哪村，就在哪清。”結果寫了檢查，跟四不清幹部一道訓話，逐個檢查，有一個教師與村裏的幹部聯繫較多，工作隊員硬要他檢查階級路線問題。這個教師認為無需檢查，工作隊員以讓他到社員大會上檢查來嚇唬他，嚇得這個老師大哭。

王光美在定興縣周家莊四清，進村三天就說：“支部爛掉了，幹部都有貪污。”王光美把周家莊的飼養員、車把式、副業組長，統統作為四不清對象，使一個三百多戶的村就有 120 人被整^[1]。

（三）運動群衆

在劉少奇集中優勢兵力、“大兵團作戰”的指示下，河北省的四清區域一壓再壓，最後縮減為一個地區只搞一個縣，全省總共才搞了十個縣，而工作隊竟達十萬人。

桃園大隊有 217 戶人家，桃園工作組有 20 多人。王光美後來蹲點的幾個地方，工作隊數量層層加碼。新城縣有人口二十八萬人，竟去了一萬四千多名工作隊員。王光美蹲點的高鎮大隊共 316 戶人家，工作隊員曾多達 86 人。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樂道的“人海戰術”。以壓倒數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隊伍，浩浩蕩蕩地進村，集中火力向農村基層幹部展開圍攻，將當地權力秩序取而代之，這就是劉少奇、王光美在四清中搞群衆運動的主導策略。

如此數量衆多的城市官僚精英從天而降，雖然號稱是來發動群衆，但難免在實際上搞包辦代替。調查資料認為，王光美在四清中的包辦代替“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不

[1] 同上。

管大會小會都由工作隊一手導演，把廣大群衆置于觀眾地位。發言稿由工作隊起草，物色“演員”，進行排練，預演，然後出場，每個人的表情也都是由工作隊指點，演出前的講話稿必須經王光美修改^[1]。

在定興縣四清時，王光美導演了一場鬥爭當地幹部王樹海的大會，會場專門搭起了一間導演室，王光美坐在幕後，指揮全場，會議的每一個主持會議的人都要通過一個布簾向她請示，王光美還派專人從北京接來她的兩個孩子觀看她的這場表演，讓她們“受教育”。會上當場逮捕王樹海，會後王光美到處介紹，把這一招宣揚為“殺鵝給猴看”。

王光美總結的經驗就是：“革命聲勢，群衆壓力，真槍實彈，政策感召”。所謂“革命聲勢”就是運動初期開不加區別的從寬從嚴處理大會，所謂“群衆壓力”就是根據她定的框框施加壓力“搞逼供信”，所謂“真槍實彈”，就是搞秘密的查帳，找到一兩個突破口去猛攻，致使“全線崩潰”達到或超過所定的框框為止，所謂“政策感召”就是濫用減免緩。在她的這套戰術下，社員無所適從，幹部哭笑不得，工作隊員心裏沒底^[2]。

應該說，王光美在四清中的所作所為，是出于真心誠意執行黨的決定、貫徹劉少奇的指示。文革大批判中將王光美的動機說成是復辟資本主義，似乎沒有說服力。僅從她在艱苦的農村條件下長期堅持蹲點這一點看，她是有為革命做工作的意願的。王光美也表現出關心群衆的一面，

[1] 《劉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區四清運動中的罪行調查報告》，北京礦院《東方紅》，1967年5月7日。

[2] 《第三桃園：定興調查紀實》，七機部新九一五革命造反總部《飛鳴镝》，1967年4月27日。

比如：重視婦女工作、為群衆作紅娘等等。然而，問題在於：她和其他許許多黨的馴服工具一樣，是劉少奇式的哲學和政策的推行者，同時也是其受害者。

劉少奇努力地把“桃園經驗”作為四清運動的標準操作模式在全國推廣。劉少奇讓王光美隨同他到各地視察，讓她給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等地的幹部現身說法。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因為表示不盲目執行“桃園經驗”，招致了劉少奇大發脾氣^[1]。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陳伯達參與的、天津市委寫的《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是和《桃園經驗》類似的一個樣板，“小站經驗”同樣是在劉少奇的思想指導之下製造出來的。在劉少奇的積極推薦下，中央也轉發了這份報告^[2]。

劉少奇領導下的四清運動，特別是在《後十條》和《桃園經驗》轉發到全國之後，普遍發生打擊面過大、體罰、武鬥和自殺現象。比如：山東省曲阜縣東郭大隊本來是所謂紅旗單位，可是在四清中，工作隊按照“桃園經驗”，將所有大隊幹部隔離反省，勞動模範、支部書記郭守明全家被鬥，給當地造成很大衝擊。在許多地方，甚至多次發生打人、捆人等現象，北京郊區通縣，去了2萬人的工作隊，有110多個工作隊打了人，自殺的有70多起，死亡50多人。

1964年底，召開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各地代表多少將這種嚴重情況反饋給中央和毛澤東。從這時起，毛澤東就表現出對劉少奇領導四清運動的方法的不滿，並發展成為和劉少奇的公開分歧。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

[1]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p488，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2] 劉晉峰：《陳伯達與小站“四清”》，《炎黃春秋》2000年第1期。

毛澤東對“秘密扎根串連”、“實行大兵團作戰”、“對幹部開始不能依靠”等等作法表示了不同意見。毛澤東說，“不可搞得打擊面太寬了”，把那些幾十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四不清幹部先解放”。“我提這個問題有點‘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麼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劃成百分之十幾二十，如果二十，七億人口就是一億四，那恐怕會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結果樹敵太多，最後不利于人民。^[1]”對於“人海戰術”，毛澤東批評說：“聽說新城縣二十八萬人口，下去一萬五千人，還說人少了。哪裏來這麼多人？哪裏調這麼多？……我們革命從來不是這麼革的。你一萬五千人，扎根串連，什麼扎根串連！冷冷清清……。^[2]”四清運動在這方面確實創立了新中國群衆運動的一個記錄：當地幾十萬人的人口，接納了一萬多人的官方運動推動者。

中央根據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批評意見，起草了四清運動的最後一個文件《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這份文件中關於儘早解放一批幹部、退賠可以減緩免等規定，發生了很大的影響，糾正了各地殘酷打擊一大片的粗暴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幹部。據當年參加四清的人回憶，1965年春節期間傳來了《二十三條》，“人們當時對這個文件，是衷心擁護的，并一時引起很大的興奮”，因為很多人認為《二十三條》的許多新精神，與‘桃園經驗’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園經驗’中

[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p1125。

[2] 毛澤東的話引自：《劉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區四清運動中的罪行調查報告》，北京礦院《東方紅》，1967年5月7日。

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連等神秘化做法”^[1]。

“四清”群衆運動中的“左”和“右”

制定《二十三條》時，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上，一是當時的主要矛盾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二是運動的搞法。關於運動的搞法上的分歧前面已經論述了，結果是以毛澤東的縮小打擊面、團結大多數的主張寫進《二十三條》。

關於主要矛盾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劉少奇認為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運動的性質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毛澤東則認為應該概括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并在《二十三條》中寫進“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句關鍵的話。

提出社資矛盾、“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實際上是意識形態修辭上的升溫和加碼，但這並沒有立即轉化成“極左”的操作，《二十三條》的實際作用，是大力糾正了劉少奇領導四清中的“極左”、粗暴的作法。

這個插曲，打破了傳統意義和通常用法上“左”、“右”概念的穩定性。這也是為什麼毛澤東在 1966 年文革開始時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提出“一九六四年形‘左’實右”的說法，來概括劉少奇所特有的政治風格。

前面已經提到，劉少奇和黨內的許多領導幹部，善于

[1] 李新：《“四清”札記》，蕭克等：《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

將毛澤東對矛盾、鬥爭的強調，直接翻譯成、解釋成一套具體的政策操作，這就是一系列極端的、過火的簡單粗暴的搞運動的方法，對打擊對象實行分類、貼標籤、殘酷迫害，然後將這套暴行解釋成是來自毛澤東的部署。很可能，毛澤東在四清後期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後來他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衆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1]”

然而，在具體操作層次上，毛澤東並不主張過這種行政命令式的、簡單粗暴的政治運動；毛澤東反而是多次強調反對武鬥和體罰，主張讓人講話，主張批評辯論和言論表達。

如何理解這種差距？遺憾的是，毛澤東沒有系統地闡釋社會主義階段的階級鬥爭在具體的操作層次上怎樣展開。然而，從毛澤東建國的言論中，能夠發現，毛澤東所謂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長期鬥爭的繼續”，等等，是通過一系列極其複雜、間接、曲折的中介過程來實現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言論思想、文化藝術，以及政治代理。這樣的中介過程，遠遠要比劉少奇和其他領導幹部所理解的“揪出百分之幾的壞分子”、開除黨籍、行政處罰、肉體消滅這類簡單、機械式的方式複雜得多，微妙得多。

毛澤東認為：在社會主義革命這個漫長的過渡期間，“階級”並不總是以傳統意義上的“處在特定生產關係中的

[1] 摘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

人群”的形式出現，而更經常是以一種文化語言、思想觀念的形式出現。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可以讓走資派重新工作，因為這些當了走資派的“人”並不是資產階級，並不是主要鬥爭對象；資產階級存在於黨內一些人的頭腦之中，因為這些人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意願，而且掌握著權力。在這種情況下，禁止講話、體罰、監禁乃至肉體消滅，都無助于事，問題在於，“思想上的階級”，只能與之作思想的鬥爭，而不能以暴力手段去消滅。“秀才見了兵，有理說不清”是說，當暴力是遊戲規則時，說服是無效的，但反過來的道理，其實更重要：當自願與說服是遊戲規則時，暴力強迫只能遭遇失敗。現代政治的權利支配基礎中，自願與說服的因素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在這方面，毛澤東對於階級、權力與思想的看法，是不僅是極具特點的，而且是富有遠見的，他看到：社會主義階段的階級鬥爭，其具體操作方式，不是急風暴雨的暴力，而是各種言論的自由、充分的表達，以及長期的、深入的批評辯論。

當然，本章的主旨，在於說明問題的另一面，即：以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許多領導幹部，他們將社會主義的矛盾鬥爭機械地理解為通過行政命令對不同政見實行簡單粗暴的壓制，這是造成歷次政治運動傷害許多無辜者，並最終使廣大人民對群眾運動產生厭惡感的主要原因。根據這個理解，就不難區分毛澤東的“左”和劉少奇的“左”的根本區別；根據這個理解，也就不難看到：“官僚主義者階級”告別革命、作威作福、逍遙享受當受背叛之名，但形“左”實右、“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官僚主義者，當他們以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整人、運動群眾、乃至鎮壓人民的時候，給群眾帶來的痛苦，給革命聲譽帶來的敗壞，都是更嚴重、

更致命的。

其實，形“左”實右，是一切“官僚主義者階級”、腐化變質者的主要特徵，他們打著革命旗號、借用革命的法統和儀式，把革命的口號庸俗化，實際上歪曲、敗壞、窒息革命。中國共產黨官方話語中所謂的“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一般被視為一“左”一右兩種不同的東西，其實它們經常結合在一起，是互補得非常好的統一體。列寧以後的蘇聯領導人，中國的劉少奇，都非常好地體現了這種統一。

第二章 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福柯說：“記憶是鬥爭的重要因素之一……誰控制了人們的記憶，誰就控制了人們的行為的脈動……因此，佔有記憶，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悠關的。^[1]”再也沒有什麼例子能比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集體記憶更能說明福柯的洞見了。有一點很清楚：文革沒有離開我們，在今天人們的意識和言語活動中，它反而越來越經常地穿上戲裝出場，在越來越典型化、越來越模式化的漫畫場面中為當代觀眾排演。文革被化約成一些鮮明生動的符號形象，如：紅寶書、忠字舞、抄家、“噴氣式”等等，這些經過文字和意識生產者的刻意加工，經過官方和主流媒體反覆強化，已經成為文革歷史的生動而“真實”的圖解。

從福柯有關真理、權力知識生產的視角，來考察文革歷史的現狀，對我們頗有啓發。今天作為歷史知識的文化大革命，是控制、篩選、操縱，亦即有選擇的記憶與有選擇的遺忘的成果。如果說，啓蒙運動的左右兩翼今天仍在為法國大革命的古老鬥爭而激戰，那麼作為不久前的另一場“法國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更還遠遠未成為“無害的歷史”，還遠遠不是“過去”，而是和今天的主導統治勢

[1] Michel Foucault, in "Film and Popular Memory: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tr. Martin Jordin, *Radical Philosophy* 11 (Summer 1975): 25, 26; quoted by Alan Megill, "Foucault, Structuralism, and the Ends of Histor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1 (1979):500.

力和主流統治意識“過不去”。正因為這樣，才有對有關歷史知識、資料研究、大眾記憶、大眾話語權的控制、操縱和獨佔。

文革本身是貨真價實的政治鬥爭，而不是迪斯尼卡通式的忠字舞彩排，那麼有關文革的歷史知識本身，也別無二致，是矛盾衝突、操縱與反操縱、主宰與被主宰的的場所，更確切說，是“記憶與遺忘”的政治鬥爭的場所。為了說明這一點，本章以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的五十天為探討對象，將官方和主流文獻的記載與那些被忽視、被掩蓋的文獻記載相對照比較，以此來展示記憶與遺忘的政治是怎樣圍繞著文革歷史來展開的。

考慮到官方和主流史學對文革初期（比如第一年，這裏就牽涉到當權派、造反派、迫害、反迫害等敏感問題）的有關事件和人物的有意模糊、混淆、“宜粗不易細”，本章將幫助讀者回憶被有意遺忘的“五十天”，并力圖揭示這歷史長時段裏微不足道的“五十天”背後，有著什麼樣的宏觀的歷史和制度背景。

有關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衆所周知，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散發了一份題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文件，全文是：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的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

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爲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1]”

[1] 毛澤東一天前（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有一段講話，這段帶有別人插話的講話記錄，遠沒有《炮打司令部》流傳之廣，但話說得更坦率、更直接，記錄如下（根據不同版本的補充）：

“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到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這與陸平、蔣南翔有什麼分別！中央自己違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不是沒有人提過不同意見，就是聽不進；另一種意見却是津津有味。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次會議要解決這個問題，否則很危險。自己下命令要學生起來革命，人家起來了又加以鎮壓。所謂走群衆路線，所謂相信群衆，所謂馬列主義等等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的事情，就爆發出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群衆，為什麼不能反對？！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系與系、校與校之間一概不准往來，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有人對中央六月二十日的批語有意見，說不好講。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報告中却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貼在大門外給外國人看見。其實除了機密的地方，例如國防部公安部等不讓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麼要緊。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也容許群衆請願、示威游行和告狀。而且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是寫在憲法上的。從這次鎮壓學生群衆文化大革命的行動來看，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馬列主義。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團中央，不僅不支持青年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運動，應嚴格處理。”當劉少奇說到，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時，毛澤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當葉劍英說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麼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這段文字，其震動之處，除了坦率、直接的特點之外，還在于首次點破了：在社會主義國家裏，竟然存在著“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的形“左”而實右方式對群衆專政的問題。這裏所說的在“五十多天裏”發生的看來是一些很重大的事件，到底是指的什麼呢？今天以控訴迫害為主題的文革回憶錄文學，為什麼對這“五十多天”竟然緘默無語呢？

先來看一看一些最權威的官方史記載：著名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此隻字未提，這是“宜粗不宜細”的典範。由席宣、金春明所著的《“文化大革命”簡史》^[1]最接近一部官方正式的文革史，依照“簡史”的風格，對此事記載道：“由於發動‘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錯誤的，目的也是含混不清的；各單位群衆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圖理解不同，對本單位領導的看法和所持的態度不同。所以，從運動一開始，就分成了‘造反派’（通常是少數派）和‘保守派’（通常是多數派），必然會同一部分群衆和某些基層組織發生許多難以處理的矛盾。加以江青、康生一夥有意煽動和挑撥，以致發生越來越多的轟趕工作組的事件，結果工作組不僅未能扭轉越來越嚴重的混亂局面，反而將自己置于矛盾交點的困難地位。……為了堅持工作，一部分工作組曾經不適當地採取了所謂‘排除干擾’的某些措施。有些單位批鬥了一些帶

[1] 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p102-103。令人遺憾的是，金春明所著另一本稍長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對五十天複雜情況的描寫就更加簡短和片面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共六百多頁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對此事有四行字的提及（p404），說法與金著相同。

頭‘造反’，轟趕工作組的人，并加以‘反黨分子’、‘假左派’、‘右派學生’等罪名。當時，對於這一類措施，黨內黨外都有贊成和不贊成的不同看法。江青、康生一夥卻對此大加渲染，誣之為‘鎮壓群衆’、‘白色恐怖’、‘反對革命’，力圖給工作組加上彌天的罪名。”這是官方史著所能給予的儘量含蓄、儘量客觀的說法了。

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是在中國公開出版的另一部比較權威的文革史著作^[1]。這部著作記載五十天的篇幅相對較長，從這裏我們才隱約看見一些事件真相的端倪，比如，提到工作組進校後人們對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的聯想，簡要提到六月初上海發生“圍攻少數派”的事件，較詳細地提到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包括這樣的情節：“把學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殺，未遂。後來，毛澤東稱李世英為‘學生領袖’。”王著分析到：“不少工作組也有錯誤的方面，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一些工作組按照自己對‘右派’的理解，過分嚴重地打擊了向黨委、向工作組發難者。”這些記述和分析的可貴之處在於有很大程度的獨立判斷，然而遺憾的是，學生和工作組、少數派和多數派在頭五十天內衝突的線索，在王著裏並沒有和後來文革的矛盾發展聯繫起來，最終王著的敘事基調要和官方結論保持一致，理解“五十天”的意義也就成為不可能了：因為對“五十天”內的矛盾衝突深入追究、分析下去，就會觸及文革運動初期複雜曲折的發展過程，就可能破壞官方文革史的一致性，使其不能自圓其說。

[1]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本章下面將通過筆者現有的一些材料對這個歷史時刻的有關事件作一番考察，比較各種說法，以圖儘量完整地復原出一個被主流話語所刻意“遺忘”的一九六六年五十天的歷史。

劉少奇、鄧小平與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從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前夕，劉少奇領導中央一線工作，毛澤東退居二線。許多回憶錄都記載了文革前夕政治氣氛越來越“左”、各種政治運動越來越嚴峻的情況。而多數的分析認為，這是毛澤東對“階級鬥爭”越來越強調的結果。然而，難以解釋的是，恰恰是在這個時期，毛澤東對當時政治運動的領導工作表現出很大不滿，并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決策權之外，因此才有毛澤東、劉少奇在“四清”問題上發生公開的分歧，以及毛澤東手拿憲法、黨章抗議被剝奪發言權的事情發生^[1]。

毛澤東的不滿之一，是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實行殘酷打擊一大片幹部群衆的粗暴作法，這就是毛澤東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所說的“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事實上，劉少奇領導一線工作期間展開的政治運動，無不

[1] 比如，在這期間的“文藝小整風”中，美術學院的模特寫生在“極左”的影響下被廢除了。毛澤東于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在中央美術學院教員閻立鵬等人就此事給江青的信上批語，并轉給陸定一、康生、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彭真，才糾正了此事。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卷，p39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打上劉少奇的個人印記^[1]。由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四清運動中所實踐和整理出來的“桃園經驗”（《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就是滲透著劉少奇的群衆觀、反映了劉少奇風格的政治運動的一部經典。它的影響普遍滲透到各級幹部的工作方法和作風當中，因而“桃園經驗”注定要在文革中發揮它的作用，它的執筆人王光美也注定要在文革初期積極運用她的經驗，從而導致她後來巨大的個人不幸。

毛劉之間的分歧又要歸結於他們對黨和群衆的看法上、對黨群關係、對精英與群衆關係看法上的深刻差別。對於尊重群衆的首創精神、“先當群衆的學生、後當群衆的先生”、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等抽象原則，他們也許沒有爭論，而一旦面對生動活潑但非盡善盡美的群衆和群衆運動，他們的態度就變得截然不同。另一方面，當毛澤東正在思考著黨內出現“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2]等問題時，劉少奇却在考慮著怎樣把“桃園經驗”的“集中優勢兵力”派工作組下基層、找根子、奪權、人人過關、“洗手洗澡、下樓放包袱”等搞政治運動的標準操作程序進一步完美化，并在這種行政命令式的政治運動中把共產黨員變得進一步馴服工具化。

[1] 可參考劉少奇 1964 年 9 月 16 日所作的《關於“四清”、“五反”蹲點問題的報告》，報告說：“當前的主要危險是右傾危險，不是‘左’傾危險。……我跑了幾個省，都碰到他們開三級幹部會，他們的發言我都看了，沒有一個是怕右的，全都是怕‘左’。”

[2] 分別見：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對陳正人同志蹲點報告的批示》，對《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批注，1967 年 5 月 6 日《人民日報》

現有文革史，對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劉少奇主持中央派工作組、訂立“八條規定”，以及後來轉發北大有關“六·一八”事件簡報等領導層的事態發展，敘述較詳盡，但對群衆層次的言論、行動和發生在基層單位的事件的記載比較稀疏，或有意回避。下面就從劉少奇、鄧小平親自過問、直接干預的兩個基層單位的情況入手，來具體說明劉少奇、鄧小平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間領導文革運動的方法和風格。有關事實記錄，很多來自文革運動中群衆出版物的文章，這裏基本引用原話，但去掉一些浮誇而無實際內容的詞句。

第一個例子是北京師大一附中。當時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是該校高一學生，她可以經常向劉少奇彙報情況，而劉少奇也根據女兒的彙報，做出指示，讓劉平平轉達給工作組。

六月九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組進師大一附中。這期間“揪出”了校長兼黨委書記劉超。六月十七日以勾德元為首的新工作組進校，這個新的工作組和劉少奇保持著直接的聯繫。新工作組進校不到十小時，就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宣布：“我們已經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團‘三家村’的全部資料，師大一附中，四類學校，黨支部是黑黨支部！”兩天後，由劉少奇親自向工作組下達命令，定了校長兼黨委書記劉超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並說：敵人佔百分之五是指全國，具體到你們學校和黨支部，那就不行了！”於是，該校將近百分之九十的幹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幫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鬥爭、被圍攻。這些幹部、教師被剝奪了參加運動的權利，甚至被迫進行長期的所謂“勞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組製造了師生之間的對立，以至互相鬥爭，互相殘殺。

工作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師生的不滿，六月二十日，一附中的學生陳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幹出身、中共預備黨員）“起來造反了”，貼出題為《揪出鑽進我們肝臟的牛鬼蛇神！》的大字報，指出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認為工作組“盜用黨的名義，利用職權，進行一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勾當”，他們“用對待敵人的態度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和革命群衆”、“千方百計地製造糾紛，煽動、挑撥、好像對待敵人一樣‘審訊’‘鬥爭’革命同志，轉移群衆的鬥爭視線”。

大字報貼出的當天，劉少奇接見了該校工作組組長勾德元等四人，說：“寫大字報的人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大字報誰都可以利用。”“現在人家向你們進攻，人家向你們採取攻勢了，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你消滅他就容易了。”“出大字報〔指批評工作組的大字報〕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敵人搞清楚。^[1]”如果說，向工作組發難使人想起一九五七年“向黨提意見”的鳴放運動，那麼，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特別是所謂“引蛇出洞”策略，就成為劉少奇心目中的一個關鍵性的參照系，這期間他的指示、談話，都反映出：他準備把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一整套作法運用到當時的運動中去。

除了五七年反右，另一個被格外注重的參照系就是不久前的四清，特別是以“桃園經驗”為象徵的“嚴格的等級秩序”、“嚴密的信息控制”、“政策神秘化”、“給群衆分類排隊”等具體操作。劉少奇的女兒根據她對劉少奇指示

[1] 劉少奇同北京師範大學一附中工作組部分組員的談話（1966年6月20日）。

的領會，在日記中寫到：“老師不許秘密開會。同學也不許。紅衛兵是秘密組織，也是非法的，只許開一種秘密會，就是北京市委傳達指示（只許黨員的），工作隊革命委員會的給群衆排隊，可以秘密，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數學生參加，告訴他們保守秘密。”另一方面，是對群衆“鬧事”的可能場景的厭惡和防範：“可以讓大家學毛選，社論，準備材料，不要讓大家沒事，沒事就會鬧事。^[1]”

從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據劉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組有計劃地組織了對陳永康、何方方等學生的三次大規模的鬥爭會，每次都有幾百人參加，僅第一次鬥爭會就開了八小時。當時負責向中央彙報中學文化革命情況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陳永康、何方方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鬥爭會還引發了工作組贊許下的武鬥：工作組七月十一日向劉少奇彙報說：“陳、何等人經過我們三次大辯論，已打下了他們的氣焰，現在還在學校檢查。第二次辯論會有一個左派學生打陳一個嘴巴。牛XX（另一名反工作組的學生）這個學生，害怕辯論，嚇得跑回家了，三天沒來學校，還揚言要絕食、要以死來威脅我們。^[2]”

三次鬥爭會後，全校一千名師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個班還被打成了“右派班”，該班“只有一個左派，一個中間偏左，其餘全是右派”。被鬥的學生在學校遭到極端的歧視，一天到晚誰也不和他們說話，何方方蹲在教室裏的一個角落裏，彎著身體學毛選，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連開始以後她

[1] 劉平平日記，1966年7月14日、1966年6月30日。

[2] 劉少奇：《在聽取北京師範大學一附中工作組彙報時的講話》，1966年7月11日。

去北大看大字報，竟被人告密說她是“反革命頭子”，把她趕出了北大^[1]。

第二個例子是北京師大女附中。鄧小平曾親自指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啓立（胡當時負責北京市西城區的中學文化大革命）把師大女附中當作運動重點，并搞成“典型”。而鄧小平的女兒鄧榕也在該校上學，鄧小平通過鄧榕瞭解該校的運動情況，做出指示。

六月四日，團中央派出了中學的第一個工作組進入師大女附中，并公開宣稱“教師都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按法律應該坐班房，應該判處死刑”、“教師是四清對象”、“學生都是修正主義苗子”。工作組進校後對教師進行排隊、整理材料，挑起了群衆之間、師生之間的對立，有的學生在教研組門上貼上“鬼齋”、在教師宿舍區貼上“狼狗窩”。一些師生對工作組進校以後把矛頭指向群衆非常不滿，六月十七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貼出了題為《工作組站在什麼立場上》的大字報，問工作組“是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資產階級保皇派”。在工作組的策劃下，當晚全校召開大會，就這張大字報展開了“大辯論”，在工作組的煽動下，不少學生跳上臺去大叫在學生中也有5%，也有右派，現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組就是反黨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等學生上臺支持反工作組的大字報。工作組組織的對少數學生的圍攻直到深夜十二點，而後又叫各班回去繼續和貼大字報及支持大字報的學生進行“辯論”。會後鄧榕趕回家向鄧小平彙報，問他反工作組對不對，鄧說：

[1] 《“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何其毒也！》首都中學紅代會《兵團戰報》1967年4月10日；《炮打劉少奇——控訴劉少奇在北師大一附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北京大學《革命串連報》，1967年1月9日。

“反工作組不對，這符合了社會上反工作組的逆流。”鄧小平這樣一句話，導致了許多的學生被打成“反革命”。

爲了鎮壓反工作組的學生，工作組搞了“全面開花”，叫各班按著工作組樹立的“樣板”抓右派。當時高二（二）一個班就鬥爭了十二個被斥爲“右派”的同學，其中張XX、朱XX被定爲“反革命”。張XX被鬥了兩天一夜，朱XX只許在“牛鬼蛇神圈”裏活動，剝奪了她們的一切政治權利，并被監視起來。有的同學被逼出了神經分裂症^[1]。

女附中反工作組的事件導致了鄧小平本人對該校的直接干預。下面是胡啓立對有關事實的回憶：“六月二十日，胡克實（當時的團中央書記）突然通知我說，要我同他一起去見鄧小平。我嚇了一跳，不知像鄧這樣的人爲什麼突然叫我？去了以後，鄧……具體指示我說：‘那十三個人並非積極分子。積極分子不同情那十三個人。’又說：‘中學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槍斃的楊國慶就是中學生，只有十九歲。對這種人就是要反擊。’又說：‘反動的學生會暴露出來，暴露出來先擺一下。’鄧這幾句話就給那十三位批評工作組的同學定了性質。我回來後，就趕快通知工作組，那十三位同學不是積極分子，要堅決依靠支持工作組的大多數。這樣必然造成工作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動了群衆鬥爭群衆。”六月二十七日，梁二同等十八人又貼出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大字報，繼續反對工作組。

[1] 物理系第四野戰軍詠梅戰鬥隊：《揭開鄧小平的反革命老底》，《新北大》1967年6月28日。新北大公社02621支隊調查組：《斬斷鄧小平伸向北京師大女附中的黑手——關於鄧小平殘酷鎮壓師大女附中無產階級革命派罪行的調查報告》，《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對此鄧小平十分惱火，下令讓卓琳打電話給劉志堅，要劉瞭解梁二同父親的情況，“企圖進行政治迫害”。

鄧小平進一步下達指示，要求運用“群衆運動”的形式來打擊反工作組的少數學生。胡啓立回憶：“六月二十日，胡克實指示我，應像師大一附中那樣在學生中組織辯論會，辯論和孤立那些反對工作組的同學，當時我有些猶疑。胡克實要我向鄧辦公室打電話請示。六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鄧小平通過他在師大女附中讀書的女兒向工作組傳達鄧的指示說，對少數反對派中的頑固分子不管不好，這樣會使他們越來越往那邊跑。工作組可以和他們展開辯論。辯論也要有些力量。讓那些爭取過來的人也參加辯論。……七月五日，鄧親自找我和工作組組長張世棟及兩位學生代表到中南海開會。他又一次當面指示要組織辯論。當時一位同學代表說反對工作組的人都不願意參加辯論了，怎麼辦？鄧竟指示說：‘她們不來，缺席辯論也可以嘛！’”

根據鄧小平在十天內連下的三道指示，不顧工作組同志的反對，七月七日到七月九日接連召開了三天的辯論會，圍攻反工作組的學生，“製造白色恐怖”^[1]。

除了帶頭反工作組的學生外，其他很多學生也沒有幸免于被打擊迫害。鄧榕後來對師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憶到：“鄧小平多次和我說：要不斷地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選準打擊目標’。這個目標就是革命群衆，這成了我的指導思想。在我做大隊工作的時候，忠實地執行了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讓各班輔導員首先分

[1] 胡啓立：《鄧小平是鎮壓師大女附中革命學生的黑司令》，新北大公社 02621 支隊編《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 年 4 月。

類排隊，劃分左中右，實際上就是排‘黑名單’，找出依靠對象和打擊對象。有的班共分七、八類之多，開幾次輔導員會也都說各班誰是左派，誰是右派……。當時，一些班裏的領導小組成員出身不怎麼好，由於受反動血統論之毒害，我極端的唯出身論，滿腦子想得都是‘奪權’，在排黑名單之後，就大搞奪權鬥爭，想把各班都換上我們信任的人，熱衷於調查家庭問題，今天你是領導小組的，明天一調查出你家有問題，就換掉。為了開一個改選會，商量半天，估計各種情況。惡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學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憤，然後再改選、換掉，完全是運動群衆。^[1]”

五十天內，女附中的幹部統統“靠邊站”，六個校一級領導幹部五個被鬥，六個教研組長也有五個被揪鬥，37個班主任有32個被圍攻鬥爭，教師被圍攻、鬥爭的佔50%以上。七月初，劉少奇、鄧小平制定一個對中學幹部、教師進行“集訓”的方案，以便結束中學運動，儘快開學。從七月二十三日開始，工作組組織了包括即將退休的老教師和半退休病號在內的師大女附中幹部、教師“集訓”，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決他們“洗澡下樓”問題。每個幹部、教師都跟著一個“左派學生”，工作組把幹部、教師的排隊類別和主要材料告訴這些“左派”，他們隨時可以叫幹部、教師交代問題。七月二十五日，工作組組長張世棟講：“洗澡下樓不要‘就事論事’，要猛上綱。”“有人要洗燙水澡。革命小將在把關，守得很嚴。”集訓期間，幹部教師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殘，很多幹部教師都講，去集訓就像進了“集

[1] 《鄧榕對鄧小平的揭發》，新北大公社02621支隊編《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中營”，有的教師說：“再過幾天，我就要被逼瘋了！”有的教師寫了遺囑、絕命書^[1]。

一附中和師大女附中是北京兩所很特殊的中學，那裏高幹高知子弟雲集，然而它們却是北京其他中學的排頭兵和風向標，其他學校會積極地效仿它們的做法。在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五十天內，工作組和工作隊在北京和全國各地的大中學校的做法，有著驚人的一致性。

北京市高校的群衆事件

五十天歷史中，一個值得思考的重要案例是清華大學，當時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以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的身份擔任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顧問。可以參考《紅旗》雜誌編輯部調查員的那篇著名的調查報告，這裏不再引述^[2]。

官方和主流歷史對五十天中唯一最著力的一筆記載就是：北大“六一八”事件後，劉少奇轉發《北京大學文化

[1] 新北大公社 02621 支隊調查組：《清算鄧小平在幹部、教師問題上“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九六六年六、七、八月北京師大女附中工作組和校籌委在幹部、教師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調查）》，《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 年 4 月。

[2] 《紅旗》雜誌編輯部調查員：《“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兩月清華大學工作組在幹部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調查）》，《紅旗》雜誌一九六七年第五期，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其他有關清華大學五十天的材料：《清華大學蒯大富同學大字報選》，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宣傳隊編，1967 年；吳英碌：《控訴劉鄧反動路線對我的迫害》，《井岡山》1967 年 4 月 6 日；《在幕後……》，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老實話》編選，1967 年 3 月。《王光美是劉少奇的劔子手——原清華工作組長葉林同志發言》，《井岡山》1967 年 4 月 11 日。

革命簡報（第九號）》并加了按語，從而使全國各地的亂批亂鬥的現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然而，這裏有意不去觸及兩個問題：第一，當時并不是以法治或者鬥爭策略的角度去制止武鬥的，而恰恰是從文革的“極左”話語、以“陰謀論”的觀點出發的。《簡報》認為，北大“六·一八”事件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活動”、“壞人搞了我們一下，但壞人也暴露出來了”，因而對付的辦法，也是上綱上綫到敵我矛盾的性質去嚴厲處理；第二，學生中自發的“亂鬥”現象，實際上是四清以來的政治運動的慣例作法，那就是以四、五十年代土改中解決敵我矛盾的武鬥方式，運用到六十年代人民內部矛盾的處理當中，《簡報》中特別提到“避開工作組亂打亂鬥的作法是有害于革命運動的行爲”，這意味著：要害在于“避開工作組”，而不在于亂打亂鬥本身，因為工作組本身并不回避武鬥，“要文鬥不要武鬥”的原則，實際上是在八月份“十六條”（即《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公布以後才真正確立起來的。由上述北京兩中學案例可知，劉少奇、鄧小平並不反對對他們心目中的“右派”和“搗亂分子”實行暴力，下面有關史實更說明：在後來的文革群衆運動中，對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工作的五十天的最大指控，不是別的，恰恰就是“打擊一大片”和“殘酷鎮壓群衆”。

而“打擊、鎮壓群衆”的主要工具，就是工作組。派工作組是共產黨的一種傳統工作方式，其前提就是：一個基層單位的工農群衆處于受壓制、不敢反抗、沒有領導的落後狀態，工作組下去瞭解情況，搞清敵、我、友，以便發動群衆。在四清中，這個前提被修改為：一個單位的領導班子爛掉了，實際上已經沒有黨的領導，因此上級黨委

就要派駐一個工作組，去重新確立黨的領導，確定誰是左、中、右，這就是所謂“奪權”。因而，派到基層單位的工作組，代表著黨，代表著中央。這個有關“黨的化身”和“黨的體現”的理論，得到當時大多數各級幹部的認同，比如，薄一波 1966 年 6 月 19 日在視察清華大學時，就“工作組能否代表黨”這一問題與蒯大富發生爭論，薄對此作了畫龍點睛的精采評論：“信賴黨中央和毛主席是對的，但毛主席不是孤立的，他有頭髮，有手，有腿，……他作事情是通過這些作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政策是通過基層執行貫徹的，我們認為工作組是可信賴的，難道你連毛主席派來的人都不相信？”^[1]”

按照劉少奇、鄧小平的理解，文革是最新的、空前規模的政治運動，因此派工作組的數量也要空前規模了。一九六六年北京有六十所高等學校，三百一十二所中等學校，還有半工半讀的學校約一百所左右。六十所高校中有四十七所派了工作組。北京市各中學的工作隊是由團中央系統抽調了一千五百多名幹部組成的。僅在北京市的文教機關，就派出了 7239 人的工作隊，其中僅清華大學就派出了五百多人的龐大隊伍^[2]。

絕大多數高校校園的動員、失控從六月一日晚開始。北工大可能是個例外。動蕩從三天前就開始了。工作組進

[1] 薄一波在視察清華大學時與蒯大富的對話（1966 年 6 月 19 日）。

[2] 這個數字出自《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12-1967.10.1》，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編，1967 年，北京。周恩來 1966 年 8 月 5 日凌晨在清華大學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的講話中說：“整個北京市派到各校各單位的工作組將近一萬人，從各地各戰線、全國調來”。

入各校後的作法並不完全一樣：有的原黨委已經垮臺，工作組進校後取代原權力機構，有的工作組和校黨委站在一起，和一部分師生群衆發生矛盾衝突，有的工作組對本來就存在矛盾的學校中的兩派支持一邊，反對一邊，加劇了矛盾。然而所有的工作組行爲一致的地方在於：都按照“給群衆分類排隊”、“上下左右一起掃”、“打擊一大片”的“桃園經驗”，主觀上十分真誠地開展運動；其次，以五七年反右為參照，視反對工作組的群衆為“右派”、“反革命”或者“假左派、真右派”，實行打擊迫害。清華大學的一位政工人員後來回憶到：“當時北京市大多數高等學校都出現了反對工作組的現象，派出工作組的領導人認為這是五七年右派進攻的重演，還認為有舊北京市委的黑線在裏面起作用，總之是牛鬼蛇神大出籠，要引蛇出洞，然後予以殲滅，他們把這個部署總稱為‘反干擾’，在清華就是‘反蒯’。^[1]”下面就來考察一下一些北京高校的情況。

各個學校的形勢發展大都是以轟動性的事件為標誌的。比如，北京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發生了“十號事件”。六月十日，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師和系裏的一部分學生組織群衆集會，揭發院系領導的問題，并把矛頭指向了商業部派來的工作組。院黨委陳如龍和工作組把該事件打成“向黨猖狂進攻”的反革命事件，十名青年教師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組召集金融系的教師幹部在下午和晚上連續兩次組織鬥爭會，實行逼供信，強迫造反師生承認是“反黨”、“反革命”，交代“反黨綱領”。宣布對他們“實行專政”，“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據當事人的控訴，在工作組和校當局

[1] 陶德堅回憶錄，http://www.geocities.com/sltao_ca/fyrs.html。

的煽動蒙蔽下，“不明真相的群衆不分晝夜到我們宿舍圍攻、聲討、鬥爭、示威，在樓道走廊，宿舍內外，床上桌子上，書上圖片上，抽屜裏以至烟盒火柴盒上，到處貼滿了‘打倒X X X’，‘反革命’，‘反黨分子’，‘混蛋’等標語、口號，甚至把標語、漫畫貼在我們背上，對我們實行體罰和人身污辱。”“晚上一點鐘以後，還有人每過一會來敲打一次門，不叫我們睡覺。他們還讓同學晝夜站崗放哨看守我們，甚至拿著木槍、木棍看著我們，對我們實行隔離，限制我們的自由，不准我們找人談話，不准我們出外買紙烟，監視我們的一切行動。當我們向他們提出了強烈抗議後，他們還說什麼這是‘群衆運動嘛’，‘是可以理解的’。”^[1]

在北京高校，工作組和群衆的衝突事件大部分集中在六月二十日左右。其中較著名的，就是北京地質學院“六·二〇”事件。據首都三司編寫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12—1967.10.1）》記載，六月二十日，“院黨委常委李貴和部分幹部、教員一起上書黨中央、國務院，揭發工作組的錯誤，他們的行動得到了廣大學生的支持，師生團結起來，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矛頭指向鄒家尤工作組。當時的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魯笳、地質部副部長兼黨委書記何長工斷言地院有‘地下司令部’，並指示工作隊抓李貴。薄一波後來在地院工作組整李貴的黑材料上批道：‘看來李貴至少是個右派，可能還是個反革命頭子。’第二天地質部的領導人還調來一批機關工作人員，為鄒家尤工作組吶喊助威，并組織家屬、小孩搞游行，作

[1] 八八隊金教“六·一〇”戰鬥組《憤怒控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我們的迫害》，紅代會中央財金學院北京公社八八戰鬥隊《北京公社》1967年4月20日。

爲反擊。^[1]”

北京師範大學的“六·二〇”事件是這樣的：譚厚蘭等十七位學生貼出了《孫友漁要把運動引向何方？》的大字報，一些師生紛紛支持。上午十時，工作組組長孫友漁急忙作“廣播講話”，認爲大字報“別有用心”，“他們的命運與牛鬼蛇神聯繫在一起”，是“有計劃、有組織的預謀活動”，“要趕工作組下臺”。于是，以“橫掃外圍”、“反干擾”、“抓游魚”名義的圍攻開始了。大字報的作者沒有屈服，中午又貼出了《孫友漁爲何如此恐慌？》的大字報。當晚，圍攻和批鬥的現象愈演愈烈，寫大字報的人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黨”“反革命”等帽子，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許吃飯^[2]。

北京林學院“六·二〇”事件圍繞一份《談話紀要》的文件展開。六月二十日清晨，林學院學生蔣書銘、曾憲均五人根據訪問新市委接待站大學組許克敏後所得記錄，整理成大字報《與新市委許克敏同志談話紀要》（也稱《二十二個問題》）。這份大字報回答了當時運動中所提出的一些問題，深受群衆歡迎，廣爲傳抄，不脛而走，到六月底，就貼遍了哈爾濱、呼和浩特、上海、廣州、武漢、重慶、西安、長沙等三十四座大中城市。這份大字報，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綱領”、“大毒草”，聲言要“消

[1] 另一種稍有不同的記載是：事件的“起因是這個工作組明顯地有目的地把矛頭引向在地質學院深得人心，特別是爲教師和學生擁護的院長高元貴，因此在六月十六日地質部來人宣布高元貴停職反省限期作出檢查後，六月二十日，地院出現了兩千多群衆包圍工作組駐地請願的場面，參加者大多是教師和學生。”（陶德堅回憶錄，http://www.geocities.com/sltao_ca/fyrs.html）

[2] 《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12—1967.10.1》，p49-53，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編，1967年，北京。

除流毒，肅清影響”。大字報的作者、林學院的五位學生被打成“反黨小集團”，遭受長期的殘酷鬥爭。據此，薄一波把林院定為“反干擾”的重點學院之一。七月九日，工作組召集十二個院校四千餘人參加的“批判反動的二十二個問題大會”，鬥爭蔣書銘等人達八小時之久，并宣布“取消蔣書銘等的預備黨員資格”。

同一時候，清華工作組把清華大學轉抄這份大字報的三個人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師史XX因翻印《談話紀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

《大事記》記載北京林學院《談話紀要》這樁文字獄的波及範圍：“反革命圍攻像瘟疫一樣流毒全國，很多地方有領導有組織地批判這個《談話紀要》。據不完全統計，四千餘人因傳抄這張大字報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殺身死，二人吐血，二個人被逼死。^[1]”

這張大字報到底邪惡在哪裏，使工作組視它為洪水猛獸呢？和當時各院校普遍反對工作組的言論比較，它並沒有什麼特別“反動”的地方，最不對工作組胃口的，不過是“對出身不好的人更要歡迎他們揭發問題”、“有人盲目地擁護黨委，以為通過運動可以入上黨，或當個好黨員，那就倒霉了”等話，還有就是把運動的政策向群衆公開、和群衆直接見面這種作法本身也讓工作組很不舒服。

據《大事記》記載：“直到十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文革的主持下這張大字報才徹底平了反，重見天日，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字報作者和轉抄者才得到了解放。”1966年11

[1] 《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12—1967.10.1》，p49-53，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編，1967年，北京。

月 3 日的首都紅衛兵三司報紙《首都紅衛兵》是這樣記載的：“（八月以後）北京林學院受迫害的革命同志和清華大學的趙鋒、馬建武等同志成立了‘北京林學院、清華大學“二十二個問題”串連小組’，……在這期間，全國各地革命群衆紛紛來信來訪，給他們提供大量的情況。”“北京林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長春地質學院等革命學生在來自全國十幾個省三十多個市六百多革命師生的支持下，乘著《紅旗》十三期社論發表後的大好形勢，發揮無產階級專政下大民主的巨大威力，勇敢鬥爭，”最後，“迫使北京林學院原工作組組長賀 X X 承認錯誤，北京市委對錯誤處理‘二十二個問題’作了公開檢討，收抄回一部分‘黑材料’，給蔣書銘等同志恢復和補發了助學金。”

在六月二十日前後幾天時間裏，北京市有三十九所大學發生工作組被群衆轟趕、工作組反過來打擊群衆的事件。工作組對發表反工作組言論的群衆的定性也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援用“反右”、“匈牙利反革命暴亂”的先例，將反工作組的風潮理解為“向黨猖狂進攻”。比如，北京外語學院的“六·一三集會”被打成反革命集會，性質類似的反工作組的“六·一六”趕工作隊事件，被打成“小匈牙利事件”。當時一位領導幹部的話反映了一種典型心態：“六月二十日前後，在野的右派感到氣候已經合適，紛紛出籠，他們和黑幫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結，利用群衆的革命熱情，以極左的面目出現，興風作浪。^[1]”總之，工作組對群衆的作法，用我們熟悉的話來概括，就是以革命的、“極左”的

[1] 《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12—1967.10.1》，p49-53，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編，1967 年，北京。

詞句上綱上線，扣帽子、打棍子。然而，這些都是在文革“極左”政策後來的受害者——劉少奇、鄧小平的主持下發生的。

鑑于北京高校反工作組的風潮興起，北京市新市委書記李雪峰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飯店召開市委工作會議，作了著名的“六·二三”報告，認為“情況複雜，反革命、黑幫、保皇派，資產階級的‘權威’及其擁護者、右派學生跳出來，趁機製造混亂，渾水摸魚，與工作組爭奪領導權”，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利用群衆的革命積極性和對黑幫的仇恨，企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在現階段，擁護新市委還是反對新市委，是擁護還是反對黨的重要標誌。”“對右派趕工作隊一定要清理。在這個緊要關頭，共產黨員一定要站起來保衛黨，不站起來，納吉就要上臺了。”

北京各高等學校，先後傳達了李雪峰的“六·二三”報告，把“反干擾”推向頂峰，“高校和中學一片白色恐怖”。據《大事記》記載，在“反干擾”時期，僅在首都 24 所高等院校統計，工作組把 10211 名學生打成“右派”，把 2591 名教師打成“反革命”^[1]。六·二〇以後，工作組利用幹部急于參加運動、要求解放的心理，誘導他們通過積極參與圍攻反工作組的學生來換取早日“洗澡下樓”，讓他們“將功補過、立功贖罪”。著名的例子就是清華大學工作組讓下樓的幹部參加“反剷”運動。

[1] 《大事記》，p56；王年一認為：這個數字“與事實出入很大，有的出版物中沿用了這個極不準確的說法”。此問題待考。

全國各地大中學校的群衆事件

首都的政治氣氛濃厚、消息靈通，發生上述矛盾鬥爭可以理解。然而，北京并不是例外，五十天裏，類似的矛盾衝突也在全國各地上演著。唯一不同的是：北京高校的工作組大多是中央各部派去的，而各省的工作組是由各中央局和省市委派出的。

在廣州發生的一起轟動一時的事件，是由一封北京來信引發的。六月間，華南工學院學生高翔收到其妹從北京寄來的一封信，介紹北京文化革命的情況，高翔等學生在六月二十四日貼出了“北京來信”，並寫了《告全院學生黨員書》的大字報。“北京來信”中有這樣的話：“除了毛主席和黨中央，各級黨組織領導都可以懷疑。”頓時，學生奔走相告，爭相傳抄。

當晚，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主持召開會議，把“北京來信”定為反革命信件，決定派出專案組進行偵察。二十五日凌晨一點，在工作隊和學院黨委第一書記張進策劃下，一些工農和革幹子弟舉行緊急會議，連夜寫出批判文章、大字報，指責“北京來信”是“反革命暴動的宣言書”，是“裴多菲俱樂部反革命綱領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亂的前奏”。工作隊還布置對有關學生進行監視、跟蹤。因“北京來信”受到鎮壓，五名學生赴北京反映情況，被省委攔截和控制。華南工學院蕭玉祥等十八名學生寫了一篇“各兄弟院校聯合起來”的信件，提倡串連，也被定為反動信件進行追查。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第七期《中南文化革命簡訊》（當時中共中南局的一份內部刊物）報道了這一事件，并把這

一事件形容為“華南工學院就一封反動信件展開的一場鬥爭”。將近一年後的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周恩來在對廣州兩派代表的談話中，特地為“北京來信”事件平反，他說：“‘北京來信’那個鬥爭是受壓迫的。是廣東革命群衆第一次受當時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省委的迫害，也是受到陶鑄的壓迫。^[1]”

中南地區在五十天內壓制群衆的現象是普遍的。中南局第二書記、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四月中旬在武漢洪山賓館會議就上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四清”加“反右”的觀點。七月三日，王任重和陶鑄起草了《給湖北省委的信》，信中說：“首先打擊最猖狂最凶惡的敵人，即首先打擊大多數群衆最痛恨的敵人。……有的是幹部、教師和大學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本院可以把最壞的右派學生揪出來集中地鬥，打掉他們的氣焰。”。在此影響下，武漢大學工作組的負責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階段”^[2]。

這個思路被工作組在武漢大學付諸實踐：“全校幹部和教師（總數是 1242 人）被打成‘黑幫’、‘黑線’的 232 人，黨支部副書記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幹部被打成‘黑幫’的 108 人，有 4 個單位總支的一般幹部被 100% 打成黑幫或靠邊站。工作組拋出武大‘三家村’以後，又在各系各單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單位硬性抓出三個來湊成一個‘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總務處一個單位

[1] 海楓：《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1971 年，香港友聯研究所。廣州《紅旗報》，1967 年 6 月 24 日。

[2] 《徹底批判王任重工作組在武漢大學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武漢紅衛兵三司《東方紅》1967 年 5 月 11 日。

就有四個‘三家村’，修繕組、機械廠的工人也成了所謂“三家村”的大老闆。^[1]”

一起駭人聽聞的事件，發生在武漢墨水湖中學。六月初，該校師生蕭維業等人寫大字報揭發學校當權派壓制學生革命的行爲，遭到學校當權派的威脅、恫嚇，後來工作組進校，衝突進一步發展，由王任重親自出馬，把師生的行動看作是“反革命階級報復”、“反革命暴亂的典型”，要中南局批發文件到基層，并上報中央(後來沒有批准)。六月二十一日，學校工作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這些起來造反的群衆打成“反革命”，分別看押起來，組織群衆鬥爭。七月十一日，公安局逮捕了他們，關進武漢監獄，先後審訊了六次，威嚇他們說：“你們有兩條路，如果不承認，等著你們的就是棺材、監獄、判無期徒刑，承認了你們是反革命，你們就有活路。”不久，他們就被分別判刑，其中有的被判處死刑緩刑兩年，最小的三個十六歲的學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同時，工作組根據王任重的指示，舉辦了“武漢墨水湖中學現行反革命罪行展覽”，把造反的群衆說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這個展覽會展出了兩個星期，在武漢市造成很大影響。王任重還親自指示，要為這件事寫社論和報道，武漢市長親自審稿，市委機關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報》搶先登載，還計劃八月五日在漢口新華路體育場開公審大會^[2]。

另一樁殘酷迫害的典型案例，發生在北京師範大學臨

[1] 《王任重鎮壓群衆運動的罪行——武漢墨水湖中學革命師生入獄記實》，首都批判劉鄧路線新代表陶鑄聯絡委員會《批陶戰報》，1967年3月14日。

[2] 李志宇：《憤怒控訴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紅代會北師大井岡山公社《井岡山》，1967年4月11日。

汾分校。以武永泰爲首的工作組是六月二十日進校的，“原來受到黑黨委壓抑的廣大革命師生，敲鑼打鼓，用熱泪迎進了他們，并對他們寄予無限的希望。”而工作組的政策是，全部幹部“靠邊站”，“在橫掃的基礎上找重點”、“剝筍政策”，并把鬥爭矛頭轉向一般幹部和學生，把學生幹部也當作“當權派”，整個分校一片白色恐怖，一名班團支書高尚年，在工作組進校第三天就被逼自殺，據他的同學後來的控訴，工作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真是猖獗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逼死一個人就像殺一隻小鷄似的平常。當把高尚年從井裏撈出來時還說：看看死了沒有，如果沒死還得拉去鬥。”另一名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學生幹部李志宇，在工作組“天天敲”的口號下，不時被提審、被鬥爭，低頭、立正、手放下的訓斥聲接連不斷，并被關在屋子裏寫檢查^[1]。

在吉林省長春市的東北人大（即吉林大學），發生了所謂“紅旗事件”。六月十三日起，東北人大師生的大字報開始貼出揭發黨委第二書記陳靜波與原東北人大校長兼第一書記匡亞明的關係的大字報（六月十三日，江蘇《新華日報》刊登了南京大學黨委第一書記兼校長匡亞明被揪出的消息）。六月十四日，省委召開緊急會議，派市委書記處書記李一平爲首的工作隊到東北人大滅火。工作組進校後，工作組和給黨委提意見的群衆發生了各種衝突。六月二十一日，“在一片‘李一平’滾蛋的聲浪中”，市委工作隊召開東北人大全校黨員大會。會上李一平號召黨員表態支持工作隊。市委第一書記宋潔涵對工作隊員講：“往外趕工作隊，

[1]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革命造反隊：《王任重，我們要跟你算賬！》，《井岡山》1967年X月X日。

說明有壞人搗亂。要準備鬥爭。”會上決定，晚上開群衆大會，把市委工作隊擴大為省市委工作隊，仍由李一平任隊長。全校黨員大會的消息傳出後，很多群衆義憤填膺。當晚，群衆從四面八方向校大禮堂聚攏，打破了工作隊“憑票入場對號入座”的規定。群衆進入禮堂後，發現臺上無國旗，僅有主席像，還歪挂在那裏。同學們上前與工作隊交涉。要求把主席像擺正，挂上國旗。工作隊的副隊長說：“得請示省市委。”這一下激怒了師生，“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三、四百革命小將自己動手擺正了主席像，又登臺扛起國旗。”十一點鐘，省市委從郊區公安分局調來兩汽車公安人員，幫助“維持秩序”，後又由各工廠、機關、學校臨時抽調二百七十多名四清幹部，以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韓容魯為首組成工作隊。“全體隊員強行登臺向革命群衆示威”，這就是轟動全城的“紅旗事件”。“紅旗事件”被省市委定性為“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革命事件、“右派搗亂”事件。事後，宋潔涵指示工作隊要詳細調查“紅旗事件”的參與者，整理黑材料。省市委工作隊對學生進行排隊，把全校數名敢于造反的學生打成“反革命”^[1]。

工作組與群衆面對面對峙的場面，也幾乎同時發生在重慶大學校園。以下是群衆出版物《八·一五戰報》所敘述的事件經過：

以張種玉為首的重慶市委工作組6月8日進校之後，肯定校黨委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委”，不准貼校黨委和黨總支的大字報，發生了壓制群衆運動的現

[1] 《春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九六五年十一月——一九六八年三月》，p14，長春公社五〇三戰鬥隊編。

象。在師生的强大壓力之下，6月16日工作組被迫叫校黨委書記鄭思群就壓抑群衆的一系列錯誤向全校師生員工作一次假檢查。而當晚，由各系黨總支書記照定下的框框分別向群衆作檢查。但是這樣作却更加暴露了工作組、校黨委和群衆之間的矛盾。在無線電系黨總支召開的檢查大會上，一些參與了以前官方秘密會議的同學自動起來揭發了系黨總支召開秘密會議以及會上布置的壓制群衆的種種措施，師生情緒高昂，紛紛要求當時追隨校黨委的一年級輔導員劉XX交出指示其開秘密會、布置開黑名單的幕後指揮。接二連三的提問弄得劉XX手足無措，冷汗橫流，不斷以目光向當時在場的校黨委委員王XX和工作組組員張XX請示和求援，張、王上臺幾次也不能控制會場，爲了挽回敗局，他們請示了校黨委辦公室主任丘崇興和市委工作組組長張種玉，丘崇興數次從同學手中奪過話筒，叫大家“這個會不要開了！時間不早了，快回去休息！”（當時是晚上十一點多鐘，而同學們認爲時間還早）留在後臺的工作組組長張種玉也極力勸阻在後臺排隊準備發言的同學：“今天很晚了，這個會準備不充分，開不好，謹防階級敵人利用。”軟硬兼施，終於制止了這次大會的繼續召開。據形容，此時“重大校園內像堆滿了乾柴，只要一點火星，立刻就會燃燒起衝天大火”。

6月18日，工作組副組長張海亭的報告是“六·一八”事件的導火線。那天上午，無線電系的同學聽說電機系的一些同學因揭發校系兩級的問題受到圍攻，馬上組織全系同學排著隊伍冒雨前去聲援。工

作組副組長張海亭出來接見同學時，說：“你們的熱情是好的，但是，這麼多人，亂糟糟地來，解決不了問題……電機系的問題，他們自己解決，你們還是回去學習文件吧！”同學們對他的態度十分反感，不再搭理他，而誦讀了給電機系同學的聲援信，兩系同學一起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號，一時群情激憤。

聲援結束後，無線電系的同學又找人去把情況講給坐鎮重大校園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何正清，要求他對此表態，但何正清認為工作組副組長張海亭是正確的。聯繫到工作組到校後的一系列表現，同學們認為市委工作組“和校黨委串通一氣，鎮壓我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天中午，就有幾個班的部分同學分別聯名給黨中央和毛主席發出加急的求援電報（有的電報被郵局攔截下來了，未發出）。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行動，使一些同學結成了某種集體。

6月18日下午，張海亭代表工作組給全校黨員和團幹部作了一個報告，認為“共青團員要堅信市委，堅信黨中央，對於上級組織的決定，即使是錯誤的，也必須堅決執行”。被同學們認為是劃框框、定調子、潑冷水的報告。

6月18日晚上，無線電系召開團員大會（有部分青年同學參加），傳達下午張海亭的報告，在傳達過程中，同學紛紛遞上字條，對報告的許多觀點提出疑問，并要求發言對其進行批判。報告傳達完畢，就已經有人跳上臺去，準備發言。但是，當時負責傳達的系團總支書記高XX和工作組成員張XX拒不同意，于是，在要不要繼續把會議開下去，要不要批判這一報告的

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突然電源被切斷，工作組的另一成員楊XX跳出來指責同學批判張海亭報告的行動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在事情的過程中，又有人打電話請示住在松林坡的重大工作組組長張種玉，他十分不滿地回答：“你們實在要開就開吧——叫工作組成員全部回來開會！”在場的人都知道事情變得嚴重了。一些膽小的人離開了會場。三、四百名堅定分子留下來了，大家推選出了幾個人組成了會議臨時主席團（絕大多數是同學們上午推選出的學生代表），有人搬來了錄音機，為大會錄音，有人自動維持會場秩序，大會繼續開下去了。

同學們爭先恐後地跳上臺，對工作組和校黨委串通一氣、壓制群衆的行爲進行揭發和控訴，提出了“不信任工作組”、“在黨中央毛主席沒有派人來之前，自己組織起來鬧革命”等口號，還有人提出：鑑於工作組和校黨委串通一氣、壓制群衆，為了保證文化革命運動的正常進行，必須“接管廣播站”、“接管武裝部”；最後，會議決定：要把學校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向黨中央、毛主席直接彙報，第二天要在全校公布大會材料，用放錄音、大字報、演講等方式揭露市委工作組。也有人提出，有人要切斷我們和黨中央毛主席的聯繫，電報發不出去，我們要殺出校門去，到工農兵中去宣傳，爭取工農兵對我們援助。發言的人一個接一個，會場的氣氛越來越熱烈，等待上臺發言的人在臺後派成了一條長蛇陣。電機系、機械系、冶金系和其他外系的同學也來聲援了，也要求發言，會議一直開到深夜兩點鐘。大會之後，在校內進行了聲勢浩大的游行，

“揭穿市委工作組的大陰謀、大騙局！”“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等口號響徹夜空。

就在同學們的自發會議進行的同時，市委宣傳部長何正清正在黨委禮堂講話，宣稱：無線電系集會是反革命事件。當時何正清和張種玉研究了兩項措施：第一調軍隊來，如果學生上街游行就鎮壓，第二立即把機械系的工人集合起來，拿上工具去“保衛”一大樓（無線電系集會所在地）。

“六·一八”集會的消息馬上傳到市委大樓裏面，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和其他幾位書記通宵未眠，共同策劃對策。工作組親自布置對無線電系師生進行圍攻，指定兩個同學各籌一篇稿子，聲討無線電系“反革命事件”。6月19日凌晨起，無線電系的學生在宿舍、在路上到處受到圍攻，校園內貼滿了“憤怒聲討無線電系一小撮人非法集會的反革命罪行”等巨幅標語和“聲討”大字報。晚上，工作組和校黨委組織了鬥爭會，對“六·一八”集會的參加者和支持者實行綁架和鬥爭。重慶市委、省文革小組專門為此事發表了“歪曲事實真相”的“情況簡報”。然而，事件之後，重慶市委也被迫調回了原來的工作組組長張種玉、張海亭，又派了新的更大的工作組進駐重大^[1]。

最後來看一起發生在校園之外的衝突，這就是南京“六·一三”事件。六月十二日，南京大學揪出了匡亞明，六月十三日《新華日報》登出了一篇《堅決支持南京大學

[1] 《踢開絆腳石，自己鬧革命！——重慶大學“六·一八”事件紀實》，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八·一五戰報》，1967年6月18日。

師生的革命行動》。南京的大中學生對這篇文章有很多批評和責問。認為文章把揪出匡亞明的功勞加在省委頭上，說是省委及時發現的，從而給省委定下不容懷疑的調子。六月十三日中午，南京農學院兩位同學給《新華日報》貼了第一張大字報，題目是《這裏有鬼》。不到兩小時，報社內外貼滿了大字報。報社部分工作人員雖然手拉手築成好幾道人牆，也阻擋不住到報社內貼大字報進行辯論的群衆。於是，公安局的人員來了，開頭來了幾十人，後來增加到二三百人，他們同報社的工作人員一起，把到報社內貼大字報和進行辯論的群衆趕了出去，然後關上鐵門，惟恐進來一個學生。“門內外嚴陣以待，如臨大敵，把革命群衆當成洪水猛獸。”

本來到報社去貼大字報和辯論的群衆比報社工作人員和公安人員多得多。後來，報社的鐵門關上了，門內是有組織的“保衛黨報”的公安人員、報社的編輯和記者、印刷廠的工人、半工半讀的學生，外邊的公安人員不時從外邊拉進一些學生和青年工人，一進門，便被團團圍住。這樣多數變少數，各個擊破。比如，六月十三日晚上，寧海中學一個幹部子弟被拉進報社，報社一大群人與他辯論，逼他承認錯誤，他不承認，報社領導就讓工人們鬥爭這個“反黨”學生，拍桌子打板凳地罵了一個多小時，罵後還不讓回校。

事件延續到第二天，六月十四日，逸仙橋小學一位少先隊輔導員因爬牆貼大字報，被公安人員拉了下來，衣服都被撕破了，拉進報社後要他承認錯誤，許多人與他輪番辯論，他不承認錯誤就把他關在報社的乒乓球室裏，最後用吉普車把他押到公安局。和這位輔導員同時被拉進報社、

遭到圍攻、被扣上“反黨”帽子的人很多，其中大多數是青年學生。

這些人被拉進報社，公安人員便強迫他們拿出證件，之後向其所在單位黨委或居民委員會通電話，調查被扣人的政治情況，然後威脅說：“你的底細我們全知道了！”有些學生在報社門口多停留一會，或多去過幾次，或者與報社人員發生過爭執，於是公安人員便把他們的單位、姓名記下來，準備順藤摸瓜。

在第二天，報社印刷廠三個工人在街上貼了一張揭發報社問題的大字報，“這下子可翻了天啦”，報社當權派便組織工人開小組會批判他們，說他們被壞人利用了，要他們承認錯誤。

凡是貼出和送進的大字報，不管內容、作者，報社都組織人整理了，貼在街上的大字報全部拍了照，照片洗出後，用放大鏡一張張把內容整理下來。“這是自覺地運用五七年反右鬥爭的‘經驗’來對待群衆”。“六·一三”事件被省委和報社打成“少數壞人鬧事”的事件。懷疑過《新華日報》的群衆被搞得人人自危，有的還被迫親自到報社編輯前檢討、認錯^[1]。

五十天內，全國各地的類似事件很多，較著名的還有西安交大“六·六”事件、青海“六·十”事件、廣西西大“龍乾運事件”等等。這裏所考察的案例應該是具有代表性的，因為有關各地類似的、雷同的案例的材料不少，這裏不

[1] 《炮轟〈新華日報〉——揭開“六·一三”事件的蓋子》，紅衛兵南京大專院校司令部《紅衛兵報》，1967年1月16日。毛澤東于1966年7月21日同中央局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講話中，曾提到：“那麼怕能行嗎？所以西安、南京報館被圍了三天，嚇得魂不附體，就那麼怕？”

一一列舉了。從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內所發生的事情來看，當時中國社會的政治生態具有相當高的同質性：在相對封閉的校園內，所發生的類似事件的進展都在同步進行，突發事件的爆發，在全國各地甚至不超過一兩天。當然，這裏面可以看到，北京是政策、信息和轉變的中心，這種機制大致一直延續到了一九六八年群衆運動結束之時。

五十天落下帷幕

進入七月份，各地校園內反工作組的風潮在工作組和黨委的壓制下大多沉寂下來。以北京大學為例：據記載，自從“六·一八”以後，北大運動變得“冷冷清清”，工作組加強了對群衆的控制，“北大校門重兵布防、戒備森嚴。各系、級之間一律不准往來，同學外出買東西，要兩人同行，向工作組請假，回校後要彙報。來北大的外校師生一律被拒之門外。”七月一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九期社論《信任群衆，依靠群衆》發表後，北大又開始活躍起來。七月十二日，陳必陶等五名學生貼了一張《把運動推向更高階段》的大字報，提出北大運動“冷冷清清，止步不前，左派隊伍沒有形成”，再次批評工作組，此後，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又多了起來^[1]。七月十九日晚，工作組進校後一直受到排擠的聶元梓對哲學系學生發表公開講話，“揭露和批判了工作組的嚴重錯誤”。鄧小平知道了，急忙讓卓琳給在北大上學的女兒鄧楠打電話，指示她“多給工作組提建設性意見，

[1] 《北京大學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運動簡介》，一九六六年，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宣傳組。

不要提破壞性意見”。第二天，鄧楠和一些高幹子弟聯名貼出《批評工作組，擁護工作組》的大字報^[1]。

北京校園裏形勢的真正轉折，是從中央文革的幾位成員走訪校園、參加辯論會開始的。七月二十一日，王力、關鋒去清華探望被王光美工作組關押的蒯大富（此前，蒯大富曾去中央辦公廳談問題，但“還有兩個人押著來的”——據《陳伯達同志的講話》（1966年12月25日））。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陳伯達、江青到北大進行調查。

七月二十四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在北京廣播學院（該校有一百多人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被限制自由）出席群衆大會，江青在會上說：“有些同學有意見，說你們之間不諒解，但你們之間不會有很大的衝突，不能進行迫害，只能怪背後領導他們的人，你們大門關得緊緊的，門口貼著封條，XX不准來，比中南海還緊，我要來放火，我要提出抗議，如果你們不改，我就把你們的門塗成黑門。”七月二十五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在北大東操場主持召開空前未有的萬人辯論大會，一些師生紛紛上臺批評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江青在大會開始時說：“我聽說，你們有幾派不同的意見，有爭論，現在請他們來講講，給我們聽聽。”如果這算是所謂“江青、康生一夥有意煽動和挑撥”的話，那麼，這是在工作組已經推行了五十天的官方恐怖之後，才發生的，而根本不可能成為一個月前學生轟趕工作組的原因。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四下北大，召開

[1] 物理系第四野戰軍詠梅戰鬥隊：《揭開鄧小平的反革命老底》，《新北大》1967年6月28日。

了第二次萬人辯論大會，在張承先的安排下，李洋洋代表三十一名高幹子弟（包括毛澤東的兒媳張少華（韶華））聯合發言，“給工作組唱贊歌”，認為工作組的錯誤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但遭到另一些人的批駁。江青在大會上告訴大家：“昨天同志們遞上來的條子，毛主席都一張一張地看了。毛主席最瞭解群衆，最關心群衆，最支持群衆革命行動！”這時全場情緒激動，口號四起^[1]。

接著陳伯達講話說：“我們建議撤掉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這是一個阻礙同學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組，是障礙物……要撤掉這個障礙物。”這時全場歡呼，人心激動。“建議在你們這裏成立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會議，是文化革命的最高權力機關，這個文化革命小組成員、文化革命委員會成員、文化革命代表會議的代表不是由誰來指定，要由群衆選舉、應該在群衆裏面充分醞釀候選人名單，醞釀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忙，醞釀以後可以把名單貼出來，大家再無記名投票。”

《大事記》記載：這個消息像東風一樣，吹遍首都各個大專院校，北大的造反派星夜奔赴各個兄弟院校傳播這個消息，學校、機關紛紛到北大進行革命串連，北京市大中學校反工作組的高潮再次興起。一九六六年不同尋常的五十天至此落下帷幕。

這裏不得不指出一個明白無誤的事實：此時此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群衆心目中，并不是野心家、陰謀家，而是群衆的朋友，不是打擊迫害狂，而倒是給受打擊、受

[1] 《大事記》，p72。

迫害的群衆撐腰打氣者和替他們平反伸冤的人。在相當一段時間裏，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群衆面前的態度是謙虛的，和五十天的工作組形成鮮明對比。

而且，文革期間群衆對毛澤東的狂熱崇拜，受迫害群衆在感情態度上對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巨大差別，其真實基礎從這個角度也許可以被理解。五十天驚心動魄的經歷，使一大批青年通過切身經歷認同毛澤東作為反壓迫、反迫害、翻身解放事業的魅力領袖，認同“造反有理”這一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心靈體驗。如果說，從前是某些黨委和上級使用著毛主席和革命的名義，那麼現在這種名義由革命的群衆直接獲取了。一位文革親歷者後來這樣寫到：“遭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與血統論壓制的造反派把毛澤東作為永生不背叛民衆的革命家領袖，作為反抗特權階層壓迫的正義帶頭人。這就是為什麼‘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這首歌在那一時代一旦唱起，在場者幾乎無人不流泪的原因。^[1]”

應該說明：一九六六年六、七月份的五十天，不是整個文革歷史的一個無關緊要的插曲，否則本章就有小題大作之嫌。五十天的意義，不僅是長期以來官方政治運動方式的內在矛盾最終不可調和的總爆發，而且，也深刻影響了文化大革命後來的發展趨向。五十天內的矛盾鬥爭，產生了少數派、多數派、造反派、保守派這些政治派別劃分，而這是文化大革命發動者最初沒有預想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字典裏也從未有過的；五十天內的矛盾鬥爭，也

[1] 尤西林：《文革境況片段》，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年，p8。

和上層的“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聯繫在一起，構成了文化大革命發展的主要線索。搞清五十天的來龍去脉、是非曲直，有助于澄清有關文革的一些最基本事實，而這些最基本事實，出于某種原因，在一些地方被模糊甚至顛倒了。需要說明的是：在北京各個校園內，五十天在中央文革的直接干涉下結束了，然而，全國其他很多地方的“五十天”（即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却仍然延續著，工作組和黨委粗暴壓制群衆、壓制不同意見的情形，有的甚至愈加嚴重，而且恰恰是以文革本身的名義。

一九六六年五十天的戲劇性歷史，很自然地引發我們對文化大革命的含義進行新的思考。除了衆所周知的一九八一年官方評價之外，現有對文化大革命意義的評價，還有另外兩種不同觀點值得我們討論：

第一，傳統的評價：亦即中國共產黨官方從文革開始到一九七八年為止對文革的正式評價，至今仍為一些老共產黨人所堅持，它或許被某些人稱為“原教旨”派別的觀點，其內容就是：由於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因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在意識形態領域裏、在政治思想戰線上無產階級批判資產階級的革命鬥爭。然而也承認，文化大革命在實踐中犯了嚴重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即“打倒一切、

全面內戰”^[1]。

第二，是相對比較“異端”的一種觀點，即認為在文革前夕，中國形成了一個新的特權階級，即官僚統治階級。最經常被引用的，就是毛澤東那段著名的話：“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一九六八年出現的湖南省無聯《中國向何處去？》這篇文獻最系統地闡明了這種觀點，認為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就是推翻這個特權和高薪的“紅色資本家階級”，“向著一個沒有官僚的社會去”。這種看法對國內和國際上的一些真誠的左派有很大吸引力，他們對文革的理論和實踐上的缺點和失敗的分析、對文革發動者和領導者的批評，也建立在這樣的觀點之上。

下面對這兩種評價都作一點簡要的評論和批評。傳統

[1]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國外學者如杰姆遜對中國文革的評價，也接近這種“意識形態領域革命論”。這裏所說的評價，當然是指承認文革的某種正面意義的那些評價，至于“徹底否定文革”的觀點，對其批評可參考有關文章：司養眼：《文化大革命與中國農村政治的民主化——北方農村文革中的變遷》，崔之元：《毛澤東文革理論的得失與“現代性”的重建》（以上兩篇見《中國與世界》1997年2月），高默波：《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是否該偏正一點兒？》（楊建利編《紅色革命與黑色造反——文革三十周年紀念研究文集》，二十一世紀基金會，1997年），李憲源：《從造反派與五七年右派的共通點審視文革——兼論誰該懺悔？懺悔什麼？》（新吶喊網站：<http://leftvoice.8u8.com>）。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文革的目的是為了改變人性，比如文革中提出破私立公、狠鬥私心—閃念等口號。這種觀點的主要問題是：把文革的目標和實踐都過于簡化，因為“破私立公”是不足以概括文革思想的全部內容的，比如：“社會主義新人”很重要的一條內容還包括反潮流、獨立思考等。我的討論主要不是和這種觀點對話，因為強調思想道德教育是毛澤東思想的特色，其影響在文革前乃至文革後一直存在，和這裏所關心的文革運動中社會矛盾的性質沒有直接的必然聯繫。

的評價固然是從忠實于歷史行動者的本來話語出發，然而它忽視了一個事實：從毛澤東到群衆，在文革運動過程中所發表的綱領、宣言、政策闡釋和理論思考並非是前後一致的，而是存在大量的內部矛盾，理解文革的意義，就不再是忠實地復述原始宣言文本所能辦到的了。比如：“意識形態領域裏、政治思想戰線上批判資產階級的鬥爭”如何和“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向他們奪權”這個文革運動主題聯繫起來？如何解釋工作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敘述，很難解釋：為什麼恰恰是在文革期間，“無產階級專政”本身竟被“走資派”所篡奪和利用，變為“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總的來說，傳統評價和文革運動的真實發展過程是相當脫節的：假如說，劉少奇、鄧小平主持文革運動的五十天是以批判文化界的“黑幫人物”為重點，這倒是符合了“意識形態領域裏、政治思想戰線上的批判鬥爭”的理解，而在這五十天中，確實是把《“五·一六”通知》中尖刻、激烈的語調具體操作化為對“反動學術權威”簡單粗暴的批判和打擊迫害，那麼，五十天結束、《十六條》發表之後，文革運動的內容開始發生了深刻的轉變（當然這中間還有一個“破四舊”的意外插曲），這包括：一定程度上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式代替原來簡單化、鬥爭擴大化的範疇（比如《十六條》將幹部情況劃分為四類，其中只有“少量的”第四類是敵對性質），群衆的集會、結社、出版、言論自由權利的真正實現等等。正因為傳統評價和文革現實的嚴重脫節，才使得其空洞、說教的理論詞句，在具體生動的“傷痕”回憶錄文學面前，顯得蒼白無力，無法說服人。而且，對失誤以“鬥爭擴大化”一言以蔽之，實際上混淆了誰搞“擴

大化”，誰挑起群衆鬥群衆，這實際上幫助了主流輿論對文革歷史的掩蓋和顛倒。

和傳統評價相比，“異端”評價重視了文革中黨群矛盾、幹群矛盾、群衆鬥爭矛頭針對黨內等問題，至少它在意義闡釋和現實解釋方面，能基本保持不脫節。然而，它的缺陷是：在意義闡釋的簡單明快的同時，過分簡化和忽視了歷史現實的複雜一面。這裏除了“新生的官僚統治階級”的概念存在疑點之外，主要問題就是：文革中的矛盾衝突是否能够一般地等同于經典的社會革命中的階級戰爭？有一個現象耐人尋味：文革中各地基層單位，普遍地爆發了黨群衝突、幹群衝突，一個單位小到一個幼兒園，也可以發生領導人殘酷打擊迫害群衆的駭人聽聞的事情，于是那裏受迫害的群衆就要起來造反^[1]。這從“異端”觀點看，可能被當作典型的“官僚主義階級”和群衆的鬥爭。然而，事情却是複雜的：支持這個單位領導人的，恰恰可能是一大批工農群衆，這些工農群衆正是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受惠者，由他們組成的“保守派”經常是處于多數。顯然，把造反派和“走資派”及其工農支持者之間的這種對抗看成是群衆推翻“官僚主義者階級”的鬥爭是不合適的。劉少奇、鄧小平被指控的一條罪狀，恰恰就是“挑起一部分群衆鬥爭另一部分群衆”，“把打擊對象擴大成一大片，而不是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和群衆”。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恰恰是採取相反的方式處理（當然這裏說的是一個總體的評價）：自從《十六條》公布以後，鬥爭對象被縮小為

[1] 比如：有關北京市東城區十字坡幼兒園的材料：徐建華：《血淚控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紅色職工》1967年1月29日。

“一小撮”走資派，而對大批受群衆衝擊“靠邊站”的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都實行儘快“解放”的政策，而對兩派群衆，則認為他們都是革命的，應該實現“大聯合”。

對於文革意義的更全面的總結，有賴於我們回到“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個範式之下，把文革理解為一次探索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的勇敢嘗試。其實，這種闡釋早已存在於文革發動者的話語之中，只是在其他時代性的重大話語的突出地位之下，沒有被充分展開。這裏，一個值得提及的事實是：對文革進行正式總結的中共九大報告，把毛澤東一九五七年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作為孕育文革的重要里程碑，這不是偶然的。而且在報告中，首次正式公布了毛澤東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對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卡博、巴盧庫所講的一句話：“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衆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

這裏的“黑暗面”，可以理解為“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可以理解為“暗藏著的階級敵人的顛覆破壞活動”，也可以理解為“一個新生的官僚主義階級的形成”，但是，更適當的理解，應該是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中沒有處理好的那部分，特別是“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衆之間的矛盾”。早在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就曾設想過“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有些人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衆一句好話也沒有，就是罵人，群衆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如果脫離群衆，不去解決群衆的

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1]

應該指出的是：上述意義的“官僚主義”和“官僚主義者”是和“異端”觀點的“官僚主義階級”有根本不同的。“見了群衆一句好話也沒有，就是罵人，群衆有問題不去解決”仍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如果說“當官作老爺”是向對抗性矛盾發展的中間過程的話，剝削、壓迫人民的“新生的官僚主義階級”則是和人民處於完全敵對的狀態了。這裏的關鍵區別在於：是把文革理解為人民內部實行大民主的偉大嘗試，還是人民群衆推翻“官僚主義階級”的政治大革命。

邁斯納說：“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其他地方，社會主義革命、廢除私人所有制之後的一個明顯的社會結果，就是一個自主的、特權官僚的上升到統治地位。無論管它叫什麼，是‘新階級’、‘官僚階層’、‘國家資產階級’，或其他許多稱呼，社會現實仍然是一樣的。”^[2]從中國經驗中吸取很多理論靈感的法國理論家貝特蘭，將它稱為“國家資產階級”^[3]。保羅·斯維齊在評論1920年代蘇聯共產黨和新的“國家資產階級”的關係時說：“這個‘曾在形成過程中的階級’存在於國家機器之中，存在於黨之中，而且當然存在於國有經濟的管理層之中。它的成員有各種不同社會背景，有著共同的利益，但還並沒有安全的覺悟去爭取共同利益，它缺少自己的傳統和意識形態。總而言之，它還遠遠不是一

[1]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p324。

[2]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A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of Mao's China. The Free Press, 1986. p322.

[3] 夏爾·貝特蘭：《蘇聯國內階級鬥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個完整的階級，更談不上一個統治階級了。然而，它已經具備了和階級類似的特徵，而且在這一段歷史上起到了本質上的階級作用。^[1]”

如何評價新中國最開始十七年的執政黨？這裏傾向於認為：不能把它等同於一個已經蛻變成官僚主義機器的、壓迫人民群衆的統治階層或統治階級。這期間，共產黨進城掌權後的官僚化、常規化的傾向，與其保持革命純潔性的努力、革命意識形態的再激進化，是共存的、互相矛盾鬥爭著。以這期間共產黨的施政綱領、內外政策來看，它還是一個典型的革命政權。

文革前夕中國社會的矛盾，正是表現為革命意識形態的戰鬥性、警惕性日益強烈，而人民內部矛盾的處理却缺少民主的、公開的方式和渠道，兩方面之間嚴重不可調和而最終矛盾爆發。文革中所暴露出來的大量矛盾衝突，除了那些高薪特權、當官作老爺的作風引發群衆的抨擊之外，更觸目驚心的，是各單位當權派以革命和“左”的名義對群衆進行鎮壓迫害所引起的那些激烈對抗。當革命的旗號、革命的詞句和革命的儀式脫離了群衆、凌駕在群衆之上，其結果就是挫傷群衆，和革命的目標背道而馳。這是直到文革前夕政治運動所一直存在的問題，也令人想起斯大林時代蘇聯社會主義的一些嚴重弊端。

這不僅是歷史上大多數革命過程都難以避免的問題，而且特別是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經驗中一個難以掩蓋的黑暗面。如果說，中國社會主義的經驗因為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式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實踐而和蘇

[1] Paul Sweezy: 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 Monthly Review, 1980. p111.

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迥然不同，那麼，它的可取之處正在于：不是像在斯大林時期的蘇聯那樣，只有對光明現狀的贊揚和歌頌，而是敢于承認自己的黑暗面，甚至敢于發動群衆，公開地、全面地揭發自己的黑暗面。

如果說文革前夕的中蘇論戰和各種政治運動所宣稱的目的在于反修防修，這裏“修”是指鐵托、赫魯曉夫式的非斯大林化，那麼，文化大革命中的群衆運動，已經是在嘗試批判斯大林模式中的黑暗面，是在揚棄新中國體制所繼承的蘇聯模式中的那些不健康因素了。具體說，這就是開始觸及并開始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共產黨內當權者濫用革命和“左”的名義，對群衆進行迫害、鎮壓。《十六條》中的第七條“警惕有人把革命群衆打成‘反革命’”，就相當於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社會主義“權利法案”。文革在這個意義上的嘗試慘痛地夭折了，但是，仍不應否認：文化大革命群衆運動中一段時間內，千千萬萬參加者確實是以巴黎公社為理想的旗幟，嘗試實踐社會主義所本來蘊涵的中心內容——人民大眾參與管理國家上層建築的政治權利——儘管這種實踐包含了多麼混亂、矛盾和慘痛代價，用今天的語言說，就是政治生活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所承諾的民主本來是更激進的，它號稱要真正地揚棄市場社會和一切剝削社會的任何形式的壓迫，使國家由社會主宰者成為社會公僕，勞動人民徹底克服一切市場的和非市場的異化力量。

從這個角度去評價文化大革命，也許能够對它的是非功過作出實事求是的分析，特別是它的謬誤的一面，比如，階級鬥爭理論的含混所造成的失誤，文革初期陰謀論盛行所造成的惡果，群衆大民主實踐的失敗等等。

第三章 “十六條”與新的公民政治： 話語、衝突和集體行動

1960 年代，周恩來在回答法國文化部部長安德烈·馬爾羅有關法國大革命如何評價的問題時說，現在作出評價為時尚早。這個回答至今已成經典。不錯，像法國大革命這樣重大、複雜的歷史事件，解釋上的鬥爭一直繼續著。爭論有時會帶著很大的情緒性。比如法國十九世紀史學家、文學評論家依波利特·泰納，及其著作《當代法國的起源》（是一部未完成著作，共六卷，第二、三、四卷是 1789–1799 年的法國革命史）。泰納的法國革命史的最大特點，按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更關心革命的“病理學”，是為了診斷病源，防止革命狂熱病的重演。泰納的法國革命史洋溢著作者的激動、恐懼和憤怒情緒，而史料趨向于戲劇化的場面和人物描寫，選擇性地記載或遺漏有關背景，以及連篇累牘的軼聞羅列，因而受到其他學者的批評。在泰納筆下，各種革命活動家被描寫成病態的、瘋狂的人，而下層群衆則更是一群獸性、噬血的野蠻暴徒。泰納將革命“浩劫”的原因歸結為法國的國民性——一種全民受催眠的症狀，導致不可避免的宿命結果。因而，泰納所記述的歷史，經常把關鍵性的不同派別、不同時期模糊、混淆起來；本來法國革命過程中各種人物角色、不同時期的各次起義、暴動，都有著很不相同的背景和意義，但在泰納那裏，都是一樣的瘋狂，一樣的病態，都因為受理性啓蒙思想的魔力驅使。

而變成野獸。

和泰納的這種國民性、文化心理解釋相反的，是所謂“社會解釋”，而這主要是指以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結構分析與階級鬥爭學說來解釋法國革命。馬克思主義學者看到的不是“集體瘋狂”，而是歷史上的階級集團之間，為各自的利益而展開較量，“鬥爭的結局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具體說，就是法國資產階級從出生到壯大，挑戰並粉碎貴族、宗教等級和舊制度，最後鞏固了資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和新法律制度。然而，有人也指出社會解釋的不足之處，比如對於社會解釋的代表人物饒勒斯（著有《法國革命的社會主義史》），批評他存在著簡單化的傾向，把革命的進展過程描述得過分平滑，似乎資產階級在經濟、文化和法律領域取得一步步勝利如同按步就班，而忽視了革命各階段的曲折，及其暴力特性^[1]。更有人批評：社會解釋越來越注重初始結構和最終結局這兩個狀態，而忽視革命的中間過程，使得有關研究越來越集中到革命前的舊制度和革命結束很多年之後的社會後果，而大革命時期豐富多彩的人物、事件反而被視為無足輕重了。此外，對傳統馬克思主義解釋的強烈批判，還來自像沃勒斯坦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內部的學者^[2]。

歷史是一面鏡子。這意味著：歷史研究的對象和方法，

[1] Albert Soboul, *The San-Culottes: The Popular Movement and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1793–1794*.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xix. 批評者自己也是馬克思主義解釋的代表人物，因此這屬於馬克思學派的自我批評。

[2] Lynn 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3–10. Inmanuel Wallerste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s a World-Historical Event*. Social Research, LVI,1, Spring 1989.

也和當代社會的運動變遷緊密相關。自六十年代以來，“新社會史”、“來自下層的歷史”在西方歷史界興起，對法國革命的研究也出現了“走向下層”的運動：歷來被史料和分析所忽略的所謂“小人物”(menu peuple)，或下層人民，第一次受到重視；革命中的群衆，不再是只被當成抽象、蒼白的概念（比如“噬血的暴徒”或“資產階級的盟友”），而是呈現出有血有肉的、有著各自的身份認同和獨立的政治願望的社會群像。比如索布爾對雅各賓專政時期的無套褲漢的研究，魯德對參與集體行動的人群的研究，都細緻地記錄了社會下層的三教九流，如行會師傅、幫工、短工、婦女、小生意人等在不同場合下的行為動機、行動方式和參與程度，從而說明：下層人民雖然吸收了中間等級和革命領袖的最新政治觀念，但他們不是被動的工具，而是有各自的冤屈和訴求，更不是像泰納所描寫的那樣，是一群沒有自我意識的烏合之衆或社會渣滓。另一個被傳統馬克思主義史學所忽視、被泰納所曲解的方面，是意識活動和革命政治的關係，這也成為一個新的研究方向^[1]。

如果說，以上對法國革命史研究的回顧，使我們對中國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今天所處的零散而不平衡的狀態有所感觸，那麼，本章就是試圖從有關經驗中吸取靈感和方法，運用到對文化大革命的考察中去；更重要的，是希望破除對文革史解釋權的壟斷，在這個領域發揚言論自由，反對

[1] Soubul: 同上页1。George Rude: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这些新历史学派的学者大多仍属于马克思主义方向。有关法国革命的语言研究：Hunt: 同上页2。William Sewell: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一言堂專制。具體說，我將采取的研究策略是：一、避免主流和流行文字中所特有的烘托渲染氣氛的手法，即像美國“新歷史”提倡者羅賓遜所批評的那種追求“畫面生動的、陰森可怖的、奇聞軼事的”史學^[1]，而是力圖通過辨別分析來提出重要問題；二、注重區分不同人物、不同派別、不同時期，對主流文字出于某種目的有意模糊混淆這方面的信息所造成的混亂，加以澄清，辯明事件的來龍去脈。三、注重主觀意識、話語活動與行為之間的聯繫，這樣做時，屏弃把文化作為整體性的民族心理決定因素的傳統的文化研究方法，而採取視語言符號為鬥爭場所的新的文化研究方法^[2]；四、把關注的目光從精英、高層和國家機構那裏，移到基層群衆和廣場、街道上來，這一點是最主要的。

顯然，這不是容易的事，筆者希望能在今後的幾章中逐漸展示說明這個努力方向。本章將探討從1966年8月“十六條”公布到10月《紅旗》雜誌第十三期“批判資反路線”社論發表之間這個重要階段。這裏呈現給讀者的，一方面是忠實于原材料、忠實于原行動者的原始話語的一些記錄，另一方面，也試圖實踐布羅代爾意義上的歷史想像——以現有的材料拼貼、復原出歷史事件和歷史體驗的輪廓甚至

[1] James Harvey Robinson: "Recent Tendencies in the Stud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 (1906): 529–47, pp532.

[2] 傳統的文化研究方法的代表是：Lucien Pye and Sydney Verba,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Richard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新文化研究方法的代表是：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Basic Books, 1973. E. P. Thompson: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1963. 以及上面提到的：Sewell, 1980.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細節，如同身臨其境地去觀察歷史上人們的生活和行動，當然這要依靠想像的力量。

話語轉變：十六條與群衆大民主

法國大革命中產生的一些重要文獻，如西哀耶斯的《第三等級是什麼？》、《人權和公民權宣言》、1793年憲法等，不僅是革命的重大階段標誌，而且是綱領和意義的高度凝聚。文化大革命的進程中也產生了類似的文獻。今天，一般都把《五·一六通知》作為文革的綱領性文件，然而，諷刺的是，這篇文件，是到1967年5月，即文革運動已經開展了近一年之後才公布于衆的，在此之前，并不為參與運動的億萬群衆所廣泛知曉和引述。過分強調《五·一六通知》的意義，意味著完全從上層精英的角度出發看待和研究文革。“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重要作用和意義是不言自明的，而今天幾乎不被人們提起的另一份文件，其重大作用和意義，實際上是超乎前兩者之上，這就是“十六條”，即1966年8月8日發表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篇可以說是具有“文化大革命憲法”地位的文獻，在今天談論和研究文革的文字中幾乎不被提及，這與今天對文革的主流敘述中對群衆的貶低和漠視是緊密相關的。

這個文件是在毛澤東主持下擬定的，陳伯達、王力等人七月初就開始起草，改了二十幾稿，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討論通過後公布于衆。之所以說它是一部“文化大革命憲法”，就是因為在一九六六——一九六八年間的群衆運動中，它實際上被當作是開展運動和實行群衆大民主的

指南。中國現代史並不曾有過一個以重視法典條文為特徵的“憲法政治”時期。也許難以理解的是：恰恰是在文化大革命群衆運動期間，人們的政治話語和實踐比較貼近一種“憲法政治”，即以一個公開的條文文本為最高依據。這個最高文本，就是“十六條”。貫徹執行“十六條”、是否符合“十六條”成為人們時刻警覺、時刻挂在嘴邊的一個口頭禪，儘管違反“十六條”的行為屢見不鮮，人們的確是普遍地以條文的規定來判斷是非、來指控對手的。

從法律意義上看，這個文本本身是很粗糙、模糊的，很容易作不同解釋。它毋寧說是提出了一種法律的精神，和開展運動的路線，按照1966年8月13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十六條“貫穿著一個基本精神，就是：信任群衆，依靠群衆，放手發動群衆，尊重群衆的首創精神。就是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從這個角度說，“十六條”是體現了文化大革命所特有的群衆大民主的綱領，也是結束劉少奇和工作組版本的文革、開始毛澤東和群衆版本的文革的階段標誌。

“十六條”中最引人注意、最具創新意義也最受群衆歡迎的一條，是第七條：“警惕有人把革命群衆打成‘反革命’”。這一條的全文是：

有些學校、有些單位、有些工作組的負責人，對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衆，組織反擊，甚至提出所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等類口號。他們這樣做，必然要打擊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積極分子。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決不允許這樣做。

有些有嚴重錯誤思想的人們，甚至有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利用群衆運動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散布流言蜚語，進行煽動，故意把一些群衆打成“反革命”。要謹防扒手，及時揭穿他們耍弄的這套把戲。

在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鬥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藉口，去挑動群衆鬥爭群衆，挑動學生鬥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

這實際上是對廣大群衆賦予“豁免權利”，使他們能放心大膽、打消顧慮向領導提意見。這和《五·一六通知》形成強烈的對比：《通知》的主旨是指控“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而這些修飾詞，到了各級黨委領導人那裏，就馬上可能成為嚇人的帽子，用來整人，用來迫害群衆。而“十六條”恰恰是旨在剝奪當權者這種矛頭向下、鎮壓群衆的濫用權力的能力。

“十六條”和《五·一六通知》形成強烈反差的另一條，是第六條：“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它提出：“人民群衆中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現象。幾種不同意見的爭論，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衆會在正常的充分的辯論中，肯定正確，改正錯誤，逐步取得一致。在辯論中，必須採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對於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也不准採取任何壓服的辦法。要保護少數，因為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裏。即使少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

也允許他們申辯，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的社論《學習十六條，熟悉十六條，運用十六條》還特地補充：“即使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也要文鬥，不要武鬥。”

這樣，運動的目標、鬥爭的對象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儘管這是一種含混不清的變化：運動的側重點，從鬥爭“黑幫”、黨外的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以及矛頭向下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轉變成矛頭對準上層、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且增加了全新的內容，那就是群衆自己組織自己的民主實踐，巴黎公社改天換地的激進想像被喚起，暗示著領導與群衆關係上的一場根本性、制度性的大變革，一次全社會的政治權力再分配的大變動。

然而，“十六條”所包含的這種話語轉變，又是含混的、局限的，帶著深刻的內在矛盾。一方面，“鬥、批、改”中的鬥，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重大的權力變動，但是實現這種變動的法律根據和程序却是含混不清的，具體說，就是各級領導人中“到底誰可以懷疑”、如何判斷“誰是走資派”的問題。本來文革發動者設想的一個觸及靈魂的、改造內心世界的運動，一下子面對著一個準法律性質的技術問題。面對學生和群衆的紛紛提問，擔任文革小組顧問的陶鑄給出的一個解決辦法就是：“除了黨中央毛主席不能反對，還有我們的林彪同志”，其他“我們這些人都可以反

對。^[1]顯然這是在一種尷尬、荒謬的情形下所能給出的一個同樣尷尬、荒謬的回答。

新的群衆運動規則與現存權力秩序直接衝突的尷尬難局，其真正根源，還來自于“階級鬥爭”話語和“大民主”話語之間的矛盾緊張：至此為止，有關“階級鬥爭”的理解、闡釋和實施，都是照搬奪取政權以前所確立起來的、以經濟地位、暴力強迫為基礎的理論和實踐體系，比如：出身成份、“黨的階級政策”等等，而並沒有把毛澤東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的“階級鬥爭”，作為一種全新的、迥異的範疇，對於“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以及“政治思想上的階級”（毛澤東分別在一九五七年《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次年的武昌會議上提出這兩個概念）如何展開鬥爭，更沒有瞭解到其特殊的、不同于經典意義下的“階級鬥爭”的有關規則。然而另一方面，發揚新中國“大鳴大放”傳統的“十六條”，其意義不下于提倡一種

[1] 周恩來十月三日接見參加國慶觀禮的全國紅衛兵代表時的講話中，有更詳盡的分析說明。領導人講話材料，除註明者，皆來自《中共重要歷史文獻資料彙編》，美國洛杉磯中文出版物服務中心編，1997年，該彙編的資料主要來源于：全國文藝界革命造反聯合總部及紅衛兵革命造反聯合總部1966年11月編印的《中央首長有關文化大革命講話材料彙集（一）（二）》、北京汽車分公司文革大字報辦公室1966年12月編印的《大字報選·第一、二集》、北京工商管理專科學校印刷廠“紅印工”戰鬥隊1966年12月13日編印的《中央首長講話》、北京工農兵體育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聯合宣傳組1966年12月編印的《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1967年3、4、5月編印的《中央首長講話》（第1、2、3、4集）、國家科委系統紅衛兵聯絡部1967年1月編印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央負責同志講話彙集（第一、二集）》、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1967年2月編印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首長講話（一九六七年一、二月）》、河北北京師範學院“鬥爭生活”編輯部1966年12月編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

全新的公民文化和參與政治。文革中群衆大民主的具體鮮活的實踐，時刻提出那些和公民參與、公共政治空間有關的規則問題，比如辯論的規則，結社的規則，籌備選舉的規則，少數多數的關係，傳媒（如學校廣播站）的控制權問題，等等。

陶鑄八月二十一日凌晨在中國人民大學有關郭影秋問題的辯論上的一段講話，很典型地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大民主這種新型的公民政治的規則的思考和摸索：“絕不能因某張大字報講的郭影秋是革命左派，我們就說他是保皇黨，也不能說反對郭影秋的講他是黑幫的就是反革命，這個不對。他認為是革命左派，可以嘛，他有他的看法嘛！另一方面，也有同志講郭影秋是黑幫，也不要講人家反對郭影秋，說郭影秋是黑幫，他就是反革命，這樣人家就不能提意見了嘛！”這段話還反映出：既在話語上也在實踐上，傳統的“階級鬥爭”和群衆大民主的衝突矛盾。在這期間，“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和“武鬥只能觸及皮膚，文鬥才能觸及靈魂”都被頻繁地引用。前者是指傳統意義的階級鬥爭，後者是指特殊意義的階級鬥爭——思想鬥爭，而思想鬥爭本應採取人民內部的矛盾解決形式，即民主辯論。然而，在整個文革過程中，兩種話語、兩種實踐的區別從未被明確，其矛盾衝突也就從未得到解決，為大民主實踐的失敗埋下了伏筆^[1]。

[1] 按照當時的辦法，是由群衆的揭發、辯論來決定一個領導人“是不是走資派”，在實踐中，群衆在語言上所創造的一種解決辦法，就是將鬥爭的形式分成“火燒、炮轟、打倒”這幾個級別層次，這樣為群衆一開始懷疑當權派、給他提意見（即火燒）提供了一定合法性。

工作組影響的延續：以北京兩所中學為例

歷史上有影響的大革命事件，在不同階段、不同地區會呈現出如此強烈的反差，以至人們的體驗、回憶、所賦予的意義，會有天壤之別。典型的對比例子就是：一七八九年夏天，在法國首都發生的、作為理性和啟蒙思想史上重大事件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的發表，和與此同時法國農村地區的“大恐慌”。同樣，比較文革運動的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比較北京和外地，比較中學和大學，比較學校和其他單位，這類巨大反差也比比皆是。而“十六條”所體現的賦權給群衆的話語，和“十六條”發表時基層群衆普遍受領導壓抑的現象，就是典型的一例。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到八月初，在北京高校，工作組撤銷了，黨委當權派失控了，然而在絕大多數中小學、國家機關和文化單位，“五十天”仍在延長，工作組、黨委對群衆的鎮壓迫害還在持續。七月間，劉少奇親自指示，北京市中學要按照四清的模式搞“集訓”：“中學太多，太分散了，不抽出來（指集訓）沒法講通道理。^[1]”並指導起草了《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的初步規劃》（1966年7月14日送審稿）。因此直到七月底、八月初，當北京高校已經開始批判工作組的“五十天”，中學却還在搞劉少奇的集訓。下面以北京五十五中和北京五十二中的調查報告為例說明，而這兩個案例都要從回溯到“五十天”。

[1] 劉少奇：在討論《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的初步規劃》時的指示，1966年7月13日。

六月初開始，北京五十五中師生員工貼出了許多揭發校黨支部書記張X的大字報，但張X認為這是“那一堆人想奪領導權”、“歪風邪氣佔了上風”、“有人別有用心”等等。六月九日，一些師生支持女四中同學在該校廣播女一中同學寫給毛主席的信件(後來發表在6月18日《人民日報》上)，遭到張X的極力反對，橫加阻止，因而激起了同學們的憤怒，紛紛起來質問校領導，張X便匆匆忙忙從團中央請來了臨時工作組，宣稱這是“鬧事”、“反革命事件”、“匈牙利事件”。六月十日，正式的工作組連夜進校。進校後的幾天內，張X和工作組接連進行了三次秘密會談，張X給工作組介紹了給她貼大字報提意見的近十位教師，認為“他們要煽動群衆”、“打垮領導”，“形成集團對運動唱對臺戲”等等。張X還對該校教職工隊伍作了介紹，全校教職工119人，按照張的介紹，其中56人有所謂“出身問題”“歷史問題”“愛人問題”(愛人有問題)、“政治野心”等等。工作組在進校後短短的幾天內，在張X的配合下，就對這個學校作了如下結論：“五十五中是領導核心薄弱，教職工隊伍不純，資產階級思想嚴重，校風校紀很壞，流氓很多的流氓學校。”並且對教職工進行了如下排隊：11人是依靠對象(包括支部書記張X)，佔12%，31人是團結對象，佔25%，屬於被孤立打擊之列達77人，佔63%。有四個教研組被列為孤立打擊對象的高達82人以上。工作組推行運動的手法包括：扭轉鬥爭目標：六月十四日工作組在全體師生面前推薦經過他們精心挑選的四份“優秀大字報”，其中三份都是揭發教師的(其餘一份是揭發教學教育問題的)，而且著重宣讀的兩份正是“揭發”敢于給校領導提意見的教師焦XX的。外出四清回校的黨員幹部黃X(教導主任)

剛貼出支持革命師生的大字報，就遭到了張X等人的孤立和打擊，經過工作組的默許，對他進行了有計劃的圍攻。對廣大師生進行監視、盯梢。工作組把教師整天關在屋子裏學習，一言一行都會被記錄然後向工作組彙報，工作組還派了他們的“機智靈活的小偵察員”處處對教師乃至同學跟蹤盯梢。教師之間人人自危，互相懷疑。有一段時間搞所謂“集訓”，把教職員工百分之百地趕上“樓”，人人“洗澡”、“下樓”“放包袱”，人人檢查，互相揭發，命令教師集體住校，集中在一個地方，不許回家，製造恐怖氣氛。然而恐怖的高潮却是在工作組撤走之後。七月二十九日凌晨在工作組尚未宣布要撤離時，張X預先得知消息，於是馬上吩咐一些黨員迅速回校佔領書記室、校長室、黨支部、團委會、校文革辦公室、會議室、政治部等戰略要地。並且從工作組那裏接過並打開抄錄了整群衆的材料。接著，連續三天召開四次黨支委擴大會議，部署大規模的“揪牛鬼蛇神”。八月三日，在給工作組提意見會上，藉教師王XX給工作組提意見的時機，把幾天前支部擴大會議上確定的第一號“牛鬼蛇神”王XX和第二號“牛鬼蛇神”左X（都是對黨支部、工作組提意見最尖銳的教師）揪上了臺，進行鬥爭。八月四日，張X迫不及待地召開了全體黨員的“火線會議”，要求黨員站在運動的前面，積極行動起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後，由校文革出面召集全體師生繼續鬥王、左。初三某班一同學按照支部會的預先策劃和部署，三分鐘之內一口氣又揪出了早已確定好的十個“黑幫”，并挂了牌。一些保黨支部的積極分子還大喊：“數學組還有”“語文組還有”……自這以後，對這些被打成“黑幫”的群衆，採取大會鬥、小會批，并以抄家、武鬥、拘留、勞改、謾罵、

圍攻，歪曲出身、歷史，大飈檔案風等等手段，進行人身攻擊和政治迫害^[1]。

下一個案例是有關北京五十二中的一位語文老師鄭兆南的悲劇經歷。六月六日，鄭兆南第一個站出來給學校當權派貼了題為《質問李靜同志為首的黨支部》的大字報。“一天之內，大字報如雨後春筍，形成一個炮打司令部的局面。”到六月十六日，學校部分學生為了衝破學校領導的壓制，和當權派展開鬥爭，過程中發生了武鬥的現象，被稱為“六·一六”事件。事件發生後第二天，崇文區中學工作隊隊長、團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李淑靜到了學校，給師生做了一個報告，認為：要一分為二地看待這個事件，是革命的行動，但打人是不好的。可是沒過幾天，李淑靜突然推翻了自己的分析，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把“六·一六”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而且硬把與“六·一六”事件無關的幾位老師說成是這個事件的陰謀策劃者，并把鄭兆南說成是首惡分子，是後臺老闆。李淑靜提出了“誰反擊假左派最堅決，就依靠誰”的口號，誰反擊“假左派”最堅決呢？就是以政治教師王文儉為代表的保校黨委勢力，工作組就把他們捧成革命派，把革委會的領導權交給他們。以下直接轉引鄭兆南的丈夫唐夕陽的控訴：

到八月底，少數暴徒在個別保皇分子的唆使下，對鄭兆南同志施加了各種慘不忍聞的刑罰，讓她在脖子上挂垃圾箱、天天游街，讓她戴很重的高帽子，一面敲著盆，一面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

[1] 《“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在北京五十五中的表現》北京中學紅代會《中學戰線》1967年7月12日。

後面跟著一個暴徒，揚著鞭子，像趕牲口一樣的不停地抽打；有時候讓她跪在地上爬，有時候讓她自己打自己，還要喊著：“我自作自受”。在最熱的日子，架著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間，熏她烤她，要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裏的髒水……同志們，我沒法把這些罪行全部對你們說，特別是在抄毀我們的家以後，八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一連三天不分白天黑夜的重打，更嚴重的是當著她的面打死一個地主婆給她看，說：“你在二十六日晚上要是有一點不老實，就這樣。”肉體上的這麼還不够，又施加精神上的折磨，對她說：“你女兒唐樺已經跳河死了。”鄭兆南同志聽到這話以後，精神很緊張，而且感到自己實在活不下去了，所以當第二天暴徒和受蒙蔽的群衆抓她游街時，她就往汽車底下跑，結果沒有死成，反倒招來了一陣致命的毒打，暴徒們喊：“你不想死嗎，我們打死你！”打昏了，用涼水潑過來再打。……而革委會的負責人却站在一旁說：“對這樣的敵人就是要狠！”同志們，鄭兆南同志到底受了多少折磨，特別是在深更半夜，她到底經歷了多少種刑罰，她自己沒有說，我到現在也不十分清楚；我也不敢去打聽。

鄭兆南被關押了四十多天，直到她被折磨成奄奄一息，才被學校放回家。在她死亡前的最後幾天，她還在聽丈夫念《紅旗》、《人民日報》的社論和群衆的大字報，並給黨寫了兩封信^[1]。

[1] 唐夕陽《血淚控訴》，首都中等學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勤務部宣傳部《大喊大叫》1967年2月22日。

也許有必要明確一下上述案例的前後語境和背景：這是在造反派群衆經歷了種種歧視、圍攻、打擊和迫害，克服了重重困難（儘管他們有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之後，才整理出來并公布于衆的控訴材料。如果這種控訴和今天的傷痕文學（虛構的與非虛構的）有相似之處的話，那麼，不應忘記：它指控的對象，是劉鄧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的工作組及其整套“官辦政治運動”的路線和影響，而不是毛澤東或他的追隨者。恰恰是因為在“十六條”的推動下發生的權力向群衆的傾斜，恰恰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恰恰是因為有對工作組的批判（不管這些批判本身存在多少謬誤），才使得這些駭人聽聞的迫害案例公布于光天化日之下，一部分受侮辱、受損害的人才得以伸張自己的尊嚴和權利。換句話說，反迫害、平冤案，這些不是外在于文革群衆運動的東西，而恰恰是文革群衆運動的一個關鍵內容；在這段時期內，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正是這些被壓迫、被迫害的造反派的盟友^[1]。

北京高校：派別分裂，人身迫害與集體行動

“十六條”提出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

[1] 對于文革中的迫害與反迫害，有必要專文論述。有關同一期間北京市中學的情況，可參考相關的原始材料：《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血和泪的控訴——劉鄧反動路線在北京女三中的滔天罪行》，首都紅軍兵團宣傳部《紅軍戰報》1967年3月8日；《關於劉鄧工作組在六十七中幹部問題上推行“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調查報告》，北京中學紅代會《中學紅衛兵》1967年5月20日；曹家珍（北京西城宣武門小學）：《紅心永向毛主席》，北京市小學紅旗造反團《首都紅旗》1967年2月7日。以上材料都將陳列于網上文革文獻館：<http://geming.20m.com>

化革命代表大會作為群衆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的具體方式，并規定其代表的產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當時大專院校撤銷工作組、而原黨委領導也已失控的情形下，已經開始的一些群衆實踐加以合法化。然而其意義在於：從過去的家長制自上而下的領導向群衆直接民主的一次飛躍。而且在“十六條”當時的設想中，“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衆組織。它不但適用於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於工礦企業、街道、農村。”

在高校，這個實踐被比喻為由“工作組當保姆”到“自己革命”。陳伯達七月二十七日在北師大的講話中說：“你們現在不要搞保姆了，這麼大了，保姆又不好。”陳伯達七月二十六日在北大、第二天在北師大分別建議通過巴黎公社式的選舉來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或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為了保證投票前的充分醞釀和討論，就必然要求有一個臨時委員會或籌辦委員會的過渡期間。

根據八月二日關鋒在國務院接待室回答群衆問題時的講話，成立臨時委員會的作法最初是從北京廣播學院來的，關鋒說：七月下旬，“批評了工作組，解放了被鬥的同學，解放了上當的同學，以後他們醞釀，認為正式選舉還不到時候，成立臨時籌委會，負責成立正式委員會。”“兩派選舉怎麼辦？……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是：若有派，少數派也有相當的人，我們建議最好也有他們參加，這樣革委會才能聽到各方面的意見。”

然而，長期的家長制自上而下的領導所造成的矛盾積累、工作組“五十天”所造成的隔閡分裂，在一個短期過渡時期很難擺平，何況許多學校的籌委會、臨委會是在工

作組撤走之前、由工作組扶植和組織起來的。

據《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12—1967.10.1）》記載，“工作組走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活魂猶在，不過採取了種種新形式。”工作組從前門出去，北京新市委派出的聯絡員、觀察員、巡視員顧問就從後門進來，控制運動。新市委利用群衆“多數”還受蒙蔽的“有利時機”，限令各校三天之內選出文革，“他們違背巴黎公社原則，不顧少數派的反對，暗中操縱，預先指定，成立了御用的‘文革籌委會’，‘文革小組’等等，奪取了各學校、機關單位文化革命運動的領導權。”這些文革會主張“立即轉入鬥黑幫”，以“鬥批改”的口號來壓制少數派批判工作組。原來受壓制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並未得到解放，依然被文革會視為“痞子”。“而原來被工作組利用、欺騙的群衆也沒有受到應有的教育，有的還當上了各級文革的頭頭，在幹部問題上他們繼續執行‘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劉鄧路線。各大專院校還括起了大辦勞改隊的歪風。”“在對待工作組問題上，一個要革，一個要保，兩派鬥爭激烈發展。各派政治勢力各以自己本來的面目登臺表演。^[1]”

就以首創“臨時籌委會”形式的北京廣播學院為例，該校在八、九月間鬥爭之激烈、對少數派政治迫害之嚴重，在北京高校當中都是突出的。

以下引述自《首都紅衛兵》的一份調查報告。七月五日到二十四日，廣播學院有一百多名同學、教員被打成“反

[1] 《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12—1967.10.1》，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編，1967年，北京，p89。

革命”。七月二十四日撤銷工作組後，保守派在工作組的幕後策劃下，八月二十六日成立“革命師生員工代表大會”。“代表大會”從九月初開始，搞了大規模的、長達四十多天的所謂“橫掃”。他們說：“這次‘橫掃’有問題的一個也跑不了”。黨委組織部長聶麗蘭、人保科長楊XX用大字報或口頭公布一般幹部檔案材料，製造“逐步擴大，全面開花”的輿論。無線電系教師文革主任、“代表大會”代表張XX說：“隨著運動的發展，掃的面要逐步擴大。”院直部門科長級的幹部七人，就有五人的檔案材料被公布。“代表大會”還大量派人外出，調查一般教職工的材料。僅教務處，被調查材料的就有三十人，佔總人數的一半。據統計，全院共有三百〇五人被調查和整理了材料。全院最典型的是無線電系。該系十五個少數派教師，全部被調查了材料，有十個人上了大字報。團支部書記以上的教師幹部全部被掃。“代表大會”還對少數派監視、盯梢，製造流言蜚語，“使廣播學院又一次出現了白色恐怖”，教師幹部彼此不敢講話，多數派群衆不敢接近少數派群衆，還發生了無線電系教師陳XX被逼跳樓自殺身死的事件。

調查報告還指控：“代表大會”統治期間“大飈勞改風，大肆抄家，對幹部不分青紅皂白，進行殘酷打擊”。“代表大會”期間，把幹部分成四個勞改隊：第一隊：黑幫隊——院級幹部、總支書記、副書記。第二隊：問題嚴重隊——總支委員、基層幹部。第三隊：保皇派隊——運動初期犯了一些錯誤的幹部。第四隊：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的——生活作風上有些小問題的一般教師和幹部。後因群衆抵制和反對，才撤銷與第三隊合併。“代表大會”期間，抄家成風，統統都是保字號組織出動，全院共抄家二十八戶。甚至連

本人的親戚家也要被抄。“代表大會”、“思想兵”等多數派組織對一些被鬥的教師實行強迫下跪、挂黑牌子、剃陰陽頭，遭到了少數派組織“北京公社”的激烈反對^[1]。

下面是北京航空學院的事態發展的情形。八月十日，北航四百多名同學前去中央文革，要求前工作組組長趙如璋回校檢查。十一日晚，工作組回北航，北航紅衛兵（北航的多數派組織）挽臂保駕，貼大標語“工作組是革命的”，并撕毀少數派貼的要求工作組、趙如璋作深刻檢查的大標語。十四日，趙如璋終於上臺作了十二分鐘的檢查，然後院文革急忙開始“鬥黑幫”。“就在趙如璋的檢查大會上，北航的文革製造所謂學生毆打工人事件。組織一些教師學生，招來一批家屬、兒童，進行游行示威，‘抗議’‘反革命殺人犯’‘毆打工人’的罪行。還向八大院校工人、紅衛兵求援、呼籲。于是地院、林學院、礦業學院在個別人的策劃下，果然調集一些工人，敲鑼打鼓，去北航示威表示‘支持’。甚至遠在幾十里之外的首都鋼鐵公司工人也被請來了。北航紅衛兵又分乘汽車到國務院告狀，并企圖以航院全體工人名義發表《告全市工人書》（未得逞）。吵吵鬧鬧，鬧得滿城風雨，想一舉摧跨少數派。^[2]”

在北航和其他各個高校，總是少數派主張清算工作組，要求為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師生平反，而掌權或佔優勢的多數派，則急于鬥爭“黑幫”（即工作組期間就已被打倒的前領導人，和其他“反動權威”）；同樣，也正是

[1] 紅代會北京廣播學院北京公社《戰鬥報》編輯部幹部問題調查小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又一鐵證（北京廣播學院幹部問題調查報告）》，《首都紅衛兵》1967年4月29日。

[2] 《大事記》，p90。

這些傾向于保工作組的臨委、籌委和多數派紅衛兵，大搞“極左”的人身迫害，大飈“勞改風”和“抄家風”。以下是北航一位副系主任的回憶：

北航籌委會上臺的第一道通令就是罰中層幹部去挖游泳池，不准參加運動，每班還有“監工”，在大樹下支著腿，一條一條記下，不是這個磨洋工，就是那個“醜態百出”。有時，一些受矇騙的群衆去看笑話，小孩子也罵：“喂！你們這些黑傢伙。”

九月中旬，在工作組和赤衛隊的頭頭一手策劃下，“中層幹部管理小組”問世了，這些頭頭們訓誡“管理小組”的人員說：“對幹部就是要凶，要鬥得越凶越好。”中層幹部被管制起來後，白天勞動，晚上寫材料。勞動前後都要訓話、申斥、監督、登記；晚上集中在四系樓三層的一個大教室寫材料。每人一個小課桌，互相隔開，不能靠攏；只許低頭寫材料，不許抬頭，左顧右盼；不許交頭接耳。就是上廁所也的先請假。材料交少了，說你消極怠工，寫多了，說你推脫責任。每一次交卷總得挨幾聲罵。

中層幹部想看一看大字報，也不允許。“管理小組”宣布，不准看“革”與“保”的鬥爭的大字報。有時想看看，腳未站穩，就會有一隻手從背後伸來突然抓住你的肩膀，“戴草帽的？（因為參加勞動）是不是中層幹部？大字報不是給你們看的。”勞動完了，只好繞道回家，連大字報區也不能經過^[1]。

[1] 趙欲李：《揭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幹部的迫害》，北航《紅旗》1967年4月6日。

下面再看北京礦業學院的情況。工作組臨走時以張學文為首的校黨委和工作組匆忙拼湊了御用組織籌委會和“首都紅衛兵”，打擊造反派組織“礦院紅衛兵”，把大批中下層幹部和群衆打入“勞改隊”實行專政，組織了臨時黨委，張學文以王任重之女王秀榮為橋梁，攀搭王任重，繼續統治礦院。繼續根據一九六六年初提出的“紅綫”與“黑綫”（即以黨委書記張學文為首的“正確”一方，和以院長陳一凡為首的教學行政幹部為“錯誤”一方），把“黑綫表”中的百分之九十的人打成“黑幫”。在院籌委會的組織下，組織了一個一百三十七人的“勞改隊”，其中主要是主管教學的幹部、基層幹部和一般群衆。勞改隊裏，剝奪參加運動的權利、剝奪人身自由，強迫每天寫一次活動彙報，必須按規定的路線回家，中途不許東張西望，不准出校門，家裏來往信件要上交。勞改中進行人身污辱：每天勞動一次點名、三次示衆，勞改後低頭聽訓話。有一次，“首都紅衛兵”總部（即所謂“二司”）勒令全院所有“勞改”的幹部，拿著臉盆前往中心區，低頭聽訓話，每人登臺敲三下臉盆，自報“黑幫分子X X X”，“反黨分子X X X”並勒令挂牌，而且規定牌的尺寸，牌上要畫上蛇，并註明“反黨分子X

XX”，“牛鬼蛇神XXX”^[1]。

下面，來重點考察這期間發生在北京的三起著名事件，即清華“八·二四”事件、地質部事件和北航學生在國防科委靜坐事件。

先來看清華“八·二四”事件。1966年7月29日，北航附中紅衛兵貼出“鬼見愁”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並展開辯論。從此，文革的派別衝突又增加了某種社會階級集團之間的矛盾衝突的維度。清華“八·二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這個新發展動向的後果，也是大學派別鬥爭和中學派別鬥爭的第一次匯合。有關“對聯”和高幹子弟紅衛兵問題，將會在後面的章節中專門論述，但本章下面不免涉及這個題目。

首先來看一位目擊者的回憶：

1966年8月24日以劉濤等高幹子弟為首的當時清華唯一的紅衛兵組織——清華大學紅衛兵與北京市老牌的中學紅衛兵一起聯合進行文革史上第一次大規模

[1] 《“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我院執行情況的調查報告》，（這篇調查報告還透露：十一月初，造反派造了張學文的反，“首都紅衛兵”的頭頭為了效忠校黨委，馬上採取報復，一夜之間有組織有計劃地抄了二十二名運動中因敢于造反而被打成“反黨分子”、“叛徒”的普通政工幹部的家，有意轉移鋒芒。可見兩派的分裂、保守派的優勢一直延續到十一月。）《我院“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典型——揭露基礎課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北京礦院《東方紅》1967年4月25日。有關調查報告還顯示：工作組對七月底、八月初的政策和話語轉變，有著自己的理解：他們把對工作組“沒有放手發動群衆”的批評，理解為“左”的不夠、殘酷鬥爭的程度不夠，然而，他們不理解，恰恰是他們“太左了”的作法，導致了群衆的怨恨。調查報告說：礦院工作組撤走前檢查自己犯了“右傾”的錯誤，表現是“該鬥爭的沒及時鬥爭”“對重點人物‘右傾’”，“該打威風的沒打威風”。於是，籌委會要克服“右傾”，就大搞挂牌、游鬥等武鬥方式。

的所謂的“革命暴力行動”。那天下午，突然間用皮鞭、棍棒、口號和“語錄歌”武裝起來的大批紅衛兵，以集團軍的形式浩浩蕩蕩從校外開進清華園，以暴力衝擊清華大字報區，用皮鞭驅散看大字報的群衆，在對清華重要的大字報進行拍照之後撕光整個清華的所有的大字報……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由於廣大師生員工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宏大的暴力鬥爭陣勢，因此整個清華乃至整個北京高校區都籠罩著濃重的政治恐怖氣氛^[1]。

另據描述，當時“北京市幾個主要中學的紅衛兵齊集在清華附中，然後在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帶領下，大隊人馬殺向清華大學，把所有的狗崽子們的大字報都撕掉。這在當時也是影響非常大的事件。”“那天黑壓壓的自行車隊集中在清華附中的大操場上，一色褪色軍裝，手提寬寬的軍用銅頭皮帶，浩浩蕩蕩殺向大學。^[2]”有關場面極具戲劇性和象徵性：對立的兩邊不僅是高校多數派、少數派，而且是“血統論”盛行的中學和不那麼盛行的大學，享有特權和優越地位的高幹子弟階層和不那麼優越的普通階層。

這個事件，可聯繫到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和二日北航附中紅衛兵近千人到清華大學游行宣傳“對聯”作為預演，更直接聯繫到清華大學的“八九”派。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清華大學學生賀鵬飛、劉濤、劉菊芬（分別為賀龍、劉少奇、

[1] 周泉纓：《我心中的文革》。為了和那些烘托渲染“十年浩劫”的文章相區別，而強調本文是以分析為目的，這裏再次提醒讀者：這是支持黨委體制的保守勢力的政治恐怖。

[2] 仲維光：《“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誕生史實》，《北京之春》第41期（1996年10月）。

劉寧一的子女，前兩人還是臨籌委的負責人）等成立串聯會，并于八月十九日組成“清華大學紅衛兵”。“八九”派的觀點代表著典型的多數派觀點，即積極鬥黑幫但回避工作組問題。從各種紀錄看，清華“八九”派在“八·二四”的暴力行動中，起了領導和組織的作用，特別是賀鵬飛的角色格外活躍。

以下摘自《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資料選編》，從中可以看出事件的來龍去脉：

六六年八月清華大學的革命造反派，在《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的鼓舞下，高舉造反有理的革命旗幟，徹底清算劉鄧工作組迫害無產階級革命的滔天罪惡。他們發揚了“捨得一身剝，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革命造反精神，拿起筆作刀槍，矛頭直指劉少奇為首的黑司令部。在八月二十日以後的幾天裏，清華園內貼滿了揭露劉少奇、鄧小平、薄一波、王光美之流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破壞文化大革命罪行的大字報。

清華大學革命派的這一行動，在革命群衆中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二十二，二十三日到清華看大字報的，每天都十萬人左右。

但是，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却為之心驚膽戰，他們指揮他們的保皇軍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八·二四白色恐怖事件，對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了殘酷的鎮壓。

八月二十四日，以劉濤、賀鵬飛為首的清華大學紅衛兵，調集了十二個學校的保字號紅衛兵，撕去了矛頭指向劉鄧一夥狐群狗黨的一切革命大字報。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劉濤、賀鵬飛同清華附中紅衛兵一些人討論了“行動”計劃。叫嚷連什麼水源，電源、廣播臺……都要“武裝佔領”。中午十二點趕製了專用的紅衛兵符號，下午2:00十二個學校的保皇軍集結在清華附中操場，賀鵬飛做了一番惡意的煽動，竟然污衊揭露批判劉少奇這一革命行動是“把矛頭指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同時，他們派人“佔領”校廣播臺，控制了宣傳機構。

下午4:00，所謂十二學校紅衛兵一開進清華園，就立刻包圍了大字報區，接著四處派人聲嘶力竭地宣讀了一份所謂“最後通牒”，什麼“狗崽子放老實點”呀，什麼“你們想把黨的領導人一個一個搞臭”呀，陳詞滿書，不一而足。

他們企圖用武力驅散看大字報的群衆，揚言這些大字報不許看、不許抄、强行搶走革命群衆的抄錄本。有一個同學因抗議了他們這一暴行竟被他們拳打腳踢。

他們爲了“秋後算帳”，對大字報進行了詳盡的拍照，特別認真拍下了大字報的作者，以便對之進行迫害。拍照結束後下午六時許，撕去了揭露、批判劉少奇、鄧小平、薄一波、王光美之流的全部革命大字報。蓋之以“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狗崽子不許翻天”、“無產階級專政萬歲”之類的叫罵口號。

事後，他們還在校園游行一周，向“狗崽子”示威。晚上，他們非法抄了“第一紅岩”等戰鬥組的家，

理由即是因為他們揭露批判了劉少奇^[1]。

另據記載：清華“八·二四”事件馬上發展到其他學校。當日晚，北航紅衛兵封鎖大字報區，將矛頭指向劉鄧等人的大字報移走，製造恐怖氣氛。北師大給劉少奇貼的大字報也統統被蓋掉。“八·二四”事件後，清華少數派的處境極端艱苦，處在高壓下，運動也轉入冷冷清清的“鬥黑幫”^[2]。

“八·二四”事件具有“官方”和“騷亂”兩面性色彩，因為騷亂領袖賀鵬飛本人就擔任清華校“文革”臨時籌委會主任、校臨時主席團主任委員和機械系“文革”主任。我們可以借助中外社會史上的一些規律性的現象來理解“八·二四”事件的意義，那就是保守勢力出于對現存秩序動搖的恐懼、出于對“動亂”的反感，而進行“反客為主”的保守主義騷亂。這裏，我們會想起1960年代在法國和希臘、1970年代在意大利出現的右翼青年團體和右翼恐怖主義組織的行為類型，想起美國南方白人保守勢力的騷亂、私刑方式，儘管這裏是略去了各自迥異的歷史政治背景而言^[3]。

“八·二四”事件所揭示的另一個更尖銳的問題，就是：文革中對劉少奇的公開揭發，至少從一九六六年八月就出現了，而且完全是群衆自發的性質。今天，在各種主流文獻中，都把十二月間“張春橋指使蒯大富組織游行示威”、“煽

[1] 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資料選編，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一九六七年七月。《大事記》所載的時間和細節略有不同：“下午二點許，清華自控系紅衛兵提著皮鞭鐵棍搶佔了廣播臺。五點，十二校紅衛兵二千餘人跑步，進清華園，實行戒嚴。……然後，他們就按照得到的名單闖入宿舍捉拿‘混蛋’、‘右派’，進行抄家。”

[2] 《大事記》，p55,62。

[3] Richard Rubenstein: Alchemists of Revolution: Terrorism in the Modern World. Basic Books, 1974, p128.

動打倒劉少奇”作為文革的一個最大的“罪惡”和“陰謀”。然而，清華“八·二四”事件及其緣起，被主流史學很策略地“遺忘”了。然而，我們可以確信：在清華“八·二四”事件中，文化大革命中群衆第一次對劉少奇的質疑和批判，是被拳腳棍棒和銅頭皮帶鎮壓在一片暴力恐怖之中。

如果說，清華“八·二四”事件是保守勢力的主動出擊，兩週後的地質部事件是由造反派首先發難的一次集體行動。《大事記》記載事件的背景和大致過程是：八月二十三日，地院東方紅公社^[1]派遣了一千多名戰士步行到地質部，要求工作組組長鄒家尤回地院聽取意見、作檢查，可是地質部黨委拒不交出鄒家尤，并煽動群衆鬥群衆。東方紅戰士進行了靜坐絕食鬥爭，結果迫使鄒家尤答應第二天返校，聽取批判。這就是著名的一進地質部。九月五日，一千多名東方紅戰士再次開進地質部，要揪回鄒家尤聽取批判，但鄒家尤不肯。何長工說：“我死了，你們東方紅要負責。”并說東方紅“威脅首長安全”、“何長工休克了兩次”、東方紅“搶走了國家機密”等等。九月七日，地質部的領導們調來了“憲兵隊”——西糾，凶神惡煞地把東方紅的隊伍重重包圍，以保護“老幹部”為名，大打出手，撕衣服，揪頭髮，皮帶抽，磚頭砸，并抓去了八名東方紅戰士，進行毒打，關押二十小時之久。事件一直延續了十五天，“地院東方紅于九月十九日暫時撤離地質部”^[2]。

按照《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資料選編》的記載，

[1] 按照地院“東方紅公社”的一篇文章，“東方紅”戰鬥隊是8月8日成立的，其對立派別是地院“勢力强大”的保工作隊的“鬥批改”兵團。見：《我們是怎樣在鬥爭中平反的》，首都三司《首都紅衛兵》1966年11月30日。

[2] 《大事記》，p59。

西城糾察隊和地院東方紅的衝突不是從九月七日，而是從九月六日開始的：

九月六日早上，西糾隊員雲集地質部，封鎖了主樓，利用何長工提供的廣播室大罵造反派，把地院東方紅戰士層層包圍，連上廁所都受到限制。

西糾一到，何長工等就一見如故，老混蛋說：“沒有你們（西糾），我一天也過不下去了。”

西糾分子則大罵“東方紅”戰士：“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我們糾察隊爺爺有權保衛國家機密，有權保衛‘老首長’，‘你們這些混蛋，狗崽子為什麼無視‘紅衛兵’，無視‘老首長’’。他們拳打腳踢，大打出手，氣勢汹汹，分兵把關，連何長工，鄒家尤出入都有西糾分子“隨駕”。

西糾後臺許明（孔原老婆）怕露出馬腳，急忙于第二天電告西糾撤退，第三天西糾灰溜溜遛走^[1]。

地質部事件同樣具有象徵意義——一份調查報告做出這樣的觀察：“有些後來參加西糾的人，八月初還在對中學基層幹部進行大規模武鬥，但不過二十幾天，在地院東方紅小將開進地質部，要揪三反分子何長工時，這些人又高唱起‘保護老幹部’的調子來了。”在和地院東方紅發生衝突的西糾隊員當中，就有鄒家尤的女兒，這為“保爹保媽派”做出了具體形象的註腳^[2]。

[1] 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資料選編，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一九六七年七月。

[2] 《對西城區三十六所中學和市區教育機關“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情況調查報告》，北京新四中公社《新四中》，1967年3月17日。關鋒在地質學院同學座談會上的講話，1966年9月28日。

地質部事件後，地院校園內的鬥爭更趨激烈，特別是圍繞輿論傳播工具——學校廣播臺。《大事記》記載：“九月二十三日，地院東方紅衝破地院文革的高壓，奮起造反，查封了院文革辦公室，奪院廣播臺。偽院文革保性大發，挑動工人赤衛隊‘鬥批改’兵團，大打出手，武鬥整整持續了一天。一百七十名東方紅戰士負了傷，造成了嚴重的流血事件。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同志即派觀察員趕到地院，召開了全院師生大會，堅決支持東方紅革命小將，肯定了他們揪鄒家尤，炮轟何長工為首的地質部黨委的革命行動。制止了這場武鬥。中央文革旗幟鮮明地支持革命‘少數派’，大大鼓舞了其他院校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的革命師生。第二天，北航紅旗、北京外語學院紅旗大隊、清華井岡山都採取革命行動，奪取廣播臺。”但大事記又說：“北航紅旗經過艱苦鬥爭”直到十月四日，才“奪得了部分廣播權。^[1]”

地質部事件表現出當時群衆造反派集體行動的許多典型特點，也就是受壓迫、受迫害的階層團體面對強大的精英和官方勢力所經常採取的那些集體行動方式，其訴求通常是自衛性的（進入政府機關靜坐、要求領導人檢查其實也是自衛性的，因為：領導人不檢查，造反派就要繼續戴著“右派”“反革命”的帽子，繼續受迫害、抬不起頭來），其手段是和平的但構成對官方正常秩序的騷擾，其策略是造成公共影響，引起公眾的注意和同情。這些特點，也表

[1] 根據 1966 年 11 月 19 日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成員在政協禮堂接見北航“紅旗”、清華“井岡山”、地院“東方紅”同學時的談話記錄，江青有這樣一段談話：“何長工，對地院同學受害（聲音已變）我真想跟你們一塊去。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們聽了十分氣憤。同志們，如果我不是主席的老婆我就要和你們坐在一起。（激動的哭起來，全場激動的流下了熱淚）。”

現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弱勢群體和少數派團體的“公民不服從行動”中，如無耕地者、無家可歸者的佔領行動，種族隔離政策下受壓迫種族的反隔離行動，以及各式各樣的靜坐、請願活動。

和類似規模的群衆集體行動類似，地質部事件曠日持久地延續了兩週，它激發了巨大的激情和集體團結，成為參加者永久的回憶，把它當作史詩和里程碑，并以不斷的重演作為紀念^[1]。《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發表、造反派取得輿論優勢後，地院東方紅曾于十月八日“三進地質部”，這次氣氛似乎比較輕鬆，帶著節日色彩：“地院‘東方紅’小將帶著樂隊，開著宣傳車，以毛主席像為前導，紅旗招展，浩浩蕩蕩，三進地質部，他們在地質部大院召開了‘慶祝十六條發布兩週月，揭發批判何長工、鄒家尤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并向何長工之流提出七項嚴正革命要求。深夜，東方紅小將帶著何長工之流凱旋而歸。”

十月二十七日地院東方紅四進地質部，“擴大戰果”。十月九日，李富春對地院東方紅的代表保證：“你們可以在地質部設立聯絡站。地質部撥房子給你們。地質部辦公，你們辦公，地質部的牌子你們的牌子互不干擾。你們不要把地質部的牌子摘掉，地質部也不應把你們的牌子摘掉。^[2]”這樣，地院東方紅這個從前受壓抑的少數派群衆組織，在

[1] 地院“東方紅公社”在《我們是怎樣在鬥爭中平反的》這篇文章中寫到：“在那艱難困苦的時日裏，我們的同志團結得象一個人一樣；多少雙素不相識的、親切支援的手向我們伸來！”首都三司《首都紅衛兵》1966年11月30日。

[2] 《大事記》，p65。李富春同志召見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五同學的講話（1966年10月9日）。

特殊的歷史漩渦中，經歷了令人炫目的命運轉變，而且居然被安排進了作為權力象徵的機關辦公樓裏面，形成一種奇怪的、表面上的“雙重政權”。

和地質部事件大約同時發生的，但延續時間更長的，是北航紅旗在國防科委南門的靜坐行動。而且有關記錄是學生抗議文化和官僚行政文化衝突碰撞的生動一例。北航紅旗戰鬥隊的靜坐從8月下旬開始，要求原工作組組長、國防科委的局長趙如璋出來交涉。據北航紅旗自己的記載，靜坐開始後，在科委領導人的挑動下，院內外數千人對北航紅旗靜坐者進行大圍攻。同一材料還透露：在八月二十六至三十日期間，毛澤東就知道了這起靜坐事件，并作了指示，大意是：“不要怕，不要讓學生席地而坐，搭起棚子來，鬧上三個月。”毛澤東的這一指示是否傳達、如何透露出來，等等，都不很清楚。但另一來源的材料顯示：北航紅旗的靜坐的確移入了室內，佔據了國防科委附近的業餘航校或航空俱樂部^[1]。材料接著記載：九月五日，總理辦公室周家鼎同志傳達了總理和江青的指示。江青指出：要趙如璋向紅旗戰士單獨澄清問題，總理也同意。這個電話記錄是科委副主任鍾赤兵親自批印為常委文件的。這時，北航紅旗已經在業餘航校等了十二天十二夜了。但科委的兩個副主任都置靜坐者的要求于不顧，但却和北航的保守派——官辦的籌委會保持著聯繫。九月六日下午，鍾赤兵把北航籌委會叫去，商量對策，鍾當時大發雷霆，一拍桌子跳了起來，大叫道：“根據現在的材料，趙如璋同志不是黑幫。是個好

[1] 北航紅旗追窮寇兵團：《這是一批哪路人馬》，北航紅旗戰鬥隊《紅旗》1967年1月15日；首都新兵：《把反革命組織“西糾”拿出來示眾——西城糾察隊罪行錄》，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報》1967年3月9日。

同志。誰敢動一根毫毛，我們決不答應！”并指示籌委會負責保衛趙的安全。趙如璋坐在桌邊也得意地聽著，用手往後理著頭髮……接著，鍾赤兵宣布：“暫不接見！”并指示籌委會：不要管他們（紅旗）。叫他們去鬧，你們抓緊鬥、批、改。七、八日，周恩來及其秘書再次過問此事，仍沒有結果。終於在壓力之下，科委副主任羅舜初提出當晚八時在三座門與北航紅旗座談，研究如何“單獨澄清問題”一事。此時，北航紅旗的學生“對科委某些領導人十幾天以來的無理態度早就怒火萬丈了”。當晚九時許，羅舜初在一大批“警衛”、“副官”的簇擁之下到來了，如臨大敵，會場氣氛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學生們以為趙如璋會隨後就到，但是，時間過去了一個小時，又過去了一個小時，九點，十點，……一直到第二天，趙如璋一直沒來，激起了學生們的憤怒。趙如璋為什麼沒到三座門來？原來，在鍾、羅等人開會結束時，鍾赤兵指示八局薛炳甫打電話通知了北航籌委會。結果在晚八點，北航籌委會、紅衛兵、赤衛隊出動了二十幾人，把趙如璋從半路上“劫”走了，演出了一場鍾赤兵導演、羅舜初登臺的把戲。僵局一直持續到九月二十日。最後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向毛澤東彙報工作時，談到北航紅旗的靜坐，毛澤東當即說：“要談。”當晚，陳伯達親自到科委傳達毛澤東的指示。但科委的人仍然拒不和學生見面。在這種情況下，陳伯達給他們立下了所謂“軍令狀”，全文如下：

“字據：以普通勞動者的態度，同北航學生聚談或者同住幾天，科委的幹部（包括羅舜初、趙如璋同志），如果被學生殺死或殺傷，陳伯達情願抵償。一九六六

年九月廿二夜十二點。關鋒記、陳伯達（簽字）。^[1]”

材料接著記載：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央文革小組和群衆的壓力之下，科委被迫將趙如璋釋放了出來。當時，紅旗戰士和科委辯論得十分激烈，紅旗戰士要求趙如璋簽字，保證隨叫隨到，羅堅決不讓趙簽字，說：殺頭也不簽字。使接見從二十一日一直到二十三日，長達四十三小時。羅把紅旗戰士講的話全部錄音。帶來的錄音帶不够，又花了四百元買了十盤。科委裏邊的人聽說外邊辯論的很激烈，鍾赤兵於是決定，增派一些人去加強科委方面力量。這就是北航紅旗堅持二十八個晝夜的靜坐請願的經過。

[1] 但原材料註明：此處日期可能不對。

第四章 首都之外：官方高壓政策與大規模群衆抗爭

如果說，在北京的大多單位，“十六條”公布後，衝突的雙方集結在多數與少數、造反與保守兩大派旗幟下，並且結合了某種社會階層集團之間對抗的維度（血統論之爭），而原黨委（特別是高校）和新市委的角色退居幕後，那麼，在北京以外的地方，黨委、市委“代表黨”的觀念還根深蒂固，原有等級秩序的勢力和影響還陣容强大，盤根錯節，而衝突對抗更直接地發生在本地和串連的少數派學生與當地黨委（甚至是省市委最高領導人）之間。

《“文化大革命”簡史》對這一階段的記載是：“發展為全國範圍的‘炮打’當地各級黨政領導機關，以圍困、進駐、揪鬥等方式，使很多地方和單位的黨政領導機關普遍受到嚴重衝擊，難以正常工作。”對中外學生運動史和官方鎮壓學生運動的歷史稍有瞭解的人，都會知道，在這類對峙衝突中，受到嚴重打擊的，幾乎毫不例外的是手無寸鐵的學生，而恰恰是為了鎮壓學生，官方機關不僅要正常工作，而且必須超常工作，以調動各種暴力和非暴力的資源。而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間，全國各地學生與當局的衝突，正是重複了這個學生運動的慣例。

在北京的中央，于8月21日、22日和9月11日分別發出三份政策性文件：《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中央軍委指示）、《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

動》(中央批轉公安部)、毛澤東“九·七”指示和中央四項決定，以及8月23日《人民日報》社論《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與其說是有效地令行禁止，毋寧說是直接透露了全國各地黨委普遍地動用軍隊、出動警察鎮壓學生、鼓動工人農民圍攻學生的嚴重情形。

學生運動與黨委政策

首先看一例校園內的事態發展，在這裏官方運動的政治迫害和北京一些高校類似，甚至更為嚴重。在四川省，“十六條”所體現的話語和政策轉變，在這裏還根本沒起到作用。1966年8月上旬，各大專院校的官辦文革或文革籌委會，在原省文革大學組的統一部署下，在學校全面開展了“批三鬥四”(批三類、鬥四類)運動。他們計劃一校一系抓一、二個人進行重點批鬥，作為試點。取得經驗後，再以教研組、班為單位廣泛開展批鬥活動。爭取一個半月批鬥完，以後就是改，國慶(一九六六年)拿出成果，向國慶獻禮。“他們妄圖就這樣把四川的文化大革命草草收場”。 “他們批鬥的對象，絕大部分是運動初期被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打出來的‘三、四類’革命群衆(革命的教師和職工)，其中很少幾個是當權派，而黨內走資派當時幾乎沒有揭發出來的。”拿成都工學院為例：當時被打出來的明的“三、四類”教師就有二百一十六人(不包括當權派和戴帽的地、富、反、壞、右及有重大政治歷史問題的人在內)，其中還有個別學生，佔全院教師總人數的26.2%，而暗的“三、四類”的教師比明的“三、四類”還要多一倍以上，有的教研組甚至多兩倍以上。明的和暗的“三、四類”

教師加起來約四百多人，佔全院教師總人數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他大專院校的情況也大致如此。

8月24日晚上，西南局黨委書記李井泉和當時四川省文革小組長周頤來到成都工學院作了一系列指示。8月25日，各系文革分別向師生員工傳達李井泉指示。“于是，工學院少數掌權的打手們，在其黑主子的一聲號令下，紛紛起來聲稱要對‘牛鬼蛇神’採取‘革命的暴力行動’。一剎時滿院到處可以看到一群一群的‘牛鬼蛇神’，頭戴高帽子，身挂黑牌子，四處游街示衆。到八月底為止全院約有二百多革命群衆被戴高帽子游街。當時，全院每個角落一片鬥爭‘牛鬼蛇神’的吼聲。從此，各系各教研組都私設拘留所，對明的‘三、四類’革命群衆完全實行資產階級專政，被剝奪一切政治權利，被抄家，被關進私設的拘留所，天天被提審鬥爭，受盡了種種迫害。”六六年九月，院、系各級文革又成立了兼管組，私設了勞改隊，對明的“三、四類”群衆，經院人事保衛部門審批，黨委決定，實行就地監督勞改。規定勞改人員必須制定出本人的“勞改計劃”和“守法公約”，天天逼迫寫“勞改日記”。每天挂著黑牌勞動時，還常常逼迫這些革命群衆唱“牛鬼蛇神嚎歌”，如有反抗就被罰站、罰打、罰做苦工。有的同時還被剃了陰陽頭、畫花臉，受盡了肉體上的種種侮辱。這一迫害暴行，于8月25日以後，幾乎是各大專院校同時進行的^[1]。

如果說，校園內部還表現為過去官方政治運動的運動群衆、矛頭向下的恐怖模式，并被推向極端的話，那麼，

[1]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徹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夥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成都打李總站教育系統聯絡站《教育革命》1968年第6期。

校園外和社會上的事態發展，呈現為新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學生鬧事”，即在繁華鬧市、政府機關附近，數量衆多的人群集結，群衆性街頭抗爭的矛頭針對省市級政府，同時亦出現了針對學生、擁護政府的反示威人群。

下面，就來看一下有關材料對各地事件的簡要描述：

《大事記》記載：八月底，“武漢張體學聲言‘只接見左派，不接見右派，’把兩千多名要求接見的北京和武漢學生打成‘右派’，拒不接見。從而，發生了‘九·二——九·四’事件，革命學生舉行靜坐絕食。在王任重的操縱下，湖北省委掀起了大抓‘南下一小撮’的高潮，張體學帶頭‘代表’湖北三千二百萬人民控訴北京南下串連的紅衛兵。”

8月28日，“李井泉和重慶黑市委任白戈之流一手製造所謂的‘八·二八’江北慘案，對革命造反派進行政治陷害，他們調集工人赤衛軍和郊區農民，把首都赴渝紅衛兵和重慶革命派打成‘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前哨部隊’，進行殘酷圍攻。”

“雲貴高原上，六月份一片白色恐怖，八月下旬，首都南下串連隊殺進貴陽。省市委內一小撮走資派，先是拉攏，讓紅衛兵住豪華的交際處，貴陽飯店。首都南下串連隊沒有上敵人的當，衝破他們的包圍圈，和貴陽革命學生，紅衛兵一起戰鬥、生活。走資派惱羞成怒，凶相畢露，大喊‘謹防政治扒手’，調集數萬不明真相的群衆，殘酷圍攻首都紅衛兵，製造了‘九·五’‘九·六’‘九·七’事件，首都紅衛兵‘不怕犧牲，排除萬難’連續三天上街大游行，大長革命造反精神。接著，又幫助貴陽地區革命派成立了‘貴陽市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司令部’。”

福州“八·二九”事件：8月29日中午，廈門大學、

華僑大學、林學院、同安一中等校的師生，爲了聲援廈門八中師生，到省委要求葉飛接見，但葉飛認爲“有壞人搗亂”，以在開常委會爲推托遲遲不出去接見，引起了師生的憤慨，一直到下午六點才被迫出來接見。但對師生採取對抗的態度，從而引起了抓人、打人的事件^[1]。

合肥“八·二七”、“九·一”事件：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合肥大學第一張《炮轟安徽省委司令部——造李葆華的反》的大字報在百貨大樓門前貼出。安徽省委組織部長、省直機關文革小組組長楊明當即親自打電話給省委黨校校長趙XX，要他組織政治上“可靠的”人帶自衛武器上街與“右派”學生辯論。晚七時正，趙XX親自帶領四十多人，攜帶鐵棍、木棒二十多根，合乘一輛客車、一輛卡車趕到四牌樓，圍攻造反派學生。八月二十七日上午，李葆華“被造反派學生揪至長江路”，楊明立即下令要省直機關負責人帶領幹部去“營救”李葆華。頓時幾乎傾城出動，人們像潮水一樣涌向長江路，“堅決擁護以李葆華同志爲首的安徽省委的正確領導”、“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口號和辱罵聲、撕扯聲此起彼伏，驚天動地。九月一日晚，李葆華調動工人與學生在省委大樓前“辯論”，是爲“九·一”事件。^[2]

文革後的一份官方材料記載：8月31日，以浙江醫科大學紅衛兵爲主的近萬名師生，集合在省委大樓前，“炮轟”省委，要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出來接見，歷時一晝夜，江華

[1] 《葉飛向全省人民作檢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福建師院分部《曙光報》1967年1月9日。

[2] 《揪出楊明，徹底揭開安徽省委階級鬥爭的蓋子》，安徽合肥工人第一革命造反司令部《紅旗報》，1967年5月2日。

沒有出來接見，即以靜坐抗議。

同一材料還記載了9月7日“金華事件”：當天，杭州化工學校赴金華串連隊貼出了“六問金華地委”的大字報，九月七日金華師範學校學生寫了“炮轟司令部——金華地委”的大字報，並要貼到金華地專機關內，與地專機關的幹部、群衆發生爭執，展開辯論，“有的學生被挂牌，戴高帽游鬥。有兩千多人參與圍觀。一直延續到16日。^[1]”

其他一些材料也顯示了同一省份內不同地區之間、不同事件在時間前後上的影響和聯繫。廣西自治區較早的一次事件是桂林“八·七事件”：八月五日，廣西師範學院的造反派（即後來的桂林“老多”）在工作隊撤離時，寫出了《送瘟神》的大字報。八月七日，當局調動成千上萬不明真相的工人、農民和群衆，對廣西師院造反派進行圍攻、毆打。

緊接著發生了桂林“八·一九事件”：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廣西軍區第一政委韋國清先後調動人民解放軍駐桂一四一師五個連進駐桂林市內，還準備派出一營部隊進入師院搶出工作隊，並且揚言必要時可以開槍鎮壓。在八月末的一次廳局長會議上，韋國清說：“桂林‘多數派’是右派操縱的，他們有八百多人，加上南下串連隊和一些工人，有兩千多人，雖然不會都是右派，但是他們在右派控制之下是肯定的。”

隨後，又發生了南寧“九·九事件”：南寧的造反派和南下串連隊，為聲援桂林造反派，抗議區黨委，在廣西區黨委院內進行靜坐絕食。區黨委調動“盾牌兵”、“赤衛隊”

[1] 《浙江“文革”紀事（1966.5—1976.10）》，p12，程超、魏皓奔主編，《浙江方志》編輯部，1989年。雖然描述比較含蓄，但明顯這是一例挑動群衆鬥群衆、鎮壓迫害敢提意見的學生的惡性案例。

等保守派群衆組織來圍攻，造成一次轟動全區的事件^[1]。

各地發生的事件不僅在時間上高度重合，而且在內容、形式上也驚人地不約而同。現有記錄但詳盡程度不一的其他事件有：上海“九·二——九·四”事件，青島“八·二五”、“九·一”鎮壓學生事件（《人民日報》1967年3月28日李元榮文章有所提及，但無詳細說明），西安“八·四”到“八·二五”流血事件，以及瀋陽、昆明等地的類似事件。

1966年8月21日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陶鑄與到北京告狀的外地同學的談話記錄，透露了有關西安交大“八·一六”抗議省委遭到鎮壓事件的一些細節，有助於我們瞭解有關當事人的主觀感受，故部分抄錄：

陶鑄：同志們來到這，天津問題複雜，看來問題大的還有西安、蘭州和四川等地。今天我光聽一個西北的，一個西南的，怎麼樣？（同學們：“好”！）

西安交大：16日下午2:00左右，我校革命師生和其他兄弟院校革命師生一起，在省委門口靜坐示威，是他們逼出來的，我認為是革命的行動。不知中央首長怎麼看。

陶鑄：這當然不能說是反革命行為。（鼓掌）省委問題沒有檢查好，你們去省委是對的。他們打傷多少同學？

西安交大：不大清楚，聽說打傷了三百多人（有人插話：恐怕還不止。）

陶鑄：今天西北局來電話承認打傷了三人。我們

[1] 《韋國清在兩條路線鬥爭中忠實執行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桂林市大中學校紅衛兵總部《紅衛兵報》1967年5月10日。

正在調查，聽說你們還抓住了三十個幹部。

西安交大：我們靜坐是十分有秩序的，我們讓他們從隊伍中間通過，要讓受害者和目睹者認出凶手。凶手中間有些是省委、西北局機關幹部。如西北局基建委員會副主任馬廣任就是其中之一。他們罵我們是以交大為首的一小撮右派鬧事，說我們的校徽是反革命標誌。我認為，這一系列嚴重打人事件是省委一手策劃的，有計劃、有組織的政治迫害。

西北大學：楊值霖（西北局文革小組長），在西北大學污衊我們的靜坐和日本人民對佐藤政府一樣。

陶鑄：你們來遇到什麼困難沒有？

西安交大：他們在西安站安上兩個大喇叭，罵我們是以交大為首的狗崽子。（插話：還有盯梢，跟蹤。）

陶鑄：過了潼關就聽不見了吧！（衆笑）你們有住的地方嗎？

西安交大：還沒有，我們剛來還沒有落腳呢！

陶鑄：請人大同學安排一下好嗎？

人大同學：完全可以！

陶鑄：地方上不歡迎你們，中央歡迎！（鼓掌）
李世英同志來了沒有？

西安交大：沒有。

陶鑄：李世英是個好同志，不是革命的寫不出那樣的文章來，他的信我看過了。

西安交大：我們根本不相信省委了，我看省委應該改組。

陶鑄：這由你們決定。（長時間熱烈鼓掌）

西安交大：同學們對打人，造成了重傷、流血十

分憤怒，到了省委門口靜坐表示抗議，有五十多個單位，五、六萬人支持我們，和我們一起靜坐。

陶鑄：省委樓那麼大，坐坐算什麼。

西安交大：有人貼大字報，并高呼：誓死保衛西北局，誓死保衛省委！

.....

西安交大：十五日我們收到偽造黨中央電報：“誓死保衛西北局，誓死保衛省委！”這兩句口號是錯誤的。大家聽到後十分高興。我們剛游行宣傳，就覺得是假的。我覺得這是個大陰謀。他們組織人來打我們，這是有計劃的行動，絕不是一般的行為。

.....

陶鑄：.....運動搞得好不好，就靠十六條，就靠你們。十六條公布後，你們有什麼變化嗎？

西安冶院：變得更壞了，這就是鐵證！（拿出撕得粉碎的衣服）

這次談話，還有以下內容：

蘭州鐵院：我們那兒也沒變好。《十六條》公布以後，還發生了流血事件。八月十六日還組織圍攻我們打傷六十多人。現在我校還是被困，學生一出來就要挨打。

.....

（這時，北京紅衛兵帶著蘭州鐵一中的五位同學進入會場，陶鑄同志和他們一一握手，他們哭著控訴了甘肅省委鎮壓革命群衆的滔天罪行。）

蘭鐵一中：省委馬繼孔指使蘭大同學圍攻我們，我從三、四點鐘一直跪到晚上 11 點多，還讓我們朝西

跪著。他們打了我們六百多人，光下跪就二百多人，當時就有 30 多人受了傷，我們跪在那裏心裏難過，我們要見毛主席啊！（許多同志都哭了，陶鑄也掉了眼淚）我們本想讓省委檢查，可是省委馬繼孔說什麼蘭大同學打我們是革命的行動。打得好，打得對，打得準，今後還要打，他們把毛主席像撕破，逼迫我們拿手榴彈刀子對著毛主席像讓他們拍照。……

下面，我們看一下有關材料對一些事件的較詳細的記載。

成都“八·三一”事件：

8月31日，北京和成都的師生在西南局和省市委靜坐集會要求領導出來接見他們。“李井泉對這個要求採取‘放、頂、拖’的方針（放，就是讓‘牛鬼蛇神’放出來；頂，就是碰到問題要頂住；拖，就是解決不了的問題便拖時間），同時要機關幹部‘堅守崗位，沉著應戰，不要打人，經受嚴格的政治考驗’。在李井泉的這些黑指示下，西南局和省市委立刻出現了一種戰時的氣象：轉移檔案，燒毀罪證，囤積食品，組織機關紅衛兵，組織大批幹部守門、守樓梯口，成立廣播站，進行欺騙宣傳，轉移重點人頭，監視‘不可靠’的幹部等等。”黃新庭（西南局幹部）還加派了一個加強班攜帶報話機進駐西南局辦公大樓設立觀察哨。西南局、省市委領導人藉口“氣氛不好”，拒絕接見學生，並說：“現在問題看得很清楚了，不到一定溫度牛鬼蛇神不會出來。”西南局的負責人認為“形勢緊張”，在機關辦公“不安全”，于是在西南局辦公會議上提出並通過籌建“二線”，並把“二線”設在公安廳 X 處；另外還在

省高級法院設了一個備用地點，準備必要時轉移出去。“‘二線’專門收集學生運動的情報，後來以此為基礎成立了專門刺探學生運動情報的西南局機關九人密探小組。

九月初，一名省委負責人在省委召集各大專院校“大聯絡員”會議上說：“學生過去幾次由於未抓到省委什麼大問題，總想藉口在成都地區製造匈牙利事件，把罪責強加在我們頭上。要組織學生戳穿這一陰謀。”按照李井泉的指示，“現在革命幹部沒有發言權，工農兵說話就是圍攻學生。革命幹部和工農兵只有通過他們的子女來說話，因此要組織工農送子參加紅衛兵，還要登報宣傳”，即宣傳“送子參軍”（即參加官辦的紅五類紅衛兵），並說：“這與革命戰爭時農民送子參軍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另一位領導人說得更明白：“因為文化大革命不能動用專政工具，所以紅衛兵（指紅五類紅衛兵——筆者註）特別是糾察隊行使某些職能……。”

“此後，接連幾天，不僅在人民南路，英雄口、西南局、省市機關、各大中學校展開了對革命學生的圍攻，而且在重慶、南充、自貢、富順、新津、彭山等地也掀起了鎮壓學生的高潮。造反派師生慘遭迫害，備受折磨，有的遭到殘酷鬥爭，有的被逐出家庭，甚至不少人被殺害，出現了全省範圍駭人聽聞的白色恐怖。”

1966年國慶前夕，省委領導人給省、市各機關作指示：“今年國慶不同于往年，外地來了一小撮，城裏也有很多壞人，紅衛兵（指造反派——筆者註）要闖進機關鬧事”。省文革小組的負責人在國慶節前幾天就

對學生的情況作了反覆研究，把成電、成大、成地等學校學生安排到某些工廠和所謂力量較強的單位十一游行隊列中間，發生情況時以便採取對策。在國慶前的晚上大學組負責人李文平還親自給一些巡視員布置，到觀禮臺對一些觀禮代表進行監視，并指示：“有代表遞條子要求發言，要勸阻，條子不要上交。”國慶這天，會場布置格外森嚴，李文平等人事親自到觀禮臺指揮，來回巡視。在游行時，音樂學院的學生抬了“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的大幅標語，并喊了這個口號，事後，省委大學組的人說：“龜兒子，大傢伙整倒了，小傢伙沒有整住。^[1]”

“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與“九月反撲”

發生在領導和群衆之間的矛盾衝突，不僅是集體行動中人數和戰術上的較量，更是對概念和現實的解釋上的鬥爭，是話語權的爭奪。這期間最著名的一次語言上的鬥爭，緣起于9月15日林彪在接見全國各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即第三次接見紅衛兵）上的講話中的一句話：“很明顯，一小撮反動資產階級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和我們不同，他們企圖炮打我們無產階級革命的司令部，我們能容許他們這樣幹嗎？”這篇講話，是經毛澤東審閱過的，但文革發動者出于何種理解、何種目的把它寫進講話，以及是否預料到它的重大後果，都不十分清楚。

[1]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徹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夥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成都打李總站教育系統聯絡站《教育革命》1968年第6期。

然而，這句話在當時所產生的巨大反響，却是再清楚不過了，這就是使各地黨委和保黨委的勢力喊出了“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的口號來鎮壓造反派，形成了一次所謂當權派的“九月反撲”^[1]。

林彪講話所帶來的衝擊影響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原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此時已調任中宣部副部長）根據他所理解的林彪講話精神，在九月二十四日所作的著名的“抓黑鬼”動員報告。“這個報告動員各級黨組織反擊趁文化革命之機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反革命，壞分子。因十六條明文保護學生，所以抓黑鬼運動主要是在工人，幹部及非學生的市民中進行。很多在文革中有所參與的五類分子都受到打擊，有的被單位關押，有的被關進看守所。前一段支持造反派學生的活躍工人都被打成黑鬼，被單位關押、批鬥。”在“九·二四”前後，湖南省委第二書記、代理第一書記王延春大抓“黑鬼”時，曾說過：“原來說，對文化大革命運動不理解，現在理解了，就是要抓呀！文化大革命，原來是這樣搞的。^[2]”

再以四川省為例說明黨委當權派對林彪講話的欣喜和興奮：西南局、四川省委于9月16日、23日在東方紅賓館開了兩次聯絡員會議，省文革小組的張力行說：“從現在的形勢看來要嗎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被打垮，實行資產階級專

[1]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新華工紅色造反派《紅色造反報》1966年11月25日的文章《王任重的反動理論——“秋後算賬”必須徹底批判》提到：“九月份在全國不少地方發起向革命少數派的反撲”。

[2] 楊小凱：《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迫害和市民的反政治迫害運動》，《中國之春》一九九三年五月號。中學“紅代籌”十二中隊八一九戰鬥隊：《絕不許王延春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翻案》，《新長沙報》1968年6月1日。

政，要嗎就是無產階級打垮資產階級，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另一位領導人分析說：“有些壞傢伙把西南局、省市委工作中的缺點提高，擴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炮打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林彪同志講話發表後，左派更堅定了，中間的分化了。”“文化革命最後決戰是學校，即是最後‘紅五類’專‘黑五類’的政。現在工農不能參加辯論，解放軍不能干預，老幹部說話不解決問題。因此，只有‘紅五類’來向‘黑五類’進行鬥爭。鬥勝了，就鍛煉出來了。工人、農民和幹部要動員弟子參加紅衛兵，紅衛兵沒有力量，就不能把‘黑五類’壓下去。^[1]”

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組不得不在接見群衆的各種場合下，澄清林彪講話，以扳回影響，比如，張春橋、關鋒十月七日在中南海接見福建師生時說：“有的人抓住這句話（即林彪的話）說：‘我是無產階級司令部，不能打我。’林彪同志講的話並不是指革命同志批評省委市委。”

另一份材料揭示江西省委領導人當時的舉措和心態：“九月初廣大革命師生揭省市委的階級鬥爭蓋子，向省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的革命行動剛剛開始，省委的某些領導人就嚇得要死，慌忙開會採取應付措施：（一）從省委幹部中挑選50名身高體壯力氣大的人在大樓門口值班，防止學生衝大樓，防止學生傷害領導，為省委領導人保鏢。（二）派出一批幹部每隔半小時騎自行車上街巡視一遍；把學生的動靜報告給省委，以便及早應付。一次工學院附屬工廠的報喜隊，前往省委報喜，被這些幹部誤認為

[1]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徹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夥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成都打李總站教育系統聯絡站《教育革命》1968年第6期。

是工學院的學生來省委‘鬧事’，于是調出大批幹部守衛大樓，真是如臨大敵，戒備森嚴，結果守衛大樓的幹部人數遠遠超過了報喜隊。（三）為了應付學生，層層設防：第一線是一些幹事，第二線是科、處長，第三線是廳局長，還有第四線，第五線。”

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方志純 1966 年 9 月 15 日在省委常委會議上發言說：“街上發生的自發辯論出問題，不如組織紅衛兵維持秩序。組織形式叫糾察隊還是什麼？……九月六日晚，省委院內情況亂，如組織工人赤衛隊前來維持秩序，這要講清楚，在十天內，把這工作抓好！”

這份材料還收錄了“江西省委給中央并主席的報告”，這個報告寫到：

現在廣大工農兵革命幹部中已有較強烈的反映，他們說：“難道中央和毛主席光要知識分子了？”目前所造成的一些現象，促成了他們的這種看法。……目前的作法，都是把廣大工農兵丟在一邊，只相信學生，所有學生都是革命的，各級黨委書記都成了革命對象，並且還得支持他們，稍一怠慢就是反革命或保皇派，就要一律打倒。這樣一來，工農兵為主體這句話就成了空話……上述的一些作法，翻遍主席的所有著作也找不到，我們深感到，假如這樣繼續下去，不僅會影響運動正常進展，也大大影響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現在廣大工農兵和革命幹部看到一些學生不講道理，敵視、圍攻我們的情景，流下了眼泪，懷疑黨是

否有這樣的政策^[1]。

如果說，共產黨原有的“基本群衆”，即廣大工農及工農家庭出身的人們，的確對“十六條”發表後領導與群衆關係的巨大變化產生疑惑，那麼，也可以說，是當時社會體制的內在矛盾本身，造成了不同的階層成員對有關事件的互相矛盾、互相對立的看法和體驗。

我們最後不妨來看兩個來自個人角度的敘述。第一個是有關長沙“八·一九”事件前後的一些情況，回憶者本人當時是長沙市一中學生，于七月初被湖南省委派的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學生，罪名是參加了學生中的非法組織活動。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後，長沙的高幹子弟以省委書記的子女為頭也組織起“紅色政權保衛軍”，誓死保衛省委、市委和紅色江山。市委書記孔安民模仿毛澤東，身著軍裝接見這些紅衛兵。我當時根本不敢想像，紅衛兵的出現意味著我們前一段的“非法組織活動”其實並不非法。記得八月五日，工作組把正在參加雙搶的學生叫回長沙，在軍區大操坪聽劉少奇，周恩來，和李雪峰的錄音報告。全場四周貼著標語“同學們萬歲！人民萬歲！”聽了錄音報告，才知道派工作組，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犯下的“錯誤”。好久以後我們才知道，這些錄音報告是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

工作組的人神色緊張和故作鎮靜，工作組員特別走到我們這些反革命學生面前觀言察色，并警告不要

[1] 《一批反革命的“自白書”——江西省委破壞文化大革命罪行材料選編》，中央戲劇學院紅色造反團《紅色造反報》1967年2月9日。

妄想翻案。因此我雖然知道“十六條”中特別規定，不能以任何理由把學生打成反革命和右派，要允許學生自組政治組織，并要保護少數，但在省委工作組的迫害威脅下，我不敢妄想翻案。……

因此我看到長沙的保守派紅衛兵成立時，心中感到恐懼，心情大概與當年猶太人看見褐衫黨成立時一樣。我旁觀了長沙一中紅色政權保衛軍的成立大會，雖然這是長沙第一個非正式共產黨的政治組織，但他們宣誓時殺氣騰騰，誓死保衛省、市委和共產黨紅色江山，而且聲言要打擊狗崽子和形形色色的右派，黑鬼。八月十九日，湖南大學的學生也自組了政治組織去市委示威游行。市委馬上把工廠的黨團員組成赤衛隊，並動員紅色政權保衛軍去市委保衛共產黨。那天湖大的學生被幾千人圍攻，毆打，這就是有名的“八·一九”事件。據說當時全國各地都發生了類似事件，市民分為兩派，一派由黨團員骨幹組成，以反右積極分子的姿態保衛省市委，另一派支持被保守派圍攻的學生。

.....

當時造反派的大字報提出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市委，和工作組）和罷省委書記、市委書記官的口號。傍晚時分，一隊不整齊的產業工人的隊伍游行到市委，他們看去剛下班，穿著工作服，舉著打倒三相信的標語。路旁的市民歡呼雀躍，我不禁熱淚盈眶。^[1]”

第二個回憶，摘自韓丁著《百日戰爭：清華大學的文

[1] 楊小凱：《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迫害和市民的反政治迫害運動》，《中國之春》一九九三年五月號。中學“紅代籌”十二中隊八一九戰鬥隊：《絕不許王延春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翻案》，《新長沙報》1968年6月1日。

化大革命》所轉述的一位清華學生八、九月份在新疆串連的經歷。

我們分頭去烏魯木齊市的各個中學。我們發現壓制群衆很嚴重。第一中學有學生寫了批評省委的大字報，被打成反革命。這些學生的家長被警告，要他們斷絕家庭關係，不然就停發工資。

我們所到之處，都被人群包圍，他們喊：“王恩茂萬歲！”王恩茂是自治區主席和黨委書記。我們是在一個獨立王國的心臟地帶。顯然新疆黨委沒有執行十一中全會的決定，這個決定要求撤銷工作組，但新疆黨委對所有學校都派了聯絡員，實際上起工作組的作用。我們決定要找到王恩茂。我們二十個人擠進黨委接待室，要求見王恩茂。

“你們是什麼人？”接待員問到。

“我們是北京的紅衛兵！”

這個人進去了一下，然後把我們領到另一間接待室，一些人出來和我們握手，其中之一就是王恩茂。

“我們的工作是按照中央的指示進行的。”他說，“工作組已經撤了，當然還有許多問題。歡迎你們批評建議。”

我們于是就把我們知道的說了。我們批評他們：說一套做一套。我們的談話都由坐在後面的四位秘書作了記錄，還錄了音。

一開始王恩茂面帶微笑，但後來臉色變了。我們要求他派人到下面去解決壓制群衆問題。我們說：“如果你不這樣，就會走向反面，從革命轉變為反革命！”

我們一回到住處，就來了許多人和我們辯論。他

們管我們叫“北京來的右派”，說我們在北京臭得混不下去了，才跑到新疆來搗亂。

爲了回答他們，我們寫了兩張大字報：《炮轟王恩茂》和《支持中學生的造反》。結果很多普通人來找我們。我們越研究發現問題越大。不僅造反派受到圍攻，圍攻也降臨到我們頭上來了。我們剛一貼出大字報，就被人圍住要求辯論，我們走到哪裏，一輛帶大喇叭的廣播車就追到那裏，不停地攻擊我們，甚至一直追到大學食堂。9月3日，我們又去王恩茂的辦公室去抗議對我們的圍攻，並向他宣傳周總理的講話，但他拒不接見。

但許多受壓的人支持我們。我們中午去王恩茂的辦公室，一直等到下午。我們宣布，開始絕食，直到王恩茂出來和我們辯論。我們在自治區黨委大院裏靜坐，和我們一起靜坐的有兩三百新疆學生。我們一邊靜坐，一邊開會揭露王恩茂的反動路線。

爲了打斷我們的討論，黨委的大喇叭高聲廣播：“你們的行動是反革命的。你們和蘇聯在印度的代表一樣壞。”當局發動了和我們一起靜坐的新疆同學的家長和兄弟姐妹通過大喇叭喊話。

“我是你媽媽。你千萬不要讓北京來的反革命把你給騙了。如果你繼續錯誤行動，我就要和你決裂。”家長們都這樣說。

但我們堅決反擊。許多普通人見到這種壓制情況，紛紛加入我們的行列。儘管餓著肚子，我們仍決定派人到街上去宣講揭露真相。我們講了我們的絕食、王恩茂的反動作法和文化大革命的高漲，越來越多的人

參加到我們當中。我們也越來越有勇氣了。但我們整天沒吃東西，非常餓。那天晚上，寒流來了。我們從北京來，只穿了單薄的衣服。現在我們在露天中凍得發抖。新疆同學於是給我們送來一整推車的毛衣和厚衣服。所以我們堅持靜坐，事態越搞越大。

最後，王恩茂擔心無法收拾，在第三天凌晨四點終於出來了。他在我們前面的臺子上坐下來，周圍全是保鏢。這是一場鬧劇！

“你們最好結束示威。”他說，“你們的態度是錯誤的。你們要見我，現在，我在這裏了，你們好好看吧。”說完，他就回去了。

我們決定：不應該繼續絕食了。我們已經取得了勝利。起碼王恩茂出來了。于是，我們解散，找東西吃，并在街上繼續鬥爭^[1]。

上述“九·三”絕食事件一定給新疆群衆造成了極深刻的印象，因為在此之後，絕食成為新疆群衆所熟悉并一再運用的一種鬥爭方式，比如後來十一月三幹會議期間烏魯木齊上千人的絕食事件，和震動全疆的“一二·一九”絕食事件。

派別、事件、自然史與文化大革命研究

今天的主流文筆下，一個最方便的修辭，就是把“文革造反派”和“希特勒青年”、法西斯運動中的“黨衛軍”

[1] William Hinton,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p83–85. 翻譯是筆者的。

聯繫起來^[1]。在這裏，除了“紅衛兵”、“造反派”等詞後來也成為身份爭奪的對象而造成指涉上的混亂之外，僅僅從尊重社會科學的概念範疇、從而使社會史的比較研究成為可能的話，這種捏造的形象聯繫也是對史實和常識施加污辱和暴力。就本文所考察的時間階段和有關案例而言，造反派的集體行動方式，和現代史上受法西斯或右翼勢力迫害而奮起反抗的弱勢群體的抗議行動和民權運動，倒是有些相似之處。不用回溯到三十年代，在文革的同時代，就能找到中國群衆造反運動的社會學等價物。比如，1963年美國阿拉巴馬州伯明翰市黑人和平抗議行動，以及1965年阿拉巴馬州塞爾馬市和蒙哥馬利市南方黑人和北方同情者的游行，這是美國六十年代民權運動史上的著名抗爭，它迫使美國總統以聯邦名義取締南方種族隔離政策，而群衆在抗爭過程中，都遭到了有壓倒優勢的警察和國民警衛隊的鎮壓，更遭受了白人三K黨的極端暴力圍攻和迫害。

現有文革研究的狀況，可以這樣描述：有關文革意義的闡述和爭論還遠遠未能基于史實，因為有關基本史實仍處于被嚴重地歪曲、掩蓋和顛倒的狀況。僅僅以清華“八·二四”事件為例，這樣一個對整個文革都有重大衝擊影響和標誌意義的群衆性事件，在主流文革史裏竟然被根本忽略和掩蓋，這就相當于：在論述法國大革命時，竟然

[1] 比如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寫到：“人們可能讀過季羨林先生寫的《牛棚雜憶》。在書中，季先生詳盡地描述了‘文革’中，北大大造反派聶元梓等人整人害人的罪惡行徑。凡讀過此書的人，對北大造反派的狠毒，一定有所瞭解。北京大學，這所中國最著名的學府，竟然變成了法西斯的集中營，變成了血腥暴徒們施虐的場所。”（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2000年）。

略去不談 1791 年 7 月 17 日在馬爾斯廣場保皇勢力對群衆的大屠殺事件，而企圖去解釋後來國王的被廢和被處決，以及去解釋後來發生的革命恐怖。

無論是法國大革命還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群衆都扮演了重大的角色。在法國大革命中，以無套褲漢為主體的群衆性集體行動，被歷史學家稱為“發生了革命鬥爭的一天”("journee revolutionnaire")，從而成爲一個重要的分析單位。一場重大的革命通常包括了大大小小的許多次這類事件，它們形成了一個互相聯繫的、有著時間順序的（這對敘述歷史的是非原委至關重要）一個結構，事件序列不僅對當時人們的意識有重大凝造作用，而且也成爲革命的“自然史”，是研究考察革命歷史的出發點。

主流文革研究至今仍然缺乏這個最基本的“自然史”的框架，這樣說的根據是：主流的文字敘述，和歷史現場中的大多數人們對事件和人物的理解、和原始文獻所論及的問題和意義，不僅存在巨大的鴻溝，而且幾乎毫不相關。具體說，這裏面存在著四個嚴重的模糊和顛倒：時間順序上的模糊、顛倒，人物派別的模糊、顛倒，重大事件和次要事件的模糊、顛倒，以及精英和群衆誰起決定性作用問題上的模糊、顛倒。

官方史學的模糊、顛倒又從而導致對最基本事實的認識上的矛盾和混亂（比如：“血統論”及相關惡行是否應該歸罪于中央文革和造反派；抄家、“破四舊”的暴徒，是否也是抵制“四人幫”的英雄），因而造成文革歷史讓人感到捉摸不透，如同盲人摸象，如同一潭渾水。認識上的最大混亂，又往往導致最大的簡單化。

本章和本書的其他一些章節試圖重新發現以群衆事件

爲分析單位的時間序列結構，只有這樣做，才有可能將被歪曲、被掩蓋的文化大革命的自然史加以恢復和昭示。這個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所明確表現出來的各個階段（如五十天、從“十六條”發表到批資反綫開始，從批資反綫開始到“一月風暴”等等），找到最有標誌意義的重大事件，考察其時間——空間上的分布。比如在文革中，只有像“八·一八”接見紅衛兵這樣的少數事件才具有直接的全國的意義，而各地大多數重大事件是在學校或省市當局的政治管轄範圍內展開的。其次，在更微觀的層面上，需要研究群衆集體行動中的訴求、派別、聯盟關係、行爲套路上的因循和創新，特別是本章所涉及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在行爲套路上的系統區別^[1]。

這樣一種研究方法，不僅致力于揭示群衆運動的自然史，也有它本身所具有的學理研討結構，是對前人有關其他群衆運動和社會革命的研究進行評論和對照，從而對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比較研究、對提出重要問題大有益處。比如：激進主義在整個運動過程中從高漲到低落的情形，熱月反動的發生時刻和背景，雅各賓主義精英的歷史作用和下層群衆訴求的意識形態意義等。

[1] 有關集體抗爭中的行爲套路 (repertoire of contention) 的研究，見：Charles Tilly: *Popular Contention in Great Britain: 1758–183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第五章 批判“資反綫”和群衆平反運動

自由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都來源于啓蒙主義哲學，它們的共同點之一就是反迫害精神。“我控訴”始終是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共同呼聲。資產階級在大革命時期提出了“普遍人權”的口號，當資產階級和下層民衆發生利益衝突時，恰恰是下層民衆將真正人人平等的公民權和人權付諸實踐，并批判資產階級的虛偽和言行不一致。迫害和反迫害鬥爭貫穿了社會主義和國際工人運動歷史，這包括一八四八年革命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時，工人階級被資產階級鎮壓在空前規模的血泊之中的歷史記憶。從個人經歷看，從巴貝夫，到馬克思、巴枯寧，再到列寧，都有受迫害的經歷，反迫害是他們革命鬥爭生涯的重要部分。更不用說，中國共產黨有著歷史上受迫害和反迫害的深厚經驗，而爭取作為自由主義的基本內容的公民權和人權，曾是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綱領的主要內容。

不久前，有人編了一本《共產主義黑皮書：罪行、恐怖和壓迫》(題目是仿照二戰後紐倫堡審判中的《納粹罪行黑皮書》)^[1]，聲稱將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各種迫害暴行作了百科全書式的記載。這個問題，顯然背負了很多冷戰的包袱。二戰後美蘇對峙的很長時間內，陰森恐怖的“古拉

[1] Stephane Courtois and others: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ance, 1997.

格群島”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人權紀錄的同義語；在奧威爾的《一九八四》那裏，共產黨的統治和法西斯獨裁的之間的區別已經完全不可分辨了。

只不過，我們不應忘記：作為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外的政治現代性的第三條支柱——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不僅如拜靈頓·摩爾所說的那樣，本身有著血淋淋的暴力出身，就以美利堅帝國和平為例，在其存在至今的 60 多年內，堪稱人權的絞肉機。估且不談美國支持下的印度尼西亞右派軍人政權的對百萬共產黨人的大屠殺，即使是在帝國中心，也有因政治觀點而判處死刑的盧森堡夫婦這樣的迫害案例，曾有著種族隔離這樣的僅以膚色為標準的制度化人身迫害，以及像保羅·羅伯遜、羅伯特·威廉這樣的因不同政見受政府迫害而被迫到其他國家尋求政治避難的例子（後者在六十年代曾去古巴和中國進行政治避難）^[1]。

確實，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紀錄中存在著大量的、包括令人震驚的黑暗面；然而，重要的問題是：二十世紀“歷史共產主義”（按照霍布斯鮑姆的稱呼）在迫害與反迫害方面的紀錄，是高度複雜矛盾的，可以說，它

[1] 羅伯特·威廉 (Robert Franklin Williams, 1925–1996), 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爾科姆·X 和馬丁·路德·金的朋友，毛澤東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發表的《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鬥爭的聲明》稱威廉為“美國黑人領袖、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北卡羅來納州門羅分會前任主席”，以綁架嫌疑被聯邦調查局追捕，1961 年至 1965 年曾在古巴避難；根據文革前夕中國報刊的報道，威廉夫婦于 1965 年來到中國進行政治避難。威廉于 1969 年回到美國後被捕，1975 年有關指控被取消，威廉被釋放。有關盧森堡夫婦案例，可見 Meeropol, Robert and Michael. *We Are Your Sons, The Legacy of Ethel and Julius Rosenberg*.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6. Howard Zinn: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492–Present*.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9. 保羅·羅伯遜案例，可見羅伯遜的自傳：Paul Robeson: *Here I Stand*, Beacon, 1971.

呈現出古羅馬神話中的杰納斯兩面神那樣的面貌：一方面是億萬人民反對人吃人的壓迫、追求全面解放的巨大激情，以及由此帶給全世界各個角落的人道的光明和實質的進步，一方面是新制度徹底取代資本主義野蠻的人類渴望遭受巨大的挫傷，這包括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失誤，以及後來的蛻化、變質和走向反面。

更重要的是，在整個“歷史共產主義”內部，“迫害與反迫害”並不總是一個沉默的題目，這裏就不得不提到：曾經成爲“歷史共產主義運動”的世界矚目中心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也許今天人們還未正視的是：恰恰是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人民免受政治迫害的權利，群衆性的反迫害運動，一度曾成爲一個中心命題。同樣，這裏並不否認：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當中群衆遭受迫害的事例惡性增加了，實際上正是文化大革命把“迫害—反迫害”這個杰納斯兩面神的矛盾面貌發展到極端。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有一個蔚爲壯觀的平反、翻案運動，這個運動的高潮時刻是官方宣布對文革的“徹底否定”。從那時起，一個強大的、深入人心的觀念被建構起來，形成了這樣一個公式：

文革：否定文革 = 迫害：反迫害

文革被等同于迫害；主流文字談起文革，無休止的內容就是迫害，特別是脫離了上下語境和歷史背景的、駭人聽聞的驚恐回憶。和這個公式相關的一整套語義系統、二元對立範疇被建立起來了，比如，如下的一系列範疇對：

文革

否定文革

迫害

被迫害、反迫害

毛澤東

劉少奇

林彪、中央文革（四人幫）	老幹部
造反派	走資派
封建法西斯	民主與法制
反自由、反人道	自由、人道
殘暴	溫和
.....

本章的目的，就是說明：這些概念構造，和文革運動複雜矛盾的真實歷史之間，存在著很大差距，通過對原始材料，特別以基層群衆為關注點的那些材料的回顧和研究，就能夠發現：文革本身就包含的迫害與反迫害兩方面的內容，反迫害和平反運動，并不是外在于文革的東西，而恰恰是文革群衆運動本身的一個關鍵內容。從另一個角度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平反翻案風潮，也不是對文革的否定，毋寧說，它是文革群衆運動在另一種政治環境和意識形態環境下的延續和發展。

以群衆的角度來考察文革歷史，它並不只是一幕無休無止的迫害，一場漆黑一團的浩劫，相反，它是迫害與反迫害相對立、相衝突、相鬥爭的一幕，它既有令人髮指的迫害場面，也有受迫害者平反昭雪、翻身解放的盛大節日，它既有陰暗壓抑的時刻，也有億萬群衆獲得空前的公民自由的狂歡瞬間。這裏面，誰是迫害者，誰是被迫害者，誰對誰施加了迫害，不同的人、不同階段內受迫害的情況和程度有何不同，迫害與反迫害的區別和界限，等等，更是高度複雜和曲折的故事，是直至今天仍然能引發高度情感和爭議的問題，也是被主流文字所有意模糊、掩蓋和顛倒的問題，因此，這裏儘量緊密地參照原始文件、儘量忠實于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完整性，來試圖恢復有關歷史事

實的複雜面貌。

作為“群衆的文化大革命史”的中心部分，本章講述一九六六年的兩、三個月內的主要社會衝突和群衆集體行動，即從十月份“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始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之前的這個階段。

《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和軍委緊急指示

本書試圖借用“革命的自然史”這個概念來考察文化大革命歷史的重大事件的時間序列結構。“革命的自然史”的概念來自里福德·艾德華茲和克倫·布林頓有關革命的研究，他們注意到：經典的社會革命大都經歷相同的一些階段，如舊制度垮臺、革命派別的逐次更替和激進化，最終發生熱月反動導致革命的結束，這些歷程彷彿像是革命的內在生命週期，為歷史上的許多重大革命所重演^[1]。顯然，文化大革命並不是經典意義上的社會革命，儘管我們仍然能够從文革過程中辨認出派別的分化、激進化，類似“雅各賓主義”的興起和衰亡，群衆動員經歷數次波峰、波谷，最終從高潮走向低落，社會格局最後走向復員等等過程。借用“自然史”的概念是為了克服主流話語裏類似“十年浩劫”這類對文革歷史的簡單化處理，辯明事件發生的順序和主次，人物、行動的是非曲直。

主流和官方史書對文革的記載，通常是以精英上層的人事變動為線索和標誌（如彭羅陸楊、陶鑄、劉少奇的失

[1] Lyford P. Edwards,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7. Crane Brinton: *The anatmoy of Revolution*.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38.

勢)，將文革歷史歸約于宮廷鬥爭，而低估下層群衆的主動作用，輕視下層群衆的經歷、感受和回憶。本書試圖以造反派群衆和黨委領導的衝突發展為線索，試圖關注領導與群衆之間、群衆中兩派之間對立的形成和發展。根據這種視角，“五十天”的結束以及“十六條”的發表是一個重大的轉折和里程碑；而十月一日之後《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的發表，則是另一個重大轉折和里程碑。

從 1966 年 8 月 8 日“十六條”發表到 9 月底，是文化大革命群衆運動脫離官僚控制和官方運動模式的第一階段。如前文所述，這期間各地領導對群衆的依舊嚴重壓制，包括對給領導提意見者進行人身迫害，另一方面，群衆中發生對抗領導和擁護領導的派別分裂，各大城市都發生了群衆性大規模街頭抗爭和官方的無情鎮壓。毛澤東在十一中全會閉幕會上曾說：“決不要以為，決定上寫了，所有的黨委，所有的革命同志就會實行，總有一小部分人不願意實行。”按照王力的回憶，“一九六六年九月，毛主席召集一部分人開會提出：‘相當長的時間內，就是從八月三日到九月，整個運動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許多問題沒有解決，特別是批判錯誤路線的嚴肅的堅定性和徹底性。’當時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徹底批判劉少奇同志的‘錯誤路線’。^[1]”

林彪 10 月 1 日在國慶節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以及第二天出版的《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所包含的幾句關鍵性修辭，是繼“十六條”發表之後，中央推動權力向群衆傾斜的又一次輿論動員。如果說，“十六條”發表在基層產生

[1]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年，p66。

的效果，是逐漸的、遲後的，那麼，《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所提出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全國各地產生了較為顯著的扭轉作用。

《紅旗》第十三期社論中關鍵性的最新修辭是這樣的：“但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並未就此結束。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是很尖銳，很複雜的。有極少數人採取新的形式欺騙群衆，對抗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極力採取挑動群衆鬥群衆的形式，去達到他們的目的。”

有關從林彪講話中的“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到《紅旗》社論正式提出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措辭取捨過程，王力在《現場歷史》中有所解釋。然而，這裏關心的，不是精英上層的決策過程，而是上層的最新修辭策略對各地基層矛盾發展所起的效應。

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以傳統的路線鬥爭語言對各地領導與群衆的衝突、群衆中少數派與多數派分裂等狀況的概括。根據一份《解放軍報社接待室同志談當前兩條路線鬥爭》（時間：1966年10月7日；訪問者：清華“捲巨瀾”戰鬥組、化工系五同志）的採訪記錄材料，《紅旗》第十三期社論是針對各地壓制群衆的情況寫出來的：“中央文革從解放軍報、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紅旗雜誌抽了一批人，到全國、北京各校調查，發現兩派不是一般的意見分歧，是兩種思潮、兩種路線的鬥爭。”

無論“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詞存在多大的含混、矛盾，《紅旗》第十三期社論的意義在於：宣布各地領導鎮壓群衆的行為是“方向性、路線性錯誤”，這樣就把當時出現的前所未有的規模的黨群衝突、群衆內部的分裂，納入到現

存的官方闡釋話語之中，因而為矛盾解決提供了一定框架。比如：“方向性、路綫性錯誤”具有確定的含義：“方向性是指矛頭所向，路綫性是指依靠誰”^[1]。這就是說，各地黨委的錯誤在於：在方向上把矛頭指向群衆，在路綫上沒有依靠群衆。其次，“方向、立場問題”相對於“路綫問題”、“方向性、路綫性錯誤”相對於“方向路綫錯誤”，又有嚴重程度區別：劉少奇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對北京建工學院工作組的講話》中就談到：“你們犯了錯誤，是什麼性質，主要講思想，你們理解到什麼程度？我問了他們（指‘八一團’代表），××、×××他們說你們是方向問題，立場問題的錯誤。你們考慮光說方向、立場問題够不够？中央現在還有人在考慮有沒有路綫問題。”而戚本禹在另一個場合下的談話，說明了帶“性”字與不帶“性”字之間的重大區別：“把革命群衆打成了反革命，要說這是方向性、路綫性的錯誤還不够，而是方向路綫錯誤。帶上‘性’字就太輕了。”^[2]”

另一方面，新的修辭指向一個意義重大的方向，那就是：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式下，解決黨群矛盾、領導與被領導的矛盾，解決官僚主義當官作老爺、脫離群衆的問題，而同時避免以往官方政治運動的上綱上綫、殘酷鬥爭的“極左”套路。比如，11月1日出版的《紅旗》第十四期社論進一步解釋說：“一般說來，犯了路綫錯誤的同志，他們同黨同群衆的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區別改正錯誤或堅持錯誤的標誌，是對群衆的態度，是否公

[1] 《走訪人民日報編輯部》，時間：10月14日，訪問者：化工學院“飛舟”戰鬥組；被訪者：編輯部周修慶。

[2] 《戚本禹同志九月六日在二七機車廠（原長辛店機車廠）工具車間講話紀要》。

開向群衆承認執行了錯誤路線，是否給被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衆，認真平反，公開給他們恢復名譽，並且支持革命群衆的革命行動。^[1]”

比《紅旗》第十三期社論有更強的政策性效果、並直接給群衆賦權的，是軍委、總政治部 10 月 5 日發出的《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這份文件的關鍵部分是：“在運動中不許挑動學生鬥學生，要注意保護少數。凡是運動初期被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所謂‘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應宣布一律無效，予以平反並當衆恢復名譽，個人被迫寫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本人處理。黨委或工作組及別人整理的整他們的材料，應和群衆商量處理辦法。經過群衆和被整的人同意，也可以當衆銷毀。”這是文革開始以來，第一次正式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規定為受迫害群衆平反、銷毀針對群衆的黑材料。

這份文件，自然產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因而幾乎成為各地受壓制的造反派的福音和旗幟。這份文件首次和群衆見面，是在 10 月 6 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由首都三司發起、有十萬人參加的“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

[1] 《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紅旗》1966 年第 14 期，11 月 1 日出版。又例：1966 年 11 月 27 日周恩來在接見外地來京申訴告狀的師生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說：“我們說犯路線錯誤的同志，一般說是人民內部矛盾，應該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去解決，去批判。只有那些堅持反動路線不改的，或者本來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或者是兩面派，表面上站在黨中央、毛主席這一邊，講一些革命的話，背後搞陰謀破壞，象你們知道的前北京市委彭真，這就超過了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敵我矛盾，或本來就屬於敵我矛盾。”

會上，這是受壓制的少數派群衆慶祝解放的一個空前盛大的場面。大會上，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組作了一個極短但被廣為流傳的講話，然後，張春橋宣讀了《緊急指示》和中央有關同樣適用於大中學校的批示^[1]。

據記載，當時在場的許多被打成“反黨分子”、“右派”的學生，感動得熱淚盈眶，高呼口號^[2]。在大會上發言的，還有北京地院“東方紅”、師大“井岡山”、北航“紅旗”和桂林、揚州、西安等地的代表，他們發言的主題大都是受迫害的經歷和對迫害者的控訴。這次大會立即成為一種模式，此後，“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成了一種鼓舞人心的最新的集體行動方式，隨著串連者的傳播，由受壓的一派群衆在各地重演。

新的修辭、新興起的受壓迫者平反運動，也並非不存在內在的矛盾。比如：參與迫害少數派群衆的，不僅有黨委領導人，還有按照領導人意旨行事的積極分子和多數派

[1] 江青的講話全文是：

同志們，同學們：

你們好！我受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問你們好！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全體同志問你們好！向你們致崇高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敬禮！

我們支持你們這種大無畏的無產階級的英雄行為，我們學習你們這種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我們堅決和你們站在一起！捍衛和執行黨中央十一中全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

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則，掌握政策。希望同志們在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掌握穩政策，學會善于運用鬥爭的策略，最重要的是重要的是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基礎上，在鬥爭的考驗過程中發展和傳達左派隊伍，團結大多數願意革命的人，團結那些受蒙蔽的人，孤立和打擊那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黨中央在十月五日批准了軍隊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通知，現在，請張春橋同志向同志們宣讀好不好？（答：好！）

[2] 《春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長春公社五〇三戰鬥隊編，p40。

群衆的成員，對以往迫害的平反和清算，很容易演變成對這些人的新的迫害。中央文革很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因此反覆地警告少數派、造反派，督促他們不要搞逆向迫害。10月9日，張春橋對清華大學的學生代表說：“你們過去被打成反革命，現在不要反過來。你們要注意團結犯錯誤的人。你們現在站起來了，以後犯錯誤的是你們。^[1]”10月18日，王力在政協禮堂接見全國各地革命師生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說：“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時候，要涉及到一部分同學，……這是不能叫群衆鬥群衆，學生鬥學生（熱烈鼓掌，呼口號此起彼伏）。”“我們不要用他們過去整我們的那種方法，我們不採取那樣一種辦法，比如什麼搜查人家啦，查人家的筆記本啦，盯梢啊，他們過去用這樣一種專政的手段來對待學生是不對的。”

此外，如何平反，怎樣才算正式平反，也是含混不清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央採取了口頭上支持各地的造反者、但不直接下令干預各地矛盾衝突的作法。各地、各單位的領導人堅持認為給領導提意見、和領導作對的群衆是“向黨進攻”、“右派分子”，受壓制的群衆去北京上訪、告狀，總希望中央和中央文革直接干預地方，直接下命令為受壓制的一派群衆平反，而中央和中央文革恰恰不這樣做。例如，王力、戚本禹11月12日接見重慶市中學生紅衛兵北上告狀團時的講話說：“在重慶有向同學們的家長施加壓力，對支持同學們的家長進行政治迫害，甚至迫使家長和他們脫離關係。”“有的同學提出來，重慶的小學生紅衛兵讓重慶

[1] 《周總理、張春橋同志接見清華大學要求王光美同志回校檢查的八個組織代表的座談紀要（1966年10月9日）》。

市委打成反革命，要求重慶市委公開出來平反。我們堅決支持你們的要求，……有的同學提出中央發給一個平反證，你們不要相信這個東西，應該相信你們自己的力量，要靠鬥爭才能解決問題。”

在另一次接見談話中，福建文化系統的赴京代表對戚本禹說：“我們和北京的同志不一樣，蒯大富，周總理還給平反了。我們得不到由中央領導同志的直接指示，只有報紙。”戚本禹回答說：“有報紙就够了，那是很有力的武器，我們去過的學校反而搞得不好。而沒有人管的地方，他們自己在那裏滾爬，在鬥爭中成長起來了，由少數變成多數，搞得很好。^[1]”

各地上訪者要求中央干預，正是因為各地領導仍然掌握著權力，維持著對群衆的高壓政策。1966年11月30日，即《緊急指示》發出後將近兩個月，首都三司的報紙《首都紅衛兵》的社論寫到：“事實證明，至今，平反的阻力還是相當大的，不是一帆風順的。在一些地區，像重慶、長沙等地平反運動很不容易進行。在工廠、農村和小學教師隊伍中平反比在高等院校阻力更大，更不容易。過去被打擊得越是嚴重的革命群衆，現在平反越是不容易。^[2]”

1966年10月後的幾個月內，受地方和單位領導壓制的群衆，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改變了以往由上級下令的平反方式，而主要通過群衆自己推動的結社、集會、出版（群衆小報）、言論（大字報、辯論會）、串連，包括比較激烈

[1] 《戚本禹同志接見山西紅色造反聯絡站等革命組織的講話》(1.8人大會堂)。

[2] 《我們是怎樣在鬥爭中平反的》，首都三司《首都紅衛兵》1966年11月30日。

的方式如請願、示威、絕食、佔領，來影響公共輿論，以達到平反、恢復名譽的目的。如果說，平反、恢復名譽仍然是舊體制內的改良性目標（因此有人會想到要用由中央發“平反證”的做法），那麼藉以達到這種目標的群衆大民主手段，對舊體制的衝擊則是根本性的。正是由於這種根本性的衝擊，才使 1966 年底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名義下興起的群衆性平反運動、反迫害運動，為 1967 年的全國“一月風暴”鋪平了道路。

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官方政治迫害的記錄

《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和軍委《緊急指示》發布後，平反、控訴迫害成為群衆運動的一個焦點，在一年多的時間內，以此為主題的集會、集體行動、群衆組織、群衆出版物、文字寫作的數量是浩繁的。雖然中央有關平反的政策主要是針對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明確規定是 1966 年 5 月 16 日以後）的冤案，但一方面由於十七年來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積累長期沒有得到解決，另一方面群衆性平反運動的勢頭強大，難以限制，平反或要求平反的案例也包括了整個十七年間的受迫害事件。

為了敘述清晰起見，這裏對“批判資反線”期間所揭露出來的受迫害案例作一個大致的歸類。（一）在文革運動開始後，特別是 6 月 1 日以後，遭受黨委或工作組的迫害案例。這一類是平反案例中最多的，其責任也直接歸結於“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案例中的受害者是通常個人，但也經常有夫妻，有時包括全家，有時是數人的集體。受迫害的時間通常開始於五十天，而且延續到五十天之後很長時

間。（二）在建國後十七年內遭受迫害的個人案例，包括歷次運動的衝擊、不公正的待遇，直至政治迫害、人身迫害。其中最著名的兩個案例，是劉結挺、張西挺夫婦的冤獄案，和“新時代的狂人”陳里寧案件^[1]。（三）十七年間受迫害、受不公正待遇的集體案件，受害者通常為相同職業或人口特徵的群體，這包括許許多多的合同工、臨時工集體、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集體、半工半讀學校學生群體對不公正待遇的集體申訴^[2]。

由於本書專注於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因此這裏主要集中討論第一類。此外，還應對案例的範圍作進一步的限定。這裏討論的，主要是指各地、各單位黨委領導直接參與和支持的對群衆的迫害行為，而不包括沒有當權派參與的、群衆組織自主性的迫害行為，而這後一類絕大多數是指在“西糾一聯動”或“老紅衛兵”名稱下那批特別以暴力著稱的集團的所作所為，這個題目有專門章節來論述。當然

[1] 對這兩個著名案例，我將以單獨的文章和原始文件加以說明。屬於這一類案例的幾份典型的原始文件還包括：張迅如：《憤怒控訴舊北京市委對我的政治迫害》，北京市教育革命聯絡委員會《教育革命》1967年7月14日。赤宇：《控訴彭羅路線對我的迫害》，廣州公安紅旗革命造反司令部《公安紅旗》1967年12月。魏存桂：《高等學校“下等人”的遭遇——憤怒控訴萬惡的修正主義教輔制度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我的迫害》，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1967年12月6日。

[2] 幾個比較典型的材料是：上海“六〇事件”赴京控告團：《駭人聽聞——上海“六〇事件”》，1967年1月；《血和泪的三年》，革命知識青年廣州鋼荔總編輯部《支農紅旗》第7期，1968年1月；有關廣州“工讀六百”事件的報道，載于廣州新一司工讀八三一戰鬥團《八三一》，1967年12月。一篇有關下鄉知青參與文革的研究：Stanley Rosen: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Guangzhou. In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 No 19,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1981.

更不包括 1967、1968 年間基本屬於內戰性質的暴力。還有時間上的進一步限定：官方政治迫害按照一定的階段發展：五十天是第一個階段，典型的迫害方式是過去官方政治運動常見的那些整人的辦法。從“十六條”發表到十月一日是第二個階段，以由當權派支持的保守派大搞牛棚、大飈勞改風為特色，另外，在首都之外的各省，一種形式是動用軍隊、警察和政府的保安人員在街頭和廣場對學生抗議者施加暴力，甚至個別情況下有大規模逮捕的案例^[1]。“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始後，官方迫害逐漸減少。但又一波大規模的官方政治迫害發生在所謂“二月逆流”期間，這期間的官方迫害嚴重升級，方式是出動軍隊對群衆進行大規模逮捕（個別情形下對群衆開槍導致大屠殺，如青海“二·二三”事件）、取締、解散群衆組織、長期的監禁等等。本章乃至本書都不討論“二月逆流”及之後的迫害升級，而且主要關注于 1966 年期間當權派對群衆個人的迫害事件。

群衆大民主對揭露當權派的政治迫害暴行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除了上面曾提到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各種“控訴大會”，以及無處不在的大字報成為申訴個人受迫害冤案的渠道外，各種各樣的群衆出版物成為反迫害、要求平反的主要講壇，揭露材料很多就是群衆大會上的發言和大字報。這類文體開始出現于 1966 年底，在 1967 年間大量見于群衆出版物，通常的標題是：《控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我的殘酷迫害》、《“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

[1] 如在湖北武漢：“……省委、市委出動大批囚車大肆逮捕學生，毒打學生，鎮壓學生運動。中學生佔絕大多數。張體學自己檢查都逮捕了 100 多，有的至今還未放出。”（《關鋒、戚本禹同志 11 月 18 日接見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團談話紀要》）

撮”何其毒也》、《一個受害者的血淚控訴》等等。除了登載在像清華大學《井岡山》、首都三司《首都紅衛兵》這樣的著名造反派報紙之外，還出現了大量的鉛印、油印、手抄的有關個別案例的單行本材料和文件彙編，在社會上流傳。

像《北京日報》這樣的原官僚體制內的報紙，在1967年1月奪權之後，也給予下層群衆控訴當權派、申訴冤屈的聲音以一席之地，這在新中國新聞媒體的歷史上也是一樁歷史性的記錄。《北京日報》1967年2月4日，刊登了滕玉虹的《毛主席給了我第二次生命》這篇發言，因為該文是無數篇控訴迫害文章的典型，這裏稍加詳細介紹。

文章長達上萬字，佔了整個第三、第四版，加有編者按，以及一幅插圖，描繪作者在被監禁中堅持鬥爭的形象。滕玉虹是北京周口店中學的數學教師，她的敘述從四清期間和工作隊與黨委領導的衝突開始；在文革運動開始的前夕，她就被指責為“反工作組（指四清工作組）”、“反黨”，被囚禁在私設的牢房中。滕被打成“文化大革命的橫掃典型”，周口店文教系統的許多師生也被打成了“反革命”、“牛鬼蛇神”、“反動小集團”。7月20日，滕逃出周口店中學到新市委告狀。並給本單位的文化革命工作隊長貼了大字報。此後，滕經歷了被公安分局關押、被定案為現行反革命、遭到受領導唆使的學生的暴力圍攻等迫害。八月份，滕再次被關進私設的刑房，受到了毒打、折磨。

8月13日，滕玉虹“冒著被發現的危險，給江青同志寫了一封信，托一個小同學給我帶出，沒過幾天，我收到了中央的來信，讓我上京彙報。”然而，校領導將中央來信沒收，並宣布“這又是一起嚴重的反革命事件”。此後，滕

遭受了難以想像的折磨和侮辱，比如：“把我當作動物展覽，讓大家往囚室裏擲石塊，磚頭，毒蟲，棗核、碎玻璃，往我的被子上潑水，讓大家在窗口外說下流話”，以及體罰、抄家等等。

8月18日，滕冒著危險再次給江青寫信，但底稿被抄走了。滕被長期的折磨，已經生命垂危，而學校領導人却對滕幾次三番說城裏教師被打死的形狀，“想讓我害怕，想誘我自殺”。以下直接摘自原文：

就在我隨時可能被害的日子裏，一天半夜，有人在囚我的小屋子門外叫我，我以為要提審、鬥打或黃福泰要下毒手了。

.....

我走出門來，我楞住了！

萬萬想不到，門前站著的是親人——解放軍，解放軍！

原來江青同志收到了我的第二封信，派解放軍報社的同志來救我了。

上述情節發生的確切時間，原文沒有交代，但應在九、十月間。此後，儘管有江青的關注和解放軍報社的干預，滕繼續遭受到迫害和監禁，十二月初，滕第三次衝出監牢，此時的政治氣氛已經越來越有利于造反者，滕于12月17日再次給江青寫信反映情況，并以申訴自己的冤案的種種活動，加入了造反運動的行列。

如果說，滕玉虹的材料是體制內傳媒對社會陰暗面的一次公開的、全面的大揭露，那麼，借助群衆出版物輾轉登載的材料，其流傳範圍廣度、影響深度方面也不會遜色。有關郭嘉宏案例的報道就是一例。從1967年3月起，有關

江蘇省鎮江蠶桑工區生產隊隊長、耕讀學校教師郭嘉宏的材料，就在全國各地造反派報紙上竟相轉載，郭嘉宏成爲第一位具有聖像意義的造反派烈士。

瞭解這個案例的首要原始文件，是郭嘉宏本人于1966年10月所寫的《控訴書——憤怒控訴鎮江市委工作組對我監禁四個月的政治迫害》。這份文件是造反派所特有的、以控訴迫害、伸張公民權利爲修辭特徵的一個受壓迫者的文字範本。《控訴書》開篇說到：“從六月十七日到今天，我被關押了四個多月。與世隔絕了四個多月，市委工作組定我爲‘牛鬼蛇神’‘反黨分子’‘現行反革命’，四個月來剝奪了我的人身自由、公民權，剝奪了我的發言權。”

矛盾起因于矛頭指向工區黨支部書記湯政的“六·一五”自發性群衆大會，以及《問湯政》的大字報。這次群衆大會被鎮江市委定性爲“反革命暴亂事件”，“六月十六日，他們〔指市委工作組〕挑動了四千多農民圍攻、毆打工區的革命職工和革命師生，派了刑車，綁架了我們十二個同志，就連公安人員的身上也沾滿了革命群衆的鮮血。六月十七日又藉‘保護’之名將我和其他幾個同志關押起來，就這樣，這些穿著人民公安警察外衣的人，竟爲這場嚴重的政治迫害的事件助威，蠶桑工區剛剛燃起的革命烈火被撲滅了。從此充滿生氣的蠶桑工區聽不到歌聲，看不到職工的微笑，大家默默地勞動、吃飯、睡覺，全體職工也被軟禁了，白色恐怖籠罩了蠶桑工區。”

就因爲我是《問湯政》革命大字報的積極支持者，“六·一五”會議的積極參加者和會議中途主持者，這樣，在工作組的心目中，我成了“黑會”的主將。

在“保護”的幌子下，我被關進一間沒人住的房子裏，房子裏堆滿了豆餅，地上散滿了碎玻璃，靠牆放著一張桌子、一條板凳。屋裏散發著陣陣霉味。門口設下了崗哨——“保護”我的警察和工區的“保衛隊員”，強迫我寫檢查，夜裏就睡在凹凸不平的地上（後來才搬進來一張床），他們把房子裏的棍棒磚塊、玻璃等物全部拿清，電燈也吊得老高，像對待犯人一樣，褲帶、衣物也要放在帳子外面。我吃飯、睡覺、甚至大小便都有人跟著，從這時起我失去了自由，開始與世隔絕了。

《控訴書》接著講述了隨後的審訊（包括鎮江市市長親自審訊）、揪鬥、恐嚇、游街、戴高帽、挂牌子、家庭成員的受牽連等等。《控訴書》結尾部分描述當地的情況：“四個月來，鎮江市委，市委工作組在我工區幹盡了壞事，至今蠶桑工區仍然是他們的天下，對稍有不同意見的人，他們組織圍攻，打擊報復，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他們公然對抗十六條，公然違背毛澤東思想，工作組就是不撤，並且揚言‘蠶桑工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是鎮江專區的典範’‘是鎮江專區的樣板’。”

根據其他原始文件的輔助說明，我們可以瞭解到：蠶桑工區的“六·一五”事件引發了轟動鎮江全市的政治大迫害，三百多名群衆“被推向‘反黨’地位”，在十六名場、隊級幹部和半耕半讀學校的教師中，受關押、審訊等嚴重迫害的竟達半數至多^[1]。十月份，在“批判資反綫”的影響下，

[1] 《憤怒揭發鎮江舊市委迫害郭嘉宏烈士的真相》，鎮江市機關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會《紅色戰報》1967年6月15日。

郭嘉宏經過鬥爭終於獲得自由，但仍然受到工作組和領導的壓制迫害。郭嘉宏和戰友們被迫去北京找中央文革申訴，回到江蘇後又到省、地委申訴。市、地的各級領導拒不給郭嘉宏等人平反，郭嘉宏等人于1967年1月初受十二個造反派組織的委托，再次去北京告鎮江市委的狀。在北京，郭嘉宏路過解放軍某建築工地的失火現場，他奮不顧身地投入救火，不幸身亡，結束了年僅二十四歲的生命^[1]。

郭嘉宏的受迫害和造反經歷，在各地千千萬萬的造反派那裏，是如此的熟悉，因而使他們立即認同他為自己的英雄，而郭嘉宏在串連上訪期間壯烈獻身的結局，吻合了雷鋒、王杰式的共產主義烈士的模式，這大大加強了造反派的革命形象，這大概是郭嘉宏作為造反派烈士和聖人的强大符號意義。

在群衆性的反迫害運動中，涌現出許許多類似滕玉虹和郭嘉宏那樣的控訴材料和調查報告，構成了一部揭露官方政治迫害的豐富記錄，這在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歷史上都是罕見的。除了以上兩例，本章無法再詳述更多的案例和原始文獻，這裏選列了一個很小的原始材料樣本，這些材料的內容基本上是同質的，時間範圍大體相同，其主題是高度一致的。

[1] 《是可忍孰不可忍——記郭嘉宏烈士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的經過》，鎮江市機關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會《紅色戰報》1967年6月15日。

表1：一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控訴材料的樣本

受迫害人	工作單位和職務	受迫害時間	受迫害情況	資料來源
高萬嶺	南開大學教工	1966.6-10	抄家，審訊 拷打	《砸爛枷鎖徹底革命——控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我的迫害》,《衛東》 67.4.18
鄭兆南	北京五十二中語文老師	1966.8-9	被毒打、迫害致死	被毒打、迫害《血泪控訴》,《大喊大叫》67.2.22
蔣安平	北京通縣北關中學語文老師	1966.8-10	被关押 67 天, 受侮辱、恶的灵魂——折磨	《卑鄙的手段, 丑陋的张耀先——控诉张耀先对我的政治迫害》, 《新通县》 67.7.14
贝管城	上海建光中学老师	1966.9-10	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毒打、被逼自杀	教师贝管城是怎被逼自杀样被逼死的? ——“贝管城事件”调查报告》, 新北大《丛中笑》战斗组, 67.1
杜萍	黑龙江省戏校老师	1966.7-8	被打成反革命、被监禁 45 天	《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我的迫害》,《红艺战报》 66.11.28
曹家珍	北京西城宣武门小学	1966.6-10	被侮辱、拷打、关押	《红心永向毛主席》,《首都红旗》 67.2.7

受迫害人	工作單位和職務	受迫害時間	受迫害情況	資料來源
王品兰	山东荷澤专区小学教师	1966.6-10	被拘留 103 天，遭受酷刑折磨	《血泪的控诉》,《首都红卫兵》67.1.31
徐建华	北京市东城区十字坡幼儿园老师	1966.8-10	被毒打、被迫打自己母亲	《血泪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色职工》67.1.29
窦起曾等十四人	石油部石油一厂干部	1966.8	被毒打、折磨	《血泪控诉康世恩、孙晓风之流的滔天罪行》,《大庆公社》67.5.19
周嵬伟	中学生、和母、父、爷、军人、干奶、叔	1966.6-12	被斗争、毒打、污蔑、开除、剥夺政治权利	《一家三代人的控诉》,《财贸尖兵》1967.3.4
	部、家庭妇女、大学生			

表內的受迫害時間都大約從五十天開始，至八月份達到高潮，而在一九六六年十月至一九六七年之間爭取到了平反。受迫害的起因，幾乎無一例外的是：因為給領導提意見、貼大字報，而被打成右派、反革命。

這個樣本只具有展示意義，它當然不能代表文革中反迫害文獻的全部，也不一定是現存的這類材料中最重要、最典型的；這裏的目的在於：使讀者對有關材料的特點有一個感性的瞭解。再次說明的是：還有一大批有關人身迫害的材料，其迫害者是聯動集團或直接受聯動影響的“老紅衛兵”，因為這個範疇和主題的特殊性，不包括在這個樣

本之內。

“保護人民的自由”

如果說，法國革命中的《限價法》是無套褲漢階層和下層民衆通過無數個“瓦塊戰鬥日”式的街頭抗爭所爭取到的權益的體現，那麼，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群衆運動中，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禁止人身迫害、保障人民的自由，主要是由造反派群衆的平反運動所推動的結果。1966年11月20日，中央批轉了中共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儘管文件旨在一般性地制止群衆自發性的迫害行爲，但聯繫到上面所敘述的迫害案例，以及從十月份以來的群衆性的反迫害運動的興起，這份文件的意義，在于限制十七年來各級領導人已經習以爲常的專斷權力，改變歷次政治運動所採取的人身迫害的作法，以保障群衆的公民權利。中央批文和《重要通告》原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

北京市委十一月十八日的重要通告，很好。現在轉發全國，請各省、市、自治區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名義大量印發，在學校、廠礦、機關或其他單位內張貼。各地如有同樣的情況，照這個通告辦理。

中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重要通告

任何廠礦、學校、機關或其他單位，都不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這樣做是違犯國家的法律和黨的紀律。

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後指揮這樣做，必須受到國法和黨紀的嚴厲處分。

從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處理。

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十六條”規定的“要用文鬥，不用武鬥”，和中央批轉的《重要通告》，從內容到法律地位都大致相同，但把它拿來和法國革命中的《限價法》作類比，是因為：這份簡短文件不同于一般的官僚文件，它是四個多月群衆抗爭的成果，是以受迫害者的鮮血生命為代價，是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範式內艱辛實踐的第一步。《限價法》所包含的反市場精神，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內部的異端，而《重要通告》所包含的“保護人民的自由”的思想，似乎也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階級鬥爭主題不相協調，自然引起困惑和反對。周恩來 1966 年 11 月 27 日在接見外地來京申訴告狀的師生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對《重要通告》作了一些說明，他說：“最近，中央批轉了一個《重要通告》，就是要保護人民的自由。有的說《重要通告》是個‘大毒草’，這是誤會。北京市委的通告，是中央文革小組提議，經過毛主席和中央批准，發給了各地。……比如過去派出的工作組執行錯誤路線時，曾經把革命師生、革命左派拘留起來，是錯誤的，批判過的，我們不要去說他了。據我們瞭解，現在有些地方有些掌權的還這樣作，所以我們要禁止，也有的地方由於受了工作組作法的影響，受到打擊的，一時激憤也想照樣作一下，這就代替了專政權力。……這是過去的學校、機關的黨政負責人作的不對引起的錯誤後果。”

另一份談話記錄——《戚本禹同志十二月一日下午在故宮的講話》，透露了在一個基層單位，有關問題的複雜情形。戚本禹說：“我需要說一下的，就是這個拘留所的問題。你們集訓班也好，拘留所這個問題，我上次跟工人同志交換了意見。我認為設立拘留所是不對的。但是，就設立拘留所本身這個問題，不要提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來看。那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許你們有，也許你們沒有。”“陳伯達同志要我把這些人〔指拘留所裏被關押的‘右派’〕、拘留所解散，他給訓話，訓完以後，叫它們回家。”“伯達同志當時有指示，馬上要帶去，要解散。當時，有中央通告啊！”“這個中央通告，它的矛頭是指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迫群衆的，這個矛頭是這樣。有些領導人，他為了鎮壓給他提意見的群衆，他把給他提意見的人都抓起來，關在拘留所裏邊，我們這個中央通告矛頭是對準他們的。但是，抓的右派分子，你們這裏抓的是不是都是右派，你們將來可以一個一個的審查，我不作結論這裏也不能作結論。那麼，對右派分子這些私設拘留所，像我們中央通告矛頭是對準他們的。但是，對這些私設拘留所，也是不反對的，因為我們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嘛！有法律嘛！也是不反對的。當然，是革命群衆要這樣做，要給他們進行說服教育，不要那麼做，硬做了的話，我們處理這個事情。中央通告發了，要處理，因為中央通告發出來，就是要群衆處理。可是發了好幾天，這裏沒有處理。”“因為沒有處理，別人把那個事情反映到公安局了，反映到市委，市委劉建勛同志把這個通信拿給陳伯達同志，你們想想看，你們作為陳伯達同志應該怎麼處理這件事情。我看，你們作為陳伯達同志也要解散，也要馬上解散。因為說了要馬上解散，要

處理，我們爲了保護革命群衆，我們也希望你們馬上解散，事情就完了，我想伯達同志是爲了保護革命群衆。要解散拘留所，是爲了保護革命群衆，你們要理解這一點，沒有通過群衆這個問題，……因爲不准私設拘留所，是我國的法律，黨的紀律，憲法裏面有規定，那麼憲法這些規定，它是經過人民代表大會的討論，經過七億人民的討論，所以這裏不發生一個不通過群衆就解散，就是錯誤，不發生這個問題，……”“究竟你們拘留的是什麼人，是要問的，如果拘留的是群衆，人家給你領導提意見，貼大字報，這個搞人家是‘右派’是‘反革命’把人家拘留起來，這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這從內容到形式都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並不清楚這些是什麼人拘留了，因爲很多拘留所我發現都是拘留些革命群衆，所以我從形式上看也差不多，也是些人。”

這份口頭報告的記錄，措辭不準確，邏輯性差，前後有一些混亂和矛盾，但聯繫上下語境，可以大致做出如下分析推斷：一、在《重要通告》發出三、四天之後，戚本禹按照陳伯達的指示，到北京各單位，解散各種名目的拘留所、集訓班，把被拘留的人放回家，其中就包括北京故宮。二、戚本禹第一次到故宮後，發現集訓班裏有一些所謂“真正的”右派或有“歷史問題”的人（比如吳仲超、唐蘭、鄭未真），因此引起兩派群衆的爭議。一派不贊成解散集訓班，認爲解散集訓班沒有通過群衆，而對立的一派支持解散集訓班，認爲集訓班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三、戚本禹面對的難題是：集訓班裏的確有“真正的”右派，而解散集訓班又有引起兩派矛盾、“挑起群衆鬥群衆”的危險。因此，戚本禹採取的修辭策略是：以保護革命群衆作爲最

高的宗旨，因而堅持：即使是針對“真正的”右派的拘留所也要解散，這是根據“十六條”中“即使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的精神。另一方面，戚本禹不再堅持拘留所一定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此來避免和保守派群衆的對抗。

筆者尚未找到有關北京故宮文革運動的資料，無法進行核實。但僅從這個講話記錄所透露出的複雜情況，我們應該能想像出：“迫害與反迫害”的主題，在1966年10月以後的相當一段時間，成為群衆性政治鬥爭的一個焦點，大批群衆的苦難與解救都維繫于此。正如同任何有廣泛參與性的公民政治一樣，文革的群衆大民主實踐，不僅把人們最強烈的衝動與激情釋放出來，也注定要把“人身自由”、“公民權利”這些主題提升到日程上來。

和中央批轉《重要通告》相關的一件事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于11月19日視察了“紅衛兵西城糾察隊”在北京六中設立的勞改所，要求西糾立即拆除這個被群衆稱為法西斯殺人魔窟、白公館、渣滓洞的私設刑堂^[1]。有關詳情將在後面的章節中敘述。

這裏還有一個重大議題，要放到下一章詳細展開，那就是：有關“資反線”時期針對群衆所整的“黑材料”，以及十月份以後，受迫害的造反派群衆要求各地黨委領導按照《緊急指示》的規定，交出、銷毀這類材料，因而圍繞“黑材料”展開的鬥爭。

[1] 可參看：《觸目驚心——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血淋淋事實》，《紅旗報》1967年1月22日。

階級與專政：修辭儀式與歷史現實

文革的發動者和參與者對文化大革命性質和意義曾前後有過大致三種不同的闡釋：一，是文化思想領域的鬥爭，這種鬥爭，在毛澤東倡議的對《武訓傳》進行批判、有關《紅樓夢研究》的討論，以及對《海瑞罷官》的討論中，能找到其先例。二，是和傳統的、經典意義的階級鬥爭基本相同的一場“階級大搏鬥”，“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衆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三，是發揚群衆首創精神，在人民內部實行大民主，“監督黨和國家機關，監督各級領導幹部”，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1]。

闡釋上的變化，是和文革進程中遇到的阻力和曲折有關。文革運動中兩個陣營的對立衝突，發展到後來，其劇

[1] 分別見：《“五·一六”通知》，《中共九大政治報告》，王力、賈一學、李鑫《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紅旗》一九六六年第十五期。還可參看《關鋒同志十二月十一日在人民大會堂的講話》，行文可看出是對接待工作人員的講話，關鋒說：“……用大民主這樣一個方式來監督各級領導機關實在十分重要，造成一種社會風氣，群衆可以批評黨和國家領導人，把憲法的民主變成人民民主的自由，真正變成實際行動，這對我的政治生活將發生深遠的政治影響。有些省的、部的負責人是好人，有些世界觀沒改造好犯了錯誤，讓群衆沖一沖沒有什麼不好，過去歷次運動都整下邊，省委書記作了幾十年沒有檢討過，從沒公開向群衆檢討過，讓這些同志公開向群衆檢討確實不容易，讓群衆沖一沖沒什麼不好。大家知道前幾年安徽發生那樣大的事情，X東也發生那樣大的事情，XXX畏罪自殺，搞的簡直是法西斯專政，有一個同志被打成反黨分子，他的愛人要到省委、北京去告狀，就叫X的人知道，就叫公安局派兩個便衣跟蹤、盯梢，到車站後不問三七二十一關了一年多監獄，中央還不知道，如果有今天這樣的大民主就可以上街貼大字報，貼到天安門前，上北京告狀，中央即可查清這回事。”

烈程度，是名符其實的“全面內戰”。因而，對這種對立衝突的性質，就有必要做出相應的闡釋。在文革運動當中，這被歸結為兩個司令部和兩條路線之間的鬥爭^[1]。

文革後的官方決議中，著重否定了“兩個司令部”的說法。然而，假如摒棄掉“兩個司令部”說法中的陰謀論成份，把它看成是精英層鬥爭和群衆層鬥爭之間的聯盟關係的形象概括的話，這個概括就是恰如其份的。一方面，是毛澤東以及他的思想追隨者，與基層造反派群衆聯合、和各種各樣在十七年和“五十天”中受到不合理的壓抑的人群的聯合，另一方面，是劉少奇，以及大量害怕群衆、厭惡“動亂”的黨政軍幹部，與未來中國“接班人”梯隊——高幹子弟主導的組織聯合，并對教育程度低、聽話馴服的基層保守派群衆的操縱利用。

同樣，將文革中的衝突看作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也是合乎情理的。歷史材料很清楚地表明：毛澤東、劉少奇在群衆問題上，在對待群衆的首創性、對待群衆新生事物上，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所謂“路線”，無非是一整套有系統的、有哲學和理論基礎的政策導向和實踐經驗。這種政策和實踐體系，甚至不需要有“司令部”式的命令傳達系統，各省市委的領導人已經是在哲學思想層次上認同劉少奇式的群衆觀和官方運動套路。

那麼，剩下的問題就是：將 1966 年在各地延續至八、

[1] 前後矛盾的是，到七十年代中期，毛澤東和他的學生把“全面內戰”作為文革的“三分錯誤”之一，而不是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生死大搏鬥”的具體表現。還應提到的是，在民間，曾經存在著“異端”解釋，將兩派衝突理解為人民大眾反對官僚特權階級的鬥爭，甚至把“全面內戰”看成是“國內革命戰爭”。見湖南省無聯《中國向何處去？》(1968 年 1 月 6 日)。

九月還未有完期的劉少奇式的矛頭向下、運動群衆的官方運動路綫，稱作“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以及其他各種場合下“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用法，到底是學理分析上的意義，還是其符號儀式上的意義？

王年一認為，1966年10月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這個概念，是“從思想上武裝了造反派”^[1]。無疑這是事實。這是因為“資產階級”一詞，早已經從“有財產的市民等級”這一原有的學理分析內容，轉化為一個儀式化的、符號性的代碼，成為一個政治鬥爭的範疇，成為最高等級的定罪標準。在1966年，人們所說的“資產階級”，已經主要不是1848年《共產黨宣言》所謂的“代替了工業的中間等級”，或者“工業中的百萬富翁，整批整批產業軍的統領”這一社會學含義，而是咒語式地指涉革命的對象和敵人，以及一切反動的、應該批判的、應該打倒的東西。一個原來具有學理分析意義的詞彙，變為只具有指控色彩，因而在話語混戰中喪失原有的學理分析意義，也許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統一、與鬥爭結合的必然邏輯，這也同時意味著：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必須隨著鬥爭實踐的開展，不斷澄清概念並更新理論範式，才能保持自身的分析和批判力量。

以這個嚴格標準來衡量，文革當中有關“階級”的話語和闡釋，無論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都存在著巨大的含混和不確定性，而這恰恰是文化大革命在指導思想上的主要失誤。

[1] 《大動亂的年代》，p9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例：各級黨委為什麼執行這種鎮壓群衆的路線？如果說，在文革頭“五十天”裏，各地領導是在按照舊套路積極推動官方運動，那麼在八、九月間，各地當權派在感受到群衆威脅之下，自保傾向明顯增加了，有時甚至露骨地動用國家機器來鎮壓群衆。文革當中造反派對此解釋，就只能是在指控性的而非分析性的、因而是含混不清的和自相矛盾的“階級”概念框架下做出的，而這樣作通常導致陰謀論，比如：走資派“憑他們的反革命嗅覺，預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將來臨，……撕下幾十年來偽裝革命的遮羞布，赤膊上陣，迫不及待地炮製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敵人面臨死亡，于是他們就以十倍的瘋狂，百倍增長的仇恨，……策劃于密室，或點火于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應，時而絕望掙扎，時而又暴跳如雷”，然而這類闡釋很難對當權派鎮壓和兩派鬥爭實質做出有真正社會科學意義的分析^[1]。

而大量的含混不清和自相矛盾，又集中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的使用上來。一方面宣稱：“我們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是鞏固的”，另一方面却透露：“各地走資派對革命群衆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到處一片白色恐怖”，概念與現實的衝突，同一概念不同含義之間的衝突，在這裏發展到極端。

澄清在這個概念上的各種混淆、誤用，是正確闡釋文化大革命及其衝突鬥爭的前提。如果從新中國推翻“三座大山”、革命建國談起，“人民民主專政”的分析意義是很

[1] 引文摘自《大事記》。明顯的例外是，造反派中的個別“異端”言論，如湖南省無聯所作的分析，無論是否正確，在學理分析和邏輯性上都要強一些。

清楚的：它不僅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時中國各階級的現實狀況為基礎，而且包含著對新中國政治制度的規範意義：它規定誰屬於人民內部，因而具有公民權利，它規定著政治協商會議的構成和法律地位，等等。然而，當“無產階級專政”一詞成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同義語、並漸漸取而代之時，“無產階級專政”本身的學理分析意義就日益變得含混不清、同時也無關緊要了；它越來越被符碼化、空洞化，甚至最後變成一個咒符，成為衝突鬥爭中的一個修辭武器，成為“打著紅旗反紅旗”裏的“紅旗”。領導人威脅群衆時，就說：“要對你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裏“無產階級”僅具有咒符和面具的意義，而“專政”才是真實的、冰冷沉重的。同樣的，當群衆對領導人施加逆向迫害時，在修辭上也借用完全相同的這個咒符和面具。

問題的實質是：蘇聯、中國等先鋒隊政黨領導的國家形式，是否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哥達綱領批判》所說的“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的“無產階級革命專政”，和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所說的“不與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衆武裝力量的政權”？

因為本章目的不是專門的理論探討，這裏僅提一些命題供讀者審視。二十世紀，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外圍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并不是通常意義下的、穩定的階級社會，也不存在穩定的、通常意義下的“階級專政”。假如說，在英國、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後很久都未建立起穩定的“資產階級民主”，而是表現為波拿巴主義的個人獨裁、資產階級少數上層獨裁和舊勢力的復辟的交替，那麼，在帝國主義和反革命勢力包圍中誕生的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其政權性質用社會科學的方式描述，也不是任何“階級專政”，

而是革命政黨的精英和官僚的專政。這裏，“官僚”意味著科層等級機構和現代理性管理制度，而不完全是所謂“官僚主義”所包含的那種脫離人民、與人民敵對的意思。假如堅持說這些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那麼就不是在任何嚴格的社會科學意義下，而只是作為咒符、作為修辭儀式而存在，從而不具備學理分析的能力。

革命政黨的精英出于對革命理想的忠誠，出于堅定的意志，在一個時期內能够為工農階級攝政，為普通勞動人民謀利益。這個過程由於缺乏民主，難免存在家長式、簡單粗暴甚至鬥爭擴大化而損傷群衆的現象。然而也正因為缺乏民主，精英對革命理想的忠誠、對革命初衷的執著是靠不住的，出于一兩個領袖的更替，就可以在整個國家出現“熱月反動”。毛澤東對當時蘇聯東歐和中國社會主義問題的思考實際上包括了這些問題。

根據上述討論，文革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無法以通常的社會科學分析意義上的“資產階級”來理解，而只能作為一種特殊的、斯大林以來社會主義國家所獨有的一個範疇，它有關到二十世紀存在過的社會主義國家內，列寧主義政黨精英和官僚機構與人民群衆之間始終存在著的、時而緩和、時而激烈的矛盾對立。有了以上理論澄清，對文革中有關“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還是“部分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有關清華“團派”和“四一四派”的爭論，才能也有一定澄清：作為實踐的文化大革命群衆運動，在建立人民內部對國家政治、上層建築的直接參與監督的意義上，它既是對十七年體制的徹底改造、徹底揚棄的嘗試，同時又是在半個多世紀的中國革命中勞動階級所獲得的權力的鞏固，而不是將它“大翻個”。

如同法國大革命在 1793 年左右，曾出現過一個以普選權（儘管僅限男子）、限價法和大恐怖為內容的短期的人民大眾專政時期；在文革運動初期，比如從“批判資反綫”到“一月風暴”奪權時期，在一些地方、一些單位的一些時刻，也確實存在過一個人民大眾專政（同時也是群衆大民主）而不是黨的精英和官僚專政的局面，也許這才是新中國歷史上最接近社會科學分析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紀錄。

第六章 圍繞“黑材料”的鬥爭

一九八三年十月以後的三年時間內，有一個清理“三種人”的運動。這“三種人”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間緊跟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在主流歷史敘述當中，三種人是高度重合的，因為“緊跟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就是所謂造反派，打砸搶全都是他們幹的，現今的記載這樣告訴人們。

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中，記載了 1966 年兩個週期的暴力高潮，第一個週期，從 1966 年 8 月 20 日開始，延續到 9 月，這即是“破四舊”中的打人、砸文物、抄家。有關這一期間的群衆政治，我們只能根據王著中的一些支離破碎的線索推斷出來：比如，這期間的紅衛兵是由“紅五類”按“唯成份論”組織的，排斥“黑五類”或“黑七類”（第 66 頁）；但是，“紅五類”紅衛兵，比如清華附中紅衛兵和“西糾”，“是堅定地保護領導機關和老幹部的”（第 88 頁），類似的，在高校，保護工作組、保護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的仍是多數派，“多數派也造反，總的說來，他們造‘牛鬼蛇神’的反，而不造領導機關和老幹部的反”。但王著在這裏缺少了畫龍點睛的一筆：多數派所謂造“牛鬼蛇神”的反，就是對所謂“牛鬼蛇神”實行打罵、凌辱、抄家、勞改，正是第一週期打砸抄的組成部分。王著難以直言、但默認的一個事實是：第一週期暴力的主體，不是別人，正是“愛黨、愛老幹部”的親體制勢力，而不是“緊跟林彪、江青

造反起家的人”，實際上，所謂“緊跟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即高校少數派，倒是第一週期暴力的受害者，因為“西糾”和高校多數派常常把對付“牛鬼蛇神”的各種手段也用在他們身上。

王著所記載的第二個暴力週期，是10月5日中央批轉中央軍委《緊急指示》下達之後，“軍隊院校和地方迅速出現要求平反、追查運動初期的‘黑材料’的熱潮，在對某一人給予不給予平反、材料如何處理等問題上爭論不休，加劇了上下之間和群衆之間的對立。上訪因此增多，打、砸、搶、抄、抓等違法活動為之發展，一些學校開始發生武鬥事件。”從這個概括描述中，讀者也許能夠體會到前後兩個週期的暴力性質的不同，遺憾的是，以上引文就是王著對該期間事態發展的所費的全部筆墨，這反映了大部分現有文革編史所共有的對群衆政治的忽略。作為“群衆的文化大革命史”的一部分，本章專門填補王著所遺留下的這個空白，即1966年最後幾個月內，群衆性平反運動和追查“黑材料”的情況，包括從精英到群衆對“黑材料”問題的談論，以及圍繞“黑材料”的鬥爭，從談判和僵持，到搶奪和肉搏。

有關“黑材料”

文化大革命一詞中的“文化”二字經常遭到非議，但文化大革命群衆運動的一個特點，確實是把文字提到了一個空前重大的地位，全社會對文字資料都幾乎痴迷般地關注，不僅各種各樣的大字報、講話記錄、辯論會發言稿成為人們每日的精神食糧，最新的社論文章、中央文件、檔

案材料，更是常常決定著人們的安危命運。“黑材料”的詞面意義既是：指記錄著某人罪行、錯誤和污點的文件，又是指領導人或其他人背地裏以不正當的手段，惡意地收集或編造別人的不慎言行乃至罪行的記錄，可以用來指控和迫害人。廣義的說，本人或者別人所寫的思想彙報、會議發言、大字報、檢查、日記、通信、個人檔案等等，都可以成為“黑材料”。而惡意地收集或編造“黑材料”以迫害某人的行為，就稱為“整某人的黑材料”。下面進一步說明，文革初期“黑材料”的來龍去脉。

(一) 什麼是黑材料

中央軍委《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說：“凡是運動初期被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所謂‘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應宣布一律無效，予以平反並當衆恢復名譽，個人被迫寫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本人處理。黨委或工作組及別人整理的整他們的材料，應和群衆商量處理辦法。經過群衆和被整的人同意，也可以當衆銷毀。”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正式涉及材料問題，而群衆對這個問題不約而同的稱呼就是“黑材料”。《緊急指示》發布後，各地“黑材料”問題不但大多沒有解決，反而使領導與群衆的衝突激化了。以迫害為用途的“黑材料”就成為鬥爭焦點：受迫害的群衆要求平反、恢復名譽，而領導人要捍衛其治理權的神經中樞，這就是對官方文件的壟斷權。

自從人類文字文明出現以後，它就成為統治的必要工具，領導人對文字信息的佔有權、處置權，是領導人一切權力的關鍵，而十七年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各級領導

人，隨其官僚化、脫離群衆、濫用權力的程度不同，也不同程度地把檔案材料、涉及群衆言行的各種文字記錄，當作是管教和馴服群衆的有效工具。文革運動開始後的一個階段內，各地當權派普遍地對不馴服的群衆進行迫害，“黑材料”問題便成為群衆的冤屈不滿情緒以及隨之發展出來的抗議行動的焦點。

為了澄清《緊急指示》發布後概念理解上和政策實施中的混亂，周恩來十月二十二日在國務院小禮堂的講話中，作了一次權威性的解釋。周恩來對地質學院的多數派說：

“鄒家尤搞了些檔案，說‘東方紅’是反革命，搞了些材料，這不對嘛！兩個月了，他們就是不交，直到正式文件有了，他還不交。最後，‘東方紅’把五位副部長都拖去，找到了幾個箱子，都是‘東方紅’的檔案。……我們一直宣布黑材料大概有這樣的東西：

第一、工作組對上級的報告，這些報告把學生分成兩派，從一去就這樣做，揭工作組的是反革命派了。

第二、排隊，排隊也不恰當嘛，排左中右。

第三、檢討材料讓被壓制的一方檢討。

第四、對支持工作組的就叫他們供應材料。

第五、出簡報，這種簡報有很大的傾向性，把反工作組的都說成是反革命，把擁護工作組的都說成是好的。

第六、工作組組員記的日記，記哪些同志說什麼話……

第七、工作組會議記錄。據我調查，大體有這樣七類。”

周恩來的講話時是在十月下旬，各地已經出現群衆搶

黑材料的現象。周恩來說：“關於這七類材料，或多或少工作組都有，因此，無怪于受壓制的少數，你不給，他就去搶！外語學院，你就相信劉新權那麼老實呀！（外語學院一同志解釋了一句）你還替他辯護！我做總理的不如你知道！我親手處理的嘛！”^[1]”

（二）檔案、材料問題的歷史來由

從 1966 年 10 月到年底這個時間窗口，中央領導人多次說明“黑材料”問題和個人檔案制度的聯繫，說明“黑材料”問題和歷史上蘇聯的影響、王明的影響的關係，以及強調毛澤東最反對這套作風。這期間，也是中央對無產階級群衆大民主、巴黎公社原則等主題進行輿論動員的階段。令人遺憾的是，輿論的動員，群衆的集體行動，最終沒有導致不合理制度的根本性改革，官僚體制對群衆實行關卡壓的許多制度性工具被保留下來。

下面來看中央領導人和中央文革成員有關檔案、材料問題的歷史來由問題的一些言論。

王力 11 月 9 日在政協禮堂對山東來京串連的師生說：“我們黨內有兩種傳統，一種是毛主席的傳統，另一種是國民黨作風的影響，直到蘇共修正主義的壞影響，過去錯誤路線那還不是國民黨作風？我們一定要接受我們黨的正確傳統，接受毛主席的正確傳統，鬥爭方針。不要像他們那樣整人，整群衆的材料，我們不要搞盯梢，監視，搜查筆

[1] 《周總理十月二十二日在國務院小禮堂的講話》，場合是接見北京各校原“多數派”代表近一百人，座談紀要是由“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即二司）整理的。

記本等不正確作法。^[1]”

《周總理 12 月 3 日接見北京外語學院少數派師生員工時的講話》記載著這樣的對話：

同學：工作組利用過去的思想彙報或黨團組織生活會上的彙報拿來整人。

總理：你們認為這好不好？

同學：不好。

總理：這是不健全的黨風，這是王明搞的那一套，從蘇聯學來的，以後安子文也是這樣，這是很不健康的黨風，主席很反對。

同學：有人不但彙報自己，還彙報別人。

總理：這是全國性很大的問題，一定要糾正。

陶鑄 11 月 12 日接見華東工程學院赴京戰鬥團時講話說：（談到檔案問題時）“我們黨有些不好的作風沒有去掉，我參加革命四十年，還沒有解決。工作組來時就排隊摸底整材料。這由來已久，過去教條主義從蘇聯帶來的，是特務作風！要破四舊！毛主席最反對這一套！”“過去搞檔案是蘇聯的，只看缺點，一句話一個字就記下來，日積月累，問題就大了，什麼排隊、鑒定、思想動態，思想分析都是錯誤的！有人講錯幾句話，可恰恰是革命的，有人規規矩矩，不聲不響但確是保守的。中央想把這個東西徹底改變，把舊東西統統搞掉，把過去的壞東西統統搞掉！”

陶鑄 11 月 16 日接見另一批外地串連學生時說：“我們還有些錯誤的東西，如保衛工作、組織工作還受到蘇聯

[1] 《王力同志的講話——11.9 政協禮堂接見山東部分來京串連革命師生的講話》。

格別烏的影響。”“過去的一套是不相信群衆，搞什麼排隊，聽到一句話就記下來歸檔案了。^[1]”

(三) 為什麼要“一燒了之”？

以檢舉、彙報為形式的“黑材料”，其製造過程常常意味著：領導人假借一部分群衆之手，去迫害另一部分群衆。那麼，推翻“黑材料”的指控，平反冤案，又有導致逆向迫害的危險，同樣造成一部分群衆去鬥爭另一部分群衆。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遺留下來的長期困擾文化大革命群衆運動的問題。一些地方，造反派群衆奪取了黑材料之後，出于報復或追查到底的心理，又將黑名單之類公布于衆，或拿來作更多的文章，引起了新的矛盾，原有的派別分裂更趨於對立。

1966年11月27日周恩來在接見外地來京申訴告狀的師生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說：“這些材料是運動初期搞的，錯誤地對同學搞左中右排隊，有的還搞了名單，欺騙一部分同學檢舉另一部分同學，這是錯誤的。不把名單公布，只有好處，不致增加同學中的對立，不致引起同學鬥同學，群衆鬥群衆。……這個問題，經過中央常委、林彪同志、中央文革小組同志大家研究，再三考慮，共同認為還是一燒了之為好。”周恩來在12月13日凌晨接見科學院文革代表時的講話中再次表達了同樣的意見：“以後不要再公布黑名單了，這不是一種好作風，這是一種小動作，毛主席、林副主席主張一火了之。我以45年的黨齡和我經過黨內痛

[1] 《陶鑄十一月十二日接見華東工程學院赴京戰鬥團時的講話》；《陶鑄十一月十六日接見遼寧大學“八三一”紅衛兵的講話》。

苦的經驗告訴你們，這樣做對黨不利，彭羅陸楊就是使用過這種作風，這是不好的。^[1]”

整黑材料的案例

具反諷意義的是：文革前十七年當權派給群衆整黑材料的文體，在文革運動中被群衆所完全學習過來，反過來用來指控當權派，但區別在於：這不再是具有官方意義的官僚文書，而是成為群衆大民主的一種形式，在社會上自由的傳播和泛濫。這裏要提到的，就是一份題為《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徹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夥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長篇材料，登載於“成都打李總站教育系統聯絡站”編輯的《教育革命》1968年第6期。下面內容來自這篇材料。

一九六六年七月初，四川省文革小組長周頤要省委辦公廳印刷分類排隊統計表格，發到各地，各大專院校，叫各校工作組在各校師生中搞分類排隊、整材料。工作組進校後，時間抓得很緊，每五天排一次隊，並向大學組彙報一次。對學生也排左、中、右，揭發黨內當權派的大字報多的學生，也就被排在右邊。根據這個官方統計材料，截止六六年七月十六日為止，四川全省幹部和教師中在大字報上被點名“火燒”的達206,320人，佔參加文化大革命運

[1] 《周恩來同志在接見外地來京申訴告狀的師生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原材料註明：“1966年11月27日，記錄整理，未經本人參閱。”《周總理12月13日凌晨接見院文革代表時的講話》，地點：中南海會議室，時間：13日凌晨2:05—4:40。

動的幹部、教師總數的 38.9%，其中一般幹部 144,599 人，佔總人數的 35.4%，教師 523,611 人，佔總人數的 43.2%，僅從成都地區大專院校統計，中層幹部 450 人，截止六六年八月，就有 142 人被打成三、四類（即被批、鬥對象），佔 31.5%。其中川醫中層幹部被打成三、四類的達 43%，成大為 51.2%，川音為 38%，川師竟高達 64.2%。

一九六六年九月底，省文革大學組負責人張廣欽等人按照西南局九月十六日、二十三日兩次會議的部署，去北京進行秘密活動，在北京以解決四川赴京學生的生活福利問題為藉口，大量搜集串連師生赴京告狀的情況（組織名稱、人員、名單、家庭歷史、本人政治面貌、觀點……），每天用密電把得到的情報打回成都，在成都由袁仲凡整理後，印成簡報，直接送交李井泉、廖志高。同一時期，李井泉指示大學組下設的聯絡、情報、宣傳、研究等組專門負責搜集學生動態，研究對策。他們逐日對學生召開的各種集會，游行示威，貼大字報，傳單，學生的動向等，寫成簡報或報告。

材料接著記載：在六六年十月中央會議前夕，四川省文革小組長周頤命令大學組、辦公廳等趕製大批材料，準備拿到北京向中央“告狀”，這些材料包括：各大專院校紅衛兵排隊材料、文革籌委主要成員的分類排隊材料，外地來川師生“放毒”的材料，報告某事件的“事實真相”材料，師生下廠下鄉串連“影響生產”的材料。

西南局在成都市收集的材料的一個大致統計：從一九六六年六月到十二月，從公安廳那裏就搞了群衆的五百多份黑材料，從大專院校聯絡總站（前身就是省文革小組大學組）搞了上千份黑材料和簡報，從外地學生接待站搞了一百二十多份簡報。

上述材料所提到的西南局、四川省當局的行爲，實際上是幾乎所有政府機關都開展的情報工作，這本屬政府職權範圍內，本來就是國家機器鎮壓職能的一部分，問題是當權派把大批的學生和群衆當成鎮壓的對象。從這個意義上說，1966年秋季開始的以銷毀“黑材料”為內容的群衆性反迫害運動，和文革運動的“元敘述”，即毛澤東有關文化革命的論述，特別是有關“徹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目標，建立起了聯繫。

下面一個案例報道，揭露了黑材料與地方當權派動用國家機器迫害群衆的更直接的關係。

六月一日聶元梓大字報廣播之後，福建省和福州市的“省市委嚇壞了，立即批准了公安局的一個恐怖計劃，名曰‘打擊投機倒把’。于是六月二日福州各學校開始把一些學生成‘反革命’。六月三日公安局通知各派出所，連夜趕製材料。沒有證據筆錄，只要排出名單，登上表格，拿出舊材料，就可以送分局批准。一夜間就製造出了1500多份材料，批准抓的有800至1000人。三日鬧了個通宵，四日晚就來了個大行動。市委立即成立了總指揮部，各區成立分指揮部，動員全市幹部4000多人如臨大敵，按區分工包乾，午夜12時統一行動抓人。他們叫做什麼‘集訓’，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由區人委出面，出個通知，人就被公安局帶走了。在800至1000人中，有80%多是基本群衆，不少是只有小違法小缺點貪下中農，真正的地富反壞右還不到20%。當天晚上福州街道上成群結隊地把人帶走，一片白色恐怖，氣氛十分緊張。”“第二天鄭重（福州市委負責人）大喊大叫，說什麼這些‘牛鬼蛇神’

要狠狠地鬥，要把他理光頭、游街，要綁幾個在大橋頭示衆等等。當時有些公安幹部實在不敢執行，可是唐勇局長責令說：‘你們大膽地做，不要怕違反政策，有責任我負責！’就這樣，街上大鬥爭、大游街持續了十天左右，把基本群衆和敵人集中在一起，苦役四個月。”這就是省市委心目中的文化革命^[1]。

到了八月份，“十六條”公布後、南下學生開始串連，福州市公安局“要把南下學生‘照相記帳’記下來。市局嚴密地布置了骨幹，把家住本地回來串連的學生，每個人的名字，家庭情況，社會關係都寫成黑材料，

[1] 這樁迫害事件，屬於典型的官方集體迫害案例。在文革運動初期，一些省市委領導人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理解為迫害、驅逐黑五類分子或其他領導心目中的“不良分子”。一份談話記錄——《康生同志十一月十五日對新疆“少數派”的講話》的結尾部分有這樣一段文字，透露了類似一樁官方迫害事件，及造反派群衆對該事件的態度：

康生同志講完，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赴新串連一同志問：“中央是否有這樣的指示，把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和牛鬼蛇神都趕出城市？”康生回答，“沒有這樣的指示。”（這位同學拿出烏地區紅衛兵總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公布的（66）糾字第四號通令交給康生同志看。（按：這是多數派組織發出的通令，發出後得到自治區黨委的配合執行。但這是一個有嚴重錯誤的通令。我團〔指“新疆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及其他革命“少數派”社團發出通告，宣布這一通令無效——記錄整理者的按語）這位同學作說明說：“這個通令發出後，烏魯木齊公安機關配合活動。烏魯木齊不但把是五類分子牛鬼蛇神往外趕，還有的不是五類分子，牛鬼蛇神也往外趕。我們地質‘東方紅’，北航‘紅旗’的同志與自治區黨委聯繫多次都沒有解決。我們認為這樣作法是不合適的。我們找王恩茂同志多次，十一月三十日〔原文如此〕找王恩茂等了八個小時都沒有解決，我們覺得這是形左實右的，特別在現在自治區有些單位才剛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些在前一時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的還沒有平反。”

直接交市公安局”^[1]。

鬥爭過程：談判、搶奪與肉搏

由於軍委《緊急指示》的規定觸動了各級領導人長期以來認為天經地義的對官方文件檔案的壟斷權，有關處理黑材料的規定，在各級領導的抵制下，無法依照原有的政策實施渠道貫徹執行。《緊急指示》的實際貫徹，是靠群衆大民主氣氛下的集體行動，而這類集體行動不僅有和平的談判協商（通常在領導人與群衆組織代表之間），也包括比較激烈的形式，如請願、絕食、包圍和佔領政府辦公場所，直至有大規模人群參與的搶奪和肉搏戰。在領導人一方面，面對群衆要不到黑材料就“搶”的策略，他們就採取各種各樣的“藏”的對策。藏的地點，通常是本單位的機要部門、保衛部門，也就是官僚體制中最排斥群衆、最易于濫用權力的部門。比如，在周恩來接見群衆的一次談話中，建工學院的學生向周恩來彙報說：“水泥設計院裏整八·二四（少數派）的黑材料，被人放到保衛組放軍火的櫃子裏，有的和檔案放在一起了。^[2]”在有的單位，領導人更把“黑材料”轉移到公、檢、法等單位，甚至轉移到軍隊機關，這是引起公、檢、法和軍隊機關後來受到衝擊的重要觸發原因之一。

在一份題為《十月十一日周總理的口頭指示》的材料中，

[1] 無產階級政權紅衛兵革命委員會《尖兵戰鬥組》：《揭穿省市委利用公安局鎮壓革命群衆的陰謀》，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福建師院分部《曙光報》1967年1月9日。

[2] 《周總理接見北京建工院八一戰鬥團、井岡山部分戰士的談話》（1.7凌晨在中南海）。

附加了“寫在前面”的一段說明文字，透露了黑材料以比較和平的方式轉交的一例，該例涉及到級別較高的國家領導人（外交部副部長劉新權），其敘述口吻也是在群衆出版物裏較為少見的平靜：

“十月十日，北外紅旗紅衛兵、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北京公社紅衛兵、東方紅紅衛兵、二七紅衛兵等五個紅衛兵組織的一百多名紅衛兵，前往外交部政治部，索取有關以劉新權（外交部副部長、外交部黨委政治部主任、外語學院前工作隊主要負責人）為首的工作隊整理同學的材料。十一日上午，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同志和周總理秘書錢嘉東同志接見了我們，並聽了我們反映的情況，後來由他們向周總理作了彙報和請示做了口頭指示，羅貴波副部長于十一日晚十時，在外交部政治部會議室向我們進行口頭傳達。”

周恩來口頭指示的主旨包括：“宣布劉新權停職反省。因為他說在同學中沒有進行排隊，實際上是進行了排隊；他說材料燒毀了，實際上是沒有完全燒毀；他不但欺騙了同學們，也欺騙了外交部黨委、陳毅副總理和周總理。”“政部其他文件櫃，如果同學們需要檢查的，可以在外交部、總理秘書錢嘉東同志和1—3位同學共同參加下，打開檢查，凡屬於與劉新權工作隊有關的材料都可以拿出來。但是希望同學們不應當利用這些材料去鬥學生。與工作隊無關的材料不能拿走。政部的檔案不准動。”

中央領導人直接干預有關黑材料的處理和交涉，在十月以後的幾個月內是常見的。另一例是北京地質學院和前工作組組長鄒家尤之間的交涉。10月9日早晨兩點鐘，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召見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五同學，

作了五項承諾，其中第二條就是：“今晚你（指周榮鑫秘書長）同他們一起去，把工作隊整理革命師生員工，包括幹部的材料和已銷毀的清單交出來，給‘東方紅’總部，鄒家尤可以留在你們那個地方，擺事實，講道理進行辯論。^[1]”

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當天上午在地院師生員工大會上講話說：“今天，昨天找了你們學校各個部分及院文革的負責同志開了個會，達成了一致的協議，有這麼幾條：第一：在運動中師生員工被圍攻的材料，工作組臨走時留下了這一部分材料應當交出來。第二：工作組走了後，院文革還繼續這樣做，這一部分師生員工的材料也應當交出來。第三：你們紅衛兵也有些內部文件和材料涉及到對方的，今天上午也達成協議，也要交出來，這些材料交出來怎麼處理，雙方各派出四人，組成一個專案小組點清，雙方達成協議，找一個地方暫時封閉起來，我們國務院市委也參加一二個人，但主要工作還是學生來做。^[2]”

很多談判都沒有像上述兩例那麼和平地達成協議，而是引起大批人群面對面的對抗，或者造成對財物的破壞。比如，周恩來在 10 月 31 日接見天津工學院紅衛兵代表時講了一例：“北京政法學院要揪工作組門，追查工作組的檔案，我們沒意見，最高法院副院長王 X X 把材料藏在檔案室，同學們追到最高法院，王不給，同學們拿大棍子撬開了門（檔案沒破壞），我們出頭了，給同學們做了工作，中央決定讓王 X X 停職反省，同學們送回了卷宗，撤走了設在法院的

[1] 《李富春同志的講話（10.9 召見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五同學）》。

[2] 《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同志十月九日上午在北京地質學院師生員工大會上的講話》，材料來源註明是“北京航空學院紅旗”。

聯絡站。”^[1]

首都三司報紙《首都紅衛兵》1966年12月2日刊登《長沙工人來信：第三司令部的革命闖將在湖南工廠裏的革命行動好得很！》，文章敘述：首都三司的成員來到湖南，深入幾個點同工人打成一片，進行調查研究。發現湖南的工人9.24以後（即張平化“抓黑鬼”報告之後）受的打擊和迫害很深。很多工人、幹部和群衆被關、被鬥、被逼寫檢討和請罪書，有的甚至被逼自殺。“裕湘紗廠（即長沙紡紗廠）的職工分為兩派，幹部叫做‘上隊’，工人叫做‘下隊’，鬥爭很激烈。三司的革命闖將到該廠與工人相結合，清出了一批整工人的黑材料，準備拿出去，可是‘上隊’的人受一些人的縱容和欺騙，把他們包圍起來，關起來打傷了一個。但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反而故意造謠說：‘三司令部的學生闖進裕湘紗廠，打傷三十多個工人。’因而轟動了長沙市。很多不明真相的群衆和紅色政權保衛軍一起趕到裕湘進行圍攻。湘江風雷挺進隊和東方紅總部得到消息及時支援裕紗，通過激烈的鬥爭，在鐵的事實面前，省市委負責人簽了字。答應了工人的條件：

一、搜出的黑材料當衆銷毀，給被打擊的革命工人公開恢復名譽。

二、黨委書記停職反省。

三、撤走省委派出的變相的工作隊聯絡員。”

文章敘述的第二樁事件是：“11月14日晚上，三司令部的革命闖將發現省委有幹部在二樓女廁所秘密燒毀黑材

[1] 《周恩來同志在十月三十一日九時三十分在接見天津工學院紅衛兵代表時的座談摘記》。

料，馬上通知東方紅總部和湘江風雷挺進隊，一起配合，找到了省委第一書記，省委派負責幹部和三司令部的紅衛兵代表一起進行了清查。搜出了動員抓‘右派’的黑材料，整革命小將‘以謝若冰為首的反革命小集團’的黑材料（謝若冰等八十個革命學生被打成‘反’革命，衝破重重阻礙，來到北京，毛主席接見過謝若冰同志）。^[1]”

如果說，上述案例中的談判，在克服困難之後終於達成妥協，那麼，更通常的情況是：群衆和傲慢的官僚多次交涉，而始終得不到結果。一份以“北京日報紅衛兵、北京日報革命職工”名義發出的、日期為1966年11月26日的《告全市革命同志書》，透露了這樣的例子：

“九月中旬，《紅旗》雜誌第十二期社論《掌握鬥爭的大方向》發表後，市委負責人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恣意曲解《紅旗》雜誌社論的精神，以為‘反擊’革命群衆的時刻已到，於是，重演他們六、七月份‘抓游魚，反干擾’的故技，企圖再一次把北京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引向斜路。就在這個時候，市委書記處書記高揚文代表市委指示《北京日報》新編委會吳象等人，把《北京日報》出現的所謂‘壞人操縱群衆’‘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情況，代市委起草一個向中央的報告。由於證據不足，正式報告一直未能寫成。吳象等人交給高揚文的只是一個報告初稿。

我們認為，市委在九月中旬布置《北京日報》新編委會負責人寫這樣的報告，是一個嚴重的事件。它

[1] 湖南建湘瓷廠毛澤東思想紅旗戰鬥隊赴京戰鬥小組：《長沙工人來信：第三司令部的革命闖將在湖南工廠裏的革命行動好得很！》，首都三司報紙《首都紅衛兵》1966年12月2日。

是市委公然對抗毛主席親自主持制訂的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罪證，必須嚴肅批判！這個報告初稿，是一個歪曲事實、顛倒黑白、把矛頭指向革命群衆的徹頭徹尾的黑材料，必須按照中央指示處理！

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六點三十分，《北京日報》紅衛兵和革命職工二百餘人到市委，要求高揚文交出這個黑材料。但是，市委負責人拒不接見，而市委書記處于深夜二十三點三十五分作了一個‘決定’，企圖以此壓制我們。我們向市委副秘書長蘇文申述理由，說市委書記處這一‘決定’回避了我們提出的實質問題，沒有滿足我們的要求，請求面見高揚文，進行交涉。但蘇文蠻不講理，拒絕我們的要求。二十四日中午十一時三十分蘇文竟然利用欺騙群衆的不正當手段脫身而去，置二百餘名革命群衆于不顧。

一切革命同志們，你們看一看，北京市委對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他們沿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走得又有多麼遠！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我決定派遣一個戰鬥隊前往市委，再次堅決要求高揚文交出黑報告初稿，并要求高揚文向《北京日報》紅衛兵和革命職工公開道歉。同時，堅決要求市委副秘書長蘇文當衆檢討阻撓和破壞我們革命造反行動，以及採取欺騙手段要弄革命群

衆的嚴重錯誤。^[1]”

一篇關於中央戲劇學院—軍事科學院“十·二七”事件報道，則包括談判、僵持、搶奪與肉搏的全部過程。以下是這個報道的摘要。敘述的第一人稱是中戲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代表。

原工作隊在撤離我院時，將全部黑材料非法帶回原單位（軍事科學院），而無視革命群衆的多次強烈要求，拒不交回。因此，十月二十五日我院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派代表前往該院，經過與原工作隊分團負責人胡秉權、高體乾等同志長達九小時的說理鬥爭，才只答應將部分黑材料加封。當場，胡秉權同志答應、並決心保證：“一定不讓任何人動此材料。”然而，他們却背信棄義，于十月二十七日有意讓我院“紅色造反團”（原中央戲劇學院紅衛兵，維護、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保守派）在此材料上也加上封條。這種違背諾言，企圖挑動群衆鬥群衆的無理做法，是原工作隊分團領導站在前工作隊的立場上維護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又一具體表現。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因此，在當日下午五時，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又派四名代表前去另行查封，并向原分團領導提出強烈抗議。

他們將四名代表帶入接待室裏，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代表鄭國喜同志問胡秉權——

鄭：周總理二十二日的講話你們看過沒有？

[1] 原載 1966 年 12 月 2 日《首都紅衛兵》；類似這種通牒書是當時的流行文體，另一例是：遼寧大學八三一紅衛兵、紅色造反團：《關於查封瀋陽市公安局和到瀋陽市公安局索取黑材料 告全市革命群衆書》，1967 年 1 月 16 日《八三一戰報》。

胡：看過了。

鄭：總理的講話算數不算數？

胡：當然算數。

鄭：你們打算執行不執行？

胡：我們討論研究了一天，應該執行。

這時，楊守林已將材料查封完畢，聽了胡這句話；就說：“這材料先放在我這裏，……”此刻，未等楊守林把話說出，原工作隊人員林中和同志突然採取暴力行動，一下子撲到楊守林懷中用力奪取黑材料。此刻，胡秉權同志視而不見，不予制止。於是幾位該院幹部也參與了搶奪，林中和更加囂張，猛力將楊摔倒在地，經過激烈爭奪，從楊懷中把黑材料奪去。這時見材料已搶到林手中，胡秉權同志才假意斥責該院這幾位幹部：“你們這是幹什麼？！”林趁機將黑材料放在牆角，其它四人馬上圍在林的附近如臨大敵，形成保護圈。面對這種情況，鄭國喜對此暴力行動提出強烈抗議，並說：“你們今天這種行動，使我們對你們不能信任，材料在此存放我們不放心。我們今天要將材料帶回去，等中央下達指示後開封。”當場遭到對方無理拒絕，雙方展開辯論，對方當即派人打電話將軍事科學院負責人王樹聲副院長、楊副院長、向仲華副政委（原文化部文革小組領導成員之一）請到現場（接待室）妄圖阻止我們索取黑材料。此時，我院又派來四名代表，王樹聲副院長公然抗拒中央軍委指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并拒絕革命學生的革命要求說：“我們是軍人，我們要聽總政的命令，你們這份材料不能拿走！保存在院黨委由我負責。”

當場，鄭國喜說：“現在所交涉的問題，是我院革命師生員工和我院原工作隊之間的矛盾。此材料是中央戲劇學院的，按軍委指示軍隊無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請你不要干涉，免得給自己找被動！”王無言對答走出房門。

此時，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代表上前索取材料，林中和與其它四位該院幹部強力阻攔、拒不交出。于是雙方撕扭一團，高體乾（原工作隊分團領導）見此情況，不但不加勸阻，反而對我們大發雷霆：“你們這是革命行動嗎？你們欺人太甚，你們能這樣做我們也能。”於是對方更加蠻橫，拚命阻攔，材料未被我們拿到。

晚十點左右，在屋內和樓道裏分別集結了數十名戰士與軍官，周圍出現了游動哨。在此強大壓力之下我們不得不向學院彙報。我院革命的紅衛兵組織及其地革命群衆，聽此消息憤慨萬分，立即聚集五十餘人，乘車前往。在我們進入接待室前（黑材料在此室內），軍事科學院某些領導人將一個排左右不明真相的戰士（36人）調入室內，在放置黑材料的牆角處，組成三道人牆奉令保護。當時在場的官兵共有五十餘人，樓道有二、三十人。此刻，王樹聲對革命學生吆喝地說：“材料就是不能給，我看你們怎麼下臺？！”說罷領著幾位領導人揚長而去。十點四十分左右我院同志進入室內。與對方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原工作隊員林中和同志態度極為惡劣。我們問：“你知道你保護的是什麼材料？”他說：“有黑的有白的。”我們又問：“是誰叫你保護黑材料的？”林竟膽敢污衊我們偉大的統帥毛主席說：“也可以說是毛主席叫我保護的。”

.....

十二點二十五分我院各紅衛兵組織負責人提出最後通牒：如果到一點鐘（即二十八日）還不將材料交出就採取必要的行動。到一點時官兵却增達七十二人。通牒時間已到，我們再次讓開路鼓掌，念語錄請戰士出去，戰士仍然堅守。於是，我們將站成三排人牆保護黑材料的解放軍戰士一個一個地往外拉，我們對他們說：“請你們出去吧！你們保護的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黑材料，你們這樣做就犯錯誤了。”但是，由於這些戰士是受該院某些負責人和原工作分團領導之令來保護“文件”的，所以，他們根本不聽我們的勸說，而是盡全力保護黑材料，他們奮力地衝來衝去，其中個別戰士因過度疲勞而昏過去。

與此同時，在門口也發生了撕扭，樓道中的該院幹部拼命往屋裏擠，將門口的我院一個女同學兩次擠倒在地，以致使她犯了疊症昏迷不醒。同時，原工作隊隊員于波同志在門口，煽風點火，挑動戰士說：“快！把大衣脫了往裏衝啊……！”原工作隊員林中和同志也在那裏指揮戰士：“上！上！”混亂一團。爭奪過程中，我院同學一直堅持說理，指出：“你們保的是黑材料，請你們不要干擾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然你們要犯錯誤的。”戰士却回答：“我是在保護文件。我是個戰士，我要服從命令！”（可見有人布置）這次撕扭持續一小時之久。半夜學院多次打電話來詢問，但他們却故意挂上不接，或故意錯傳號碼進行刁難！在鬥爭激烈時值班室電話突然不通，使我們與外界失掉聯繫！

.....

二十八日上午六時左右，我院派代表去軍委文革，向他們簡單說明了情況，軍委文革打電話請示後，表示(1)支持你們的革命要求；(2)科學院派軍隊不對，(3)希望不要把事態擴大。其後，他們和解放軍報社聯繫，派了記者前去現場。

對方固守，不交出黑材料。十一點零五分我們發出最後通牒：“限二十分鐘內將材料交出，否則我們將採取必要的行動！一切後果將由軍事科學院及原工作隊分團領導全部承擔。”此時該院狄副政委才答應將採取措施，給予答復。

十一點二十六分，對方毫無任何撤出隊伍的迹象，時間已過，也並未予答復，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室內同志採取了行動，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呼聲中，終於在十一點三十二分將部分黑材料搶了出來。

大隊撤走之後，我院留下代表與原工作隊分團領導談判，提出三個條件：(1)必須把其它院校的材料交出來，(2)搶走的黑材料只是一小部分，必須將我院的全部材料交出來，(3)強烈抗議軍事科學院某些領導，調派軍隊鎮壓革命學生，挑逗[原文如此]戰士鬥學生；科學院黨委必須向廣大戰士檢查；向我們做深刻檢查。

以上就是影響波及整個北京市的“十·二七”事件的大致輪廓，該事件不僅是規模較大、持續時間較長的一次搶“黑材料”行動，而且，衝突發生在學生造反派和解放軍之間，這在全國也是較早的一例，增加了事件的嚴重意義。事件產生的衝擊效果是：在北京以及全國都謠傳：第三司令部打死了四名、打傷了二十幾名解放軍。十一月八日晚

上十時，軍事科學院幹部禾田的兒子、北京外語學校學生禾衛民帶領一群學生以“十·二七”事件為由衝擊第三司令部，是一次餘波震蕩^[1]。

如果說，群衆出版物上的文章的客觀性、準確性不可完全信賴，那麼，我們來參考一位移居香港的作者對當時目擊的回憶。《廣州電影界的造反者——珠影東方紅》于一九六九年一月在香港出版，是這樣描寫有關事件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繼“東方紅”〔指廣州珠江電影製片廠造反派組織“東方紅”一筆者註〕在珠影廠內砸了人事、保衛科的保險櫃，搶到了“黑材料”之後，廣州地區許多單位也發生了大搶“黑材料”的情況，迅速地形成了一股暴風驟雨般的風潮，不但發生在各該單位的人事保衛部門之內，而且蔓延到各該單位的上級領導機關也被有組織的群衆衝砸。這股風潮無疑是旗派〔廣州地區造反派的總稱一筆者註〕鼓動起來的。事實上這種行動就是廣州旗派在當時的中心任務，同時亦是他們當時社會活動的主要內容。……當發生這種搶的情況的時候，各單位（包括其上級領導機關）辦理人事組織的人都慌了手脚，他們急忙將人事檔案上交省委組織部，請求保管或處理，往上一推以求卸責。然而當時的省委正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實際上這時省委各部已被有組織的群衆衝擊搶砸過許多次了，又怎能保得住這堆上交的所謂黑材料？後來不知由誰想出了一條“交由可靠的革命群衆組織

[1] 《以鐵的事實戳穿謊言——軍事科學院某些負責人調動解放軍鬥學生罪責難逃！》《首都紅衛兵》1966年12月4日。另據記載，中央戲劇學院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是在事件之後才加入首都三司的。

代爲保管”的妙計，于是把這一大批的“黑材料”秘密地轉移到中山大學的圖書館內，交由人多勢大的“保派”組織“中山大學革命委員會”代爲保管，以爲這樣就可以逃過被搶的厄運。這條妙計本是相當高明，因爲中大圖書館是個偏僻而冷門的大樓，文革開始以後便封閉不用了，平常亦不會被人注意到，而且這座圖書館當時是控制在“中大革委會”的手裏。把“黑材料”密存與此，實在是很符合天時、地利與人和的。詎料事情終于被“中大紅旗”的人知道了，真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既然“黑材料”送上門來，焉有不搶之理？于是由素有“中大紅旗敢死隊”之稱的“八三一”紅衛兵帶頭去搶。但“中大革委會”亦已早有戒備，召來上千人之衆守衛著這座圖書館，加之這座建築物只有一道樓梯上樓，因此“中大紅旗”久攻不下，還被打傷了人，便打電話把情況告訴珠影“東方紅”。曹征〔珠影“東方紅”的主要負責人〕接到電話，當即動員全體成員前去支援助搶，同時馬上打電話聯絡“廣州紅旗工人”總部，“八一戰鬥兵團”和旗派學生，一下子糾合上萬的人，從四面八方趕到中大的校園，情況驟然變得異常緊張。“中大革委會”亦打電話向東風派〔廣州地區保守派的總稱，亦稱“總派”；“東風派”是1967年3月以後的稱呼—筆者註〕的“紅總”、“地總”和“主義兵”求援，同時又打電話報告軍區，請求派解放軍來鎮壓……。于是中大圖書館周圍便展開了萬餘人之衆的攻防戰。武鬥情況十分激烈。兩派之間還有上千的解放軍夾在當中，這些軍人手扣手地築成了一道人牆，名爲防止兩派武鬥，實則保護圖書

館內的“黑材料”。這樣雙方對峙了差不多一天的時間。最後旗派的人狠命地衝破了解放軍的人牆，終於奪取了樓梯登上書庫，他們砸爛了門窗和箱櫃，搜到了“黑材料”。但是，此刻樓下仍然被上萬的人重重圍困著，旗派和東風派的人梅花間竹地包圍了幾個圈，繼續展開搏鬥，包圍圈當中還夾雜著解放軍在聲嘶力竭地念毛語錄，進行勸架，故即使搶到“黑材料”也無法運出來。還是“東方紅”的曹征有謀略，他把旗派的女學生和“東方紅”的女成員組合起來，組織一個救護組，說是要上樓去救護受傷的戰友，拖著解放軍作為掩護，衝開“中大革委會”的防線一同上樓，但她們進入書庫之後就拼命將“黑材料”往自己的襯衫內、褲兜裏塞，塞滿了就猛衝下樓突圍而出，被拖上樓的解放軍雖然眼巴巴看著她們這些動作，但礙於她們是婦女，一時不知所措，亦無法動手制止。這時“東方紅”已經備好了幾輛汽車在校門外接應，等她們連人帶“黑材料”上了車就立即開走。這次珠影“東方紅”就是用這種辦法支援協助“中大紅旗”搶到不少“黑材料”的。

事後一位“東方紅”的女成員告訴我：

“這回搶到可以裝滿幾麻包的黑材料，但還未及存放在書庫裏的十分之一哩！”她還說：“我個人就搶到了一大捆，當晚先由各人帶回家裏去，以後才交回給自己的所屬組織。我看過自己搶到的那一份，原來是一間中學教職員和一處郵電所職工的人事檔案，這些檔案當中還夾雜著他們黨支部在運動中鬥批教職員工的材料哩，幾乎每個人的檔案都附有所謂言行記錄，政治懷疑要點，別人對他的檢舉報告，後期處理參考

意見等等。真是可怕，也真令人憤恨……！”

另一位“東方紅”的成員又告訴我：

“雖然這次搶得不够乾淨徹底，也並非搶到自己的黑材料，還被他們打傷了不少人，但在政治上的收穫，我們認為是很大的。”

我問：“為什麼呢？”

他說：“第一，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執行反動路線的保皇派以當頭一棒，煞煞他們的威風；第二，徹底暴露了以劉、鄧、陶為首的黑幫多年以來假人事制度對人民群衆進行政治陷害的罪惡手段，造了這種罪惡手段的反；第三，使革命群衆看到自己的或別人的黑材料，受到一次活生生的教育，從而覺悟起來，提高了革命造反的情緒；第四，通過這次革命行動，考驗了群衆的鬥爭性和檢驗了我們旗派的組織力量。^[1]”

從以上敘述，我們能瞭解到，造反派搶黑材料的運動，已經從反對個人迫害、爭取自己平反，發展成為既解放自己、也解放別人，從而追求集體解放、普遍解放的正義事業，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在1966年到1967年的一段時間裏，人民群衆的政治熱情極度高漲，全社會都陶醉在巴黎公社改天換地的動人想像和浪漫主義氣氛之中。

再來看一個外國人的目擊和記載——當時在上海外語學院任教的美籍英語教師尼爾·亨特所著《上海日記》，記述了1966年到1967年間上海市文革運動的情形，亨特的素材來自于他本人的觀察、他的學生的講述，以及他所搜

[1] 王超：《廣州電影界的造反者——珠影東方紅》，中報周刊，1969年，p71-75。

集的材料的整理。

我們學院的造反派“野戰軍”懷疑校黨委整了他們的黑材料。一個激進的學生曾在黑板上抄了一首革命烈士的詩，詩裏提到要向“王”復仇，這裏“王”是指蔣介石。但是一些保守派學生正在找造反派的黑材料，向黨委彙報說：出現了一首反對毛主席的詩。黨委表示要調查，但直到十月份也沒有任何結果。造反派認為學校當權者手中有材料，準備將來對付“野戰軍”。此事在九月份一直引起較大的爭議。

十月份，中央軍委《緊急指示》之後，野戰軍決定採取“革命行動”。十月十五日，他們以詩詞事件為藉口，其實是想繳獲更重要的材料，野戰軍紅衛兵將學校黨委、文革小組和各系黨總支的文件櫃都仔細地封了封條。封條是典型的中國式的，一點也不新鮮——不過是二、三英寸寬、二、三英尺長的紙條，上面寫著加封日期和加封條者。這在當時上海是到處可見的一景。

黨的當權派對此提出憤怒的抗議，但造反派會說：“如果你們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材料，為什麼反對我們封檔案呢？”當權派只好說：檔案中有國家機密，亂動是違法的。當封檔案的作法擴散到了所有學校和工廠與政府機關中，黨的官員都是這樣說。在我們學院，大多數學生反對封檔案，支持黨委的警告。這裏，他們的看法是出于根深蒂固的紀律觀念和對黨的尊敬。

結果形成僵局。十月十八日，野戰軍發表了一個聲明，正式指控黨委書記手中有造反派的“黑材料”，並要求他交出材料，承認錯誤。黨委書記堅決否認，

并得到紅衛兵團（該校的多數派組織）和其他幾個組織的支持。野戰軍經過許多會議和討論之後，決定進行絕食。十月二十六日，三十四名野戰軍成員宣誓停止進食，直到黨委書記在他們的要求上簽字。儘管絕食的人比較少，但還是造成了相當的轟動。自從解放前的那些英勇鬥爭歲月以來，上海學生還從未採取過這樣的反對當權派的鬥爭。絕食也不限于我們學院。其他上海高校的造反派紅衛兵也同時發起了絕食行動。

大量的大字報譴責絕食行動是“資產階級的武器”，“在社會主義社會完全沒有必要”，以及“是不合法的鬥爭方式”、“無緣無故損害身體”。我們學院的紅衛兵團和臨委與其他組織一起，舉行了一個唱對臺戲的靜坐示威，這件事在公共汽車上、在商店裏和大字報上都成為一個話題，使學院第一次吸引了全上海的矚目。

也許因為吸引了太多的關注，黨委書記突然同意造反派的要求。但造反派高興過早了，絕食剛一停止，黨委書記就用大字報解釋說：“我並沒有見到任何可以用來迫害學生的材料。”同時也承認自己犯了嚴重錯誤，并表示要堅決執行中央軍委的《緊急指示》。黨委書記的作法，既得罪了造反派，也得罪了保守派。

.....

十一月八日，野戰軍半夜突襲黨支部的辦公室，將他們自己貼的封條打開，查看文件。在此之前，他們懼于黨委有關國家機密的警告，一直未敢開封，但現在他們恐怕當權派要銷毀證據。突襲之後，野戰軍聲稱發現了他們要找的黑材料，但沒有拿出任何具體的東西。黨委理所當然地大聲抗議，否認“黑材料”

的存在，並譴責少數派的“法西斯暴行”。

反對野戰軍的勢力越來越大。但野戰軍出于某種考慮，再次出擊，這次是校黨委的辦公室。十一月十日的事件是我們學院自運動開始以來最壯觀的鬥爭了。夜晚，野戰軍走近三層的辦公樓時，發現從一樓到樓頂都由紅衛兵團和保守派的教師和工人把守著。雙方各有幾百人。于是，在入口、走廊等地方，發生了拳腳相向的衝突。

第二天，大字報上照例公布了受傷情況，難免有一些添油加醋，紅衛兵衝突之後都是如此。這次戰鬥結果不很分明：野戰軍聲稱發現了一批“黑材料”，而紅衛兵團堅決否認。

有關誰挑起武鬥的爭論，轉向了意識形態的爭論。這個爭論絕不僅限於我們學院。一份小冊子說：“最近，復旦大學、上海工程學院、上海外語學院、交通大學和其他地方，都發生了搶‘黑材料’的事。由於這是從未有過的現象，所以這件事一被提起，就成為談話和爭論的焦點。有人說這是好得很的革命手段，有人譴責說這是破壞法律，還有人說這並不全好也不全壞，因為這是用錯誤的手段達到正確的目的。”這個小冊子是北京航空學院的一個造反派組織散發的。小冊子引用了周恩來七月二十二日〔原文之誤，應為十月二十二日——筆者註〕所作的“黑材料”的定義，以及將這種壓迫行為形容為國民黨“訓政”的比喻，得出結論說，在這種特別情況下，可以使用武力：“中央軍委的指示已經發出一個多月了，但至今仍沒有一個上海高校交出一張半張黑材料。有許多工廠、機關、

文化藝術單位，那裏人們甚至根本不知道中央軍委《緊急指示》的內容。一個月以來，上海市委根本沒有宣傳《緊急指示》，而是頑固地封鎖……在這種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們革命派別無選擇，只有武力搶‘黑材料’！”

亨特的記載還告訴我們：搶材料的行動是經過周密協調的，行動者是由多個學校的人組成的。比如上海工程學院造反派的搶黑材料行動，就有上海第一醫學院、復旦大學和上海水產學院的盟友參加。另一個有趣現象是：工程學院搶黑材料的肉搏戰的同時，有雙方廣播喇叭的宣傳戰，保衛大樓的一方設法切斷了包圍一方的廣播喇叭，并大聲廣播自己的宣傳，主題是：“我們不讓匈牙利反革命暴亂重演！”“匈牙利反革命暴亂”——這是當時對造反派的一個普遍的指控^[1]。

隨著“搶材料”漸漸變成一種標準的集體行動模式，它也不再是造反派的專利，圍繞材料的政治鬥爭，也變得錯綜複雜起來。比如，一份有關北京市灰砂石總廠（在長辛店）的報道：12月27日，該廠的“保皇派”（由捍衛團改頭換面的“造反隊”）突然把該廠廠長、書記等當權派被群衆揭發的材料搶出，裝上汽車，企圖轉移和銷毀，保當權派過關，同時也替自己“開脫罪責”。當即被該廠紅色造反者發現，和他們辯論，不准他們轉移該材料，結果“造反隊”搶材料的計劃流產。但他們“在當權派的慫恿下”，帶領六百多人進城鬧罷工，鬧告狀，要求中央首長接見，也沒有成功。

[1] Neale Hunter, *Shanghai Journal: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9, p111-131. 翻譯是筆者的。

後來，“造反隊”于 1967 年 1 月 5 日聯合北京市的其他“保皇派”在廠裏製造了“一·五”流血事件^[1]。

鑑于《緊急指示》發出後檔案材料問題一直未得到解決，反而引起領導與群衆之間、群衆與群衆之間更大的對立，中共中央于 11 月 16 日發出《關於處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檔案材料問題的補充規定》，這個文件特別強調：“防止在枝節問題上糾纏不休，互相對立。”并對檔案材料的範圍，處理的程序、適用的範圍，都作了更清晰的界定。一方面，它規定有關材料應當“全部集中，不許隱瞞，不許轉移，不許複製，不許私自處理。否則，就將加深錯誤，并將受到黨的嚴厲處分。”另一方面，“在處理材料問題的過程中，各方發生爭執的時候，應該嚴格遵守‘十六條’的精神，根據上述規定，採取共同協商的方法解決，只許文鬥，不許武鬥。”《補充規定》還特地強調了保護幹部：“在文化革命運動中，對待犯路線錯誤的領導幹部，一般應該遵循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為了讓他們改正錯誤，繼續工作，不要連續地在長時間內去鬥，不要勉強留下他們，也不要限制他們的行動自由。犯錯誤的領導幹部應當主動地、認真地、虛心地向群衆進行檢討，不要同群衆形成對立的狀態。”

難以看出這份官方文件達到了其預定效果。然而，它却印證了上述不同來源的材料對圍繞“黑材料”的談判、僵持、搶奪、肉搏等記載的真實性。周恩來在 12 月 9 日的

[1] 《灰廠“一·五”流血事件》，北京職工紅色造反團《紅色造反報》1967 年 1 月 12 日。

一次講話中也提到：“十月五日批轉軍委關於‘平反’的通知，十一月十六日的補充規定，可是現在找個典型都沒有，現在還在爭。”^[1]直至1967年1月7日，周恩來還在解決一些單位的“黑材料”問題。《周總理接見北京建工院八一戰鬥團、井岡山部分戰士的談話》記載：“周總理要部長下一道命令，把所有設計院、研究所、院等來個清理，在七、八、九三天（或至十日，四天）上午專搞材料，有關文化大革命的筆記也交出來。‘由科、室為單位封閉、集中起來，然後組織你們（指被接見的戰士）左派去搜查，到任何地方抽查。我們信任你們（指在座的）你們可以信托的。組織不超過廿人的組織，去十一個單位（指研究、設計院）。部裏右派也吸收，保字派可以去五個，人數不超過廿五個，吸收保字號的要群衆不反對。施行了，還要調查，確實沒有漏洞，抽查幾個。以後根據材料豐富的，把揭發搞一個時期。看有人留副本，就作嚴厲處分。材料最後一火了之，最後當衆燒毀。’”

發生較晚的一次搶“黑材料”事件，但却是規模較大、較為轟動、也引起上層關注的一次，是1966年12月在浙江杭州市發生的衝擊省軍區大院事件。以下內容是我根據文革結束後官方編纂的《浙江“文革”紀事》彙編而成。

衝擊事件發生在12月23日，當天“深夜，‘浙江省紅色造反聯絡站’等組織在‘首都三司’駐杭聯絡站”的策劃支持下，以追查省委存放在省軍區所謂的黑材料和揪省委書記陳偉達為藉口，糾集了一千多名造反派第一次衝進了省軍區司令部大院。”“12月24日，浙江大學造反派派出張根生等六人赴京向中央軍委告省軍區窩藏黑材料，窩藏

[1] 《周總理十二月九日的講話》。

當權派。1967年1月2日，南京軍區政委杜平給省軍區打來電話：浙江大學張根生等六人，去年12月30日到達北京，向中央軍委告浙江省軍區政委龍潛的狀，說龍潛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窩藏省委黑材料和省委負責同志等，軍委答復三條：一、你們的革命行動我們堅決支持，你們揭浙江省軍區的問題我們歡迎；二、浙江省軍區有錯誤就要認真檢查；三、責成南京軍區派人到浙江省軍區共同商量解決問題。^[1]”

這次衝擊事件的嚴重意義，在于兩點：其一，這已經不是局限于針對某個具體基層單位黨委或工作組的集體行動了，而是全市造反派的跨行業聯合，向省委造反的大規模共同行動。其二，在于它成為二十多天後更大規模的一次衝擊軍區的預演，而第二次衝擊導致了軍區大院內持續半個月之久的軍民對峙的危機，呼應了全國各地軍隊普遍捲入地方文革矛盾的趨勢，而普遍捲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省軍區幫助省委藏匿黑材料，造成和群衆的對立。

對於衝擊浙江省軍區事件，林彪在1966年12月27日

[1] 《浙江“文革”紀事》，p21。有關官方文件材料放軍區保存的先例和根據，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10月28日晚）中回答問題中有一項：“其他文件（簡報、會議材料）大區、各省可帶回一份，中央各口可帶回一份，如果機關不保險，可以放在軍區保存，省市、各部不帶回文件了，因為自顧不暇，如譚X X。”然而，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的《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透露了中央政策的矛盾、兩難，從而留給地方黨委的極大政策漏洞，文件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地方黨委把重要檔案材料，電臺機要人員和機要交通人員，暫時轉移到軍事機關，這對保證黨和國家機密的安全，保證黨內文電的正常傳遞，是有好處的，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些地方黨委，却藉此為名，把文化大革命中整革命群衆的材料，也塞進軍事機關。更惡劣的是，有的地方黨委，自己幹了這種事，却嫁禍于人，挑動不明真相的群衆，把鬥爭鋒芒指向軍事機關。”

發出了《關於浙江問題的重要指示》，這個文件說：

“十二月二十七日杜屏同志電報向林副主席報告了浙江省軍區與浙江大學紅色造反聯絡站談判情況，當天下午五點半，林彪同志指示：

要把學生的工作，當作群衆工作來做，這是送上门來的群衆工作。不但不應該就這個問題引起軍隊與學生的對抗，而且應當藉這個機會，大力加強和革命學生的團結。處理這個問題的原則要重申以下三條：

(一)領導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衆見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壓，愈躲愈壓愈糟糕。

(二)對學生提出的正確批評，要誠懇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錯的要坦率進行自我批評。他們合理的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對他們不正確的意見和不合理的要求，要進行解釋和教育。

(三)從頭到尾要貫徹對學生熱情、友好、耐心的態度。在耐心的問題上，軍隊上要作出榜樣。聽了反面的話，絕不能粗暴，發脾氣。”

同一天，毛澤東對這個文件批示道：“林彪同志，此件應發到全軍營以上各級機關去。”

文化大革命與“公民不服從”

不能不回答的一個問題就是：群衆為什麼訴諸絕食、肉搏、佔領等激烈的手段，來解決黑材料的問題，以及如何評價這些行動。

首先，應該注意到的是：群衆所採取的手段，還很難歸類為暴力的範疇，即使我們認為這些手段是非和平的。

進行絕食、肉搏或佔領行動的人，通常是赤手空拳的人群，他們手中唯一的資源就是數量可觀的人數，和對他們有利的最新輿論修辭。我們從前面各種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本文所敘述的時間範圍內，各地當權派仍然掌握著主導性的權力，首先是對暴力工具的壟斷，其次是佔有各種物質的、信息的、輿論的、符號的資源。無論從任何角度看，受迫害的群衆才是暴力的真正受害者，因為群衆受迫害的過程，幾乎無一例外地就是被施暴的過程。

在受壓迫的群衆看來，黑材料問題不解決，不僅無法恢復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名譽，而且存在著將來遭受更大規模迫害的前景。在當權派的慣用語中，“運動後期”和“秋後算賬”是兩個最具威脅的不祥詞語。群衆出版物的一篇評論寫到：“有的人慣用硬的一套。他們到處放風，以‘運動後期見’，‘秋後算賬’威脅革命群衆。他們嚇唬群衆說：‘別看這幾個小子現在這麼狂，到運動後期，當權的還是老子。那時再整你們！’^[1]”

對於群衆在圍繞黑材料的鬥爭中使用肉搏的手段，《王力同志 11 月 18 日接見被蘇聯無理勒令回國的留學生時的報告》中所記錄的一段話可以作為最好的註解，王力說：“過去搶檔案等都不怪群衆，而是怪領導，過去領導搞材料的錯誤手段是對付群衆的，這些東西，群衆是關係一輩子的，對群衆是個威脅，一來個什麼運動，拿出來就要整他，這太不合理怪領導上，不能怪群衆。他要與你拼命，不打這一個月的架，我們也不理解這一個問題的嚴重性。打了一

[1] 本報評論員：《從平反開刀》，首都職工革命造反總部《革命工人報》，1967 年 1 月 12 日。

個月架，打破頭，抬到醫院的也有，砸了保險櫃，把部長扣起來，學生不承認，說是他自己去的（笑）。”

值得注意的，是王年一所敘述的 1966 年前後兩個週期的“打、砸、抄”的高潮之間的區別。第一週期以“老紅衛兵”為主體的暴力，其特點是情緒發泄型的，甚至帶著病態的虐待狂傾向，而不具備任何具體的政治目的，暴力本身就是目的，因而是一種發泄行為。第二週期以造反派群衆為主體的“暴力”，也就是本文所討論的搶奪、佔領和肉搏，其特點是突出工具理性，即以肢體、人群的肉體力量為手段，達到一定的、具體的政治目的，比如搶到“黑材料”，要求領導人做出保證、道歉等等，因而，造反派群衆的非和平手段、不服從行動，只是他們在理性選擇之下不得不訴諸的工具，以實現他們的有限目標。

社會群體隨著其社會位置、手中資源和政治訴求的不同，其集體行動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一個最明顯的區別，就在於擁有社會強者的文化價值和行為特徵的保守主義團體，和擁有社會弱者的文化價值和行為特徵的反體制、反權威團體之間。我們不妨來考察一下和中國文革運動同時代、但在另一個完全迥異的社會經濟體制下的一些事件。

一九六二年，圍繞黑人青年麥雷迪斯進入密西西比大學學習的問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和密州州長的種族主義立場發生衝突，導致上千南方白人種族主義者帶著武器，在密西西比大學校園裏實施暴力，大打出手，來阻止麥雷迪斯入學，造成流血慘案。

一九六四年夏天，美國民間團體“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招募了數百名北方白人青年志願者南下密西西比州聲援種族歧視制度壓迫下的黑人社區，幫助黑人進行選民

登記、開辦“自由學校”。這就是當時引起全美國關注的“自由夏天”運動。參加這個運動的志願者和當地黑人，遭到了當地白人種族主義者和地方當局的殘酷迫害，有四人慘遭殺害，四人受重傷，八十多人遭到毒打，上千人被捕（警察經常將被捕的人在釋放時交給白人種族主義暴徒），三十七所黑人教堂被燒毀，三十家黑人住宅和店鋪被炸毀、燒毀。

同年九月，在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園，為抗議校方限制政治社團活動，二十二個學生組織在學校辦公樓靜坐十小時，啓動了著名的“自由言論運動”。警察到校園逮捕學生活動分子，警車被學生包圍。靜坐和佔領建築物的抗議行動又持續了 32 小時。隨後學生代表和校長舉行談判。兩個月之後，校方撕毀協議，請求加州州長派警察對學生實行大規模鎮壓，有 783 名學生被捕。一九六八年，發生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學潮，學生的抗議方式更加激烈了。為反對學校的具有種族隔離性質的新建體育館計劃，示威游行的學生佔領了學校行政大樓，並將代理教務長拘留了一天一夜。兩天內，學生佔領了五座大樓，校方動員了上千名警察以武力奪回了被佔領建築，並逮捕了近六百多人。

這裏，形成了一種對照：保守主義團體的常見行動方式包括：製造暴力氣氛、以血腥殘忍來威懾和恐嚇、習慣性的污言穢語、無序的騷亂，等等，總之，對暴力和強大的崇拜指導著行動。而反體制、反權威的弱勢群衆的常見行動方式包括：請願、靜坐、佔領，以非暴力手段對官方秩序的擾亂，等等，總之，可以用“公民不服從行動”作為概括。前者主要訴諸於人的非理性本能，比如：恐懼、憎恨、復仇等等，而後者主要訴諸於人的理性，即廣義的

集體行動邏輯。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西方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手無寸鐵的群衆對特定的空間實行大規模的入侵、佔領，幾乎成為反體制、反權威的弱者群體行動的標準模式，比如：西方國家無家可歸者和其他反體制團體進駐空屋的行動，反戰、反核運動對軍事基地、核電廠的佔領行動，很多非洲、拉丁美洲國家無地農民佔領、定居并耕作空閑的耕地行動，等等。從法律意義上說，反體制、反權威的行動模式構成對官方或私有財產的一種“侵犯”，也是一種“暴力”，然而這同時也正是“公民不服從行動”的擴大民主、賦權給下層的積極意義所在。

自然我們不能忘記：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群衆政治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的群衆政治有著極大差別，特別是 1966 年 10 月至年底圍繞“黑材料”的鬥爭，是在獨一無二的中國條件下發生的。然而，兩種迥然不同的集體行動方式的對照，無論在中國，在美國，在非洲，在拉美，都是成立的。兩種行為方式聯繫著兩種不同的政治背景，這一點也具有普遍性：在各種社會史上，以群衆運動方式出現的極端保守主義，都傾向于濫用暴力恐怖、對弱者和弱勢群體施加迫害，總之是忠實地按照“強者哲學”劇本裏的臺詞來表演，而世界各地反體制、反權威的弱勢群體，其群衆運動手段也普遍地趨同於幾個特定方式：請願、絕食、佔領。

如果以上二分法成立的話，那麼，本文也許有助於我們區分“老紅衛兵”的“黨衛軍”式的、“水晶之夜”式的打砸抄，和造反派群衆圍繞“黑材料”的搶奪、肉搏。以這個區別作為鑰匙，我們也許能够對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派做出社會學意義的分析：從“激進的保守主義”角度來考察“老紅衛兵”現象，另一方面，從世界—歷史範圍內的

反體制、反權威的群衆運動的比較視角來考察普通群衆的“造反”。

第七章 從“對聯”到“聯動”：血統論、特權與保守（上）

在主流話語裏，“紅衛兵”和文革基本上是兩個可以互換的同義語，特別是，這兩個詞所喚起的是同一組負面的形象。“文革—紅衛兵”這個範疇對，強烈暗示著和歷史上其他群衆運動的類比：“法國革命—無套褲漢”、“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當然，最首要的是：“納粹法西斯運動—衝鋒隊”。不同歷史事件的敘事擁有同樣的深層結構：精英操縱下的群衆運動，及其意識形態迷魂藥驅使下的打手。命名的權力在這裏是很明顯的：

黨衛軍	——	紅衛兵
水晶之夜	——	“紅八月”
砸猶太人商店	——	破四舊、砸文物
迫害猶太人的暴行	——	迫害黑五類家庭的暴行
.....	——

因而，

納粹運動、法西斯主義 —— 文化大革命

其次，“紅衛兵”在主流話語裏，擔當“文革”的擬人化角色形象——黃軍裝、繫皮帶，嘴裏口口聲聲罵著“混蛋”，一個陰森的、血腥的、令人髮指的形象，這也是當代人們必須牢記的文革的形象。如同納粹歷史沒有褐衫黨、衝鋒隊就不是生動的，文革歷史沒有“紅衛兵”也不是生動的。很多有關文革歷史的通俗讀物，標題大都采用“紅衛兵”

而不是“文革”，比如《紅衛兵的興亡》就比《文革的興亡》要更加形象。

然而，將“紅衛兵”等同于“文化大革命”，嚴重忽視了歷史事實的複雜性。實際上，“紅衛兵”一詞本身在文革中不僅是多義的，而且這個概念本身、名分本身，就是爭奪的對象和鬥爭的焦點^[1]。一個例子很好地說明這一點：文革中，外國記者會從中國發出這樣的新聞電訊：約有一萬多紅衛兵，在集會之後，出發去攻擊另一群紅衛兵，雙方發生了大規模衝突^[2]。然而，外國記者難以確切給出雙方派別的具體名稱，或者雙方派別的政治觀點和立場。這個時候，我們就知道，像“紅衛兵”這樣的概念已經難以作為精確地描述歷史的工具了，除非我們滿足于：“紅衛兵正在打紅衛兵”這樣的描述。這好比說，在西班牙內戰中，當共和國派別和國家主義派別都聲稱在保衛西班牙祖國，那麼，“西班牙人”作為一個稱呼，就難以作為敘述西班牙內戰的概念工具了，除非我們滿足于“西班牙人正在自相殘殺”這樣的描述，而不再深入追究。

[1] 不僅如此，在文革運動中，甚至“文革”這個詞本身也是如此：比如：群衆出版物上會出現這樣的文字：“文革的作法完全違反了毛主席、黨中央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但第一個“文革”是指本單位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或“文革籌委”等等。這其實反映了當時政治鬥爭中話語爭奪的情形。正因為如此，筆者在文章中，根據上下語境，使用“文革運動”、“文革群衆運動”等。亦因為圍繞“文革”一詞的話語爭奪還沒有嚴重到象“紅衛兵”那樣的程度，所以筆者沒有象放棄“紅衛兵”那樣放棄“文革”這個詞。

[2] 比如：趙聰：《文革運動歷程述略》（四卷本），友聯研究所，1974年，第二卷，p545。現有的文化大革命歷史編年資料中，該書少見地採取大量的原始文件與敘述相結合方式。然而，該著作的致命缺陷是：在觀念和語言上受港臺的反共八股的影響較深，比如以所謂“毛林派”與“反毛林派”來概括派別分歧，因而嚴重妨礙了敘述分析的準確性。

正如同我們需要“共和派”、“共產黨人”、“無政府主義者”、“保皇黨”、“國家主義者”等詞彙來瞭解西班牙內戰，那麼，我們必然也需要拋棄“紅衛兵”一詞，引入“造反派”、“保守派”、“老造反派”、“老紅衛兵”這些所指更明確的稱呼。如上所述，這不僅是一個使瞭解歷史的複雜細節成為可能的手段問題，而且有關到權力的操縱與反操縱，有關到對歷史真實的掩蓋、歪曲、顛倒，及其相應的揭露、復原與再顛倒。

前面的幾章都是圍繞著領導與群衆的衝突這個主題。本章將很大程度上離開這個主題，轉向以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劃分為基礎的群衆政治。文化大革命中的矛盾不僅反映了官僚體制、國家機器和普通群衆的對立衝突，還反映了來自社會生活內部的衝突，具體說，就是社會精英集團和非精英階層之間的衝突。這裏所關心的主要對象，是以中學“老紅衛兵”、“血統論”對聯、西糾、聯動等為名義、為代表的社會集團和政治觀點，因為其發生、發展過程中，創造了“紅衛兵”這一詞彙，因而考察這個題目的同時，也是把“紅衛兵”這個稱謂放回到文革歷史的完整背景和具體的“社會成份”中的最適當的時機。這番考察將會說明：產生“紅衛兵”這個稱謂的有關歷史，只是文革歷史的一部分，儘管是極其特殊的一部分，然而遠遠不是文革歷史的全部；而“紅衛兵”稱謂本身，也恰恰是群衆政治中話語混戰的對象，因此也就不能夠作為精確敘述歷史的範疇工具。以這兩點而言，目前流行的以“紅衛兵”為題的讀物，大多是把“紅衛兵”的歷史等同于全部文革歷史，更糟糕的是，不對“紅衛兵”稱謂的含混意義加以澄清，反而對有關群衆政治有意加以掩蓋、歪曲、混淆和顛倒。有鑑于此，

本章不是有關一個概念化的、一般化的“紅衛兵”的研究，因為正是這種概念化的、一般化的而實際內容含混的“紅衛兵”範疇。

“老紅衛兵”與“對聯”：發生和發展

現有記載大都表明：“老紅衛兵”發迹的首要地點是清華附中和北大附中。而有關清華附中“紅衛兵”的產生經過，則有稍詳細的記載。

《中國青年》雜誌 1986 年刊登了《一個紅衛兵發起者的自述》，文章內容是卜大華（文革開始時清華附中的高中生）對有關事件的回憶，此文是衆多文字的引用來源。文章說：“5 月 29 日，卜大華等和其他高年級的學生聚在一起討論形勢和對策。這一天後來被看成是紅衛兵的誕生日。6 月 2 日，……清華附中正式貼出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表示‘堅決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紅衛兵’三個字後面有一百多人簽了名，卜大華名列其首。^[1]”

5 月 29 日的聚會，就是被後來蒙上一層傳奇化、文學化色彩的“園明園聚會”，被當作紅衛兵的誕生之祭。米鶴都所著《紅衛兵這一代》寫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曾經自編、自導、自演了一出名為《希望是屬於你們的》的話劇，其中關於紅衛兵成立的場景是這樣描寫的：

“在北京西郊的園明園，殘垣頽壁的廢墟旁，一群中學生崇敬著早年毛澤東‘誰主沉浮’的豪氣，憂患著黨和國家的命運，激發起保衛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的

[1] 梁梁執筆，《中國青年》1986 年第 10 期。

強烈責任感。

有人說：‘我們也應該向早年的毛主席學習！’‘對，我們組織起來，成立一個戰鬥隊！’‘對，我們戰鬥隊就叫向日葵戰鬥隊吧。’‘叫火車頭。’‘我們應該叫紅衛兵，我們要做毛主席紅衛兵。’‘對！紅，象徵著我們一顆紅心；衛，是誓死保衛毛主席；兵，是我們要做個毛主席的小兵。’‘好啊！我們就是紅衛兵！’^[1]”

在這裏，史實和虛構的界限開始模糊，時間是在初夏的傍晚，地點是在圓明園遺址的小山坡上，在富于詩意和永恒意義的歷史廢墟側畔。人物，按照一個說法，參加聚會的清華附中學生有：卜大華、王銘、駱小海、曠濤生、陶政、張承志、張曉賓等^[2]。

能够肯定的是：最開始，“紅衛兵”是一個北京市中學生的特有範疇，而這些中學生政治積極分子在一九六六年五十天當中的“造反”活動，和高校學生中的反工作組風潮在時間上是共時的。不過，“紅衛兵”這個稱號的知識產權屬於中學生，而且，連“造反有理”這個後來各地造反派（不僅是大中學生，而且包括工人和各種職業）的座右銘，也是從圓明園遺址附近的這所中學校園裏開始傳播開來的。

按照卜大華的回憶，在文革開始前夕，由於他和一些同學和校領導發生爭執，被校方警告說：你們這樣對待黨組織很危險，當心 57 年的教訓。6 月份工作組進駐學校後，明確表示校方壓制學生，犯了錯誤。“我們大受鼓舞，把這看成是黨中央對我們的支持。不錯，論《無產階級的革命

[1] 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香港：三聯書店，1993 年，p110。

[2] 任知初：《“紅衛兵”與“嬉皮士”：歷史的試驗品、試驗者和試驗》，明鏡出版社，1996 年。

造反精神萬歲》就是在那種情況下產生的。說它的名氣大，是因為後來毛主席支持了它。這篇東西寫出來後，我們幾個討論了一下就貼了出去。這下可熱鬧了，工作組非常緊張，問我們‘造反’兩個字如何解釋？現在是共產黨領導，要造什麼反呢？我一點也不慌，拿出了確鑿的證據——66年6月5日《人民日報》的一篇評論文章中摘引的毛主席的一段語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工作組的同志驚愕不已，又親自去核實。”按照任知初的說法，工作組請示團中央的胡克實，團中央指示“抓住壞的”、“不能縱容”，工作組於是揪住這批人中的王銘，他父親曾任羅瑞卿秘書，因而往已經倒臺的“彭羅陸楊”上聯繫^[1]。

米鶴都記載：“6月上旬，成立紅衛兵組織的還有北京地質學院附中、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京礦業學院附中等學校。至6月底前後，北京相當一批中學建立起紅衛兵的組織，其發展趨勢是由海淀區開始，由西向東波及西城區、東城區的學校，而後擴展到宣武區、崇文區以及朝陽區和豐臺區。^[2]”

工作組與最早組織紅衛兵的那批學生的關係，在北京各中學的情形也紛雜不一。在北大附中，造反者的命運不如清華附中，工作組進校後，提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要批，但不能像學生當時做的那樣，而且不准成立學生組織，于

[1] 根據鄭義的文章《清華附中、紅衛兵與我》的說法，三論的作者是駱小海，《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的作者是熊剛。見《北京之春》第42期，1996年11月。

[2] 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p112。遺憾的是，無法找到這些學校學生組織最早成立的材料，造成這裏敘述的缺欠。

是“紅旗戰鬥小組”被取締。類似的，二十五中、地院附中的紅衛兵被定為反革命集團強行解散^[1]；在北京師大一附中，革幹出身的學生陳永康、何方方在六、七月間，也組織了紅衛兵，在劉少奇直接過問的工作組的支持下，被抄、砸^[2]。在師大女附中，最早給校領導提意見的是幾名學生黨員，但受到校領導的壓制。工作組進校後，支持她們，為她們平了反，但另外一部分學生起來反工作組。師大女附中的學生楊三白、鄧葉雲還曾經和清華大學的蒯大富通信，這是最早的跨校串連記錄之一^[3]。

和高校反工作組的學生很大一點不同的是：向校領導和工作組造反的中學生或紅衛兵小組成員，絕大多數都是革幹出身，特別是來自中上層幹部家庭。根據有關材料，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小組成員中，王銘的父親是公安部副部長王仲方，袁東平的父親是當時濟南軍區政委袁升平，宋柏林的父親是解放軍裝甲兵學校校長，曠濤生、駱小海是幹部子弟，卜大華是軍人子弟；北大附中彭小蒙的父親是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彭炎，等等^[4]。這個差別的原因，有各種解釋，比如從大學和中學的招生結構、高幹子弟的就學分布、中國領導人的年齡、生育年代等等角度分析，這不

[1] 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p124。

[2] 《徹底砸爛劉少奇的反動血統論》，《兵團戰報》1967年4月27日。

[3] 《蒯大富六月二十二日給北師大女附中的一封信》，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宣傳隊編《清華大學蒯大富同學大字報選》。

[4] 鄭義：《清華附中、紅衛兵與我》；仲維光：《“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誕生史實》。仲維光文章說：“在清華附中也有一大群幹部子弟，但是和四中以及師大女附中等校的區別是，很少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賀龍、薄一波這種最高層的領導人的子弟，在清華附中有的是一些部級領導人的子弟。這也造成了日後清華附中紅衛兵的特點。”《北京之春》第41期，1996年10月。

是本章的重點，故不再追究。

一篇回憶文章記載了中學紅衛兵小組最早的串連、造反行動：“六月八日，在〔清華附中〕學校西側通往體育學院的路上突然出現了黑壓壓的一片、近百位騎自行車由城裏來支援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的幹部子弟。其中主要是在前兩年四清中就已經鬧得很凶的四中、八中的一些幹部子弟。據說有前文說的孔丹、孔棟兄弟，秦曉、王尚榮及薄一波的兒子薄熙成、薄熙勇兄弟等。清華附中的學生和校領導哪裏見過這種陣勢，校領導怕出事關了西校門。校門外堆積了幾百人，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前兩年剛剛切掉一個肺的副校長韓家鰲親自冒著烈日到校門外勸解外校同學回本校去，不要無組織地串聯，以免發生意外。但是這哪裏可能有效。‘十七級幹部，我們家有好幾個呢！」這是躡動人群中的一句調侃的名言，却真正代表了他們心底的聲音。在那些‘以天下為己任’的狂妄的幹部子弟心中什麼時候把基層幹部放在眼裏呢！”^[1]”

有關中學生紅衛兵造反的動機，這裏也不打算深入討論，但筆者認為下列觀察是大體準確的：中學生紅衛兵“憑著響噹噹的‘紅五類’出身，……不相信有人可以把他們打成反革命。他們這時唯一信奉的是毛主席號召的造反有理，有著在風暴中經風雨、見世面、煉紅心的想法。^[2]”另一方面，中學生的生活環境中也存在著很多壓抑、挫折的因素，使他們易于接受反叛的鼓動，特別是很多人感到以追求升學率、“分數挂帥”為代表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把

[1] 仲維光：《“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誕生史實》。

[2] 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p125。

廣大工農革幹子弟壓得抬不起頭來”，比如當時在清華附中上學的張承志，“不僅進不了預科班〔保證進大學的快班〕，而且要用課外時間補習數學，且無任何體育文藝特長，是在清華附中感到個性受到很大壓抑的一類學生。^[1]”

1966年7月中旬，毛澤東表示了對劉少奇、鄧小平主持文革運動的方法的不滿：“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的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有關“學生運動”的評論，自然被理解為：既適用於高校，也適用於中學。

五十天裏，在高校出現反工作組的學生群，他們成為後來的高校“少數派”、造反派，與此同時，幾乎平行發展的，是反對中學黨委或工作組的中學生革幹子弟，他們成為“老紅衛兵”的源頭。兩種“出身”不同的造反派的第一次相遇，可以認為是在七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大學東操場召開萬人辯論大會上。在這次大會上，不僅有保工作組和反工作組的兩派北大學生的發言，作為中學生代表的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成員彭小蒙，也作了發言控訴張承先、張德華（北大附中工作組組長）。

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文革小組在北京展覽館召開大會，宣布撤銷海淀區各中學工作組。據記載，彭小蒙也出席了這次大會，她慷慨激昂地上臺控訴，清華附中紅衛兵駱小海、曠濤生也上臺發言。會上，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小組成員把他們寫的“兩論”遞交給來參加會議的江青，請她轉交毛主席。衆所周知，此信得到了毛澤東的親自回復，回信不

[1] 仲維光：《“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誕生史實》。

僅熱烈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還點名熱烈支持北大附中的彭小蒙。

此時此刻，一個意義更加重大、影響更加劇烈的文字事件爆發了，這就是“鬼見愁”對聯的誕生。從事件對社會的衝擊速度、力度看，以“爆炸性”來形容這個文字事件恰如其分，從其他方面看，該事件也是極為奇特、獨一無二的。這不僅是由於對聯把極其豐富、極其當代的政治內容，濃縮于簡練、群衆喜聞樂見的中國特色的語言和文字形式，更由於：對聯所提出的命題，來自真實的社會土壤，來自活生生的社會現實和社會衝突，它是對主流革命意識形態的公然篡位和取代，而不再是簡單地模仿或重複官方意識形態話語和官僚標準操作程序——而這後兩者在以前經常是凌駕於社會現實之上的^[1]。

[1] 在對聯這種群衆極其喜聞樂見的中國特色的語言和文字形式之上，“鬼見愁”對聯更被譜曲（作曲者不詳），成為同樣為當時群衆所喜聞樂見的政治歌曲形式。以下是少數派傳單上所登載的一個版本，歌詞已經按照少數派的觀點修改過了：

鬼見愁

1=D 2/4

1 . 1 | 5 5 | 5 3 1 | 2 - + 1 . 1 | 5 3 | 2 1 6 | 5 - |
父 母 革 命 兒 接 班， 父 母 反 動 兒 批 判。
X X | X X 0 | X X | X X 0 | 6 . 6 | 5 5 | 1 5 1 2 |
(呼) 理 應 如 此， 理 應 如 此， 要 是 革 命 就 跟 著 毛 主
3 2 3 | 5 . 6 | 5 . 5 | 3 . 1 2 . 3 | 1 0 | X . X X X |
席， 要 是 不 革 命 就 滾 他 媽 的 蛋。(呼) 要 是 不 革
X . X | X . X | X X | X 0 X | X . X X | X 0 ||
命 就 罷 他 娘 的 官 就 滾 他 媽 的 蛋！

傳單落款、日期是：

北京師院“東方紅”大隊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11.7

“燎原”戰鬥團翻印 12.27。

有關對聯誕生的時間，大多數文字的一致記載是：七月二十九日，北航附中的紅衛兵貼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的對聯，四天後，北航附中紅衛兵把對聯貼到清華、北大、人大等高校。八月二日，北航附中紅衛兵近千人到清華游行宣傳對聯。印紅標提出更早的日期和不同的地點，他認為：“1966年6月，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傳出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7、8月間，開展了關於對聯的辯論。”并在註釋中說：“這是他“據採訪及收集的材料考實”，但未提供更詳細的資料^[1]。

圍繞對聯的討論所留下的最早的文字記載，包括下面兩個講話記錄，都是在對聯開始傳播的五天後：

《陶鑄同志八月二日在人民大學講話》中有這樣一段：“（陶鑄回答有人遞的條子）這個條子要我講的，是個對聯，是‘紅衛兵’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基本正確這個意思，是不是我今天不講，你們去辯論一下，好不好？（回答：好！）你們辯論一下，你們辯論以後一定比我回答的高明。”

和陶鑄的推脫回避不同，關鋒和張春橋在同一天作了正面的回答。《關鋒、姚文元、張春橋八月二日在國務院接待室的講話》記載，關鋒先談到：

“有人問〔對聯〕是不是江青說的，是同學提出的。對這個口號怎麼看？我們這個口號基本精神是爲了很好貫徹階級路線，要工作組依靠工農子弟、革幹子弟。有些工作組就不依靠工農子弟、革幹子弟，或拉攏一

[1] 《紅衛兵運動的兩大潮流》《二十一世紀》總第13期，1992年10月。

部分工農革幹子弟打擊另一部分工農子弟和革幹子弟，這些同學針對工作組的毛病提出的，精神是好的，的確他們在家受到很多教育，對黨對毛主席無限熱愛，另外一方面，地、富、資、反動派的兒女（當然不能一概而論）但總多少受到剝削思想的影響，他們的大部分與我們對黨的感情不大相同，甚至是仇恨的。口號我覺得不是這樣提好。‘老子英雄兒好漢’不全面，容易起副作用，革命子弟自然受到好教育，但是不是‘好漢’還要在革命的暴風雨中鍛煉，在鬥爭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這個口號對革命幹部子弟不利，形成了公式。將來不是會影響他們提高，不這樣提可能大批是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樣提不策略，不利于我們爭取可以爭取的人。我們儘量爭取更多的人。地富要爭取教育地富子女一樣。有的同學提得好。第一階級成份論，第二重在表現，這很好，這是同學提的，對不對大家討論。”

大概是會場騷動，或者有人遞條子表示不同意。張春橋接著發言說：“有的同學對關鋒同志的對聯解釋不能同意，不同意很好，繼續辯論，你說你是英雄好漢，就領導革命嘛，被人說成混蛋，你要革命，聽毛主席的話，共產黨不會杜絕人跟共產黨走的，總給他機會的，毛主席那裏說過不允許人革命？”

圍繞對聯最著名的一次辯論，大概就是8月6日晚的天橋劇場辯論會了。報告文學《老紅衛兵風雲夢囈錄》回憶當時的情景^[1]：

[1] 《中國青年報》1989年6—7月連載。

“大會由海淀區紅衛兵首領彭曉蒙 [原文如此；應爲“彭小蒙”] 主持。……參加會議的紅衛兵很多，整個會場擠滿了人。海淀區的紅衛兵威風極了。清一色，全部穿的都是當時最流行的革命服——發黃的舊軍裝。……彭曉蒙絕對是一個革命者的形象，她很瘦又架了一副眼鏡，穿一身發白了的舊軍裝，頭戴軍帽，腰束一根很寬的皮帶。說話非常老練。她突然提高了嗓門說：‘這，就是我們的江青阿姨！’

頓時會場狂熱起來。大家拼命地鼓掌。”

下面摘錄《江青同志在天橋劇場對“紅旗戰鬥小組”“紅衛兵”的講話》中有關對聯的部分：

我聽說你們爲一副對聯爭執不下，我覺得這は很好解決的。你們是爲了某一個具體的人，匆匆拿出來的，我想講一下“老子英雄兒好漢”是從那來的。有一出京劇叫《連環套》看過沒有？（答：沒有！江青同志笑）竇爾敦對黃天霸這個叛徒說的。他唱“老子英雄兒好漢”。我們老糾纏在這個問題上就沒法前進了。我們要隨時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我們現在有好多成語是過去的，你們不改我們也不勉強。你們請我們來了，我們出點主意行不行？既然革命就不怕有什麼錯誤缺點嘛！你們采納我們的意見也可以，或另外改也可以，我覺得這樣比較妥當。

父母革命兒接班

父母反動兒造反

理應如此

我們只做個建議，你們去討論。……

看一個人第一要看其階級立場。第二不要唯成份論，這是指某個階級的個別分子背叛原來的階級說的。

第三重在政治思想表現，不要看表面。（看一張條子後說）有一個外語附校的紅衛兵寫了一個條子，沒寫名字，叫我明確表態，同意不同意這副對聯。我不完全同意，道理也講啦，很簡單，那種封建術語不能代表新的思想，這是匆匆忙忙拿出來的^[1]。

同一個會上，康生的發言完全回避了這個爭議。

儘管中央文革小組等政治精英認為對聯與文化大革命不相關，甚或認為它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清除的“封建術語”，但對聯似乎具有一種難以解釋的魔力，緊緊地俘獲了中學生、大學生乃至全社會的政治想像力，似乎像一顆特別適合中國土質、溫度的種子，播撒在中國的任何地方都迅速地發芽瘋長，一個不再是由精英所主導和控制的論戰，成為群衆政治的壓倒性內容，直至發展成為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大角逐、大搏鬥。

在這場大論戰中涌現出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北京工業大學學生譚力夫。他在一篇與別人合寫的大字報《從對聯談起》（1966年8月12日）^[2]中，為對聯鼓掌叫好：“這幅對聯一出來，就幾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長好漢們的志氣，大滅混蛋們的威風。在修正主義長期統治下的工大，這一顆火星燃起來了熊熊烈火。”

[1] 有關江青這天的講話，在後來的一份談話記錄中有所提及，《中央文革小組與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座談紀要》（1967年1月4日）記載：“同學（談到對聯和江青八月六日的講話）：我們要看你的講話，他們〔顯然是指“血統論”觀點的老紅衛兵〕就保密，我們貼了三次，他們撕了三次。”還記載：李峰給康生同志寫了一個條子，問謝清泉是不是謝鎧忠的兒子？說他幹的兩件事。康老遞給江青，江青對謝鎧忠說：“回去讓你的兒子去派出所自首。”這時康生說：“那就是老子革命兒混蛋麼！”

[2] 原載上海市上海中學《思潮集》，1968年。

而譚力夫在一次辯論會上的發言，變成爲整個對聯論戰的定音符，這個發言成爲文革史上最重要的一篇文獻之一。譚力夫發言的意義，就在於把維護以對聯爲代表的“血統論”、維護工作組和維護老幹部聯繫在一起，淋漓暢快地表達了全國各地保守派、多數派心聲，成爲他們的綱領性宣言。

下面摘錄譚力夫的《在八·二〇辯論會上的發言》^[1]的著名段落：

“我看少奇同志講得對，只有我們下臺讓他們上臺。”

“有人對黑幫不恨，……可是，對工作組，對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對鬥工作組比鬥黑幫還帶勁。知道哪一個幹部犯了錯誤，就高興得不得了，大有雀躍之勢。看著共產黨的幹部犯錯，你高興什麼？！他媽的！（有人喊：罵得好！熱烈鼓掌）”

“反正權力還在手，我就敢罵人。罵完了，我挺著肚子，像個無產階級的樣子下臺。下臺也不能軟骨頭，不能像狗熊一樣，不能給無產階級丟臉！（熱烈掌聲）”

“我看只有工農革幹子弟有這個膽量，有這個本事，你們其他人誰敢？（熱烈鼓掌）看來還是‘老子英雄兒好漢’。（群衆：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熱烈鼓掌）”

可以看出，譚力夫的發言即興式地一氣呵成，充滿機智，展現了他高超的演說才能，以及對革命話語體系的嫋

[1] 又題爲《在工大一次辯論會上的發言》，（原載上海市上海中學《思潮集》，1968年）。

熟操縱。據記載，這篇數十分鐘的講話，引起了社會上的廣泛震動，使他成了全北京市乃至全國的知名人物。從長白山到海南島，從東海之濱到雲貴高原，到處都在流傳譚力夫的講話。僅福建省，在省委指使下，即在不長的時間裏複製了幾十萬份“講話”，由新華書店發行到工廠和農村，有的單位還硬性規定每天必須學習討論四個半小時“講話”內容^[1]。

這期間，如果不是在政治意義上，而是在視覺和聽覺效果上、符號象徵意義上最重大的一件事，是 8 月 18 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衆大會”，這是當時的稱呼，後來通常被稱作“八·一八檢閱紅衛兵”。命名的魔力，施加於歷史知識的生產，甚至成為改寫歷史的神奇之筆，這裏就是一例。被請上天安門城樓參加接見的，不僅有彭小蒙、卜大華、宋彬彬等中學紅衛兵，也有聶元梓等少數高校代表，前者“血統高貴”，且馬上就要成為“保爹保媽”派，而後者代表著平民出身的造反派，他們的旗幟將要寫上：反迫害、反特權。從這個意義上說，“八·一八”的意義是含混的、矛盾的（如同下文將要提到的聯動第一次大會上放映“八·一八”紀錄片所表現的那樣），這種含混只有在後來兩派陣營分明的衝突對立中才得到澄清。而“八·一八”的命名力量，就在於它把兩個對立衝突的陣營都歸類於“紅衛兵”之名下，這樣，兩派的本質區別就被掩蓋、

[1] 從一些原始材料中，可以感受到譚力夫講話所引發的巨大震蕩，比如：《就譚力夫發言問題訪問解放軍報社》（時間：1966 年 10 月 9 日；訪問者：南開大學物理大隊“東方紅”評論員等；被訪者：解放軍報社接待站劉詩），和《走訪人民日報編輯部》（時間：10 月 14 日；訪問者：化工學院“飛舟”戰鬥組；被訪者：周修慶）。

模糊了，含混的名稱，就為在事件、行為上的張冠李戴，時間、因果上的顛倒，打開方面之門。從這個意義上說，大部分以“紅衛兵”為主題的文革史學，是使文革歷史的渾水更加渾濁，更加令人捉摸不透。因此，本書沒有采用“紅衛兵”作為主要概念，而是採納了其他一系列概念對，這就是“領導一群衆”、“多數派－少數派”、“保守派－造反派”等等。

按照這些概念對去分析，“八·一八”之後，批判工作組屬於大學造反派的範疇，而“破四舊”基本上屬於“中學老紅衛兵”——保守派的範疇。但本章將略去對“破四舊”的敘述，這樣做不是因為“破四舊”規模不够宏大，對社會的破壞衝擊不够強烈，而是認為，“破四舊”基本獨立于文革群衆政治的“造反－保守”的二元對立，除了對社會邊緣群體的情緒化的暴力虐待之外，並不包含實質性的社會、政治矛盾衝突的內容；其次，“破四舊”在八月份以後的持續部分，從主要對財物的破壞演變為主要對人的迫害，因而也就進入“老紅衛兵”的“血統論”和造反派群衆反迫害運動之間的衝突範疇，而這將是我敘述的重點。我所關注的，始終是目的性的、理性化的群衆政治，而不是情緒化的、個人化的非理性發泄行為。當然，下一節的內容將有助于理解“老紅衛兵”在“破四舊”中的這種非理性發泄行為。

“高幹子弟要掌權”：階級路線與血統論

對聯是對特定的政治、政策、社會倫理的通俗和簡明的總結，它試圖概括在官方話語裏被稱為“黨的階級路線”的範疇。在文革開展之前，“黨的階級路線”不斷在教育領域、

文化領域裏強調，然而，同一時期內毛澤東對階級、文化問題上的那些離開經典定義的論述，也使階級的意義變得廣泛、游離而不確定，另一方面國家在學校裏的政策，比如在招生、升學、教改等問題上，也存在著搖擺和不確定性。雖然這些不是本章所關注的重點，但却是“血統論”對聯異軍突起地對“黨的階級路線”實行篡位的重要背景。

實際上，“血統論”所表達的情感、倫理，比國家政策範疇的“黨的階級路線”，更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分成三六九等的無情現實。在新中國這個力圖消滅階級差別的社會裏，存在著社會精英與非社會精英這樣明顯的區別，而社會精英集團不僅是一個高度緊密、高度同質化的內部小圈子、特權俱樂部，而且具有高度自覺的自我意識。

社會精英的自我意識又集中到以家庭為紐帶的事業、權力傳承關係。來看兩篇曾被廣為傳抄的高級幹部留給子女的遺囑。一篇說：“我希望你們百分之百的成為革命的硬骨頭，百分之百的聽毛主席的話，百分之百的聽黨的話，百分之百的作父母事業的接班人。……我們不希望我們的事業在你們手中斷綫，而你們要對得起父母，對得起先烈，對得起黨和毛主席啊！……你們的擔子重啊！要帶頭努力啊！我們總是要死的，我們事業的擔子就會擔在你們身上！”另一篇說：“你們的條件很好，你們懂得了不少外面年輕人不懂的東西，你們也知道這是政治上的優越性，你們千萬不要背上這個包袱，作危害人民的事。……你們要努力學習，好好鍛煉自己，做一個共產主義接班人，把黨交給你們的事業，勇敢地擔當起來，永遠跟黨走，永遠跟毛主席走。^[1]”

[1] 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p62-63。

這裏，老一輩革命者對自己革命事業的忠誠，和對自己子女疼愛袒護的私人感情，奇怪地摻雜結合在一起。

文革中群衆出版物廣泛報道了這樣一件事：1966年6月22日，鄧小平為了瞭解北大運動的情況，把在北大上學的兒子鄧朴方、女兒鄧楠召回家談話。當鄧楠提出了下鄉、下廠、當兵時，鄧小平說：“考慮問題要全面，要做當工農兵的準備，也要做掌握印把子、掌握政權的準備，要一顆紅心多種準備，以黨的需要作為第一需要。”“工農、革幹子弟掌權，這是一個方向。”

群衆出版物指控：鄧小平這番話為後來學校裏的血統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裏難以估計鄧小平這番話有多大實際影響。但大多數革幹子弟確實是把繼承父輩的權力、職位，等同于繼承革命事業、等同于黨的階級路線。

在1966年的“五十天”裏，血統論、“高幹子弟要掌權”的思想貫穿在高校和中學工作組的政策當中。比如劉少奇親自過問的師大一附中工作組，剛一進校就立即秘密召開部分高幹子女會，稱他們是“最可靠”、“階級感情最深”、“立場最堅定的左派”。不久，工作組就宣布五名高幹子女為工作組組員，後來又扶植了清一色幹部子女的革委會。劉少奇的女兒、高一學生劉平平就是工作組組員，後來又是革委會主任，都不是通過選舉產生的。劉少奇的另一個女兒、師大女附中初一學生劉婷婷也任該校革委會委員^[1]。

“五十天”結束時，工作組準備撤了，由誰來填補這個權力真空，是當時鬥爭的焦點。據記載：北京大學七月二十五日的辯論會（中央文革在會上建議撤銷工作組）散

[1] 《徹底砸爛劉少奇的反動血統論》，《兵團戰報》1967年4月27日。

會後，鄧朴方回到年級召集二十多個工農革幹子弟開會，說：“現在工作組撤了，工作組建立的一切組織作廢，黨支部也不存在了，目前我們必須實行強硬的階級路線，必須立即把一切權力奪到我們手裏來。”在這個會上，選出了以鄧朴方為首的三人小組，奪到了技術物理系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權^[1]。

在很多學校，更有人主張：在黨委癱瘓、工作組撤走的情況下，要成立新的“階級組織”——其實是指以工農革幹出身的學生組成的組織，來取代過去的黨委領導，從而實現“強硬的階級路線”。因而，是成立這種新的“階級組織”，還是通過普遍選舉成立巴黎公社式的文革委員會，成為當時的爭議的焦點。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文革小組明確表示支持普遍的選舉，而反對“強硬的階級路線”。

八月四日，江青在北大的集會上的說：“我收到很多信，剛才又收到很多條子，要成立貧下中農、工人、革命幹部出身子弟組織，我建議是貧下中農、工人、革命幹部出身子弟積極參加你們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或者革命小組，不要再搞那些分裂活動，再上他們的當，我懷疑你們又要上壞人的當了。”康生接著發言說：“關於工農、幹部子弟建立組織問題，江青同志講了，我完全同意同志們的心情。教育界要貫徹階級路線這是好的，使工人，貧下中農子弟不再受歧視、打擊，這種心情我完全理解。……學校有沒有階級組織？有，就是共產黨和共青團，……問題是……黨團組織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能起作用，如北大的黨委癱瘓，

[1] 《鄧小平及一家文化大革命中部分活動大事記》，新北大公社 02621 支隊編《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4。

青年團也癱瘓。不能因癱瘓另外成立一個階級組織，工農革命幹部出身的同學有任務徹底改革這個組織。是否另有組織，江青已經講過了，在實行階級路線，通過黨綱，不要再建立一個組織，如果建立這個組織，可能使自己孤立起來，分裂我們。……左派、革命幹部子弟你們有一個危險，要時時刻刻警惕，不要脫離群衆。毛主席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信中談到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接班人的五個條件的〕第三條是很重要的條件〔即：能够團結絕大多數的人一塊工作，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還要善于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并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我很欣賞李洋洋的一句話：‘我要站在群衆之中，不是站在群衆之外’。現在的任務不是成立貧協，是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李洋洋和 X X X 講得好，上次我還批評了他們，相隔幾天，他們就覺悟了，青年人覺悟要比老年人好得多。”

周恩來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他八月五日凌晨在清華大學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說：“有同學遞條子問，說你們組織了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子弟協會，問對不對，上午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文革小組開會討論，說黨在學校中的政策不是這樣的。^[1]”

實際上，即使不成立“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子弟協會”，高幹子弟在八、九月份也依然掌握著清華大學的文革大權，即對所謂“三臨”——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總部、清華大學文化革命領導小組臨時籌備委員會和清華大學紅

[1] 分別見：《江青、朱德、康生同志在北大批判張承先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8月4日；《周總理在清華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的講話》（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凌晨）。

衛兵臨時主席團——的控制。一份材料開列了這期間清華大學高幹子弟掌權的概況：

劉 濤——劉少奇之女，校“文革”臨時籌委會付主任、校臨時主席團和清華大學紅衛兵主要負責人之一，自控系“文革”主任。

賀鵬飛——賀龍之子，校“文革”臨時籌委會主任，校臨時主席團主任委員，機械系“文革”主任。

李黎鳳——李井泉之子，校“文革”籌委會、臨時主席團及清華大學紅衛兵主要負責人之一，工物系“文革”主任。

劉菊芬——劉寧一之女，清華大學紅衛兵總頭目。

喬宗淮——副外長喬冠華之子，偽“三臨”（校“文革”臨時敵委會、臨時主席團、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總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數力系“文革”主任。

胡勁波——胡克實之子，機械系“文革”負責人。

王新民——王維舟之子，偽“三臨”的負責人之一，無綫電系“文革”負責人。

王蘇民——四機部部長王錚之子，偽“三臨負責人之一，無綫電系“文革”負責人之一。

該材料還報告：“北京的大中學校，特別是高幹子弟集中的或劉鄧直接插手的幾個學校清華、北航、師大一附中、師大女附中、景山中學、女一中、北大附中、二十六中、十一、八一、一〇一中……幾乎或大部都是高幹子弟掌權。劉少奇的兒子劉允若在七機部原是工作組紅人。劉允真在豐臺農業學校被安排為臨時團委書記，參加了工作組；……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師大女附中，原來連班代表也不是，也被安排為革委會委員。女兒鄧林在中央美術學

院被安排為革委會副主任；鄧的兒子鄧朴方在北大技術物理系學習，原候補黨員，也被王任重內定為北大校黨委委員。此外像賀龍的幾個孩子，賀鵬飛在清華、賀捷生在北航、賀迎明在景山中學。趙如璋的兒子趙丹平在京工附中，鄒家尤的兒子鄒建平在京工附中，孔原兒子孔丹在男四中、張鼎承之女張梅妹在女一中，張文舟的女兒張蘭蘭在女三中，陳毅的兒子陳曉魯在男八中，安子文的兒子安國在石油附中……一個個都當上了‘紅衛兵’或革委會的頭頭。^[1]”

下面，來看兩例外地黨委是如何執行他們心目中的“黨的階級路線”的。

根據一份材料，1966年9月6日，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對重慶的“紅五類”學生說：“從今天起，一切權力歸‘紅五類’，你們大膽地幹吧！他們不敢搞你們‘紅五類’的，就用你們‘紅五類’的隊伍衝，衝出一條‘紅綫’來。只要你們搞起來，只要你們搞得好，把他們〔指造反派〕中的‘紅五類’瓦解過來，這樣他們就只是些‘黑五類’和其他出身的了。爭取十天時間左右，扭轉重慶市的形勢。”9月18日，李井泉在接見紅衛兵時，又說：“炮打司令部最積極的，都是‘紅五類’打旗幟，黑五類在幕後指揮。對反動的傢伙，只有和他們鬥。我們殺了他們的老子，和他們的老子結下了仇；你們殺他們的兒子，和他們的兒子結下了仇；他們還有兒子、孫子！我們和他們鬥一輩子。”在另一次接見時，反覆說：“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挑你們‘紅五類’，經過這次文化大革命的鍛煉，在將來你們接了班後，你們就知道你們的對手是誰，也就會鬥爭了。”

[1] 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資料選編》。

且看是如何鬥爭的：白紫池、肖菊人按照廖志高的指示，于 1966 年 8 月 29 日在東方紅禮堂召開“紅五類翻身大會”，會前翻印了五千份《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會上請了清華附中等校七個紅衛兵作報告，公開介紹了所謂鬥爭“黑五類狗崽子”的經驗，向全市傳播了“自來紅”、“自來黑”、“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等血統論觀點，公開宣揚武鬥。當場打了一個學生，趕走了一個不鼓掌的聯絡組長。大會上還提出‘黑五類’子女是專政對象，提倡打鬥‘黑五類’學生，‘黑五類’學生滾出去等等。廖志高還派人在大會上宣布‘省委負責同志要接見這七位同學’，以表示對大會的支持。會後當晚，不少學校就發生了鬥學生，致使不少學生慘遭毒打的嚴重流血事件。

9 月 1 日，廖志高對四川省文革成員指示：“要迅速組織和壯大以‘紅五類’為主體的紅衛兵，要成立紅衛兵總部。”紅衛兵的任務包括“保衛機關”。省文革大學組的余之光和張廣欽出面組織了“大專院校紅衛兵指揮部”。9 月初，李井泉指示要宣傳“送子參軍”（即參加官辦紅衛兵），並說：“這與革命戰爭時農民送子參軍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四川省委還學習西糾的經驗，挑選了幾百名身強力壯、出身好的紅衛兵，組成了紅衛兵糾察隊，要求他們執行公安局對造反派專政的任務。一位領導人說：“紅衛兵糾察隊成立之後，由軍事部門或公安部門輔導挂鉤和配合。因為文化大革命不能動用專政工具，所以紅衛兵〔指紅五類紅衛兵〕特別是糾察隊行使某些職能……”

9 月下旬，省委更進一步給一些高幹子弟布置成立

“紅衛兵糾察指揮部”。先組織五百人，培訓成紅衛兵骨幹。糾察隊除了政治條件“紅五類”外，還要身強力壯，個子高大。還配備了汽車，哪裏有事就可立即趕到，以便圍攻造反派^[1]。

第二個材料是有關天津市的情形。大約八、九月間（原文有關日期不詳），天津市出現了完全中學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聯絡站，但市委認為聯絡站裏有造反力量，因此成立了另一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完中聯絡站”。新成立的聯絡站從一開始就被市委所操縱，幾次聯絡站成立籌備會上，每次都有市委的人，而總是參加意見，每次會後，完中聯絡站臨時負責人鬥要徵求一下市委使者——方光宇和另一位人物的意見，而他們也總像個顧問式的說上兩句。市委對聯絡站的直接操縱者是方光宇、李德林，幕後的操縱者是趙武成、杜長天（市完中文革辦公室主任）、徐光等。聯絡站成員和市委高級人物有著非一般的關係，有：杜長天的女兒杜XX、李權超（市委候補書記）的女兒徐X。另外趙武成的兒子趙XX，萬曉塘的兒子萬XX等也都是各校紅衛兵的負責人。在市委操縱下的完中聯絡站裏，壓制不同意見的發表。比如有人對市委的人總參加會議提出異議，結果被排擠出來。天津市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糾察隊也是在公安部門的扶植下成立的。市裏派了四個公安人員來幫助訓練，成了糾察隊的直接操縱者。有的糾察隊員經常打人，市委非但不制止，反而還贊揚。國慶節糾察隊執勤，市委先報告了情況，說要保衛要害部門，如：幹部俱樂部，

[1]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徹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夥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成都打李總站教育系統聯絡站《教育革命》1968年第6期，p44-47。

勝利橋，賓館等，最主要的是保護市委。于是調了一個連的糾察隊來保護市委，據說這一個連是所謂心腹連，盡是市委人員的孩子和高幹的孩子。聯絡站還下了一個通告：“黑七類”子女一律不准外出串連，串連的帶出身證明^[1]。

高幹子弟與特權

下面，我們要考察血統論思想、“高幹子弟要掌權”思想的社會基礎。這不僅牽涉到一個特權階層在生活方式、教育、政治經驗上的優越，而且更主要的是，關注一種逐漸形成、逐漸鞏固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社會關係——儘管筆者試圖避免用傳統意義的階級概念來概括“高幹子弟與特權”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特別現象，但從這個社會特權集團的產生和再生產的特點來看，它非常接近一個正在形成的“新階級”。

這個社會特權集團再生產的兩大溫床，一個是高幹家庭，另一個是幹部子女的教育環境。先來看後者。

根據有關材料介紹：解放後的幹部子女集中寄宿制學校，是從革命戰爭歲月老解放區的幹部子女學校轉化來的。解放後曾試圖取消，但仍然保留下來，而且發展成為事實上的“貴族等級”的學校。比如：北京“育英小學”只收司、局長以上和大使、參贊的幹部子女；“八一學校”、“十一學校”收的是將、校級幹部子女；“香山慈幼院”收的是“民主人士”、“社會名流”的子女，等等。

[1] 《揭天津市委在原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完中聯絡站所幹的罪惡勾當！》，天津中學紅代會《中學紅衛兵》1967年5月4日。

幹部子女學校普遍特點是“三多”：一是“人多”。這類學校教職工與學生的比例一般是 $1:5$ — $1:7$ 。而一般的學校是 $1:28$ — $1:35$ 。二是錢多。幹部子女學校每年開支達幾十萬元。如“八一學校”是三十多萬元，相當于北京郊區大興縣龐各莊小學每年經費一萬二千元的二十五倍，而學校鐵工廠和菜園每年幾萬元的純利潤還不包括在內。國家每年對每個學生的補貼是 $140 - 250$ 元，而一般小學是30元。三是“物多”。幹部子女學校普遍佔地廣大，校舍造價昂貴。像“十一”學校，每個學生佔20平方米建築面積，而一般小學只有2.5平方米。校舍優美，建築華麗、設備完善。連蘇聯“專家”都驚嘆他說：“在我們蘇聯，海軍子弟學校是最優越的，但你們育英學校比我們海軍子弟學校優越得多了。”學生在這裏，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吃飯的時候，教師要在旁邊照料；洗臉洗腳有人催；回家返校，有大小汽車接送^[1]。

而高幹子弟的優越生活，更多地來自其家庭環境。請看下面的描述：

一些幹部子女，尤其是一些高幹子女，在生活上享有種種特權。在住的方面，他們住的地方，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冬有暖氣，夏有電扇，有的一人住一個單間，并有褓姆侍候；在吃的方面，他們吃的都很好，大米白麵不在話下，就是鷄鴨魚肉也是家常便飯，什麼山珍海味也不足為奇，而最特殊的是，他們在幹部子女集中寄宿制學校吃飯不定量，即使在國

[1] 《在幹部子女學校問題上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劉氏幹部子女學校是封、資、修貴族學校的翻版》，原載《春雷》砸爛幹部子女集中制、批判“聯動”思潮專刊續編，1967年12月；首都八一學校東方紅公社主辦。

家困難時期，在全國人民“低標準，瓜菜代”的情況下，他們仍然不定量，放開肚皮吃；在行的方面，他們上學，回家，看戲，可以坐父母的小轎車，司機隨叫隨到，“前幾年，八一學校一到星期六，接學生的小轎車源源不斷開進來，有時多到學校擠不下，只好從學校一直排到海淀大街上”，這麼多的汽車，交通警也不得不趕來學校維持交通，指揮車輛，更有甚者，有的幹部子女還可以坐軍用飛機去串連，可以隨便曠課坐軍用飛機到廣州、延安游逛；在用的方面，不少幹部子女有手錶，自行車，照相機，半導體收音機，平時用錢更是大手大腳，有的甚至揮金如土，一個學期花上幾百元，去年串連，八一學校有個將軍的孩子，一個多月竟花了二百元；在醫療方面，他們看病也享有特權，有一年將軍以上的幹部注射一種預防腦炎的針，將軍孩子也同享注射的權利，其他的孩子只能望洋興嘆；在節假日生活方面，有的高幹子女，暑假可以到北戴河、青島消夏，寒假可以到廣州避寒，八一建軍節和春節可以到人民大會堂參加軍民大聯歡，五一、十一晚上可以上天安門城樓觀看焰火；在玩的方面，有的高幹子女可以到養蜂夾道高幹俱樂部去玩，那裏有高、精、尖的文體設備，孩子與老子同享高等待遇，在這裏吃飯、理髮、洗澡、游泳、釣魚、看內部電影及參加各種游藝活動^[1]。

還可以看一下對高幹家庭生活的更貼近的觀察：

[1] 《特權與“聯動”反動思潮》，原載《春雷》砸爛幹部子女集中制、批判“聯動”思潮專刊續編，1967年12月；首都八一學校東方紅公社主辦。

“他〔賀龍〕和薛明對兒女們嬌生慣養的程度，的確像外面傳單上所說的：‘賀龍對小龍（即賀鵬飛）除了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沒法給他搞到以外，小龍要什麼給什麼’。他們從小就培養小龍玩這、玩那，他現在除了沒學開飛機外，什麼騎馬、開摩托、開汽車……都會，有時小龍就和李井泉的兒子開了汽車上郊外打獵作樂。每星期六放映什麼電影，都要等兒女們回家點頭同意。小龍睡覺了，周圍的人在老遠就要小聲說話，連打掃衛生也不能搞了。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結束後，國內打乒乓球風氣很盛，那時小龍也心血來潮要打乒乓球，家裏就專門為他修了一個乒乓球房，把原有的兩個房間打通，把地板、牆壁重新裝修，挂上絲絨窗簾，布置的和健身房一樣，并指定把冠軍桌（即莊則棟奪得冠軍的桌子）從體委搬來。球衣、球鞋、球拍，紅雙喜乒乓球那就更不成問題了。並且叫世界名手XX去給他陪練。^[1]”

優越的生活方式和環境，培養著優越的自我意識。一篇文章評論說：“由於他們出身的關係，他們可以進入所謂‘幹部子女小學’（典型的修正主義學校），或其他具有種種特權的學校。他們進出都有小轎車或專車接送，聽到的是一片頌揚聲，得到的教育就是‘將來當總理、元帥、部長’而決‘不能去種地、做工、賣醬油醋’。既與世隔絕，又凌駕于世，樣樣與衆不同，幼小的心靈裏早已埋下了‘非凡的，自視高貴’的種子。在那樣的學校裏，不少人以自己

[1] 《我要控訴反黨篡軍大頭目賀龍》，北京工農兵體院毛澤東主義兵團《體育戰線》1967年2月9日。

的出身炫耀，互相比父母的‘官’職。從那樣的小學出來，然後穩篤篤地上中學和大學。在這樣的學校裏，很容易入團入黨。由於出身高貴，教師，校長也樂得巴結，許多人就以本校本班高幹子女多而覺得光彩，這愈發使他們自視高貴的心理得到滋長。他們還有著其他許多特權，別人沒有的東西，他們能有；別人不能去的地方，他們能去，他們可以看內部文件，可以看內部電影（多半都是一些色情的，頹廢的），常有小道消息，甚至可以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意志……，這一切都與衆不同。由於舊的習慣勢力的影響，人們往往把他們看得了不起，他們往往也因此而產生‘血統高貴’的思想。^[1]

請看一段反映出高幹子弟“血統高貴”心態的維妙維肖的自白：

有人污穢我們是“自來紅”，崽子們：你們的污穢是我們的光榮！你們說對了！要問老子是哪一個，大名就叫“自來紅”，我們從小長在紅旗下，成長在紅色部隊家庭環境中，從小飽受了紅色革命的教育，我們的老子跟著黨，跟著毛主席從槍林彈雨中闖出來的，他們對黨對毛主席最熱愛，並且從小就這樣教育我們，所以我們從小就對黨和毛主席有最最深厚的感情，最最熱愛毛主席。老子的革命精神時時刻刻滲入我們的體內，我們從裏到外都紅透了。“自來紅”正說明了老一輩革命者的傳統怎樣傳給了革命的後代！我們是純粹粹的無產階級血統，我們受得是地地道道的革命

[1] 向東輝：《高幹子女的特權思想與資本主義復辟》，原載《春雷》砸爛幹部子女集中制、批判“聯動”思潮專刊續編，1967年12月；首都八一學校東方紅公社主辦。

教育^[1]！

不僅自我優越意識佔據著高幹子弟的頭腦，“高幹子弟優越”的意識也侵佔了整個社會的頭腦。有人分析說：“幹部子弟在同學中具有較高威望也同當時的社會文化心理有關。由於新中國的建立，使廣大勞苦群衆翻了身，生活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這使得廣大群衆對共產黨和第一代革命者們的尊崇和愛戴油然而生，同時，群衆也相應地把對黨和老幹部的這種感情移植到他們的後代身上。在青年學生中，也是這樣，在那個年代裏，常常可以聽到有人以‘我和X X X的兒子同學’為榮耀。當然，其中不能排除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官尊民卑等級制度所造成的心靈趨勢，即使在幹部子弟的寄宿學校，如‘八一學校’中，學生們也互相攀比誰爸爸的官大、誰爸爸坐的轎車高級，還出現過‘誰爸爸的職位高就聽誰的’這類事情。^[2]”

而在批評意識比較強烈的觀察者那裏，特別是文革群衆運動中的造反派那裏，高幹子弟的優越生活和優越意識，實際上已經構成了和普通群衆之間的一種不平等關係、壓迫關係。署名“新四中公社 1216 紅衛兵”的文章《這就是“特權”！》代表了這樣的激進觀點，它揭露了特權、優越之下的霸道、壓迫本質，行文當中以“他們”——“我們”、“你們”——“我們”這樣的對立，展現了社會已經發生對抗性分裂的無情現實：

他們在家庭小天地的封邑中，以小公爵自居，和享樂結下了不解之緣，養尊處優，唯我獨尊，對一切

[1] 清華附中紅衛兵：《自來紅們站起來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兵團戰報》，1966年11月26日。

[2] 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p132。

發號施令，聽到的只是一片唯唯諾諾之聲。他們可以逞性妄爲，甚至薄一波、彭真的孩子竟打罵公務員、打傷眼睛、打壞胳膊，仗著父母的名氣，別人只能忍氣吞聲了。

他們憑著父母的特權。夏天，帶著從學校請來的補課老師，到北戴河、青島等名勝地方極舒服地休養。這是他們得意的時刻了。在海濱，由警衛員下水保護著這些少爺們游泳。在極豐富的物質待遇下，消磨時光，紙醉金迷的生活，使他們流連忘返。該過“十一”了才想起了回家。冬天，他們則又在廣州的陽光下，趾高氣揚地和國家女籃賽球了。過去只有封建帝王才能在行宮裏避暑，避寒。那麼今天這些特權的顯赫人物，又可以享此清福了。

更有甚者，彭真去南寧開會，帶著女兒，曠課兩個月游山玩水盡飽眼福。什麼桂林山水、陽朔風景，全不在話下。回到學校，領導替她遮掩，毫無斥責之意。而劉XX跟著父親視察，看虎門炮臺。百米跑11秒多的這位少爺，竟然也能住在亞洲療養院裏“休養”。這一切不是特權又是什麼呢？儘管四中紅衛兵的“解放全人類”報，巧舌如簧，但這些事實就是你們這些人據為己有的特權。而廣大工農子弟在特權二字上，與你們是沒有絲毫共同之處的。

憑著你們的特權，進出民族飯店大吃大喝，去高幹俱樂部鬼混，去看色情電影，……西糾薄XX心血來潮請來驢販子黃胄，窮極無聊地學畫驢。他要練打槍，院子裏立即成了靶場。如此醉生夢死的生活還不能滿足他們的奢望，他們還要享受老子的政治待遇，中央

的絕密文件，他們能隨意瀏覽。這大概就是他們“天性高尚，學識淵博”“政治目光敏銳”的來源所在吧！

四中曾有個品質惡劣的李XX，竟然動用父親的職權威脅一個批評他的教師：“讓我爸爸撤了你的職！”這多麼深刻地描繪出了一個特權人物的醜惡嘴臉啊^[1]！

雖然沒有實證研究數據，但可以相信，高幹子女作為一個社會集團，以極高的比例複製了其父母的特權地位和社會交往方式。高幹子女的小圈子內部，實際上就是他們父母那個小圈子的翻版——官本位的等級秩序，老上級、老部下、老同事關係錯綜的人際網。高幹子女在文革中的結社方式顯示了這一點。比如，一些材料揭露：聯動（北京高幹子弟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成立的組織）在組織內部規定了森嚴的等級制度，從他們佩帶的袖章可以看出來。袖章上質量分級（呢、絨、綢、緞、布五種）尺寸分等。按照其出身的不同，老子官職的大小等分帶各種不同的袖章。例如X女中一個班四十八人就分成了三級九等（“紅五類”、“紅外圍”、“黑七類”）。另外，某些聯動分子為了證明其老子官職的大小和自己血統的高貴，還把其父母過去已廢除的軍銜（肩章、領章、軍帽）從家偷來作為憑證^[2]。

來自家庭和社交的優越感，直接轉化為政治立場，對50天之後形成的政治分野，表現出了迅速的、強烈的敏感。比如一份鉛印的（這期間鉛印的群衆出版物還少而又少，除非有很強的官方背景和支持）的傳單《告工農革幹

[1] 新四中公社1216紅衛兵：《這就是“特權”！》原載《春雷》砸爛幹部子女集中制、批判“聯動”思潮專刊續編，1967年12月；首都八一學校東方紅公社主辦。

[2] 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資料選編》。

子弟書》，就表現了這種強烈的敏感，它憤怒指責“許多資產階級狗崽子，偽裝紅衛兵，把矛頭指向老革命幹部”，傳單用那些充滿激情的、帶強烈情緒色彩的詞彙為老革命辯護，戰略性地使用了所有的關鍵套話，比如“紅色江山是誰打下的？在那戰火紛飛的年代，……不怕坐牢入獄，……面對敵人帶血的刺刀，……二萬五千里長征，爬雪山，過草地，……今天，……他們雖然白髮蒼蒼……”，“我們的老前輩，打下了江山，我們的老前輩保衛著政權，他們最聽毛主席的話，最愛讀毛主席的書，他們是黨的馴服工具，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是人民的勤務員。”接著，傳單警告說：“要謹防有人趁機把所有的黨員都搞臭，把各級領導都打成黑幫，甚至對老革命幹部下毒手。”并大聲呼籲：“紅五類子弟，趕快行動起來，千萬不要上階級敵人的當。”^[1]

“西城糾察隊”和暴行

“破四舊”是老紅衛兵的代表行動，然而其中政治衝突成份不多。老紅衛兵參與的最早的有政治鬥爭意義的集體行動，很可能是清華大學“八·二四”事件。在前面的章節裏，我曾經談到清華“八·二四”事件，并且認為這是對整個文革都有重大衝擊影響和標誌意義的群衆性事件，該事件明白無誤地說明：文革中對劉少奇的公開揭發，至少從一九六六年八月就出現了，而且完全是群衆自發的性質，却遭到了保守派的暴力血腥鎮壓。這裏，再根據一份

[1] 傳單的署名是“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化工學院附中紅衛兵，日期為1966年8月30日，并註明“北京市印刷機修配廠全體革命職工翻印”。

材料，對中學老紅衛兵在清華“八·二四”事件中所扮的角色作進一步說明。一份題為《八·二四事件是怎麼回事？》的材料，是迄今我所看到的有關該事件的最詳盡資料。資料顯示：“八·二四”大規模鎮壓造反派的行動，是清華大學以高幹子弟為主的多數派（臨時籌委會、八九串連會等）和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等中學紅衛兵共同決策和執行的^[1]。

鎮壓行動的集結、動員是在清華附中進行的。材料記載：8月24日下午1:00：清華附中宣布戒嚴，本校同學不讓出，外校同學不讓進。1:30：在附中教學大樓五樓大教室召開紅衛兵紅五類子弟緊急會議。有問題的紅五類子弟（包括曾向附中紅衛兵提過意見的）不許參加。2:30：會議散，紅衛兵領毛筆寫標語：“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堅決打退王八崽子，免崽子的猖狂進攻”“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等。約3:00：十二校的中學紅衛兵隊伍陸續開進清華附中，步伐整齊，軍紀嚴明（原定3:00開始行動，因故順延）。從開始集結到開會前，附中用大喇叭廣播：“清華大學所謂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清華大學反工作組的少數派組織〕的混蛋王八蛋們，限你們15分鐘內滾出清華附中，否則一切後果由你們負完全責任！”廣播後未見有“混蛋”“王八蛋”退出。清華大學紅衛兵姍姍來遲，最後開進了附中，共約150人。

大約4:00：十二校紅衛兵在附中教學大樓前集合約2000人（附中非紅衛兵同學關在大樓內不得外出）。誓師大會開始，改用小喇叭（聲音小），賀鵬飛登臺講話，要點是：

[1] 《八·二四事件是怎麼回事？》清華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東方紅公社合編：《清華大學大字報選編》，1966年10月7日。

一、清華大學有一股歪風。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把矛頭直接指向黨中央、毛主席，藉以達到自己卑鄙的目的。二、要去保衛黨中央、毛主席，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三、先看守住大字報，通令限作者二小時內撕掉，否則後果嚴重。四、把大字報作者記下來，把大字報照相或抄下，以後算賬，再移至內部館。（有人遞條：“爲了區別外校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與清華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希發小紙牌。”說也奇怪，遞條子以後，“紅衛兵”小紙牌馬上就生產出來了。）接著，劉菊芬登場講話。當她說到：“[在清華]有人還說：選舉新革委會，幹部子弟不許超過兩人……”話未說完，即出現爆炸性氣氛，聽衆義憤填膺，磨拳擦掌。然後，由清華的“高個子”對作戰計劃作了周密部署：“到大禮堂前先戒嚴，把大字報圍起來，然後照相……”。附中革委副主任張小冰講了幾句注意政策等。大隊出發前，劉菊芬宣讀了一個《聯合最後通牒》：“清華大學的資產階級狗崽子們，你們把矛頭指向黨中央毛主席，真是罪該萬死……你們不是說‘捨得一身剮’嗎！那麼我們就給你們一身剮！”念畢問大家“同意嗎？”在掌聲和同意聲中全體通過。

4:50：十二校紅衛兵跑步進入清華園，包圍大禮堂（清華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正在裏面開會），“八·二四”事件爆發。

材料對“八·二四”行動的事先決策過程沒有定論，但調查到：師大女附中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某戰士曾去清華大學臨籌，說：你們這些大字報〔指批評劉少奇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的大字報〕應該馬上轉入內部館，讓這麼多狗崽子看，太不像話了。賀鵬飛說：你跟我們觀點完全一致。清華紅衛兵總部及臨籌也有人說：是師大女附中等幾校發起的，我們同意。材料作者訪問了師大女附中總部，得到

回答是：24日，清華大學紅衛兵總部邀請我們參加一次重要的戰鬥任務。要求派政治上絕對可靠的紅五類子弟。中午，清華派了一輛大卡車來接我們（此車是租的）。但我們上了車，仍不知道去哪，去幹什麼。

清華“八·二四”事件的獨特之處在於：這是大學多數派和中學紅衛兵進行聯合行動的幾乎唯一的記載。“八·二四”還標誌著中學紅衛兵的行動重點，從破四舊、抄家等，轉向了實質意義的政治鬥爭，即在集體行動當中，和執不同意識形態觀點的群衆團體展開面對面的對抗。清華“八·二四”事件後的第二天，帶著強烈的血統論和高幹子弟色彩的中學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成立了，這顯然不是巧合。要麼是：“西糾”被“八·二四”行動所催生出來，要麼是：即將誕生的血統論御林軍，藉“八·二四”進行了一場熱身訓練。

按照群衆出版物上的兩篇文章的說法，西糾的前身是石油部的官辦紅衛兵——“猴子兵”，而成立後一直受到石油部、市委、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等國家機關及其高級官員的支持。以下按照有關資料復原出西糾成立的細節：

早在運動初期，余秋里、康世恩等人就指示他們的心腹宋惠（石油部辦公廳副主任）和梁健（石油部直工部副部長）等人積極組織“猴子兵”——石油部幹部子弟紅衛兵。宋、梁的兒子就是“猴子兵”的頭頭（也是以後“西糾”的小頭目，余秋里的女兒余園園也是“西糾”隊員）。在“西糾”成立以前，這些人就經常出入宋惠的辦公室，活動頻繁。為了便於他們的活動，宋惠還指使行政處給“猴子兵”安

排了兩個房間“辦公”，裝了直通電話^[1]。

1966年8月25日，31個中學的紅衛兵代表在師大女附中集會，正式成立西糾，由四中、六中、八中、女三中負責起草成立宣言，并責成上述四校在西糾中負主要責任，其中有四中一個所謂機動連。西糾總部的負責人是：孔丹（四中）、王XX（四中）、趙XX（四中）、陳曉魯（八中）、董XX（六中），“十一”以後，郭冀豫、蘭小兵、駱小峰升為要員。西糾董XX等人曾找過市委高XX的秘書，要求派解放軍去作政治指導員，于是雍文濤將此事告訴了紅衛兵西城聯絡站負責人、總參的李XX，後因西糾許多人不願意受人“管”，于是沒派^[2]。不久，東城糾察隊、海淀糾察隊也成立了。

西糾的《成立宣言》和《第一號通令》，是石油部辦公廳副主任宋惠親自起草和審定，并將草稿交研究室的人，連夜去《工人日報》社排版，後由石油印刷廠、XX日報社印一萬五千份。宣言和通令的印刷費用，也經宋惠批准全部由石油部開支。《首都紅衛兵糾察隊員守則》是周榮鑫手下要人李夢夫（國務院秘書廳主任）的大作。

材料說：西糾手眼通天，自一成立，上自國務院，下至市委派給的物資源源而來。開列如下：

高XX（市委書記）：“借”電話二部；

[1] 《把“西糾”的後臺余秋里揪出來》毛澤東思想哲學社會科學部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聯絡委員會紅衛兵聯隊《進軍報》1967年4月1日。文中多處出現《XX日報》，經過上下文對比，應為《工人日報》，已經改正，其他數處可能是指《人民日報》，但沒有改正，如有訛誤，責任在筆者。

[2] 首都新兵：《把反革命組織“西糾”拿出來示衆——西城糾察隊罪行錄》，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報》1967年3月9日。

周榮鑫（國務院秘書長）：“調借”物資一批

（一）車輛：大卡車二部、吉普車二部、摩托車一部；

（二）物資：軍棉大衣六十件、軍被一百八十條、軍墊二百八十塊，擴音機四臺，火爐五十個，炊具（一百人）全套，大小沙發八件；

（三）經費：自九月九日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共開支八千一百二十元。其中主要項目：汽油（三千三百三十五元）、電話（八部）、袖章（五千一百四十個）等，此外尚有“暫借”款四百元。

《工人日報》幫西糾印通令，而以國務院印刷廠最為積極，通過周榮鑫、許明的關係先後印了六至十三號通令（其中六、七號是西糾頭目孔丹、秦X直接接洽）、《首都紅衛兵糾察隊員守則》、《歌頌32111》、《做老紅軍的好後代》、《國慶獻辭》等。並給“整風聲明”和另一通知排了版。《工人日報》社也很賣力氣，排印了《成立宣言》、《第一號通令》、《整風文件》等。

西糾主辦的《紅衛兵報》原為六中所辦，後經西糾討價還價，六中同意從九月初（第二期開始）起轉交西糾。四中派出秦X、戴XX等去任編輯。出的幾篇文章多是“保”字號的，或是宣傳血統論。後西糾頭目孔丹不同意辦報（原因是效果不如通令）才繼續由六中辦此報，至十一月多。在出版過程中，北京市委大加嘉獎。九月二日，四中派路XX等人去找市委高XX，高代表市委把紙、經費全包下並派秘書馬X去《XX日報》社聯繫印刷之事。

除了北京市委的扶植外，石油部的官員對“西糾”也關懷備至。余秋里對“西糾”的一份《紅旗戰報》（以七中名義出的）極為重視，指定研究室兩位幹部為其編排稿件，

大樣則由宋惠親自審閱修改，并在石油部印刷廠印刷。同時，石油部又專門撥了一輛嘎斯六九卡車供“西糾”使用。

石油部不僅在物質上支持“西糾”，在政治上也特別優待他們。大慶的XXX來京，石油部設宴招待，余秋里通過宋惠也把“西糾”隊員請來一起“歡宴”。幾天後又請XXX給“西糾”作了一次報告〔這裏“XXX”可能是指王進喜——筆者註〕。32111鑽井隊來京，在石油部作了兩次報告，也都有“西糾”的幹部參加。更有甚者，大慶職工家屬宣傳隊來京參加國慶彙報演出，宋惠也竟然請“西糾”三十餘大小頭目，對宣傳隊的節目加以“審查”。

西糾甚至參與和取代國家機器的鎮壓行爲：西糾的審訊室曾設在西城分局，並且西糾在西城分局有代表（六中的吳XX）。西城分局有些人對西糾說：“你們不要在公安局打人，因為這是專政機關。可以在外邊打人，在外邊打人我們不管。”六中西糾隊員武鬥現象嚴重，西城分局去人看過拘留所，瞭解過情況，但事後却得意洋洋地對六中紅衛兵領導說：“不錯，好好搞，今後還要向全市中學生推廣你們的豐富經驗。”陳伯達11月19日去六中視察了拘留所之後（此事下面詳述），西城分局XXX忙說：“告訴六中紅衛兵，有人說現在西城分局對六中〔的態度〕變了，告訴他們，我們並沒有變，還是和原來一樣。”

有關西糾所起的作用，下面的具體材料將有所說明。而西糾九月份發表在《紅旗》雜誌上的一篇文章，顯示了西糾在武鬥問題上的矛盾角色，文章說：“我們對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於資產階級反動的學術權威，對於地、富、反、壞、右分子，都不要打。”接著馬上又說：“我們要正告一切階級敵人：我們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講

文鬥的，我們是緊握著槍杆子講文鬥的，如果你們膽敢進行階級報復，反攻倒算，我們紅衛兵、糾察隊員完全有權力、有義務和革命群衆一起，協助政府，堅決鎮壓一切階級敵人的反撲！^[1]”這就是說：其他群衆組織都一概不得武鬥，但是西城區糾察隊“完全有權力”對他們心目中的“階級敵人”動用暴力，堅決鎮壓。

這樣，“血統高貴”的西糾，就有權鎮壓血統平平的高校少數派，哪裏有造反派的靜坐、請願，哪裏就可能出現西糾的打罵、騷擾。群衆出版物上一篇文章一針見血地評論到：“有些後來參加西糾的人，八月初還在對中學基層幹部進行大規模武鬥，但不過二十幾天，在地院東方紅小將開進地質部，要揪三反分子何長工時，這些人又高唱起‘保護老幹部’的調子來了。^[2]”

前面的章節已經敘述過，西糾在地質部事件中起到了鎮壓高校造反派的警察作用。和地質部事件大約同時發生的、在影響上不相上下的另一次學生抗議行動，是北航紅旗在國防科委的靜坐事件。然而現存對此事件的許多敘述，都未提到西糾與這次事件的聯繫。下面轉引署名“首都新兵”的報道材料：

九月下旬，北航“紅旗”去國防科委要揪趙如璋（原工作隊隊長），“北航紅衛兵”〔大約指北航附中的紅衛兵〕要擠走北航紅旗，于是十幾個學校開會討論，後決定夜裏開始行動。夜裏，住在總部裏面的西糾隊員

[1] 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一定要堅持文鬥》，《紅旗》12期（9月17日出版）。

[2] 《對西城區三十六所中學和市區教育機關“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情況調查報告》，北京新四中公社《新四中》，1967年3月17日。

突然集合，總部一個人造謠說：“北航紅旗扣了西糾的人。”即令全體隊員跳上兩輛大卡車，衝到北航紅旗駐地：航空俱樂部。去的有師大女附中和四中的一百多人。

西糾隊員闖入航空俱樂部，整隊“待命”，西糾的負責人、四中“革委會”主席孔丹已經在裏面和北航紅旗爭吵。孔丹說：“誰批准你們住在這裏的？！”“有借條嗎？！”對方說：“房子是借的，口頭答應的。”孔丹說：“沒借條不行，這裏是我們的總部了！這所房子是我們借的，我們有借條！”郭冀豫（西糾小頭目）却不知得了誰的指示，騎上摩托車想往外衝，被北航紅旗的人揪住了，頭頭一聲令下，隊員蜂擁而上，混亂間讓摩托車開走了。

在相持不下的情況下，西糾在院內找了幾間房子，四中的西糾“機動連指導員”劉XX來報告，說：航空俱樂部挨著國防科委，中央軍委，北航紅旗這樣不像話，這房子西糾已借下了，得把北航紅旗趕走。接著讓XXX介紹情況，他說：“北航紅旗的出身複雜，讓他們在門口地上貼了大字報，外國留學生拍了照，裏頭還有間諜活動……一個處長講發現了定時炸彈……”西糾分子立即火冒高丈，紛紛認為一定要把北航紅旗趕出去，并把軍被也運來了。

早在轟北航紅旗之前，因發生過地質部事件，這次去，孔丹心裏沒底，因此想跟他母親許明（國務院副秘書長）商量，但當時許明不在，于是就給許明留下了一張條，內容大意是：“事關重大，談談您的意見。”夜裏兩點，許明叫孔X去找孔丹〔材料原文使用“X”

這裏照錄；孔丹是中調部部長孔原之子]。此時，西糾正準備大幹一番，突然傳來孔X帶來的聖旨：撤！於是西糾隊員又稀裏糊塗地爬上汽車溜了^[1]。

以上這個案例，雖然不涉及到過多的暴力，但很生動地展示了西糾的典型行爲方式。在文革中，造反派的典型抗爭策略，是請願、靜坐，激烈一些的是絕食、佔領，這是中外社會史上無權者、弱勢群體所通常采用的集體行動方式，一般都提出針對掌權者或強勢群體的某些具體、有限的要求，比如造反派的平反、索取黑材料等等。而西糾的典型戰術，和中外社會史上那些依靠強權、依靠國家鎮壓機器的右翼團體的集體行動方式非常相似，比如製造暴力氣氛、以血腥殘忍的暴行作為威懾恐嚇手段、習慣性的污言穢語、傾向於無序的騷亂等等。注意到：從西糾到聯動都特別注重服飾外表的符號作用——黃軍裝、寬皮帶、摩托車、自行車隊等等，這些都是力量、速度的象徵。這裏，決不是說，西糾的思想意識等同于法西斯主義，也不想推測：西糾有意模仿了法西斯主義文化。而是試圖提出這樣的命題：以激進為形式、而以保守為實質的群衆性運動，其文化上和行爲上的表現形式，都被其自身的“激進的反動”的矛盾性質所影響或決定著。

有關材料還列舉了西糾作為鎮壓造反派工具的以下幾例。

“石油一廠革命派”來京向中央揭發石油部代部長康世恩等人的罪行，康等聞訊後，連忙派“西糾”將

[1] 首都新兵：《把反革命組織“西糾”拿出來示眾——西城糾察隊罪行錄》，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報》1967年3月9日。

石油一廠的上訪者綁架押送回原地，此後，這些上訪者在石油一廠遭到殘酷的迫害。

九月下旬，遼寧大學和東北工學院師生十五人來京向中央反映石油一廠的問題。余秋里、康世恩連忙指使任成玉（石油部政治部主任）、宋惠調用“西糾”前往鎮壓。在任成玉的直接指揮下，“西糾”對這十五位同志大肆圍攻，并于第二天將這些師生強行押送離京。事後，宋惠又以“西糾”名義印發傳單，對這些師生進行政治迫害。此外，北京石油學院的師生每次到石油部去，余秋里等人也總是派“西糾”隊員來監視他們的行動。

十一月二十四日，西糾砸了“全國文藝界造反聯絡總部”，以報復他們造京劇一團的反，夜裏十一點來總部打人罵人砸玻璃，抄電話。西、東糾、二司糾察隊罵造反派是“狗崽子派”“你們造什麼反？！”（答：“造舊文化部的反。”）“你們造文化部反，不經肖望東批准能住這兒嗎？”等等。山東藝術學校的女生王紅軍因保護電話被打，手臂受傷。

大串連開始時，西糾極力反對，在車站刁難、毆打串連師生，大批串連者被轟走，尤其是所謂“狗崽子”一律打將回去，還貼了“黑五類子女混蛋”之類標語。一次，十三中西糾隊員和一些關係密切的外地高幹子弟毒打貧農出身的朝鮮族教師崔風吉，理由就是他說了一句：“高幹子弟有什麼了不起，不是和工農子弟一樣嗎？”

十月以後，由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興起，西糾遭到越來越強大的反對。石油部為了保護“西糾”

頭頭過關，密謀讓“西糾”頭目二十餘人和 82111 鑽井隊一起乘包車去大慶，名為勞動，實為“避難”。這批“西糾”頭目後來又從大慶到 641 廠混了一個多月，旅費全部由石油部報銷。直到十一月上旬，才讓“西糾”頭目回京^[1]。

利用中學紅衛兵去鎮壓高校造反派，并非北京所獨有，而是各地當權派的慣用手法。比如成都工學院事件就是一例：“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李井泉回成都不久，就製造中學生圍轟成都工學院的事件。這是成都地區第一次大規模的有組織、有計劃挑動學生鬥學生的嚴重事件。八月二十一日，在四川省委書記處召開了一次黑會，策劃製造這一事件。李井泉說：‘七、八十個中學，輪流去那些大學搞他幾天，也亂他幾天再說。’‘大學就搞不得嗎？衝工學院，全市的中學去轟他，組織他一、二萬學生去轟他。市委敢不敢挑起這場鬥爭，九中、四中帶頭去轟工學院，打破他們所謂的正常秩序。’‘先衝工學院，這是有目標的。讓這些娃娃衝，準備他出亂子，準備打架，讓他鬧，鬧亂一些好。’密謀既定，周頤、肖菊人等人就緊急行動起來，于是八月二十二日藉口成都工學院有學生用毛主席像遮太陽的‘事件’，李井泉在四中讀書的兒子申 XX [原文如此] 組織了四、七、九中的二十幾個中學一萬多不明真相的學生，圍鬥工

[1] 《把“西糾”的後臺余秋里揪出來》，毛澤東思想哲學社會科學部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聯絡委員會紅衛兵聯隊《進軍報》1967 年 4 月 1 日；首都新兵：《把反革命組織“西糾”拿出來示眾——西城糾察隊罪行錄》，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報》1967 年 3 月 9 日。

學院師生兩天，挑起了革命師生相互間的鬥爭。^[1]”

大量材料不僅記載了西糾如何擔任當權派的鎮壓工具，更詳細記載了西糾所留下的駭人聽聞的種種暴行記錄。這裏所說的，和前述在鎮壓造反派行動中大打出手的案例有所不同，而是指老紅衛兵對“黑五類”及其子女、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和教職工的殘酷虐待，其暴力也不再具有群體衝突場合之下的政治意義，而是對監禁之中或完全無抵抗能力的弱者的肉體折磨，表現出病態的殘忍成性和虐待狂心理。

下面直接抄錄地質學院《東方紅報》所揭露的一個事例：

十二月十八日晚，蘭小兵（豐盛中學的西糾負責人）打了豐盛一同學（此人思想反動，但打不能解決問題），打後讓她跟著自行車從豐盛跑到總部。進總部後又讓她在操場上跑了六、七圈。以後，蘭小兵先踢她的小腹，又把她脫得只剩兩件單衣，加以毒打。邊打邊讓她喊：“無產階級專政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她們又讓她趴在地上，蘭、駱〔小峰，也是西糾成員〕二人一人踩一臂說：“我們就是要把你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用鞭子抽臉，頭嘴流血。直到她胳膊不能抬，一條腿失去了知覺。打完後蘭逼她不許對別人說，有人問就說：“蘭小兵教我好好學毛選。有人問挨打的事就說是首都兵團的人打的。”

再次提醒讀者：以上引文，是地質學院造反派報紙對一樁迫害事件的揭露，事件中的受害者只是因為“思想反動”

[1] 記載于：《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徹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夥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成都打李總站教育系統聯絡站《教育革命》1968年第6期，p44-47。

而遭到令人髮指的暴力虐待。這裏重要的事實是：文革中不僅存在這種難以置信的殘忍暴力，也存在對這種殘忍暴力的無情揭露和控訴，特別是主要在造反派群衆的出版物上，這個事實具有重大的意義，我將在本章結束時詳細展開說明。

西糾施行這一類暴行的最經常場所，是他們在一些中學所設立的所謂“勞改所”，這些勞改所、拘留所，被造反派群衆形容為白公館、渣滓洞和法西斯集中營。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北京六中勞改所。以下是北京六中“紅色造反團”編寫材料的摘錄：

勞改所設在六中後院東北角。由看守室、刑訊室、男牢、女牢幾部分組成。上設值班崗樓，安有警鈴、自動控制門、探照燈，夜間稍有風吹草動，便警鈴四起，強光環射，西糾分子發出陣陣怪叫，一片陰森恐怖。牆上寫著“紅色恐怖萬歲！”六個血淋淋的大字（由紅漆和被害者流出的鮮血寫成）。所內常放長短刀、木槍、皮鞭、彈簧鞭等種種刑具。正門用磚砌死，一律由後邊窗口跳進跳出。除“犯人”及看守人員外，其他人一律嚴禁入內。為怕泄露勞改所內幕，曾打算挖地下室，因土質不好中途停工。大批革命群衆就在這裏慘遭迫害。左派學生王光華、老工人徐沛田就是被西糾分子活活打死、勒死在這裏。

有關六中勞改所的材料很多，下面摘錄一件手抄體印刷品文章《看劉鄧反動路線在北京六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介紹著名的“王光華事件”。

王光華，男，19歲，出身資本家（未定，待查）平時表現一般。文化大革命運動以來，表現積極。五

月九日王光華和XXX一起去團中央反映學校情況。五月二十三日（大約）寫出第一張大字報。接著又先後寫出了一些揭發校領導壓制文化大革命罪行的大字報。在當時，群衆還未充分發動起來的情況下，起了點火作用。這時，工作組、革委會及紅衛兵的某些領導人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制群衆，把鬥爭的矛頭指向群衆，起了惡劣的作用，反動對聯（老子反動兒混蛋，老子英雄兒好漢，基本如此）一時盛行，但王光華堅持真理，大膽發表自己的正確意見，和某些人的錯誤作法進行了鬥爭。

九月七日，王光華不顧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某些紅衛兵領導人的種種阻撓，未經他們的許可出外串連。（按：這是一種敢于造反的精神，大串連是毛主席交給廣大革命群衆的大民主，任何人不得阻攔，也無權阻攔）

王光華運動以來一系列的革命造反行動，觸怒了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老爺們，在幕後者的策劃下，對王光華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人身迫害。

一、剛一得知王光華等四人要出外串連，西城糾察隊的負責人六中紅衛兵的某些領導人便馬上布置車站上值班的受他們控制的西糾隊員，企圖在車站扣留王光華等四人，計未遂，他們便馬上派人跟蹤追擊，想在中途捉回，這一切陰謀全落空了。

二、他們從各方面探得王光華可能在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五點多返京，于是在他們的精心策劃下，便開始了一場大搜捕。王光華等四人在串連途中失散，先期回京的四位同學便被我校的紅衛兵某些領導人找到

校內的拘留所，嚴加拷打，逼問有關王光華及他人的材料。釋放前，曾威脅地對他們說：“王光華一回來，馬上打電話通知我們。”接著就派出大批人馬上去車站及王光華的家的附近，戒嚴搜捕，但撲了一個空。在某人的報告下，他們得知王光華未直接回家，而去校長王XX家；就讓人在王XX家門口等著王光華。王光華和王XX談話之後，大約八點多鐘，剛一出門，便被這些人押到學校。

三、當晚九點鐘左右，全校戒嚴，把王光華押到他們精心設計的“監獄”中，不由分說，剝光上身。開始了為時三十多分鐘的毒打。十來個暴徒手持各種凶器（木槍、木棒、皮帶、鋼絲鞭、電線鞭以及各種不知名目的鞭子）輪番毒打。並且四、五人一組，把王光華圍在中間，手持木槍向他身上突刺，掄起木槍木棒向王光華胸前背後輪流猛擊，肋骨被打折數根。王被打過重，昏迷過去，XXX用腳猛踢其頭部，說：“要觸觸你的靈魂。”一邊打一邊還有人大聲怪叫：“要饅頭，不要窩頭。”（即針對要文鬥不要武鬥）。看這一小撮人何等猖狂，公然惡毒攻擊毛主席親手制定的十六條，公然惡毒攻擊林彪同志所一再強調的，要文鬥，不要武鬥，武鬥只能觸及皮肉，文鬥才能觸及靈魂的英明指示。是可忍，孰不可忍？就這樣王光華幾次死過去，最後，為了從王光華口中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讓黑幫給王做人工呼吸才免除一死，第二天上午（9月28日）王光華已面部青腫，危在旦夕！在有人攙扶的情況下去廁所還不由自主地摔倒在地下，小便便血。事態是這樣的嚴重，可是這一小撮人仍然置之不理！

惡毒的看守XXX和西糾骨幹，我校紅衛兵領導人X XX、XXX又打了數次，逼他寫材料，終於在下午兩點左右王光華在這一小撮殘無人道的迫害下，又一次停止了呼吸，當時有人建議請校醫搶救，這一小撮人爲了封鎖消息，掩蓋罪行，不顧王光華的生死，斷然拒絕。只是派人到校醫處學了簡易人工呼吸法，讓剛被挨打的黑幫作人工呼吸，無效，王光華就這樣被他們活生生的打死。當晚12點多，趁夜深人靜，就焚尸滅迹，送到東郊火葬場燒了。

發生在六中的還有老工人徐沛田被害事件和其他暴力虐待案例，皆記載于《觸目驚心——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血淋淋事實》一文^[1]，這裏不再引述。

1966年11月20日，中央批轉了中共北京市委有關“不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的《重要通告》，要求“各省、市、自治區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名義大量印發，在學校、廠礦、機關或其他單位內張貼。”周恩來在接見外地來京申訴告狀的師生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11月27日）中特地說明《重要通告》的目的是爲了“保

[1] 《紅旗報》1967年1月22日。有關這兩起事件，一篇文章指控說：“吳X縱容西糾，六中打死王光華、徐沛田之事，他是知道的，但却不做處理，不上報中央！”（首都新兵：《把反革命組織“西糾”拿出來示衆——西城糾察隊罪行錄》，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報》1967年3月9日。）這裏吳X顯然是指北京市委的吳德。同樣性質的材料還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血腥產物——記“北京一中”監獄》；《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血和淚的控訴——劉鄧反動路線在北京女三中的滔天罪行》。兩篇皆載于：首都紅軍兵團宣傳部《紅軍戰報》1967年3月8日。《徹底肅清反動“血統論”在八一學校的流毒》，首都八一學校革命造反聯合總部主辦《春雷》摧毀“聯動”組織、批判“聯動”思潮專刊，1967年9月。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所編的《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資料選編》，也有類似的部分。

護人民的自由”。這份文件的發布，和北京市造反派群衆批判“資反綫”、反迫害運動的興起有很大關係，而且一定程度上由於西糾暴行在社會上引起普遍的反感，受害群衆要求批判、制裁西糾的呼聲越來越高。

在這方面，最具有象徵意義的一件事，是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 11 月 19 日、20 日兩次訪問北京六中勞改所、解散被非法拘留在那裏的群衆。下面且看群衆出版物對此事件的記載：

“重要通告”出來之後，王冒明、朱 XX [六中西糾成員] 仍無動于衷，還與解放軍報編輯部的同志亂爭亂吵，藉口“勞改所不是拘留所”堅持不撤殺人魔窟——“勞改所”。十一月十九日 [原文誤作九月] 下午，陳伯達、戚本禹、關鋒、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組同志在百忙中來到我校。陳伯達同志來到後面的“勞改所”，看了打人凶器和被打的人，聽了一些事實，在和一些老師的談話中氣憤地說：“這樣搞是非常殘酷的，無論對什麼人都不行！”在談話中對老師說：“你們見到這種現象為什麼不制止啊？”老師有的在下面說不敢，陳伯達同志說：“你們怕什麼，我就不怕，我一沒帶匕首，二沒帶短槍……，我們是靠毛澤東思想吃飯的，我們要相信毛澤東思想的威力。”老師們向陳伯達同志彙報了一些情況（因為當時有西糾成員在場，發言並不踴躍，就是這樣，這些老師還受到了威脅）這時戚本禹同志拿起旁邊的紅衛兵報念：“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他念完之後感嘆地說：“是自我諷刺呀！”陳伯達同志說：“反其道而行之。”關鋒同志說：“不準備

實行之。”陳伯達同志說：“像這樣的報紙可以停辦。”其他同志也講了一些話。總之，這次會給了老師們一個極大的鼓舞。臨走時，陳伯達同志從“勞改所”帶走了一大捆匕首，長短刀。但西糾一小撮人並不甘心，還在繼續磨刀。在十一月二十日陳伯達同志和戚本禹、關鋒、王力、吳德等同志再次來到我校，直奔“勞改所”讓當晚拆除崗樓、勞改所，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兩次來到我校，大長革命造反派的志氣，給了革命師生一個極大的鼓舞，燃起了我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烈火，這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1]。

如果說，西糾（以及海糾、東糾）還是經過國家體制幕後扶植而成長起來的一個特權青少年的狂暴群體，那麼，其轉世重生的組織——“聯動”，則是該群體依靠其狂野的政治想像而自主成立的一個極端產物，這將是下一章所關注的內容。

“野獸般的性情”，還是“激進的反動”

有關“老紅衛兵、西糾、聯動”的題目，既是群衆的文革史的一部分，也是文革史中和精英最有關係的一部分。也許正因為此，現有文字記載，在這個主題上，信息的欠缺、神秘、混亂，以及基于現實利益的敏感，都是最嚴重的。如果本章上面是為了回答“發生了什麼”而清理出一個基

[1] 《觸目驚心——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血淋淋事實》，《紅旗報》1967年1月22日。

本框架，那麼，還需要對“為什麼”作一些探索性的回答。

這裏先看一下現有的答案。目前對老紅衛兵現象的最流行的一個解釋，就是所謂“極權文化”所造成，特別強調價值觀、行為方式的教育和灌輸，對青少年在個人心理方面的決定作用^[1]。然而，和所有訴諸“極權”概念的解釋一樣，這種解釋是經受不住在歷史材料面前的推敲的。如果“極權文化”真的具有那樣強大的“全能的”（這是一些極權論學者新近對“極權”的婉稱）灌輸效果，那麼，在文革中，就不會出現對有關行為的批評意識，而且由於“極權”的性質，整個體系會不斷地複製自身，永久地持續下去，直到出現外部的致命衝擊才會崩潰。這不僅和本章所敘述的歷史完全不符，而且和衆所周知的共產黨國家的內部發展事實相違。不僅老紅衛兵的暴行在文革中就遭到批判，而且整個對所謂文革的否定過程，主要是中國內部的動力所促成的，一個“極權文化”的自我否定，是和極權論的基本命題相矛盾的，如果試圖在此基礎上對“極權文化”解釋作修改，那麼，這種解釋就變成一個毫無用處的循環論證。

相比之下，在文化大革命群衆運動當中出現的對老紅衛兵現象的批評和反省文字，是從社會內部的矛盾角度考察問題，倒是比“極權文化”的解釋更富于分析性。這裏引用在造反派文獻中獨立分析性最强的、套話堆砌最少的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文章《“聯動”的騷亂說明了什麼？》，實際上文章最有代表性地反映了造反派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首先，它認為組成“聯動”的高幹子弟在物

[1] 仲維光：《“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誕生史實》。

質上、精神上形成一個特權階層，而其中“沒有改造好的高幹子女”，實際上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分子”，是反革命修正主義的寵兒，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標準選民，在文革中被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所利用。至于西糾、聯動式的行爲特徵，文章認為：“長期受修正主義的毒害，長期以貴族自居，長期放鬆思想改造，勢必使一部分革幹子弟的靈魂，變得十分醜惡了，其中的一小撮，簡直具有野獸般的性情，特務一樣的心靈，乃至達到了滅絕天良的地步！”^[1]這就是說，對高幹子弟老紅衛兵的社會性質，做出類似“特權階層——新階級”的判斷，這是一種高度理論化的結構主義；而對其極端行爲，用“道德——靈魂”這樣的倫理語言來解釋，這樣的分析在解釋能力上却是相當軟弱的。

如果說造反派的“特權階層—獸性靈魂”的解釋，比“極權文化”論更接近事實、說明更多的東西，那麼，前者在總體上仍然是基于當時的“元理論話語”，這就是有關“階級鬥爭”、“現代修正主義”等後來被稱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造反派的“聯動觀”，實際上是把毛澤東在不同場合下所作的一些零散評論，比如：“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我們的高幹子弟很令人擔心”、“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等等，融會貫通成為一個大致符合實際的解釋。然而，部分由於毛澤東的話語體系在“階級”、“無產階級專政”等概念上的含混與不確定，造反派對“聯動”的批判，也包含著一定局限，特別是以“獸性靈魂”這樣的倫理範疇來解釋聯動的病態殘忍，是沒有解釋能力的。

[1] 《中學文革報》1967年2月10日。

筆者並不能夠提出一個十全十美的解釋，但傾向於認為：應該把“老紅衛兵現象”，和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中國革命等具體歷史事件相聯繫，把它看成是激烈革命變動的歷史大背景之下的特殊產物，具體說，是在激進革命環境下“保守主義”所呈現的一種特殊形式。造反派指控，“聯動”的實質是“保”，恰如其分，它和古今中外歷史上的其他“保守主義”具有很多共同的特徵。其特殊之處在於：它在形式上吸收了激進革命傳統的表面東西，這就是構成“聯動”的不可分的兩面：形左、實右。它既是革命的嬰兒，又是反動的後代，它是革命和反動的奇特結合。因此稱它為“激進的反動”，或“狂熱的保守主義”^[1]。法西斯主義一般被當作“激進的反動”、“狂熱的保守主義”的典型。通常，右翼的行動組織，如拿破崙戰爭時期，西班牙出現的保衛西班牙王室、抗擊拿破崙的入侵的游擊隊，希臘 1960 年代反共的右翼恐怖主義組織，美國迫害黑人和進步人士的三 K 黨團體，都屬於這一範疇。在中國 1960 年代產生這種奇特結合的土壤，就是新中國政權本身所包含的那些奇特而又激烈的矛盾：共產黨進城掌權後的官僚化、常規化的傾向，與其保持革命純潔性的主觀努力之間的矛盾；革命意識形態的不斷激進化，與其凌駕於社會現實之上、甚至與其脫節的矛盾。以這樣的角度考察，就能夠用分析的方法解釋“西糾”老紅衛兵的行為方式：“野獸般的性情”應歸結於其結構上“激進的反動”的矛盾性質。

[1] Richard Rubenstein: Alchemists of Revolution: Terrorism in the Modern World. Basic Books, 1974. 然而，筆者仍然希望強調：“老紅衛兵現象”和法西斯主義以及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史上的右翼恐怖主義有著本質的區別。

第八章 從“對聯”到“聯動”：血統論、特權與保守（下）

陳伯達講話、十二月黑風與西糾的垮臺

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老紅衛兵、西糾和高校造反派之間的衝突，最主要的形式，是在靜坐、抗議場合下兩派人群的面對面的推搡、圍攻等輕微暴力，當然還會有雙方在辯論會、大字報、出版物上的文鬥。然而，首次以較正式文字對血統論和老紅衛兵的所作所為加以批評的，是1966年10月16日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可以發現：以現有文獻而論，在陳伯達中央工作會議的報告日期（1966年10月16日）之前，在較正式的文字、言論媒體裏（包括各種群衆出版物）竟然找不到對老紅衛兵、西糾的批評或攻擊。即使是觀點比較激進的材料，比如清華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東方紅公社合編的《我們所知道的“八·一九”事件》、《八·二四事件是怎麼回事？》這樣的文章裏，批評的對象主要還是清華大學臨籌委等，而對中學紅衛兵未加任何負面的評論（除了記錄他們罵人的髒話）。對女附中的紅衛兵還稱之以“同志”、“戰士”。換句話說，陳伯達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會議的報告，是最早的對血統論和老紅衛兵（未點名）加以批評的有記載文獻。

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因為在九月份，西糾的文章還被當作“紅衛兵文選”刊登在《紅旗》雜誌上。這期間，西糾還擔任歷次在天安門接見來京串連群衆的維持秩序任

務。造成這個轉變的，無疑是群衆對西糾的惡行越來越多的揭露和控訴。

陳伯達報告的標題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談到“血統論”以及不點名批評高幹子弟老紅衛兵的有關段落如下：

最近一個時期，有人企圖用宗派主義代替黨的階級路線。他們把無產階級的革命原則拋到九霄雲外，完全不理會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種不同政治立場，也完全不理會各種派別都是帶有政治性的，階級性的，都是代表這種或那種社會思潮的。他們用血統論來代替階級論，企圖混淆階級陣線，孤立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

各地流行著一種所謂“自來紅”的謬論。投靠這種謬論的人，就是過去用各種手段打擊、排斥工農子女的人。他們利用工農出身青少年的階級感情，利用一部分年輕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兒好漢”，來蠱惑一批學生。實際上，這是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血統論。封建地主階級宣揚什麼“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就是這樣的血統論。這是徹頭徹尾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徹頭徹尾的反動的歷史唯心主義，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根本對立的。

.....

現在有一些學生接受什麼“自來紅”、“自來黑”的觀點，接受什麼要在學生中劃分“紅五類”、“非紅五類”或者什麼“黑幾類”的觀點。製造這類觀點的人，是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製造混亂，蒙蔽青年。

我們勸青年們不要接受這種血統論的錯誤觀點，而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階級論來武裝自己的頭腦。

同時，那些製造和散布這種血統論的人，如果願意回到無產階級的革命道路上，就應該改正錯誤，停止散布這種謬論。

.....

不做階級分析，不把事物一分爲二，只醉心“高幹子弟要掌權”，這是完全脫離了無產階級軌道，完全同毛澤東思想背道而馳。我們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條標準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為什麼因爲是高幹子女，就一定要掌權？難道因爲他們的血統高貴嗎？

和兩個多月前江青在天橋劇場對對聯的溫和批評相比，陳伯達的批評要嚴厲許多倍。但那時連江青溫和的批評都引起了老紅衛兵們的很大不滿。這次陳伯達對血統論的嚴厲批評，中央領導層對其重大意義似乎是瞭解的，毛澤東指示：陳伯達的講話“要大量印行，印成小冊子，每個支部，每個紅衛兵小隊起碼有一份”。然而，後來的情形顯示：一些群衆在過了數月之後都還沒有讀到這個報告。

陳伯達的報告打破了一個禁忌，“血統高貴”的老紅衛兵開始受到批評，他們的第一反應是難以置信：“嘿，黑七類子弟反對譚力夫講話倒成了正確的了。^[1]”在陳伯達表示

[1] 《就譚力夫發言問題訪問解放軍報社》(時間：1966年10月9日；訪問者：南開大學物理大隊“東方紅”評論員等；被訪者：解放軍報社接待站劉詩)，和《走訪人民日報編輯部》(時間：10月14日；訪問者：化工學院“飛舟”戰鬥組；被訪者：周修慶)。

了“不要用糾察隊的形式和名義、西糾應該解散”的意見之後，西糾的負責人蘭小兵、駱小峰、王向榮等給周榮鑫寫了一封信，表現了典型的西糾風格：

周榮鑫同志：

汽車，我們半輛也不退！！！中央文革要我們解散，必須把原因講清楚。否則一切嚴重後果由中央文革負責！！！！望周同志把這些話轉達給陳伯達同志，并告訴他，我們全體西城糾察隊員找他！

蘭小兵、駱小峰、王向榮

十一月間，陳伯達兩次到西糾總部，批評了他們，惹怒了這幫“好漢”。西糾成員圍住一同前來的關鋒，和他展開辯論。首都二司革命造反聯絡站（從保守的二司中分裂出來的造反派）和首都三司分別于11月12日和12月11日發表了取締、解散糾察隊的文章和“通令”^[1]。

隨著陳伯達報告的傳播，北京中學大批受到聯動歧視和迫害的“狗崽子”、“黑五類”終於從打罵聲中抬起頭來，呼喊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加入造反派的行列，實行“自己解放自己”，由此釋放出來的政治激情是難以估量的。在這段期間裏，戲劇性的、天翻地覆的轉變在人們眼前發生，大概這可以算作社會學家阿里斯蒂·左爾伯格所說的“狂歡的瞬間”——在這一時刻，“一切都成為可能”，“工具手段和自由表達之間的高牆坍塌”，“政治衝破了其界限，衝向生活的一切”。革命的爆發、被佔領領土的解放，都會產生“狂歡的瞬間”。左爾伯格所說的，無非就是列寧對革命

[1] 首都二司革命造反聯絡站：《立即取締西、東城區糾察隊》；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第五號通令：《解散“糾察隊”》，《紅峰報》1966年12月30日。

的著名贊譽——“人民的盛大節日”^[1]。

此刻，另外幾個重大的動向也在同時發展。學校裏的造反派開始下工廠、和工廠裏的造反運動相結合；另一方面，反對造反派的力量也在聚合。據記載，1966年11月初，北京市各高校原“多數派”的人突然打破了以往的沉默，積極活動起來，抓住“少數派搶黑材料”的事，以大字報、大標語、辯論會發言的形式攻擊少數派，特別把火力集中于首都三司，但攻擊的矛頭却指向中央文革。這就是所謂的“‘十二月黑風’。

這期間，發生了第三司令部四次被砸的事件。《大事記》記載：11月8日晚，北京外語學校、一〇一中、人大附中等一百多名“老紅衛兵”手持匕首，氣勢洶洶，喊著“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半夜三更闖入第三司令部，大肆進行打砸搶。反三司的風潮還蔓延到全國各地，11月中、下旬，在重慶、長沙等地，三司聯絡站及工作人員連續被圍攻、毒打、砸抄^[2]。這期間，中學糾察隊還兩次襲擊已經發生分裂、被少數派造反了的二司：11月18日強佔二司的《東方紅》編輯部，11月20日又砸了二司總部後勤組人員的住處^[3]。

12月9日，周恩來在會見包括西糾、三司在內的各派別組織（這次會議在座位問題上還發生了爭執）的一次講

[1] Aristide Zolberg: "Moments of Madness," *Politics and Society* 2:183–207, 1972.

[2] 《大事記》，p138–139。11月8日的事件起因于中央戲劇學院—軍事科學院的“十·二七”搶黑材料事件，詳情可見：《以鐵的事實戳穿謠言——軍事科學院某些負責人調動解放軍鬥學生罪責難逃！》《首都紅衛兵》1966年12月4日。

[3] 《造反記——兼駁幾種謬論》，二司《東方紅》，1966年11月27日。

話中，第一次對西糾提出嚴厲批評：“西城區糾察隊長期驕傲起來。”“你們要好好整風，不要盛氣凌人。”“你們管轄下的六中，那樣打人，完全違反十六條，你們自己整頓嘛！大前天在民族飯店的行動，連工作組勸都勸不住，爬窗口還要打人，第三司令部沈XX被打，（總理問：她今天來沒有？衆：來了）她來了可以作證，7日許多人圍住，交通都阻斷了。”“你們對中央文革也這樣，對同學也這樣。打這個那個司令部已經多起，這不是正常現象，不是革命需要。”

周恩來所批評的西糾“爬窗口”、“打人”，指的是12月7日在民族文化宮舉行的“第二屆中日青年友好聯歡”籌備會上，西糾與“三司”所發生的衝突。據記載：九月初，開始籌備中日青年友好大聯歡。主管人廖承志東不找，西不找，偏要找到西糾頭上，經市委批准，西糾便插到其中作了“主角”，直到十二月中央文革指示重新分配中日友好聯歡籌備工作的人員為止。即使如此，廖承志、周榮鑫仍不放過機會，挑動西糾對中央文革、三司的不滿，于十二月七日唆使西糾、海糾在民族飯店鬧事，打傷數人^[1]。

12月5日，亦即中學老紅衛兵成立“聯動”那一天，高校多數派也在開會，北京林學院學生李洪山召集了清華、人大、林院等二十三個單位的145人，召開“首都紅衛兵聯絡員會議”。會上，李洪山宣揚“踢開中央文革小組”的三個理由，并建議“一二·九”那天“上街游行紀念”（但未實現）。李洪山還在會上讀了他批判陳伯達的文章《一篇很好的反面教材——扼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毒草——

[1] 《周總理十二月九日的講話》；首都新兵：《把反革命組織“西糾”拿出來示眾——西城糾察隊罪行錄》，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報》1967年3月9日。

評陳伯達“對兩個月運動的總結”》^[1]。

從現有材料看，清華大學“八·二四”事件之後，高校的“多數派”和中學“老紅衛兵”並沒有更多的聯繫和聯合行動，除了一些零星的指控，比如說北航“八一縱隊”曾兩次與西糾等中學老紅衛兵舉行會議，以及林學院的李洪山和四中王XX的來往。

即使在“十二月黑風”中，也沒有材料顯示出現過這樣的聯合。一篇題為《看！十二月黑風》的材料，羅列了發生在11月1日和12月14日之間反對三司、攻擊中央文革的較重要的言論、行動事件。材料所記載的大小事件，從11月1日到11月30日之間共19起，12月1日到12月14日之間共40起。事件絕大多數發生在高校校園（由於該文章作者是清華的人，故樣本向清華嚴重傾斜），其中只有7起牽涉到中學保守派紅衛兵，有2起是有關工人，有5起發生在市內或社會上。

這些案例中，包括被大多數記載所提及的林學院紅衛戰鬥兵團“永向黨”李洪山的標語、演講《踢開中央文革小組、自己鬧革命》，農大附中伊林·滌西的大字報《給林彪同志的一封公開信》，北航八一縱隊的《一、二、三問中央文革》，等等。大部分言論的署名，是以五花八門的小組織、小戰鬥隊的形式，如清華的紅衛兵“七人小組”、“紅梅”、“梅花”、“雪蓮”、“紅四軍”、“閃電”、“紅雷”、“不怕砸”、“越砸越硬”、“傳聲筒”、“泄密社”、“高幹子弟辯論團第五別動隊”，

[1] 《大事記》，p139。《大事記》還說：“清華大學紅衛兵”易振亞在會上跳出來惡毒攻擊毛主席、林副主席。然而，《看！十二月黑風》記載易振亞的講話是在林院辯論會上。情況可能是：當天分別開了聯絡員會議和辯論會，易振亞在兩個會上作了內容相似的發言。

林院的紅衛戰鬥兵團“永向黨”、紅衛兵“長征戰鬥隊”等等。言論內容也相當的多樣，既有攻擊三司、攻擊中央文革的（包括攻擊陶鑄、王任重），也有對毛澤東、林彪表示不敬的^[1]。

如何評價“十二月黑風”？從今天的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群衆大民主所造成的空前言論自由的結果。僅僅從署名上的五花八門，就可以想像出各色各類言論的爭鳴熱烈。實際上，很多也被收錄在“十二月黑風”中的言論，比如一部分反陶鑄、反王任重、反康生的言論，恰恰是出自一些同樣受過工作組迫害、同樣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造反派。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許多反中央文革、反三司的言論和行動，是互相默契協調的，反映出高幹子弟、保守派敵視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觀點和願望，從這個角度講，“十二月黑風”中的反中央文革、反三司的言論，是沉默的“多數派”利用空前的言論自由，開展的一次有意識的共同行動、政治鬥爭。鬥爭的動機，既出于很多“多數派”對傳統秩序的失控、對背景複雜的造反派的“囂張”的不滿，因而根據他們過去所形成的價值觀，奮起“保衛黨”，也出于一部分高幹子弟感受到自身社會集團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脅。

比如，卜大華回憶說：“在京廣線和沿海一帶串連，看到的確是沒有一個黨的領導、沒有一個黨的組織、沒有一個省委、市委不受到‘炮轟’和‘火燒’。到處是‘打倒’，到處是混亂。難道紅衛兵運動所帶來的竟是這種結果嗎？”強烈的本階層、本集團意識，使一些高幹子女意識到：精英集團的失勢，正是群衆大民主的後果，于是他們開始醒悟，

[1] 《看！十二月黑風》，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井岡山報》1966年12月22日。

開始反感群衆大民主，而中央文革恰恰是不遺餘力地支持群衆大民主，所以高幹子弟把仇恨和咒罵集中到中央文革身上，特別是集中到江青身上，從他們父母那裏，高幹子弟學到了老幹部特有的對江青的厭惡。高幹子女的談吐大都顯示出超乎一般的政治成熟。計三猛寫的《一個紅衛兵和他的元帥父親》^[1]曾提到：陳毅的兒子陳曉魯在家時，父子一起咒罵造反派和江青。1967年2月在著名的懷仁堂會議上，譚震林控訴說：“高幹子弟統統挨整，見高幹子弟就揪。”在多大程度上，高幹子女把父母的政治世界觀接受內化為自己的，以及父母又如何把子女的觀點情緒變為他們自己的，從而影響國家政治，比如對1967年2月各地的大鎮壓浪潮的影響，這是一個重要的、仍待研究的課題。在這個意義上，圍繞著“十二月”逆流的鬥爭，已經無法被群衆大民主的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式所規範，而走向對抗。

在中央文革和群衆造反派方面，十一、十二月間發生的看上去是彼此呼應、互相協調的保守派言行，使他們做出極端嚴峻的判斷：存在著一個密謀，這個密謀正在劉鄧、保工作組的“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校保守派和仍然堅持血統論的老紅衛兵之間醞釀（密謀甚至包括了對“逆流”加以密切報道的莫斯科電臺和東京電臺），認為這些勢力仍準備伺機反撲，使造反派歷盡千辛萬苦取得的成果（平反、批判工作組、否定血統論、集會、結社、出版大民主等等），都毀于一旦，而保守勢力最終又會以“黨的領導”的名義捲土重來，在“運動後期”對造反派實行“秋後算賬”。

[1] 載周明等編：《歷史在這裏沉思》第五卷，北嶽文藝出版社，1989年。

十九世紀末法國大革命中，革命的群衆和領導人多次做出“革命處于危險之中”的極端判斷。比如，1791年夏天，國王的逃跑、逃亡貴族的積極活動、凡爾登的失陷、外國軍隊的逼近等因素，就使群衆和雅各賓派領導人作出了這種極端的判斷，群衆中最激烈的一部分，還實行了大規模緊急處決犯人的極端行動。在革命內戰的情況下，人們的思考方式最容易受密謀論的影響^[1]。而文革歷史以特殊的方式重複了這個規律。

1966年12月16日起，文革領導人和造反派群衆對“十二月黑風”展開反擊，不過造反派群衆的行動比起1791年法國巴黎群衆要溫和多了。首先是12月16日召開“北京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出席了大會並講話。按照造反派群衆文獻的描述，“大會宣判了反動對聯死刑，敲響了‘東南海糾’的喪鐘。”在學生代表發言之後，江青發言說：“他們以貴族自居，血統高貴，什麼東西！”群衆熱烈鼓掌。之後，還有這樣一個把西糾的支持者“揪出來示衆”的文明批鬥的插曲：江青問大家：“要不要周榮鑫、雍文濤站出來看看？”（群衆強烈地回答：要！）“出來！”（群情激昂、憤怒）“好，安靜，安靜。戰友們，你們都認識他了，讓他們回去吧！”

周恩來在這次大會上發言說：“對那少數幾個，或者十幾個，或者幾十個，或者更多一點，總之是一小撮犯了嚴重錯誤的、甚至犯了罪的孩子們、小傢伙們，現在採取專政的辦法，逮捕起來了，加以法辦了。但是因為他們是青

[1] 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38–39.

年，只要他們誠心悔過，低頭認罪、坦白出來他們所以犯罪、犯這些錯誤的原因，可以更好地教育我們大家。^[1]”

據描述，“在‘12·16’大會精神鼓舞下，革命造反派向‘東西海糾’發動強大的攻勢，搗毀其頑固據點，制裁其首惡分子，揪出其後臺，揭露批判其滔天罪行。劉鄧反動路線的憲兵隊‘東西海糾’垮臺了！”^[2]”

這個“強大的攻勢”中，包括北京工業大學造反派組織“東方紅”公社準備12月23日召開十萬人參加的“全國在京革命派控訴鬥爭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譚力夫大會”，但在戚本禹、姚文元、王力的勸阻之下取消，戚本禹說：“用這樣的規模搞一個譚力夫不太適宜……搞這事當權派很高興，他有了替死鬼了。”^[3]譚力夫于1978年發表的文章中說：“是敬愛的周總理親自制止對我的萬人批鬥大會，不許轉移鬥爭大方向”^[4]，然而上述講話材料顯示，是中央文革成員親自出面對學生做工作，取消了這次鬥爭會。

同一天王力、戚本禹又去做了一、二、三司令部的工作，因為他們準備在25日開十萬人大會，鬥爭蘭小兵、XXX等西城糾察隊被抓起來的一夥人和周榮鑫，王力在座談時建議說：“開十五萬人搞這些小毛崽子，方向、目標的問題，過去北京市委鬥爭幾個小流氓、這是王任重他們搞的，王任重也沒有報告中央文革，這樣的錯誤不要再犯，……今

[1] 《江青、陳伯達、周恩來、康生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在“北京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上的講話》。

[2] 《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內容介紹》，《春雷》摧毀“聯動”組織、批判“聯動”思潮專刊，1967年9月；首都八一學校革命造反聯合總部主辦。

[3] 《戚本禹、姚文元、王力同志十二月二十二日與北工大“東方紅”公社社員座談紀要》。

[4] 譚力夫：《談談我這個老紅衛兵的遭遇》，《人民日報》1978年5月17日。

天我與戚本禹同志同各司令部商量這個會不開，類似這樣的會也不開。^[1]”

西糾成員是一些十五到十八歲的青少年，他們家庭背景特殊，其中個別人嚴重觸犯了法律，如何對待他們，顯然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在《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同志十二月二十三日晚在大會堂接見首都紅衛兵代表的講話》中有涉及這方面的評論，江青說：“西城區糾察隊我們調查了很久，伯達同志去了好幾次。如果說這個組織沒做一點好事，他們委屈。這個組織後來被壞人利用了，到處打好人，打死許多人。開始還打壞人，後來就打起好人來了。這是不允許的。我相信，西城區糾察隊大多數青少年是好的，他們來了嗎？（答：來了！）吳新起來了嗎？我要認識認識你，你們自己改正錯誤這好嘛。（吳答：好！）（大家鼓掌）”“對極少數小傢伙專政，是一種教育，有的通過他們的家長，讓他們的子女自己去投案，這些人之中，可能有將軍之子，元帥之子，國家主席、副主席之子，總理、副總理之子，部長、副部長之子。”“不要像西城區糾察隊那樣捉人，你們不要再犯。不要把人捉得太多了。”“就是那麼一小撮人，梁老彬，吳小宗，他們把打人慘叫聲錄下來聽，這是什麼行為。一小撮人颳了一股歪風，必須打掉！如果不打掉，我們的革命就會引到斜路上去。”

聯動的成立與終結

至 1966 年底，老紅衛兵——西糾在政治上被否定，但

[1] 《王力、戚本禹同志十二月二十二日與首都部分紅衛兵座談紀要》。

有多少人被拘捕，其中又有多少是因為刑事犯罪，還沒有詳盡的資料。然而，作為一個政治活動集團，它最有特色、最反映自己風格的表演，是在最後的一幕。這就是1966年底聯動的成立，和1967年初短暫時間內的活動。聯動的成立，既標誌著高幹子弟“老紅衛兵”的自我意識和獨特風格的發展高潮，也是它作為政治活動集團的最後的天鵝哀鳴。

《“聯動”事件始末》一文發表于1986年，作者之一徐雅雅曾是北京市戲劇專科學校的老紅衛兵，這是一篇被廣泛引用的材料，以特寫的方式記載了聯動成立的情況：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學二樓的一間會議室裏，正醞釀著一項重要的決定。

參加會議的是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華附中、京工附中、八一學校等海淀區十幾所中學“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

會議由北大附中的牛皖平主持，中心議題是：研究當前運動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

.....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黨中央，對它有意見為什麼提不得？”

“可現在誰提意見，誰就是反革命，這豈不是國民黨作風。”

“為什麼不許我們對當前運動提出自己的意見？我們中學紅衛兵應該聯合起來，和蒯、聾之流幹到底！”緊張熱烈的討論接觸到主題，這個建議一發出，立刻得到會議室裏幾十個人的響應。

那麼，這個組織應該叫什麼名字呢？

“我看，就叫‘紅衛兵第四司令部’。蒯大富是‘三

司’，咱們是‘四司’。”有人說。

“要不就叫‘造反兵團’……”

“現在司令部多如牛毛，‘造反兵團’也太俗氣，我看就叫‘聯合行動委員會’吧……”

“對，這個名字好！”會議室裏的氣氛活躍起來，大多數人都贊成“聯合行動委員會”的名字。而且，有人還建議前面再加上“首都中學紅衛兵”幾個字，和大學的“紅衛兵”以示區別。

會議持續了兩個多小時，“聯動”就這樣誕生了。大家決定，它的組織機構采用集體協商辦法，各校派出一名聯絡員，主持常務工作，由京工附中于增壽同學任總聯絡員，總部設在北大附中。宣傳工作由北大附中負責，組織工作由石油附中負責，并委托北大附中的宮小吉起草“聯動”宣言。

有關“聯動”的組織規模和成員人數，沒有準確和一致的記載。南京《紅衛兵戰報》（1967年2月2日）給了一個顯然是誇大了的描寫：“[聯動]有鋼院附中、石油、清華、礦院、北航、京工、師院、北大、農大、人大附中的紅衛兵、八一學校八一革命軍紅衛兵，紅衛隊，育承中學紅旗支隊，豐臺三中、長辛店鐵中、六中紅衛兵等七十多個學校四千多人組成。其中大部分是高幹子弟。……聯合行動委員會中最頑固的是十大縱隊，近一千人。頑固派賀信是特別縱隊。由各個學校頭頭組成。共有一百多人。”

12月5日是“聯動”正式成立的日子。這天夜裏，北京街頭出現了這樣一些標語：“熱烈歡呼聯合行動委員會成立！”“堅決擁護中央軍委四位副主席的講話！”“堅決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的表現形式”……為了製造聲勢，“聯

動”成員全力以赴，冒著刺骨的寒風，奔走在首都的大街小巷，京工附中鄒建平等竟爬上幾十米高的西直門城樓，用幾十張大字報紙刷了一條大標語，上面赫然寫道：“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

有關聯動成立後的第一次衝突行動，吳過著紀實文學《紅衛兵檔案》^[1]有下面的描寫：

12月6日，也就是“聯動”宣告成立後的第二天，牛皖平帶領十幾個“聯動”成員來到蒯大富控制的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筆者註：蒯大富並不“控制”三司，而是清華井岡山兵團的負責人，清華井岡山不是三司的成員組織〕，點名要求辯論揪鬥老幹部的問題。在大門口，牛皖平等“聯動”成員即遭到幾十名大學紅衛兵的圍攻，眼看寡不敵衆，牛皖平等人只好奪路而逃。

第二天，“聯動”再次派出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京農業大學附中20餘名紅衛兵，來到“三司”所在地。誰知道，對方竟用電話迅速調集了上千名紅衛兵，將“聯動”成員團團圍住。雙方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周恩來在得知“聯動”成員被圍困的消息後，他立即派出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前往調解。在周榮鑫的勸說下，直到第二天凌晨一兩點鐘，三司勉強同意放人，并要求得到明確的答復：“聯動”不得再來衝擊“三司”總部。

12月7日在民族文化宮，廖承志主持的“第二屆中日青年友好聯歡”籌備會上，“聯動”又與“三司”發生了一場衝突。衝突的焦點是聯歡會的主持權。“三

[1] 百度文庫：<http://wenku.baidu.com/view/bcaf056b561252d380eb6e42.html>

司”紅衛兵代表提出，聯歡會應由他們來主持，而“聯動”代表馬曉軍等人則堅決反對，雙方為此爭執不下。籌備會的召集人廖承志偏向“聯動”一邊，“三司”紅衛兵發現後，先是提出嚴重抗議，然後退場^[1]。

第一次“聯動”大會于1966年12月26日晚在北京展覽館劇場召開。在1966年發生的數不勝數的群衆性集會結社活動中，也許這次聯動大會是最為別開生面的一次了。下面分別來看從三個不同角度對同一事件的記載。

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編的《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資料選編》是從醜化的角度來描述這次集會的：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聯動以“破私立公”為名在北京展覽館劇場召開把矛頭指向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大會。由聯動頑固分子李單綢、項東平（京工附中），周春英，宮小吉（北大附中）張路寧（人大附中）馬小軍（石油附中）等人籌備召開，反動分子彭小蒙臨場指揮，並扇動其他聯動“老百姓”反中央文革。她對清華附中聯動分子張新月說：“你們反不反？你們不反我反。”宮小吉也高叫“反了！反了！”在彭，宮扇動下，首都《紅後代》七個反革命分子（其中一個是北大附中的李鐵兵）跳上臺聲嘶力竭地狂叫：“堅決批判以中央文革某些人為首的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央文革某些領導人不要太狂了”……

隨著他們的狂吼，“紅綢子們”發狂似的蹦起來，跳上椅子，跳上桌子，狠命鼓掌，哇哇叫好！鞋子，帽子，頭巾，傳單滿天飛舞，嚎叫聲，炮竹聲，震耳欲聾。

[1] 可對比“首都新兵”在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報》上對同一事件的記載。

是道出了自己的心裏話。彭小蒙按捺不住自己的興奮，奔上臺來，對剛剛念完反動口號的馬XX說：“念的好！我支持你，你們在學校幹，我在家裏給你們搜集材料。”還鼓勵大會主席周春英說：“你一定要頂住。大家情緒起來了，你要不支持就是右傾。”會後演了兩部電影。一部是毛主席8·18接見紅衛兵。目的是回憶一下自己的“黃金時代”，當看到他們自己的鏡頭時，簡直得意忘形！當鏡頭照到賀龍時，也使勁鼓掌。當出現中央文革首長時，他們就發出一陣叫罵。

這個大會就是一個反中央文革的烏七八糟的反革命大雜會。請看他們在這次大會上狂呼的反革命口號：

1. 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
2. 堅決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爲首的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
3. 堅決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幾天發表的反毛澤東思想的講話！
4. 誰敢亂捕革幹革軍子弟小心狗頭！
5. 反對亂揪革命老前輩！
- 6 活著幹，死了算！

《“聯動”事件始末》則從美化的角度敘述了這次大會：

……憤怒的力量終於在12月26日“聯動”的第一次大會上像火山一樣爆發了！

這次大會是在北京展覽館召開的，由北大附中的周春英主持。會議開始後，由清華附中等四個學校的“聯動”代表就運動以來本組織“紅衛兵”的成績和缺點作“破私立公”發言。但就在發言過程中，一份署名“紅後代”的傳單，引起了青年們的興趣，他們三五成

群地議論起來。後來石油附中“聯動”負責人馬曉軍、賀邯生等人索性走上主席臺，向大家宣讀這份傳單：“堅決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幾天發表的反毛澤東思想的講話！”馬曉軍的話音剛落，劇場裏就響起一陣暴風雨般的掌聲。接著的每一條口號都引起巨大反響。當讀到“反對亂揪老前輩”時，全場同時喊出“好！”這是幾千個革命後代從心裏發出的聲音！這是對中央文革、蒯、聾之流錯誤作法的強烈抗議！當馬曉軍他們又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這句口號時，全場幾千人全都楞住了，一秒，兩秒……突然像平地裏捲起了一陣狂風，全場沸騰了。大家發狂似地蹦起來，跳上椅子、桌子狠命鼓掌，大聲叫好！鞋子、帽子、頭巾、傳單在圓形屋頂下飄舞。爆竹聲震耳欲聾。接著大會放映了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記錄片，當鏡頭出現毛主席、周總理、賀龍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時候，掌聲響成一片，一出現中央文革成員鏡頭時，劇場裏却發出不滿的噓聲。這是多麼鮮明的愛憎，這是多麼大膽的挑戰呵！

最後，來看一位目擊者對當時情景的回憶：

聯動大會開張。本人家距會場不遠，故約兩小伴前往看熱鬧。無票在手，前門進不得。只好旁門伺機。苦等良久，忽見江克出來，此人乃小伴兄之好友，因此好說。恰巧此旁門直通大臺，故我等便落入大會主席團行列。且看臺上，數十人等，身著黃綠軍裝，臂戴尺長袖章。此類袖章，全無一字，正面紅綵，反面白綢。謂之曰“紅色恐怖壓倒白色恐怖”。再望臺下，人頭簇擁，全場爆滿。各個裝束，大體如此。有趣的是，與

會者雖多爲聯動及其鄉黨，但也不乏反對派人士。因此各呼各的口號，此起彼伏，好不熱鬧。文革初期“大民主”之風氣，此時尚存。主持大會之人是一小姑娘，據說名叫周春英，乃是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周榮鑫之女。在她指揮之下，衆人上臺慷慨陳詞。時間久遠，許多閑話難以回憶。只記得臺上臺下，“打倒三司！”之聲，聲聲不絕。

.....

石油學院附中一條不要命的漢子跳上臺來，大呼“中央文革小組的某些人不要太狂了！”。頓時全場嘩然，衆多人應聲高呼。群情激奮，幾乎話到嘴邊，只是無人喊出打倒江青罷了。也有人大叫反對中央文革就是反對毛主席。既然反對派人士在場，總要讓他們說說話。只是一位先生聲言只說一句話，半句未出口，便被哄下臺。激情過盡，悲從中來。衆小將回想幾月前的風光對之以今日之淒涼，頗感冤枉。于是乎高唱“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

大會開完，已過午夜。接著放蘇聯電影“區委書記”。片中游擊隊員舉槍宣誓“以血還血！以命抵命！”霎時間全場頓時群情激昂，齊聲高呼“以血還血！以命抵命！”，帽子橫飛，口哨亂響。.....

電影演畢，已是凌晨四點多，衆人餘興未銷，蹬車前往公安部解救落難的弟兄。這便是史載六衝公安部的第一衝。.....^[1]

材料顯示：老紅衛兵于一月二日在展覽館劇場又舉行

[1] 百虎：《第一次“聯動”大會目擊記》，《華夏文摘》增刊 156 期，1998 年。

了一次“破私立公，革命到底”大會，四日舉行了一次辯論會^[1]。另一篇回憶文章中也簡短地提及這些聯動大會，說：“同樣的大會後來又在不同的地點開了幾次。我參加了其中的大約兩三次。會場毫無秩序，主席臺上站滿了人，誰都可以拿麥克風吼叫一氣。有人帶著鞭炮，到處亂放，不時全場大唱革命傳統歌曲，一派烏烟瘴氣。大會結束，這些情緒激昂的聯動分子一哄而出，跨上自行車，號稱‘鬧不靈大隊’騎車游行，一路高呼‘反動口號’：‘打倒中央文革！打倒江青！油炸江青！’。現在想起來雖然荒唐，但當時的氣氛却頗為壯觀熱鬧。^[2]” 1967年1月4日的首都三司《首都紅衛兵》（中學版）還登出二日大會主席團的發言，以及幾篇評論文章。評論說：“一月二日的大會，可以說是十二月二十六日大會的繼續。但是，畢竟有所不同。二十六日的瘋狂反中央文革的叫囂的調子降低為瘋狂地反三司。^[3]”從主席團發言和評論看，出現了被稱為“西糾造反派”的聯動內部的反對派，這一派主張檢討過去的錯誤，收回反對中央文革的口號。

除了這篇主席團發言之外，聯動留下的原始文獻少而又少。然而，現存的幾份聯動通告，却最為生動地把聯動的心態和語言風格表現出來了，因此將所謂聯動“003號通告”抄錄如下：

[1] 北京三中遵義兵團：《打倒特權思想》，首都三司《首都紅衛兵》（中學版）1967年1月31日。

[2] 趙淮海：《也談“文革”》，《中國之春》一九九三年一月號。

[3] 編者按：《一篇值得深思的發言》，首都三司《首都紅衛兵》（中學版）1967年1月4日。

中央、北京黨政軍幹部子弟（女）

聯合行動委員會通告

中發秘字 003

中國共產黨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軍各軍兵種、中央軍委、國防部幹部子弟聯合行動委員會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禮堂正式成立。

聯合行動委員會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集體領導下工作。

聯合行動委員會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聯合行動委員會在馬列主義原則精神和中共歷次黨代會的一貫路線指導下工作。

聯合行動委員會的任務：

①堅決、徹底、全面、乾淨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二個副主席、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取締一切專制制度，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會，保證民主集中制在黨內生活中得到堅決的貫徹，保證中央各級黨委黨員的生命安全。

②堅決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產生的各級反動造反組織。

③堅決地肅清中共黨內和國家機關中的反黨分子，蔣介石分子，赫魯曉夫分子。

④鞏固三面紅旗，加強國防，保衛社會主義建設和無產階級專政。

⑤保衛黨的各級組織和優秀、忠實的領導幹部。

組織路線：在中央委員會直接領導下，發展過程

如下：

- (1)第一階段由中共中央、國務院、解放軍、省市委幹部子弟組成；
- (2)第二階段由基層組織（地委、專署與公社）幹部子弟組成；
- (3)第三階段吸收全國工農兵和出身他種家庭而政治表現好的。同盟軍：包括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士，中共黨員，共青團員，工農積極分子。

聯合行動委員會號召各省市革命幹部子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忠于馬列主義和一九六〇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繼承革命傳統，在各地迅速組織聯合行動委員會，貫徹中央、北京聯合行動委員會的一切指示。聯合行動委員會號召它的成員，無限忠于黨、忠于人民，戒驕戒躁，密切聯繫群衆，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和黨的左傾機會主義的惡劣影響，為黨、為人民、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直到流盡最後一滴血。……同志們，同胞們，應該認識到，我們肩負著黨和人民的重大歷史使命，肩負著歷史賦予我們的共產主義戰鬥使命，“我們一定要英勇、忠誠、幹練、堅貞、艱苦耐心地做好各項工作，迎接大反攻戰機的到來。”我們的困難是複雜嚴重的，我們的處境是白色恐怖的，不鬥爭，必滅亡。無數的革命前輩和黨員兄弟被圍攻，被拷打，被審訊，被迫害，許多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優秀戰士英勇地就義犧牲了，數以千計的黨的好兒子被監禁、監視和失蹤，看到這些，我們還有什麼不能拿出來啊！人民盼望我們，希望我們粉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他們罷工、停電、

絕食、請願，為我們做出了優秀的榜樣，我們莊嚴地向全人類和所有敵人宣告：我們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流鮮血，受迫害有何懼。我們的事業——馬列主義的事業必然勝利。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全黨黨員團結起來！

全黨全民全軍團結起來！

中國共產黨萬歲！

中國人民萬歲！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共北京市委革命幹部子弟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人大常委革命幹部子弟

中共中央軍委、國防部革命幹部子弟

十六省、市委革命幹部部分子弟

聯合行動委員會

公元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

和“003號通告”一起傳世的，是著名的“聯動六衝公安部”，這也是該組織最昭彰的一組集體行動了。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所編的《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資料選編》對此記載比較詳細，根據該文件轉述如下：

一衝：1966年12月16日晚上，“北航紅旗”將兩個企圖偷摩托車並行凶打人的“聯動”分子押送公安部。正在公安部接待室與公安人員接洽時，一夥“聯動”暴徒衝進了接待室，劫走凶手並打傷紅旗戰士。公安部的同志出面制止，這些暴徒非但不聽，反而破口大罵，衝撞公安部的工作人員，甚至動手打了一個前來解決問題的副部長。接著對其他工作人員圍攻、毆打，囂張至極。公安人員除將

其中打人最凶的幾個拘留起來外，繼續對他們進行耐心的說服教育。這樣，他們“承認”了錯誤，作了“檢討”。可是，釋放出來後，一反既往，一口咬定，說公安部亂抓人。

二衝：12月28日上午，“聯動”調來了二、三百名暴徒、強佔了接待站的八個辦公室，無理毆打在裏面辦公的同志，迫使這些同志離開辦公室。他們還大肆破壞、砸爛玻璃、電話機、把痰盂、茶杯、墨水瓶等向公安部院裏扔。工作人員在院內向他們喊話，請他們派代表來談，却被這些暴徒用彈弓打傷一個同志的眼睛，用石頭打傷另一個同志的頭部。中午，又有十幾個暴徒從窗戶跳進院內動手打人，當即被公安人員扣下，讓他們吃了飯，又對他們作了仁至義盡的說服，他們都先後承認了錯誤。到下午四、五點鐘，在接待室的暴徒，又都從窗口跳到院裏，將工作人員團團圍住，連罵帶打。另一部分暴徒圍攻一位患心臟病的女同志，該女同志當場昏倒，而暴徒不讓搶救，經過兩小時的努力才把病人營救出來。這幫暴徒又撞入大禮堂，把裏面的設備砸個亂七八糟。他們在禮堂裏吼叫：“高幹子弟要掌權！”“打倒第三司令部！”“打倒公安部！”“槍斃三司後臺！”“中央文革支持三司亂抓人”“公安部權力下放”等口號。這天半夜，一個副部長要找他們談，他們拒不理會，反而大罵“兔崽子”、“混蛋”等，把副部長趕出禮堂。第二天，即29日早上，他們把被扣留的二個打人凶手搶走，並將三個公安人員用繩子綁架到禮堂。進行圍攻、謾罵。有一個同志被他們用繩子勒住脖子，差點兒咽氣。他們還把裝大便紙的箱子扣在工作人員頭上。第二天，30日，工人、學生要求支援公安部，他們才蹣跚而退。

三衝：12月31日，“聯動”又糾集了近一百名暴徒，

再次衝進公安部接待站，強佔了兩個辦公室。工作人員請他們派代表來解決問題，他們置之不理，並動手打人，當場推倒一個女同志，踢傷一個男同志，經公安部同志耐心說服，他們到一月一日下午才灰溜溜地逃掉了。

四衝：1月6日晚上十一時左右，“聯動”又糾集了百餘名暴徒第四次衝公安部。這次他們公然從公安部的大門衝了進去。在裏面大撒反動傳單，寫著“活著幹，死了算”、“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等口號。以後又衝入禮堂，再次搗毀禮堂的設備，包括電話機、配電室等，并在禮堂內點放鞭炮，塗寫標語。第二天早上，公安部廣播室把他們的所作所為廣播出去，他們著慌了，企圖搗毀廣播室，但沒找著，便到處割電線，砸喇叭，他們又想衝進南大樓，沒有得逞，又轉而進食堂，把食堂的四、五十斤粉腸和五、六十斤豬頭肉搶吞一空。以後，群衆聞訊趕來，這夥暴徒謊稱總部來電話要他們回去，一溜烟夾著尾巴倉惶而逃。其實電話早讓他們砸壞了。

五衝：一月九日，他們又一次糾集五、六百人帶著菜刀、匕首等凶器企圖衝入公安部，大喊“打倒三司”、“打倒江青”。由於不少群衆聞訊自動趕來保衛公安部，“聯動”的企圖沒有得逞。但他們竟將“二踢腳”裝上鐵釘向負責守衛公安部的解放軍同志臉上扔去，使好幾個戰士受傷。

六衝：隔一天即1月11日，他們于二十八中集結，再次糾集五、六百名暴徒企圖第6次衝公安部。這次自動前來保衛公安部的群衆更多了，“聯動”一到，立即就陷入了群衆的汪洋大海之中，沒有衝成。在廣大群衆的嚴詞駁斥下，他們一小撮人理屈詞窮。但仍向公安部提出“最後通牒”，臨走時還喊出“油煎江青”，“打倒周恩來”，“打倒陳伯達”、

“劉少奇萬歲”等口號。

在 1967 年的頭一個月裏，聯動和大中學校造反派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既有包括像一月四日展覽館劇場辯論會這樣的文鬥，也有和“六衝公安部”類似的各種程度不同的暴力衝突，比如材料記載：北大附中井岡山等造反派組織多次被“聯動”抄砸；師院附中紅旗兵團“深入虎穴”，把大字報貼到“聯動”頭目家裏去；101 中毛澤東主義公社的小將“面對‘聯動’暴徒的匕首，堅強不屈”；許多革命組織走上街頭大造革命輿論，揭露‘聯動’的反動本質，動員群衆向‘聯動’作鬥爭”。似乎是歷史的諷刺，公安部門從數月前為西糾提供拘留所，角色倒轉為和造反派群衆配合行動搜捕聯動成員。據記載，“聯動”在京工附中的據點，在石油學院附中的組織部、在北大附中總部，在 1 月 17 日和 19 日之間被造反派群衆包圍、搜捕，數名聯動負責人被逮捕^[1]。

參加搗毀聯動在各中學的總部和分部的行動，每次都有數千到上萬群衆參加。聯動的“六衝公安部”行動，再次實踐了“激進的保守主義”的通常做法，即率先對體制內的法律秩序發動暴力攻擊。另一方面，在北京絕大多數市民心目中，從西糾到聯動已經“壞事做盡，罄竹難書”，導致“革命群衆無不恨之入骨”。此時圍剿聯動的行動，也變成了全民性的見義勇為的事情了。

比如，一份材料報道，對“聯動”的最後一個據點——“八一學校”的圍剿，是由“首都職工造反總部、海淀區農民、

[1] 《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內容介紹》；首都八一學校革命造反聯合總部《春雷》摧毀“聯動”組織、批判“聯動”思潮專刊，1967 年 9 月；喬伊、徐雅雅：《“聯動”事件始末》。

三司中學部、北大紅衛兵、師大井岡山、小教聯、財貿尖兵海淀分部、北京中教紅色造反團海淀分團等三十多個革命群衆組織”等三萬多群衆，“在當地解放軍、公安戰士的全力支援下”這樣一個盛大的場面中完成的。下面來看詳細過程：

北大附中、人大附中、京工附中、石油附中、一〇一中，及八一學校，都有〔聯動據點〕，而上述學校前五個據點都相繼被革命師生砸毀，唯獨八一學校這個據點變成了他們的避難所和大本營，他們在這裏集中了大量凶器，內外設防，利用校內地道、假山、樓臺、坑道，建成大小工事和堡壘，企圖作垂死掙扎。

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八一學校內“聯動”的負責人開會，該校革命派組織“農奴戟”“銅牆鐵壁”等戰鬥隊送信出來。為了不失戰機，北京中教紅色造反團海淀分團，立即採取行動，調集隊伍，擴大串連，于下午五時左右，革命師生隊伍首先插入，包圍了學校。“聯動”內部慌亂，有三輛摩托車直衝校門，想突圍逃跑。英勇的紅衛兵小將們，挺身而出，攔阻住兩輛摩托。當即捕捉了三名首惡分子。全場群衆鬥志昂揚，一片喊聲。許多人越牆而入。準備進行大搜捕。不料“聯動”分子轉移到屋頂上，居高臨下，進行猖狂反撲。為了避免武鬥事件，革命師生轉攻為守，退出校門。傍晚，各革命造反組織、機關工作人員、農村社員和海、陸、空三軍戰士、公安、民警都陸續趕到。戰鬥轉入第二階段。我前線指揮部和二線指揮部都成立起來了。電話局截斷了“聯動”的線路。第二次組織重點進攻。幾輛宣傳車發動了猛烈的政治攻勢。揭露“聯動”的

反革命罪行。反覆交代政策。使受蒙蔽的人逐漸覺醒過來。該校許多革命教職工和家屬也紛紛起來檢舉、揭發。到此“聯動”的防線即告全線崩潰。第三階段是大搜捕，搜查各種凶器贓物，搜捕潛藏分子，前後共捕獲一百二十餘人，經說服教育，誠心悔改者大部釋放，只將首惡分子三十三名送交公安部依法處理。^[1]

《“聯動”事件始末》也敘述了同一事件，為比較起見，照錄如下：

1月25日下午四時，謝富治指揮蒯、聾之流調集三萬餘名不明真相的群衆，要拔掉“聯動”的最後一個據點——“八一”學校了。他們把“八一”學校圍得鐵桶似的，師生一概許進不許出。五時左右，搜捕開始了。所有的教室、宿舍被統統踢開，暖氣管道被拆開，天花板被踩壞。當時在校的320名職工宿舍有一半被抄，儀器室、標本室、圖書館被砸得亂七八糟，前後抓走32名學生，甚至兩名同情學生的教師也被當作“聯動”抓走關進了監獄。

該文然後接著寫到：“這一罪惡行徑激起‘聯動’成員極大憤怒。……‘聯動’代表幾次到公安部要求面見謝富治，……于是，氣憤的‘聯動’成員們就在公安部的牆壁上刷上了……等大標語。……這就是所謂‘衝擊公安部’的真相。”這個記載犯了明顯的錯誤：“六衝公安部”發生在12月16日和1月11日之間，而且恰恰是因為聯動引起極大民憤，才導致1月25日的群衆性大圍剿。像這類時間顛倒、

[1] 《“聯動”在海淀的重要據點徹底搗毀》，北京中等學校革命教職工紅色造反團《教工戰報》，1967年。

因果顛倒的敘述，在該文中還有數處，而這正是 1976 年以後有關文革的官方和主流文字所最典型的筆法。

在整個鎮壓聯動過程中，並不清楚共有多少聯動成員及其同情者遭到逮捕。然而，可以確定的是，還有大量的聯動成員或其同情者在社會上活動，而且在 1 月 25 日之後，仍然參與了一些暴力事件，比如一九六七年年初發生的“二·八”衝擊鐵道兵學院事件。二月八日下午五點左右，七一學校的“七一”縱隊、一中的“要武隊”，“衛東彪”“革命造反隊”、二中的敢死隊和三中的紅色恐怖隊五十多人，乘一輛大卡車急停在鐵道兵學院門口，五十多人涌向大門，推開衛兵，衝進大院，由該院某高幹子弟、七一學校學生（其父正被批判）作嚮導，直奔革命造反兵團的辦公樓，進行武鬥挑釁，後被制服。後來其成員自供說：“我的確參加過‘聯動’。因為我認為我們高幹子弟被人看不起，被人踩在腳底下，北京三司亂抓人，我們高幹子弟要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反對北京三司。”交出的“罪證”包括：聯動的全紅袖章，五十多把鑰匙（其中包括數把汽車、摩托車鑰匙）、公章十多個、空白學生證、介紹信、半裸體女人照等等^[1]。

1967 年 4 月 22 日，聯動成員被釋放的數目是 139 人，但仍不清楚還有多少仍被關押或後來被捕的人數，以及被捕者當中，多少因為刑事犯罪，多少只是因言而被治罪。各種記載似乎說明，絕大部分西糾、聯動的成員或同情者這期間都獲得了自由，并有活動。比如：材料記載：四月五日清明節，聯動分子成群結夥去八寶山，在墓前大叫

[1] 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學院革命造反兵團的《革命造反報》1967 年 2 月 16 日報道。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散發傳單：“紅衛兵，革命漢，活著幹，死了算，鋼氣節英雄膽，灑熱血，捍江山，老子英雄兒好漢；不破不立反！反！反！”并高喊“打倒黨內最大的當權派”的口號。十點左右他們來到頤和園，三百多人買十幾張票往裏衝，擠壞服務員、游人、票箱、并動手打前來勸阻的解放軍。在園裏，他們以打流氓為名，大打出手，共打十七人，重傷六人，一人腦震蕩^[1]。

聯動成員在被關押三個月之後得到釋放，也是文革歷史中最為獨特的事件之一。這次釋放是根據毛澤東的親自指示，根據楊小凱的說法：“毛主席命令江青和公安部把關押的聯動份子全部釋放，還說允許他們自己出版報紙，條件是各地的公檢法機關把所有二月初關押起來的造反派學生全部釋放，保證他們的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2]”這個說法還未見到其他核實。然而，這裏值得一提的是：和在北京被捕的上百或數百名高幹子弟、保守派相比，在“二月逆流”的大鎮壓中，全國各地被捕、被鎮壓的造反派群衆在成千上萬之計，僅在新疆石河子“一·二六”慘案和青海“二·二三”慘案中被殺害的造反派群衆就在數百之計，武漢軍區“三·一七”一夜之間就逮捕造反派群衆上千人，廣州“三月黑風”期間被抓進監獄的僅“八一戰鬥兵團”成員就有六、七百人之多，等等^[3]。

據記載，釋放當天，周恩來、江青、康生、陳伯達、

[1] 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資料選編》。

[2] 楊小凱：《牛鬼蛇神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

[3] 劉國凱：《文化革命簡析》，《人民之聲》特刊，第二期，1980年12月。p147；《珠影“東方紅”》，p101。

戚本禹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的會議室會見了被釋放的聯動成員。中央領導人對聯動成員講了四點：（一）毛主席指示釋放聯動分子；（二）聯動是反動組織，它的反動思潮要批判；（三）中央文革是支持中學革命造反派的，回校後不要和造反派鬧對立；（四）聯動不要搞請罪。

隨著聯動的釋放，北京大中學校園裏造反、保守兩派的衝突再次興起。很多地方記載：不少學校的“聯動”成員召開了“老紅衛兵新生大會”；“聯動”部分成員串連在一起，與北京二十八中的“四·三派”發生武鬥，佔領二十八中達三天之久，還在全市搜捕對立派觀點的人。《展覽》記載：四月二十八日深夜，聯動十六縱數十人圍住了在天安門前貼標語的鋼院附中同學，發生爭吵，二十八中“八·一八”紅衛兵數人趕來解圍，也被分割包圍。他們用皮帶、刺刀、匕首、壘球棒、長劍朝被圍的同學猛抽亂砍。有的頭被打破，有的臉被打腫，有的肚子被刺傷。

一篇材料介紹《從聯動分子被釋放到工大校園裏的一場鬧劇》，材料說：

五一節前夕，工大校園裏標明“首長講話”的一張大字報引起爆炸性的反響：給聯動平反了！聯動是革命小將！！隨後，兩張大字報又出籠了，一張以偽造的首長講話“聯動也是革命小將”為依據，叫喊“原工大紅衛兵就是這樣的革命小將”為譚力夫翻案。隔了一天，一張以“為毛主席的命令歡呼”為題的大字報說：“毛主席釋放聯動的這一英明決定，解放了聯動，為它平了反，宣布他為合法組織……”。甚至還貼出了大張的海報：召開大會討論學習這份偽造的“講話”。兩三天時間內，一個個鄭重聲明、嚴正警告、“為我平

反”、“給我道歉”的要求投向了工大東方紅公社（該校造反派）。隨後，中央文革接待站明確指示對那個講話要闢謠：“首長沒講聯動是革命小將，沒給他們平反，沒講銷毀他們的材料，沒講他們以後犯錯誤不抓了，江青總理都沒流泪，并指示：對聯動思潮要狠批。^[1]”

可見，釋放聯動所引發的衝擊還是相當大的。對於釋放聯動，大多數造反派群衆是不太滿意的，對聯動的憤恨和反感長久不能消除，群衆出版物上經常出現類似花邊新聞式的短小消息，比如：

△五月五日中午，一夥“聯動”“輕騎隊”三十餘人，飛車高呼“打倒流氓！”到二里溝時，遇見兩個陌生行人。這一小撮“聯動”頑固分子不問青紅皂白，一頓拳打腳踢皮帶抽，直至把人打昏到，才揚長而去。解放軍問訊趕到現場，問明情況，火速駛車追捉凶手。

△近來，“聯動”在紫竹院活動頻繁。他們多在夜間十一點後秘密集合，四周放上崗哨，開黑會，極力發泄對革命造反派的仇恨。會後，有的爬到塔上，狼嚎鬼叫。

△四月二十七日，安定門外有三個學生被“聯動”打傷投進青年湖裏，原因是有一個學生穿白球鞋未繫鞋帶^[2]。

由以上各例可看出，一些老紅衛兵的行為已經主要局限於情緒發泄性質的破壞、惡作劇等等。大約是聯動所發

[1] 朱懷章等：《從聯動分子被釋到工大校園裏的一場鬧劇》，紅代會北工大東方紅公社《東方紅》1967年5月6日。

[2] 首都八一學校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聯合總部《春雷》第7期，1967年5月24日。

出的最後一個“通告”(日期在四月到七月之間)，也透露出老紅衛兵自始至終所特有的那種狂暴、荒誕和滑稽和特點：

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

首都紅八月革命造反司令部

緊急聯合通告

中發 7431 密字 3452 (注意此為暗號！)

(下發各縱隊各校支隊)

繼本聯合行動委員會十日發出密件後，各縱隊、校支隊立即行動起來，戰鬥成果輝煌，大長紅五類威風，但近日狗崽子活動更為猖狂尤其是四中王八蛋的“紅四月”運動流傳全市，企圖煽動全市的狗崽子對我們革幹革軍子弟進行專政。

希各縱隊、校支隊配合當前形勢立即行動起來，再次打擊狗崽子的進攻，顯一顯我們紅五類的威風，每個戰士召集革幹革軍子弟藉四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社論和四月十四日戚本禹講話之名把狗崽子給壓下去！搞壞這些“左派”和解放軍的關係，狠打狗崽子的威風，把他們整下去。

各縱隊、校支隊、每個戰士見此通告後，立刻照此精神緊急行動起來，給“左派”們加上“反解放軍”、“反軍訓”的罪名，直至搞臭，搞到紅五類上臺。

打倒狗崽子！鎮壓流氓！

革幹革軍子弟就是要掌權！

特急

火速

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

首都紅八月革命造反司令部

一小部分老紅衛兵仍在利用群衆大民主的形式堅持鬥爭。比如首都中學紅代會的報紙《兵團戰報》（代表中學造反派“四·四”派觀點）1967年4月27日刊登了署名師大女附中“不怕摔跟頭”的文章《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這篇文章為老紅衛兵鳴冤叫屈，批評造反派不能正確對待老紅衛兵，而是壓制、打擊他們。更有一些老紅衛兵辦起自己的出版物，包括《萊茵報》、《湘江評論》。筆者手中各有一份樣品。《萊茵報》註明編者是“首都紅衛兵萊茵報編輯部”，聯繫地點是“北京二中”，而且印有德文刊頭“Rheinische Zeitung”，大概是顯示傳承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或者炫耀熟讀原著的程度（可惜德文拼錯了）。因為只有這份創刊號，所以無從知道出版了多少期。也無註明日期，但從文字中看是1967年8月出的。一篇署名“湘江潮”的文章還對“四·三”派、“四·四”派作了一番品頭論足的評論。《湘江評論》樣品是1967年5月29日（第二期），編者是：清華附中紅衛兵、北大附中紅衛兵、人大附中紅衛兵、北航附中紅衛兵、北師大女附中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湘江評論》編輯部。聯絡地址是北大附中。該期登載了上述五校老紅衛兵組織《關於申請加入中學紅代會聲明》^[1]。老紅衛兵其他方面的重要活動，就是組織“老兵合唱團”，排演了大聯唱《紅衛兵組歌》，其成員包括參加過聯動的魏京生^[2]。

還值得記載一筆的，是西糾、聯動成員在廣州開辦的“紅衛兵農墾戰鬥團”。材料記載，1966年9月，西糾和其他一

[1] 按照《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的記載，老紅衛兵還辦有刊物《準備！》（紅色封皮，上書“準備”兩個大字，下方空白無字）。

[2] 趙淮海：《也談“文革”》，《中國之春》一九九三年一月號。

些高幹子女成立了“紅衛兵農墾戰鬥團籌委會”，準備到新疆、東北辦軍墾農場，後來由陶鑄、趙紫陽和廣東省農墾廳安排，選擇了廣東英德、從化、大林、海南島作為基地。據後來從“紅衛兵農墾戰鬥團”中殺出來的“紅色造反小分隊”的揭發說，在農墾團裏，也奉行血統論，看不起工農子弟和外地同學；脫離工農群衆，計劃農墾團進島一批人，農場職工就要撤走一部分，最後全部取代；有些人消極空虛，進島時帶著奶粉、咖啡，在勞動中抓螃蟹、抓蛇、玩耗子、養狗取樂^[1]。

大約在釋放聯動前後，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在八一學校內舉辦了“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據記載，展覽期間，聯動成員多次組織衝擊展覽會場，高呼“還我‘聯動’！”“‘聯動’永存！”等口號，在留言簿上惡毒咒罵等等。展覽會印發了《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資料選編》，除了文字材料外，還附有 24 張照片，其中包括：地質部事件中的人群衝突、一中勞改所的部分刑具、六中勞改所的崗樓、監獄牆上的標語“紅色恐怖萬歲”、宮小吉頭戴大沿帽擁抱地球儀的照片、帶有被砸得血肉模糊的麻雀的恐嚇信、八一學校“大觀園”式的宿舍，等等。今天各種各樣的有關聯動的信息、傳說，來源大部分都可以追蹤到這份材料，包括“遙憶當年送沙果”等聯動詩抄。當然，今天的文字大都是有選擇地抽取信息，並且根本不說明信息的來源。

《“聯動”事件始末》據說是幾位當事人在進行了反覆

[1] 紅衛兵農墾戰鬥團紅色造反小分隊：《揭露陶鑄支持“紅衛兵農墾戰鬥團”的政治陰謀》，首都批判劉鄧陶聯絡委員會《批陶戰報》1967 年 4 月 10 日。

調查的基礎上撰寫的，這篇文章一開始有這樣一段：

1967年夏天，北京“八一”學校院內，舉辦過一個名噪一時的“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展覽以所謂觸目驚心的大量“事實”把充當“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急先鋒”的“聯動”成員，描繪成一群“腐化墮落”、“窮凶極惡”、“青面獠牙”、“手揮皮帶”，專搞打、砸、搶的“暴徒”，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炮製展覽會的陰謀家們心裏完全清楚，這一切都是假的：所謂“聯動”的“高級消費品”是外貿部抄家得來的財物；匕首、鐵棒等凶器是從公安局借來的；自行車是從一些學校學生手裏扣下的；外國畫報是從圖書館裏搬來的；而那些被砸壞的教具和標本則是蒯大富、聶元梓之流指揮一些打手一手砸壞的……

這是一個用心多麼險惡的騙局呵！

文革的鬥爭，仍然是當代的鬥爭，連辯論的策略和風格都面貌依舊，以上文字就是最生動的一例。由於以上斷言和本章所大量依賴的文字證據有關，這裏稍加討論。不能否認，文章的指控或許部分成立，但真正的問題是：以“由上而下的密謀論”觀點，能否就把一場高度複雜和曲折、有廣泛群衆參與的歷史事件，特別是它所留下的大量豐富的文字遺產給一筆勾銷呢？這實質上涉及到如何估計精英對群衆的操縱能力，特別是在一個大眾印刷技術相對普及、出版印刷、言論表達的主體高度多中心化的情況下，精英操縱大眾文字記錄的能力。筆者在寫作本書時，總是記住：文字記錄是以曲折變形的、間接隱晦的、有時甚至是顛倒和反諷的方式，反映社會實際和事件真相。文字記錄本身的風格，如含混還是清晰、概括還是具體，遮掩還是揭露，

就是對其是否誠實加以評價的線索。比如，比較《“聯動”事件始末》和《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會資料選編》這兩篇文件，它們對事件的敘述、證據的展示、背景的交代等等，的確有不同的文字風格，這一點相信讀者也能够做出判斷。

其次，我們不是在判斷一兩個具體記載的真實于否，而是在討論：整個一批文獻，整個一座信息庫，整個一波文字運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賴，作為今天復原歷史過程的基礎。這裏應該注意到：文化大革命中群衆出版物（包括展覽這樣的多媒體形式）所特有的高度分權化、高度基層自主化、信息渠道的分散甚至紊亂。這裏，無非是在用另一種語言來表達：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群衆運動的一致概括——“天下大亂”——特別是其在信息傳媒領域的反映。根據常識判斷，在這樣幾乎“無序”的信息紊流中，《“聯動”事件始末》作者所指控的“這一切都是假的”、“用心多麼險惡的騙局”能夠有多大可能完美實現而不露馬腳？群衆出版物對聯動的記載成篇累牘，但描繪出的形象却高度一致，考慮到群衆出版物在其他方面的活潑多樣，甚至包括它常見的混亂、訛誤，說它們參加了一個共同的密謀，自始至終在默契配合，精心偽造栽贓一個聯動冤案，不太符合常識。

首都之外的“聯動”和相似的社會集團

北京是全國高幹子女最為集中的城市，這是產生聯動的空間、生態背景。外地一些城市，也有不同規模的高幹子弟學校，以及高幹子弟的小圈子、小社會。比如：有的

材料提到南京有升學率高、高幹子女雲集的南師附中、寧海中學、南京九中等，和聯動相似的組織，外地有福建的“東海兵”，廣州的“主義兵”等等。這裏引述兩個材料，說明在北京之外的大城市裏和“聯動”相類似的社會集團的背景和活動狀況。

第一份材料介紹西安市第一保育小學這所高幹子女集中寄宿制學校。該校的前身于一九三七年在延安成立，當時主要招收革命遺孤和革命戰士、革命幹部子女。自一九四九年以後學校逐步成爲西北地區的“貴族子弟學校”。學校規定只招收十三級以上幹部子女。在一九五七年後，又開始招收教授、導演、名演員的子女。學校學生的家長，包括：習仲勛、張德生、趙守一、牛衛中、張鋒伯、郭琪、李宗陽、柯仲平等。學校僅有千餘名學生，竟佔地上百畝，環境幽美，條件優越，待遇特殊。學校座落在風景優美的南郊西北局機關宿舍旁邊。學校裏花園，果樹，洗衣房，理髮室，圖書館，體育室，醫療所，洗澡塘，縫紉廠，木工廠，應有盡有。一切設備盡善盡美，追求第一流水平，講究高級化。

爲了保證這些子弟的健康，醫務所就配備有十三個醫務人員，而且多是經省、市委和教育局挑選來的好大夫。醫療器械，齊全無缺，治療醫藥，應有盡有。連許多大醫院都沒有的貴藥品，這個醫務所都樣樣配齊，其他像隔離室，病房，鋼絲床等，勝似一般醫院。學校每班都配有1—4名保育員，專人給學生送洗臉水，洗衣，洗澡，掃廁所。教職工跟著學生屁股團團轉，甚至學生洗頭，洗腳，剪指甲，梳頭都要保育員包了，學生在這所學校裏完全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生活。

當地領導人對該校老師說：“咱們這些學生，將來都是

直接接班的，都是當然接班人。”“像我們學校的學生，家在機關，住在城市，父母都是領導幹部，不升學怎麼辦？”他們在教師中散布“咱們學校學生的家長都是領導幹部，他們忙忙碌碌的工作，把孩子交給學校，如果升不上中學，咱們咋有臉去見家長呢？”給教師施加壓力。曾經有一度，因為該校學生是高幹子弟，不經考取，破例全部“保送”到“重點中學”。

學生被關在這與世隔絕的“大觀園”裏，不參加勞動，不接觸社會，來回往返汽車接送，誇官比級，揮霍浪費。有的竟然拿飯菜打架，對教工極不禮貌，視作下等人，對勞動人民更無感情。在圖畫課上，有個學生在一個農村小娃拾糞的圖畫邊上寫上了“鄉裏棒”三個字，哈哈大笑；有個教師穿了件中式衫子，有的學生竟耻笑道：“鄉巴佬！”學校附近是農田，看到農村小娃，有些學生譏笑地喊“稼娃，稼娃……”。進了中學也是如此，他們和工農子女相處不在一起，嫌中學的飯不好吃，整天逛大街，買零食，下館子，甚至經不起三年自然灾害的考驗，招搖撞騙，貪污盜竊，而犯罪遭法辦。

按照這份材料，西安地區的高幹子女組織是“紅色恐怖隊”。材料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觸動了他們的特權地位，有的“紅恐”分子公然叫囂：“我爸爸革命三四十年了，最後落了個黑幫。”有的還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高幹子女倒了霉！”

材料說：“十幾歲的小學生，由於修正主義毒害，有一小撮人忠實地充當了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御用工具。他們把鬥爭矛頭對準革命教工，千方百計保黑幫分子過關。對教工拳打腳踢，吐唾沫，澆涼水，皮帶抽，石頭砸，揪

頭髮，挂牌子，實行武鬥，製造恐怖。他們叫囂道：‘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比地主、資本家好，’‘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受害者，今後也要給出路呢？’他們破壞鬥爭會，覆蓋造反派的大字報，還在人家大字報上批語亂罵，至今還有人暗中聯繫，秘密組織，積極為‘西紅司’‘紅恐隊’翻案，並企圖將‘八月紅衛兵’大本營設在本校，與造反派對抗到底。”

在情緒發泄性的暴力破壞方面，他們的行為模式和北京的西糾、聯動有很大相似之處：“他們亂打，亂搶，亂燒，亂偷，有的燒學校的竹簾，有的燒桌椅床凳，有的偷電線，有的卸廣播，人少居住的地方，玻璃全部被砸光；空房子的銅鎖全部被拆卸賣掉；全校路燈和空房的燈泡全部被打碎，圖書館五次被砸，書籍大量被搶，體育室被撬開，體育用品被偷走，木工廠另件被拿走，少先隊隊部徹底搗毀；連為他們效勞的衛生所也被砸搶，全部鋼絲床的彈簧被拆掉了，有一間房的瓦被打碎剝光，他們幹完後還寫上‘破壞縱隊永垂不朽！’的反動標語”^[1]。

另一份材料《堅決砸爛新疆的“聯動”》，是有關新疆八一中學的情況，材料雖然沒有介紹學校的情況，但可以推測這是新疆烏魯木齊市高幹子女比較集中的一所學校。材料顯示，直到 1967 年五月份，“新疆八一中學的革命造反派師生仍在遭受殘酷迫害”，迫害者是“長期實行白色恐怖”的八一中學“紅造部”。

材料把八一中學“紅造部”比作新疆的聯動，說他們

[1] 《西安市第一保育小學是培養修正主義的苗圃》，《春雷》砸爛幹部子女集中制、批判“聯動”思潮專刊續編，1967 年 12 月；首都八一學校東方紅公社主辦。

倚仗强硬的後臺，把矛頭不是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是指向革命造反派，指向廣大革命的師生員工。他們專搞武鬥，製造恐怖活動，鎮壓群衆運動，宣揚血統論，勾結“聯動”，到處招搖撞騙，打人、殺人、搶劫錢財。

材料接著介紹“五·九”流血事件：

“我校造反派師生員工長期以來，受盡了‘紅造部’的迫害，四月二十九日造反派師生的血迹未乾，五月九日，又向我們下了毒手。這天，這群法西斯暴徒，手執鋼絲鞭，在校園裏橫衝直闖，見人便打，無法無天。一姓任教師見這群暴徒追打紅二司的教師，只說了聲‘要文鬥，不要武鬥’，就被一群暴徒用石頭猛擊臉部，當場流血不止。暴徒仍不甘心，獸性打發，提來一大桶尿，劈頭蓋臉打下去，幾十人把他按倒在地，倒拖雙腳，邊拖邊用腳猛踢腹部，用鋼絲鞭亂抽，折磨了四十五分鐘之久，幸好紅二司戰士聞訊趕來，才免遭一死。另一教師的愛人，剛生孩子一天，就被趕出學校，并把這教師連續綁架三次，進行毒打，折磨得奄奄一息。更可惡的是八十人圍打我造反派工人鄭志良，把他按倒在地，用鋼絲緊捆雙腳，倒拖數百公尺，又關到家裏用鋼絲鞭、皮帶、自行車鏈條抽打，用腳亂踢，這工人被打得從床上滾到床下。不僅這樣，暴徒還用錐子在他臉上猛刺三錐，并用開水澆灌傷口，還企圖挖出他的雙眼，這群野獸如此毒打我造反派師生員工，是可忍，孰不可忍！但他們並不罷休，在五月九日下午他們又衝進‘遵義’大樓，見誰打誰，在樓裏的幾十名教師和學生無一幸免，個個被打得鼻青臉腫就連受傷躺在床上的某教師也不放過，拉起來毒打，

直至打得眼看不行了，才將其塞在床下。臨走時將大樓洗劫一空，師生個人的生活用品，被砸得粉碎，這群暴徒掏錢包，掏手錶、撕飯票，無所不為。在此同時，他們又分頭洗劫了數家造反派教師，其景慘不忍睹。我造反派師生全被趕出學校，至今搞得衣食無著，流落街頭，妻離子散。^[1]”

以上這個材料的缺陷是：沒有提供更多的政治信息和背景，使我們不知道流血事件的前因後果（這也是很多文革中群衆出版物的問題）。唯一可以印證的材料是《展覽》記載：北京的聯動同烏市“八·一”學校組織“紅造部”（由本地革幹革軍子弟組成）勾結，搞地下聯絡站，寫標語，散傳單，並大搞打砸搶等恐怖活動，專與“紅二司”等造反派作對，烏市人民無不切齒痛恨。從其他地方可知：紅二司是新疆造反派的聯合組織，材料所記載的暴力，表現出和北京的聯動相類似的行為模式，也反映了1967年春夏之交全國各地所面臨的內戰氣氛。

階級、統治與革命（之背叛）

從“對聯”到“聯動”的演變，是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時的精英和群衆都沒有料想到的，它是極為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極為特定的社會互動所產生的結果。然而，這個奇特的“激進的反動”的產生，又必然具有深層結構和制度上的原因。在一個試圖消滅階級差別的社會裏重新出現

[1] 新疆八一中學瑞金紅旗：《堅決砸爛新疆的“聯動”》，《春雷》摧毀“聯動”組織、批判“聯動”思潮專刊，1967年9月。

社會不平等，出現“比資本家還厲害”的特權階層，這是社會層面的背景。這裏，我們著重對主流的革命話語體系進行一些分析，因為這裏早已隱藏著“血統論”的滋生的溫床。這裏所說的，就是有關無產階級掌握政權、成為統治階級、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等一整套話語，如果在無批評反省的情況下，就會腐化蛻變成為新的壓迫意識形態，為新的不平等進行辯護。

先來看：在革命話語主導時期內，很多詞的使用都是“一語雙關”的，比如“掌權”、“接班人”、“前輩、後代”、“紅色江山”等等：“掌權”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一語中，是集體的、抽象的，是指國家的性質，而當鄧小平對子女說：“工農、革幹子弟掌權，這是一個方向”，“掌權”的意義是個人的、具體的，意思是指：具體某些人的兒子、女兒將要擔任國家領導人的職位。同樣，毛澤東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項條件”裏的“接班人”，是指普遍意義下社會主義的“新人”，而當老幹部對自己的孩子叮囑要成為“接班人”時，通常是指“接父母的班”，而這包括繼承父母個人所擁有的在政治、經濟和社會聲望方面的資源，正如同繼承老子的私人遺產。同樣，當說到“革命前輩”、“紅色後代”時，永遠存在著一個語言的雙重遊戲：它既可以是堂而皇之的革命誓言，又可以是特權家庭的自戀私語：“革命前輩”——老子英雄，“紅色後代”——兒好漢。而血統論對聯，正是捅破了一層窗戶紙，乾脆把雙關的兩種意義重合在一起了。

顯然，這裏靜悄悄地發生了一場在話語層次上的私有化政變。以一語雙關的革命術語為橋梁，將共產主義的聖彩，不動聲色地貼到私人特權利益的臉上，原來革命話語裏的一切神聖的權威，都被用一個談話的技巧所盜竊了。“革

命前輩打下的紅色江山”，漸漸地和封建王朝的“國家社稷”有了語義上的互換性。當“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基石地位的概念，也經過這樣的偷換，革命話語就被篡改成爲一個當代種性等級理論了。

革命話語本身的含混，牽涉到基本理論中的一些盲點：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確切意義是什麼？無產階級掌權後是否還是無產階級，或者說是否要開始消滅自己？國家是否立即開始消亡？作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統治誰？誰是資產階級？前資產階級的殘餘，還是自己頭腦內的資產階級，甚或在特權階層內已經產生的新資產階級？

歷史學者莫里斯·邁斯納認爲：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階級，存在著三種不同定義，這三種不同定義代表了三種不同的政治立場：一種是以家庭出身界定階級，這種定義對應著保守主義立場；一種是所謂“新階級”觀點，即以新生的官僚階級、權勢階級以及新生的不平等來界定階級，這種定義對應著革命的立場；而以“重在表現”來界定的階級，其政治立場則是改良主義的。按照邁斯納的分析，中國官方的立場在文革前夕和文革當中，主要是在這三種之間搖擺，而且主要是在保守主義和改良主義之間^[1]。

世界歷史反覆告訴我們：保守主義可以在一個取得政權之後的革命政黨機器內部迅速地發展出來。在這個過程中，革命政黨迅速地走向其反面，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只是把這種日益積累的矛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在話語和修辭層面，這表現爲：“革命”到底是什麼意思？爲什麼

[1]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A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of Mao's China. The Free Press, 1986. p325.

“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造反有理”也是相對的嗎？革命造反，是理解其普遍解放的意義，還是政權更迭、改朝換代的意義？從“激進的反動”的理解來看，革命只是打江山、坐江山。這種理解在本質上是保守的，革命的一切意義最後也只剩下保守的意義了——保守革命所帶來的特權。那麼，在“坐江山”問題上，新的統治階級能比舊的統治階級做的更好嗎？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裏的一段話在這裏似乎較為相關：“每一個取代前一個統治階級的新的階級，為了達到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代表全社會的利益，……進行革命的階級從一開始，僅僅因為它反對一個階級，所以似乎是代表著整個社會；它似乎是全社會的群衆鬥反對同一個統治階級。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它的利益和其他非統治階級的利益更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因此，每一個新的階級，都在比前一個統治階級更廣泛的基礎上取得盟主權，其後果是：以後，非統治階級反對新的統治階級的鬥爭要發展得更加尖銳、更加深刻。”

總之，這裏牽涉到無產階級如何解放自己、解放本階級、取得盟主權、解放全人類的討論。社會主義革命是“翻烙餅”，還是不平等社會的根本的、結構的改變？這是從“對聯”到“聯動”的尖銳、深刻鬥爭的歷史給人們的啓示。

附：老紅衛兵、西糾、聯動及其同情者部分人名錄^[1]

姓名	學校	組織	家庭背景	著名言行
彭小蒙	北大附中	紅旗戰鬥小組	彭炎之女	
宮小吉	北大附中	紅旗戰鬥小組		《换取五分的秘密》
牛皖平	北大附中	紅旗戰鬥小組		
周春英	北大附中	聯動發起人	周榮鑫之女	主持聯動成立大會
蘇秋濱	北大附中	聯動成員		
卜大華	清華附中	清華附中紅衛兵	革軍	
駱小海	清華附中	清華附中紅衛兵	革干	《一、二、三論》
熊剛	清華附中	清華附中紅衛兵	熊向暉之子	《無產階級的……》
孔丹	北京四中	西糾負責人	孔原之子	
王尚榮	北京四中	西糾成員	王任重之子	
陳曉魯	男八中	西糾發起人	陳毅之子	
蘭小兵	豐盛學校			負責和周榮鑫聯繫
鄒建平	京工附中	聯動成員	鄒家尤之子	爬上西直門刷標語
趙丹平	京工附中		趙如璋之子	
于增壽	京工附中	聯動成員		
馬曉軍	石油附中	聯動成員		
賀邯生	石油附中	聯動成員		

[1] 關於彭小蒙，《展覽》說：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集體加入聯動，但又說，彭小蒙還說過：“我不參加聯動，並不是我不反中央文革，因為聯動反的不是點兒，只知道亂沖，把老子逼急了，老子比聯動還反動。”

姓名	學校	組織	家庭背景	著名言行
董良翮	北京六中	西糾、聯動	董必武之子	
董福三			董必武之子	在廣州辦農場
劉丹利	人大附中	聯動成員		66年底大鬧新疆
劉微賓	女三中	聯動成員		在廣州串連
宋彬彬	女附中	聯動成員		給毛澤東獻袖章
伊林·滌西	北農大附中			《致林彪同志……》
譚力夫	北工大	北工大紅衛兵	譚政文之子	《八·二〇發言》
賴銳銳	北航	八一縱隊負責人	賴際發之子	《四問中央文革》
李洪山	林學院	文革籌委會		《踢開中央文革…》
易振亞	清華物八	清華大學紅衛兵		“12月黑風”中活躍
朱成昭	北京地院	地院東方紅、三司		抓彭德懷；同情聯動

註：不包括《展覽》的“清華大學高幹子弟掌權概況”已有的那部分名單。筆者沒有信息之處留為空白。

第九章 奪權案例：1966–1967年《北京日報》的群衆微觀政治

一九六六年一月，全國各地發生奪權的“一月風暴”。這雖不是通常意義的政治革命，但也決不是通常意義的政治清洗或官員換馬。所謂“奪權”是借用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一個專門詞彙對當時中國群衆政治的獨一無二的創造的修辭稱謂。各地的“奪權”過程，都是一個群衆性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地震，其不同于傳統意義的政治革命或政變的獨特性質，恰恰可以用“革命內部的革命”來概括。因而，文化大革命中的“奪權”比一般意義的政治革命有更大的不確定性。許多省份發生的混亂、衝突和僵局說明了這一點。比如：廣東省革聯的“一·二二”奪權，安徽“一·二六”奪權，江蘇“一·二六”奪權，都是不成功的，遭到廣泛反對或其他派別的反奪權。通常，矛盾發生在不同派別的造反派之間，發生爭論的有關問題也各種各樣。因為“一月風暴”規模極為龐大，涉及到廣大的地域和衆多的單位，過程極為曲折複雜，各省市自治區、各級單位的奪權歷史都值得詳細考察，想要顧及全面，不是在單獨一章裏能做到的。但是，又有必要以個別的案例說明奪權所遇到的各種可能情況。因此，本章以一批有關《北京日報》奪權的

比較完整的檔案（包括對立的兩派的不同材料）為依據^[1]，來大致復原出《北京日報》奪權過程中兩派不同的造反派之間的鬥爭的情況，即知識分子佔優勢的“造委會”與工人佔多數的“聯委會”之間的矛盾。希望通過《北京日報》這個不是很大但比較重要的單位的奪權過程中的微觀政治的考察^[2]，能够有助于我們瞭解文化大革命中基層的具體鬥爭，以及評價有關具體鬥爭和其解釋框架的“元叙事”——“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之間的關係。

從文革開始到奪權前夕

《北京日報》是最早受文革運動影響的單位。由於《北京日報》是在舊北京市委的領導之下，以及被指責在批判“三家村”時“假批判、真包庇”，早在“五十天”開始之前，《北京日報》就發生了權力變動。1966年5月底，北京市委被改組，隨後，新的北京市委立即成立了《北京日報》的新編委會。北京新市委1966年5月25日成立新的《北京日報》編委會的決定全文如下（這份文件發表於1966年6月7日《人民日報》）：

“(一)撤銷《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原來的編委會；
撤銷范瑾的社長職務。
(二)成立新的《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編委會，

[1] 文件收錄在：《紅衛兵資料》，Vol 18,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Washington DC, 1975, P5644–5655

[2] “微觀政治”的概念，見：Marc J. Blecher and Gordon White: Micro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technical unit during an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 E. Sharpe, 1979.

領導《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的工作。新的編委會由翟向東、吳象、林青等七同志組成，翟向東任總編輯，吳象、林青任副總編輯。

(三)撤銷《前線》編委會，《前線》暫時停刊，進行整頓。”

其中，原社長范瑾是北京舊市委常務委員、北京市副市長。新調任的總編輯翟向東，原任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長、《河北日報》總編輯。

1966年6月6日《北京日報》發表了《新編委公告》，《人民日報》于次日轉載。公告說：“《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過去墮落成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負責人推行修正主義路線、進行資本主義復辟的工具，成為‘三家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集團的工具。這三個報刊曾經散布大量的毒素，瘋狂地攻擊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包庇資產階級右派，打擊無產階級左派；蒙蔽人民群衆，壓制廣大讀者的批評。這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明目張膽地抗拒黨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路線和方針，妄圖把這一場偉大的革命運動納入修正主義的軌道。當他們的陰謀敗露之後，又在四月十六日，製造了一個假批判、真掩護，假鬥爭，真包庇，‘捨車保帥’的大騙局、大陰謀。”

以上是群衆運動開始之前《北京日報》的情況。從六月份到年底這段時間，文化大革命運動發生了根本轉折，特別是群衆大民主的開展衝破了原來的官僚操縱下的官方運動模式，領導與群衆之間的衝突矛盾以公開的、自主的群衆政治的形式展開，這個根本轉折和前所未有的實驗，

連周恩來都多次說：“連做夢也沒有想到。”^[1]

和各地不同的是，北京市的領導機構是 1966 年 5 月才成立的新市委，然而新市委在“五十天”及之後按照官方運動模式搞政治迫害、鎮壓群衆的情況却和各地是類似的。李雪峰于 1966 年底所寫的《中共北京市委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的、路線的錯誤的檢查提綱》說，新市委不僅在六、七月間犯了“圍剿革命派”的錯誤，錯誤包括“《北京日報》在六月三十日還錯誤地發表了關於這個問題〔過早提出了恢復黨團組織活動〕的社論”，而且在十六條公布以後，又犯了嚴重的錯誤，包括“錯誤地支持了八月十三日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有七萬人參加的鬥幾個小流氓的大會，造成了很壞的影響”，以及“沒有下很大的力量，採取適當的方式，幫助他們〔受打擊迫害的革命師生〕從錯誤路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從而消除兩派同學之間的原則分歧。”

從 6 月到年底之間文化大革命發生了巨大的轉折，這期間在北京日報社發生了什麼？可惜資料很少。只有一份材料提供了大致的輪廓，這份材料原載 1966 年 12 月 2 日《首都紅衛兵》，是以北京日報紅衛兵、北京日報革命職工名義發出的《告全市革命同志書》。這個文件說：

“華北局和北京新市委派到《北京日報》的工作組組長朱子強（華北局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北京日報》新編委會編輯翟向東（前河北省委宣傳部長、河北日報總編輯）是瘋狂鎮壓《北京日報》文化大革命的創

[1] 比如：《周總理十一月十五日接見天大、南大、師院紅衛兵聯合總部代表座談會的講話》。

子手。朱子強工作組撤走以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翟向東被革命群衆揪出來罷了官以後，李雪峰、高揚文、李立功等市委主要負責人，又指使《北京日報》以副總編輯吳象、林青為首的新編委會，繼續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最為嚴重的是，九月中旬，《紅旗》雜誌第十二期社論《掌握鬥爭的大方向》發表後，市委負責人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恣意曲解《紅旗》雜誌社論的精神，以為‘反擊’革命群衆的時刻已到，於是，重演他們六、七月份‘抓游魚，反干擾’的故技，企圖再一次把北京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引向斜路。就在這個時候，市委書記處書記高揚文代表市委指示《北京日報》新編委會吳象等人，把《北京日報》出現的所謂‘壞人操縱群衆’‘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情況，代市委起草一個向中央的報告。由於證據不足，正式報告一直未能寫成。吳象等人交給高揚文的只是一個報告初稿。

我們認為，市委在九月中旬布置《北京日報》新編委會負責人寫這樣的報告，是一個嚴重的事件。它是市委公然對抗毛主席親自主持制訂的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罪證，必須嚴肅批判！這個報告初稿，是一個歪曲事實、顛倒黑白、把矛頭指向革命群衆的徹頭徹尾的黑材料，必須按照中央指示處理！

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六點三十分，《北京日報》紅衛兵和革命職工二百餘人到市委，要求高揚文交出這

個黑材料。但是，市委負責人拒不接見，而市委書記處于深夜二十三點三十五分作了一個‘決定’，企圖以此壓制我們。我們向市委副秘書長蘇文申述理由，說市委書記處這一‘決定’回避了我們提出的實質問題，沒有滿足我們的要求，請求面見高揚文，進行交涉。但蘇文蠻不講理，拒絕我們的要求。二十四日中午十一時三十分蘇文竟然利用欺騙群衆的不正當手段脫身而去，置二百餘名革命群衆于不顧。

一切革命同志們，你們看一看，北京市委對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他們沿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走得又有多麼遠！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我決定派遣一個戰鬥隊前往市委，再次堅決要求高揚文交出黑報告初稿，并要求高揚文向《北京日報》紅衛兵和革命職工公開道歉。同時，堅決要求市委副秘書長蘇文當衆檢討阻撓和破壞我們革命造反行動，以及採取欺騙手段耍弄革命群衆的嚴重錯誤。”

這也是現有的針對北京市委的群衆集體抗議行動的唯一較詳細的報告。在同一階段，各地針對省委、市委的群衆性大規模抗議行動已經是風起雲涌了。

除此之外，我們從資料中知道：以翟向東為首的新編委會，于八月底，被群衆鬥爭後揪回原單位，剩下兩個副總編輯吳象、林青，由於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被群衆揭發、批判，連批准汽車的使用權也沒有了，至一月風暴前夕，吳象正在報社半日勞動、半日檢查，北京日報的

黨委會也“早已爛掉”，只剩下一個不起作用的木頭章^[1]。

在上海11月底到12月初發生的《解放日報》事件，和廣州12月底發生的《紅衛報》(《羊城晚報》)事件中，造反派試圖封閉官方報紙從而引發大規模衝突，這是1966年和新聞單位有關的兩起重大事件。1967年初，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兩家新聞單位相繼被奪權。對這兩報奪權的意義，毛澤東曾高度評價說：“這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這件大事對於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發展，必將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2]”

1967年1月9日，上海十一個造反單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向全國廣播、在《人民日報》上轉載，1月12日《人民日報》轉載上海造反派的《緊急通告》，相當於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奪權的輿論動員。一月風暴開始了。

為什麼要奪權？奪權和前一階段平反、反迫害運動的關係是什麼？《王力同志接見上海來京工人的講話》(1月20日凌晨在北京市工人俱樂部)有畫龍點睛的一段，王力說：“有好多工人同志們，還有其他方面到北京來的同志們說到北京來告狀。有的是來告狀的，有的是來解決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比如說一個工廠裏頭要求罷官，把一個什麼人拉到北京來，有的要求平反到北京來，什麼黑材料他不交，到北京來。同志們這樣一些問題，都用不著到北京來解決，這些問題，只要我們工人階級，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我們掌握了權，就可以處理，自己來決定。(掌聲)要

[1] 《北京日報》紅色工人造反隊、長纓戰鬥隊、東方紅兵團：《所謂的“北京日報革命造反委員會”是什麼貨色？》1967年1月24日。

[2] 1967年1月19日《人民日報》社論：《讓毛澤東思想佔領報紙陣地》。

不要他當官，本來就應當由我們工人階級自己來決定。（掌聲）選誰，不選誰，應當是巴黎公社的原則，不稱職的應該隨時撤換。如果權掌握在我們無產階級手裏，那麼，我們被他們過去打成‘反革命’的同志們，他們對我們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實行白色恐怖。如果權掌握在我們自己手裏，那我們就翻身了。……如果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沒有權，那麼今天迫于形勢給我們平反了，將來他還會翻過來的，所以我們一定要這個中心的東西。這就是權！什麼黑材料、白材料，都歸我們自己來處理了，如果我們不能掌握這個權，如果我們掌握的權不牢靠，將來還會讓他們翻過去，他們將來還會整理我們的黑材料，所以一切的一切，中心的中心，就是奪權。（口號）”

“一月風暴”在北京是令人眼花繚亂的。在首都雲集了中央的龐大部門，疊床架屋的僚機構攢聚于此。從一月十四日到十八日，一系列中央部門，如石油部、化工部、一輕部、水電部、林業部、煤炭部、冶金部、水電部、衛生部、水產部、農林部、紡織部、八機部紛紛發生了奪權或者接管。

一月十八日，北京市委被接管。一份署名“首都革命造反派奪權鬥爭委員會”、日期為1967年1月29日、題為《告全市革命造反派書》的傳單說：“元月十八日，我們首都革命造反派奪權鬥爭委員會正式宣告成立，并接管了北京市委的大權。通過一個多星期的奪權鬥爭實踐，我們深刻地體會到，北京革命造反派的大聯合，大奪權，必須通過這樣有機聯繫的兩步：第一步，由初步聯合起來的革命造反派組織，接管并監督北京市委的工作，在向市委奪權中聯合，在聯合中奪權。第二步，在初步聯合的基礎上，發動最廣

泛的群衆鬥爭，進一步實現全部革命造反派組織的大聯合，大奪權，在北京市的各種大權基本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裏的條件下，召開北京工農兵學商革命造反派大會，徹底砸爛舊的官僚機構和官僚制度，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政權。”傳單說：“首都革命造反派奪權鬥爭委員會”于一月十八日二十二時，奪了北京市委的大權，接管了市委各個部門，并和革命群衆一起，監督其工作。然而，另外一些資料顯示，奪權者的名稱、大聯合的範圍和構成組織或發生變動，或是有多個并存，比如另外一份署名“北京革命造反公社”、日期為1967年1月27日的《倡議書》，其倡議內容和上一份傳單類似：“根據北京的特點，要實現全市範圍的大奪權，必須有一個巴黎公社式的、自下而上的、各基層單位革命造反派的大聯合，通過工農兵學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會的形式，制訂奪取北京各級大權的方案，進行全面奪權。”《倡議書》的發起者，包括北京第一機床廠紅色造反聯絡站、中科院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等三十三個群衆組織^[1]。後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在四月份的成立，大致是按照這個自下而上的、在紅代會、工代會和農代會的基礎上構成的。

《北京日報》兩次奪權的經過

先根據有關材料，敘述一下有關事件的經過，然後，再介紹有關文件所反映的各派別觀點。

[1] 《告全市革命造反派書》見《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第五卷，丁望主編，明報月刊社，1970年，p498。《倡議書》及發起單位見趙聰：《文革運動歷程述略》第二卷，友聯研究所，1974年，p536。

隨著大串連的發展，在一九六七年初，包括北師大、清華、北大、北航、工大、黨校等全市二十多個群衆組織進駐北京日報社，並出現兩個相互競爭的準備奪權的大聯合，即後來的北京日報革命造反委員會（造委會），和首都革命造反派創立新《北京日報》聯合委員會（聯委會）。

一月十八日，在北京師範大學井崗山、北京郵電學院東方紅支持下，“星火”、“燎原”“烈火”等組織成立了“革命造反委員會”，發表了一個接管通告，宣布從編委會、黨委手中奪權，報社的一切權力歸造委會。而其他的一些社內群衆組織和進駐報社的群衆組織，紛紛提出抗議，宣布不承認“造委會”。根據造委會的敘述，對立面的“聯委會”大喊大叫：“這是陰謀！”“我們不承認革命造反委員會！”^[1]根據對立面的“聯委會”的敘述，這天下午五點多鐘，屬於造委會的的本報社的“星火”“燎原”兩個戰鬥隊的幾個人，突然在報社大樓內狂喊大叫，說“周總理、江青同志在一月十八日的講話中已經承認北京日報被左派奪權，中央文革小組今晚要接見我們”。進駐北京日報的支持造委會的北師大井岡山學生闖進車間，向反對這次奪權的排字工人示威。考慮到事件的重大、形勢的緊張，可以想像人們的情緒很激動，雙方都曾經“大喊大叫”應該是事實。當晚，支持造委會奪權的一派還去中央文革報喜。但是，按照“聯委會”的說法，“中央文革並沒有接見他們。周總理、江青同志在一月十八日的講話中根本沒有提到《北京日報》的事”，“中央文革小組也沒有說要接見他們。只

[1] 《北京日報》革命造反委員會：《一個形“左”實右的代表作——評所謂“首都革命造反派創立新〈北京日報〉聯合委員會”一月二十四日〈通告〉》，1967年1月26日。

是通過私人關係把《紅旗》雜誌社的編輯林杰找了出來，講了幾句原則的話。^[1]這就是造委會的“一·一八”奪權。

一月十九日晚，趁造委會去《紅旗》雜誌報喜的機會，以北航“紅旗”為首的北京市二十多個（又說三十多個）造反派組織，用十幾卡車調動了社外千餘人進入報社，聯合北京日報社內部的東方紅兵團、紅色工人造反隊，以“聯委會”的名義進行反奪權，按照反對派別的說法，“把社內外的廣大革命群衆關在大門外，限制人身自由。在報社內部到處布滿了崗哨”，第二天發布了《奪權宣言》，這是聯委會的“一·一九”再奪權。次日《北京日報》出版了新一號^[2]。1月21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還發來了“熱烈歡呼《北京日報》新生”的賀電，大概應該是祝賀“聯委會”的“一·一九”再奪權的。

聯委會奪權後，新一號《北京日報》發出給毛主席的致敬信，同時挑起了有關“編輯老爺”的爭論。新一號把攻擊的矛頭對準“編輯老爺”——即原編輯部理論部的知識分子，引起兩派大字報的激烈辯論^[3]。

一月二十三日中午，“星火”、“燎原”戰鬥隊在全樓舉行示威游行，到工廠排字車間、“東方紅兵團”、“長纓戰鬥隊”辦公室門前高喊：“新生的《北京日報》必須停刊！”“聯委會必須立即解散！”“打倒階級投降主義！”“打倒保皇派！”^[4]

[1] 《所謂的“北京日報革命造反委員會”是什麼貨色？》

[2] 《北京日報》革命造反委員會烈火戰鬥隊：《你們的大方想全然錯了！》1967年1月29日。

[3] 《北京日報》1967年1月20日。

[4] 《北京日報》東方紅兵團：《新生的〈北京日報〉在紅色的革命風暴中誕生！》1967年2月3日。

顯然，這是“造委會”反對“聯委會”的示威游行。

聯委會一月二十四日發出一份《通告》，《通告》所采用的高高在上的強迫口吻，再一次激怒了對立派別。《通告》說：

一小撮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一小撮搞分裂主義的人，他們是不歡迎《北京日報》新生的，是不會甘心失敗的。他們千方百計要扼殺新生的《北京日報》，挑動一些工作人員（如記者，編輯）脫離工作崗位，挑動少數工人脫離生產崗位，這一小撮人的罪惡是逃脫不了的！我們要警告這一小撮人，若對抗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破壞《北京日報》順利出版，一切嚴重後果將由你們負責！

接著，《通告》“鄭重宣布”：“舊《北京日報》的編委會、晚報編輯部、理論部、地方新聞部、農村工作部、文藝部、國際部、群衆工作部等所有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舊制度統統砸爛。上述各部人員統一由聯委會領導、調動。”“聯委會接管社內一切財產，此財產由各革命群衆組織使用。由聯委會調撥。”特別在最後強調：“如有違反者，將以破壞文化大革命論處，若有背後操縱破壞者，將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同日，聯委會還發了一份《通知》：通知說：“一、舊北京日報社編輯部、各部門工作人員在一月二十五日十二點以前到 211 室報到，聽候聯委會分配工作。二、公章、電話總機、收發報室等機要部門管理人員，會後立即去 211 室向聯委會報到。”

造委會于第二天貼出大字報，指責聯委會的《通告》是“一個形‘左’實右的代表作”，是“太上皇”、“訓政家”“欽

差大臣”的嘴臉^[1]。看來，造委會的“一·一八”奪權已經失敗，而聯委會的“一·一九”再奪權暫時取得成功，并得到外界的一定認可。

造委會反對《北京日報》的最新當權派“聯委會”，訴諸于無權者典型的造反手段，比如組織控訴會，在全市各處散發傳單、張貼標語，攻擊聯委會內的群衆組織^[2]。一月二十七日，屬於造委會一方的烈火戰鬥隊等工人回車間印自己的傳單，遭到聯委會領導人的刁難和破壞，聯委會派人衝進車間拉掉電閘，又到機器上把紙打斷，造成多次高速急停車^[3]。

按照造委會同情者的說法，新的《北京日報》實際上操縱在北航紅旗等少數人手中，復刊後的新1—5號簡直成了轉載的刊物^[4]。按照聯委會的說法，造委會一派不僅口頭上抗議新出版的《北京日報》，要求停刊，而且訴諸于具體行動之中，如威脅郵局禁止發行新生的《北京日報》，挑動一些人離開工作崗位，尾隨零售報紙的同志之後，窺伺凡有購買新生《北京日報》者，即搶上前去塞給一張攻擊新生《北京日報》的傳單，并大喊一聲“大毒草”^[5]。

無論是出于造委會方面的抵制，還是其他原因，新版的《北京日報》發行量日趨下降，從21日的第一號三十餘

[1] 《一個形“左”實右的代表作》。

[2] 北京政法學院“紅旗”戰鬥團、紅衛兵駐北京日報聯絡站：《戳穿新陰謀 打退新反撲〈北京日報〉必須走徹底革命的道路》，1967年1月19日。

[3] 《你們的大方向全然錯了！》

[4] 北京景山學校東方紅：《“新生”的〈北京日報〉企圖把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引向何方？》1967年1月25日。

[5] 《新生的〈北京日報〉在紅色的革命風暴中誕生！》。

萬份，下降到一週後的一兩萬份^[1]。但造委會仍然堅持要把報紙辦下去，一些人還自願幫助賣報。

兩派矛盾衝突展開的同時，是各自向中央文革的成員尋求支持。造委會“一·一八”奪權後向中央文革和《紅旗》雜誌報喜，實際上是徵求支持或默許。

我們來看中央文革的關注。1月23日晚，中央文革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專院校座談會。會後（24日凌晨2時許）首都職工革命造反總部西城分部李雄良等人與王力談到了《北京日報》問題。王力說：“報紙辦起來了，大家要共同把報紙辦好。毛主席最注意造反的報紙。你們要把報紙辦好。你們同北師大的關係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吧。要團結起來！”這是首都職工革命造反總部西城分部、北航紅旗駐《北京日報》聯絡站等組織傳抄的，他們顯然認為王力的意見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在《北京日報》兩派奪權之爭的後面，反映了北京高校“天派”和“地派”之間的矛盾：北航紅旗屬於“天派”，而北師大井岡山屬於“地派”。

一月二十五日，駐北京日報的師大井岡山公社的成員，給王力去信瞭解“二十三日、二十五日，就《北京日報》問題，您發表了兩次談話，中心意思是：《北京日報》應該繼續辦下去，是否確實？”王力在一月二十六日親筆回信給師大“井岡山”公社，說：“現在報紙辦起來了，還是繼續辦下去。”“你們之間的問題，按照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則解決。”并認為，新的《北京日報》“應該成為北京市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喉舌”。

按照聯委會的記載，王力兩次接見“聯委會”，都表示

[1] 《一個形“左”實右的代表作》。

了“現在既然辦起來了，那就辦下去吧”的意思，并聲明：“對於《北京日報》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是一致的。”^[1]

然而，另一份談話記錄表明：中央文革小組不同成員之間，或者在不同的時間，其意見并不一定是一致的。《江青同志談“北京日報”問題》(1.22)記錄有江青有關對《北京日報》問題的一段評論：“1月22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開的一個會上，代表談到北航《紅旗》，北工大‘東方紅’的一些同志在《北京日報》問題上的錯誤，並提出了尖銳批評。江青同志聽完以後講了話。江青說：“你們對報紙興趣很大，想抓幾個報紙，我們維持《人民日報》這一版面就夠辛苦了，我們爲了《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花費了很多精力，你們的小報還少嗎？你們搞《北京日報》，我看過幾天，就成架架了。（陳伯達插說：他出來就死了一半了）。你們小報辦的很活潑，不要搞那些報紙了，讓那些編輯老爺去搞文化大革命，下去和工農相結合，你們不要去搞那些東西了，我們贊成這些報紙停，不要消耗這些精力。”

這裏不能不說，江青的建議有合理性：作爲過去官僚架構附屬物的北京日報，既不能起到兩報一刊的政策導向作用，也不能像群衆小報那樣生動活潑，其實已成爲多餘。

有關《北京日報》此後的發展，沒有太多紀錄可以查詢，但直到四月份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沒有出現有關《北京日報》權力變動的報道。可以推測，聯委會的掌權和對立派別的反對，都持續了下來。

[1] 《新生的〈北京日報〉在紅色的革命風暴中誕生！》。

互相的指控

兩個互相對立的奪權聯合體，在奪權之前就開始激烈的爭論和互相指責，奪權和反奪權發生後，以大字報、傳單等方式的文鬥更加激烈。雙方的爭執主要不是在於有關事實上發生了什麼、什麼沒發生，這方面沒有太多的爭議，而主要在於指責對方的作法，因此可以認為雙方的指責都有一定的事實根據。

一、有關奪權程序和合法性方面的互相指控。

首先看聯委會對造委會第一次奪權的指責。聯委會指責造委會“一·一八”奪權沒有實行大聯合，是單槍匹馬的奪權。由四十人左右組成的、屬於造委會方面的“星火”、“燎原”戰鬥隊，“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于一月十八日下午，置北京日報廣大革命職工不顧，置進駐報社、促進《北京日報》新生的二十多個革命造反派組織而不顧”，“實際上是貪報社革命造反派之功為己有，玩弄了一場揀洋撈的假造反！”聯委會的文章還揭露：“一月十八日，正是二十多個革命造反派組織為促進《北京日報》新生而陸續進駐報社之際，也正是《北京日報》社以工人造反派為主體的‘東方紅’兵團成立之時。當時，‘燎原’戰鬥隊的一個同志，曾向該隊負責人（理論部的一個同志）提出，應該和‘東方紅兵團’打個招呼，採取聯合行動。但是，竟被這位負責人拒絕。^[1]”

[1] 《所謂的“北京日報革命造反委員會”是什麼貨色？》；《新生的〈北京日報〉在紅色的革命風暴中誕生！》。

再看造委會對聯委會第二天反奪權的指責。造委會認為，聯委會大搞突然襲擊，奪權後對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組織的同志，限制人身自由、剝奪勞動權利、“勒令”“通告”不一而足。而聯委會辯解道：“當時，為了防止一切不利于奪權、不利于《北京日報》新生的事態發生，在‘聯委會’的統一指揮下，對工廠大樓以及要害部門采取了一些斷然措施，這是必要的。……而且，當時我們所採取的斷然措施僅幾個小時，一旦恢復常態，便立即予以解除。^[1]”其次，造委會還批評“一·一九”奪權不符合“內部造反”的精神，因為有過多的外單位造反派組織出現在聯委會之中“包打天下”，包辦代替。

二、有關代表性、方向性的互相指控。

聯委會指責造委會沒有代表性，只是少數自封為“堅定左派”的知識分子，而造委會指責聯委會說：聯委會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衆，把廣大工人和幹部當成了敵人，蓄意製造工人和編輯部工作人員之間的分裂。

聯委會揭露說：“‘革命造反委員會’是由‘星火’‘燎原’等戰鬥組湊成的。其核心人物和幕後指揮者是原北京日報編輯部理論部的一班人馬。他們當中有彭真黑幫搞學術批判騙局時，從各高校和機關點名要來的修正主義苗子；更有跟隨范瑾、周游多年的鐵筆杆，……而追隨這個所謂‘革命造反委員會’的一些‘群衆’中，有的則是范瑾時代十七級以上著書立說的‘名記者’‘國際專家’和‘中心組

[1] 北京師大井岡山公社駐北京日報大隊、北京郵電學院東方紅公社駐北京日報聯絡站、首都井岡山兵團、北京日報造反委員會：《堅持原則，堅持團結》1967年1月30日；《新生的〈北京日報〉在紅色的革命風暴中誕生！》。

成員”。總之，造委會大多是一些秀才、專家，代表了“原編輯部、理論部那些老爺們”，而把報社工廠的大多數工人拋在一邊^[1]。

造委會反駁說：聯委會在“打倒編輯老爺”的口號聲中，把攻擊的矛頭指向不同意見的同志和組織，以工廠同理論部的對立、工人同知識分子分子的對立，代替了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攬亂了階級陣線，實際推行了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和宗派主義。造委會方面特別針對聯委會奪權後出版的新一號提出批評，因為新一號的版面沒有反映北京市文化大革命中反對經濟主義以及大奪權等重要問題，而是把報社內部爭論反映出來，還寫到了《宣言》裏。一封署名“北京景山學校東方紅”、支持造委會觀點的文章說：“[新的《北京日報》]在新一號上大反特反毛主席充分肯定了的內部造反的道路，以一副接收大員的姿態出現，置內部造反派于不顧，……不能從‘革’與‘保’本質的區別來看問題，而是抓住工農兵和知識分子的職業區別不放，只要是工農兵，不管是‘革’還是‘保’，那就是北京日報當然的主人；只要是知識分子，也不分是‘革’和‘保’，統統是編輯老爺，都要被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這哪裏有一點點主席的階級分析的味道，哪裏有一點路線鬥爭的覺悟呢？”^[2]”

“打倒編輯老爺”這個口號，成為聯委會和造委會對抗衝突的焦點。下面要進一步闡述。

三、其他方面的指控。

[1] 《戳穿新陰謀 打退新反撲 〈北京日報〉必須走徹底革命的道路》。

[2] 《“新生”的〈北京日報〉企圖把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引向何方？》

由於高校造反派組織的介入，而高校在社會上、在全市乃至全國的衝突中都廣泛參與，北京日報造委會和聯委會之間的衝突變得複雜起來，辯論中各種矛盾和話題也都摻雜進來。最明顯的，是北師大井岡山和北航紅旗之間的結怨和鬥氣。以北師大打頭署名的造委會方面文章說：“以北航紅旗駐北京日報聯絡站為代表的某些領導同志”“為了打倒師大井岡山，便拼命攻擊林杰同志，所謂首都革命造反派創立新北京日報聯委會，親自擬定攻擊林杰、攻擊師大井岡山的標語十七條，同時由其中的重要成員北工大東方紅，逐步升級，攻擊康生同志，事後又多方抵賴、不公開承認錯誤，以捨車保帥的手段，蒙蔽群衆。也正是這些同志，為了打倒師大井岡山，他們已喪失了一個革命造反派應有的立場，直接插手師大井岡山內部的鬥爭，同‘新思潮’的人物勾結，調撥離間，興風作浪，妄圖顛覆師大井岡山。^[1]”

雙方都互相指控對方將保守字號的組織拉進自己的隊伍。以工人為主體的“北京日報東方紅兵團”剛一成立，就被造委會一方指責為“新舊保守勢力”的“大雜燴”和“合流”，特別是指控聯委會其中包括“北京職工紅色造反團北京日報大隊”，認為這是和保守派“勾勾搭搭”。而聯委會則反唇相譏道：“‘新舊保守勢力的大雜燴’這頂帽子，應該扣在以‘星火’、‘燎原’為主的所謂”革命造反委員會“的頭上。他們為了擴張勢力，不擇手段地收攏一切符合於他們觀點的人。所謂‘北京日報革命造反委員會’中的一個成員，在招兵買馬時，就曾對過去的一些‘保守派’們說：‘你們

[1] 《堅持原則，堅持團結》。

馬上要是過去（按：指倒向‘星火’、‘燎原’一邊），就成左派！以前的錯誤一筆勾銷！”

指控的材料還揭示了報社內矛盾和外部盟友的聯繫及有關矛盾。署名“首都井岡山兵團”（具體單位不詳）的兩篇文章，進一步揭露說：“人大‘三紅’總部向‘三紅’全體戰士發出揭發批判康生的通告，人大紅衛兵在這裏充當了急先鋒的角色。可人大紅衛兵駐《北京日報》的人不知被哪位‘好心人’薦為所謂新生《北京日報》的大編輯！……對於他們反康生同志的反動活動我首都井岡山兵團（當時是聯委會中一員）萬分氣憤，強烈要求‘聯委會’把他們清除出去，在實在找不到為人大紅衛兵罪責開脫、辯護的慘狀下，‘聯委會’忍痛將人大紅衛兵開除出去——人大一走，就缺少了好幾個‘編輯少爺’呀！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決定開除，可聯委會中某些人却瞞天過海，竟還讓其參加晚上召開的內部會議，我首都井岡山兵團幾番在大會上強烈要求把他們轟出去，出人意外，堂堂大左派北航紅旗聯絡站等組織却一聲不吱，對我們的革命要求非但沒得半點支持，反倒被哄了一通，煩我們羅囉嗦嗦，以至于還要把我兵團開除出去，排斥不同意見。^[1]”文章顯示，首都井岡山兵團後來退出了聯委會。

不僅是北航紅旗、北師大井岡山參與《北京日報》奪權，而且大學造反派組織普遍干預校外單位的文化大革命，形成一種模式，形成了全市性質的聯盟和分裂，《大事記》一月十九日記載：“有的學校的組織在他們的頭頭率領下，

[1] 首都井岡山兵團：《社會上反康生同志的反動活動與“聯委會”無關嗎？》
1967年1月30日、《鄭重聲明》，1967年1月27日。

打著‘這次奪權是中央安排的’的旗號，東搶權，西搶權。他們把手伸到了高教部、中宣部、華北局、團中央等中央十幾個部門，置那裏的廣大群衆于不顧，儼然以救世主的面貌出現，嚴重干擾了主席的戰略部署，代表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向中央奪權。^[1]” 比如：一篇文章指控：參加了聯委會奪權的“北京職工紅色造反團北京日報造反大隊”，其母體組織“北京職工紅色造反團”也參與了中宣部的奪權，而且是被阮銘（中宣部文革主任）所操縱的“一小撮人”，“搞所謂的‘革命造反派大聯合’，把鬥爭矛頭指向中宣部內的真正革命造反派，以達到保自己……的目的”^[2]。跨校的矛盾以及對其他單位的干預，發展成為北京“天派”和“地派”的爭執：最後分化組合成以北航紅旗、新北大、人大三紅等為代表的天派，與北師大井岡山、地院東方紅、北郵東方紅為代表的地派之間的分歧，并在民族宮衝突事件中發展成為暴力對抗。

所謂“新生的”《北京日報》最後被證明是短命的。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起，《北京日報》的新序號停止，開始“試刊一號”。這樣說，新序號只出到“新五十七號”（筆者見到的最後一期是三月八日“新四十三號”）。這意味著：在三月下旬，報社的權力結構又發生了變化，大概“編輯老爺”們重新加入了新的“三結合”的編輯委員會。但版面不得再有任何有關內部矛盾的內容。

[1] 《大事記》p169；另一版本的《大事記》，第一句是“北大紅旗兵團在孫蓬一等人的率領下”。

[2] 《“新生”的〈北京日報〉企圖把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引向何方？》

兩派的關鍵分歧

僅以《北京日報》奪權的案例而言，兩派的衝突絕不僅僅是無原則的山頭主義或宗派利益之爭，而是反映了意識形態上的一個重大爭論，這個爭論也恰好具有有重大的政治和社會意義，這也是文革發動者所關注的中心問題，即知識分子、工人階級和文化輿論權力三者之間的關係問題。

造委會和聯委會的區別，不僅在於：造委會集中了編輯人員、記者等知識分子，而聯委會以印刷廠工人為大多數，還在於：由於社會地位的身份區別，在政治修辭上針對對手的博弈策略也隨之不同，這有關到一系列問題上的有關論戰：奪權主要依靠誰、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今後《北京日報》誰來掌權、誰來辦報、如何辦報。聯委會把問題這樣提出來：今後《北京日報》的大權不能再交到編輯部、理論部的那些脫離工農群衆、耍筆杆子的秀才、專家手裏，不能再依靠少數知識分子關起門來辦報，而要“徹底打碎舊的剝削制度、修正主義制度、官僚主義機構”（聯委會引用《人民日報》1月22日社論的話），由社內外的革命群衆相結合共同辦報，為工農兵革命造反派服務。而造委會方面反駁說：過分強調知識分子和工人的區別是錯誤的，編輯只是一種職業分工，而更重要的區別，是兩條路線鬥爭的區別、“革”與“保”的區別，今後的《北京日報》還主要依靠社內的“堅定左派”，而社外的造反派只能是“後盾”。而造委會認為聯委會“在‘工人辦報’‘群衆辦報’‘工人要奪權’的外衣下，大搞工聯主義，在工人運動中不是高

舉毛澤東思想去團結革命工人，而是用資產階級機會主義思想侵蝕工人同志，利用革命工人與革命工人之間的矛盾、利用革命工人同革命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拉一派打一派，從而分裂了革命隊伍的團結。^[1]”

兩派的分歧，最後歸結到對一句口號的態度，即：“打倒編輯老爺！”一月二十日和一月二十一日，造委會方面的“星火”戰鬥隊和聯委會方面的紅色工人造反隊、東方紅兵團各自貼出一張大字報，最有代表性地表明了雙方的立場，下面摘錄這兩張大字報。

“打倒編輯老爺！”這句口號在報社大樓裏喊得真響亮呀！北航《紅旗》的某些負責人熱衷于喊這個口號，有些單位也把這句口號刷成大字標語，貼在牆上。

同志，你想到沒有，這是一個極其錯誤的，反毛澤東思想的口號！

編輯，這是一種職業分工，有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編輯，也有為無產階級服務的編輯。“打倒編輯老爺！”這個口號，根本不管這些，完全不進行階級分析，統統稱之為“編輯老爺”，統統要打倒的。他們可能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他們之中很多人由於思想改造不够，存在著輕視勞動，自高自大的缺點，沒有或沒有很好與工農群衆結合，這是知識分子的致命弱點。對此，很多編輯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經有了較深或初步的認識，決心放下架子，走和工農結合的道路，改造自己的思想，我們的態度應該是幫助和鼓勵他們更好地和工農結合，更好地為無產階級服務，而絕不應該不加

[1] 《堅持原則，堅持團結》。

區別地一概打倒。

毛主席教導我們：“全黨同志必須認識，對於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我們黨在土地革命時期，許多地方軍隊，對於知識分子的不正確態度，今後決不應重複，而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的造成，也決不能離開利用社會原有知識分子的幫助。”

.....

打倒編輯老爺！這個口號只能在革命工人和革命知識分子之間製造分裂，在報社就有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這個口號，煽起宗派主義情緒。北航紅旗某些負責人進入報社以後，就打出了“打倒編輯老爺”的口號，你們如果不是蓄意製造報社工廠工人和編輯部工作人員之間的分裂，從中漁利，也是為那些極力製造宗派主義情緒的別有用心的人大大地幫了忙。

“打倒編輯老爺”這個口號是直接和“革命工人、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聯合起來！”的口號相對抗的。

同志們，我們要擦亮眼睛，打倒一切調撥革命工人和革命知識分子的陰謀伎倆，打倒一切形“左”實右的口號。

.....

下面再看紅色工人造反隊、東方紅兵團的大字報《“編輯老爺”，堅決要打倒，必須靠邊站！！》：

最近，在北京日報裏不斷自吹自擂為“堅定左派”的“星火”戰鬥隊，在兩條辦報路線的尖銳鬥爭中，拋出了一篇大字報，名為：《“打倒編輯老爺”的口號是反毛澤東思想的》。這是一篇不折不扣的反毛澤東思

想的大毒草。出籠後，立即受到社內外廣大革命工人、學生、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嚴厲駁斥！

毛主席教導我們：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北京日報》要新生，就必須徹底砸爛舊北京日報，徹底打倒“編輯老爺”，依靠全市工農兵和真正同工農群衆相結合、能認真改造思想的革命的知識分子。

.....

我們認為，在無產階級革命隊伍裏，編輯是一種職業分工。一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認真改造自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編輯，決不可能成為“老爺”，而是人民的勤務員，是革命同志。如果他不是這樣，那麼，他就會成為“老爺”，他就會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而決不會為無產階級服務。舊北京日報難道不就培植著一些“編輯老爺”嗎？在這次兩條辦報路線的鬥爭中，一些人匯成一股勢力，打著“堅定左派”的招牌，極力推行只靠少數“內行”“專家”關門辦報的修正主義路線，而把以工農兵為首的革命造反派置于“後盾”的地位。依靠這些“編輯老爺”來掌權、來辦報，豈不就是地地道道的改良主義嗎？

教師也罷、工程師也罷，只要他一旦成為“老爺”，我們就要堅決打倒他！怎能說“打倒編輯老爺”就是“完全不進行階級分析”呢？“打倒編輯老爺”！正是用了階級分析。文化大革命運動就是要將一些不願意接受改造的“編輯老爺”“小姐”從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新聞隊伍中請出去。

“星火”說“‘打倒編輯老爺’這個口號，是挑動工廠工人和編輯部之間的分裂，”他們這麼說，才是真

正的挑動群衆，製造分裂！革命工作，有具體分工，但決沒有“老爺”、“非老爺”之分！革命造反派辦報，有人去排字，有人去做編輯工作，但是他們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是革命同志，而不是什麼“編輯老爺”和工廠工人的關係。想用“編輯老爺不能打倒”的謬論，來攏絡人心，製造“編輯部是一家”，挑動革命同志的分裂，那是絕對辦不到的！知識分子只有同工農結合，才能是革命的；想當“老爺”，就絕對不可能是革命的！今天，是革命造反派的大聯合！決不是革命造反派和什麼“老爺”的和平共處！

“星火”戰鬥隊提出反對“打倒編輯老爺”，是一種自我暴露。這說明，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還是想當“老爺”。“老爺”辦報，只能是專家辦報、秀才辦報。這是一條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路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老爺”的寶座一燒而光！新生的《北京日報》是革命造反派的天下，決不是一些“老爺”們的天下！

.....

以上雙方論戰有幾點值得評論。首先，雙方的意識形態基礎、理論範式和修辭方法是共同的，都來自主流的革命話語，特別是文革開始以來的漸漸形成的一種特徵明顯的文體。也許在今天的很多人看來，雙方的立場、觀點並沒有什麼實質的區別。分歧反映在行文走字中戰略性地使用關鍵詞彙，這是解讀這種文體的鑰匙。比如：聯委會所用的關鍵詞包括：“工農兵—秀才、筆杆子”、“徹底砸碎—改良主義”等，造委會的關鍵詞是：“兩條路線鬥爭”、“黨的政策”、“形‘左’實右”等。分歧雖然微妙，但却是激

烈的；兩派的用詞都來自同一個政治語言體系；是對同一體系的不同應用，產生了意義上的競爭和對抗。不言而喻的是，給雙方提供詞彙、語法的這一共同的政治語言體系，本身就存在著內在緊張和矛盾。正如筆者在其他文章中數次提到：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有關文革的各種理論準備和具體指示、政策，無不存在著大量的含混、矛盾、前後不一致的地方。這是兩派爭論陷入死結、誰也無法說服誰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有關“編輯老爺”這場難以解決的論戰，實際上是整個文革運動、乃至整個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政治鬥爭和社會改造嘗試中所暴露出的矛盾、僵局和死角的縮影。

文化革命的一些重要思想，主要體現于毛澤東的《五七指示》，以及毛澤東關於“知識分子無產階級化”和“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化”、“工人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無產階級對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的領導權”等問題的論述。然而，新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技術官僚來管理日常運作的社會。而且，除了科技專家、知識分子這種“傳統”的技術官僚，更嚴重的是，原來的那個充滿熱情、深入群衆的革命政黨，也變成了一類新的“紅色技術官僚”，那就是各單位的黨委、政治工作人員、掌管意識形態宣傳的理論家、報紙編輯等等，他們甚至比傳統的技術官僚還要更面目可憎，因而“宣傳部”變成了“閻王殿”。

白色技術官僚和“紅色技術官僚”這是文革要觸及的議題。由於文革初期官方運動對群衆的傷害，以及“血統論”突起造成暴行，從“十六條”到批判“資反綫”，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主題主要都是對“紅色技術官僚”的鬥爭；

在針對“紅色技術官僚”的鬥爭中，知識分子是最激進的。于是，在文革的“原主題”之外，出現了“新主題”——反迫害、批資反路線，大民主，奪權，等等。然而，對兩種技術官僚，如何權衡、如何取捨，一直是存在矛盾緊張的，在《北京日報》奪權過程中就暴露出來。

以北航“紅旗”為聯盟的聯委會一派，強調文革的“原主題”：即：縮小三大差別、改造舊知識分子、反對精英主義；聯委會認為奪權是對《北京日報》原官僚機構，按照“五·七指示”精神進行激進的改造，把原來知識分子、專家秀才關門辦報的方式，改變成爲有廣泛的工農兵群衆參與的開門辦報，而參與的辦法之一，就是讓印刷廠的工人進入原來只被編輯部、理論部控制的報社決策層。而以師大井岡山為代表的造委會一派，強調了文革的“新主題”：就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強調“革”與“保”的區別和鬥爭，他們理解的奪權，就是由曾被當權派迫害、後來奮起造反的“最堅定的左派”為主體的造反派實現大聯合，向當權派奪權；而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最深的，通常是知識分子和出身不好的人，而這些人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求平反、要求銷毀黑材料的鬥爭中也最積極。

在方法、手段上，兩派也存在著意識形態上的巨大分歧。從某種意義上說，兩派都認爲對方是脫離群衆的精英主義。聯委會認爲：造委會單槍匹馬，只是一小撮人的造反，脫離了在報社佔大多數的印刷廠工人，也沒有聯合進駐報社的大部分外單位造反組織，因而奪權後還會繼續過去“編輯老爺”對報社的統治，執行“修正主義”辦報路線。造委會則認爲：聯委會根本不承認報社內有革命左派，而是把外單位造反派的意旨強加給報社，以一副接收大員的姿

態出現，置內部造反派于不顧，聯合了保守勢力，完全站到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除了指責聯委會的“包辦代替”，造委會還指責它“在‘工人辦報’‘群衆辦報’‘工人要奪權’的外衣下，大搞工聯主義”、“拉一派打一派，從而分裂了革命隊伍的團結。^[1]”

如果我們認為雙方的指控都存在一定的根據的話，那麼，這場“編輯老爺”和“工聯主義”的爭論，可以看成是“十七年”“修正主義”的、精英主義的文化媒體制度的影響，和文革中一些造反派所表現出的簡單粗暴的“極左”作風之間的碰撞衝突。換句話說，聯委會主張：對舊《北京日報》的編輯、記者等專家秀才的技術官僚統治，進行巴黎公社式的改造，使之更趨于平等、民主、參與，這無疑有其合理性，但聯委會的簡單粗暴的作法，特別是北航紅旗的過多干涉、操縱，其手段是權威主義的、不民主的，因而損害了其自身的目標。比如，後來從聯委會中聲明退出的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北京公社八八戰鬥隊駐《北京日報》聯絡站對聯委會提出批評：“‘新生’的《北京日報》……不少稿件是閉門造車的東西，辦報路線上還是少數人關起門來辦，沒有深入工農兵群衆，這種新編輯老爺的作風，根本不可能把報紙辦好。”一個打破官僚主義、鏟除精英主義的嘗試，最後結果導致了新形態下的官僚主義、精英主義，新瓶裝舊酒，這是在最典型、最一般意義下文化大革命失敗的寫照。

造委會、聯委會的論戰雙方誰也不能說服誰；指控對方的修辭策略的升級，使得雙方都難以有妥協的餘地，儘

[1] 《堅持原則，堅持團結》。

管王力堅持“還是人民內部矛盾”。造成這個僵局的，除了原有意識形態體系內的矛盾和含混之外，還由於當時政治鬥爭形勢的錯綜複雜。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改造《北京日報》的嘗試陷入困境，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文革的原主題和新主題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在社會上還遠遠還沒有解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紅色官僚的抵抗。在本單位，也許“紅色技術官僚”已經被打倒、被罷官，但紅色技術官僚體制所保留的一整套監視群衆、操縱群衆、對群衆管、卡、壓的一整套機器，還根本沒有清理，這就是周恩來說的“不健全的黨風”、“王明搞的那一套，從蘇聯學來的”，以及陶鑄所說的“我們還有些錯誤的東西，如保衛工作、組織工作還受到蘇聯格別烏的影響”^[1]。群衆反迫害的運動不能從體制上進行改造，那麼，巴黎公社的反精英精神，工農兵對意識形態上層建築領域的參與和領導，最終也無法實現。最壞的情形，就是把工農兵下層勞動人民的賦權過程，建立在對知識分子、出身剝削階級的人的迫害之上，使下層的賦權建立在任意專斷的行政權力之上，那麼巴黎公社的目標就一定要夭折。這個弊病，以北航紅旗為主導的聯委會在北京日報社的表現還不十分明顯，然而，在後來的“清理階級隊伍”階段，這個弊病發展到了極端的形式，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嘗試從根本上失敗的時刻。

[1] 《周總理 12 月 3 日接見北京外語學院少數派師生員工時的講話》；《陶鑄十一月十六日接見遼寧大學“八三一”紅衛兵的講話》。

附一：《北京日報》奪權過程中兩派組織情況一覽

派別總稱	《北京日報》	首都革命造反派
	革命造反委員會	創立新《北京日報》聯合委員會
構成組織	星火戰鬥組 燎原戰鬥組 烈火戰鬥隊	紅色工人造反隊 東方紅兵團 北京職工紅色造反團 北京日報大隊
領導核心	原編輯部理論部	北航紅旗駐北京日報聯絡站
外部盟友	北師大井岡山 北郵東方紅	北航紅旗 清華井岡山 政法學院紅旗 北工大東方紅 人大紅衛兵
奪權日期	1967年1月18日	1967年1月19日
主要文件	1月18日通告 1月24日《通告》	1月19日奪權宣言
被對方指控	“編輯老爺” 自封的“堅定左派”	工聯主義、宗派主義 修正主義紅衛兵、形“左”實右

(註：一篇文章顯示：造委會派別的人原來屬於北京日報紅衛兵指揮部，後來指責指揮部是修正主義紅衛兵，自己則退出來，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功勞攫為己有。地院東方紅、中央財金學院八八戰鬥隊原來加入聯委會，後退出)

附二：兩派文件一覽表

一、造委會及其支持者：

① “星火”戰鬥隊：《“打倒編輯老爺”的口號是反毛澤東思想的》，1967年1月20日。

②新華社北京分社紅旗戰鬥隊：《致北師大井岡山戰士的一封公開信》，1967年1月23日。

③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駐《北京日報》新聯絡站：《嚴正聲明》，1967年1月23日。

④北京景山學校東方紅：《“新生”的〈北京日報〉企圖把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引向何方？》1967年1月25日。

⑤《北京日報》革命造反委員會：《一個形“左”實右的代表作——評所謂“首都革命造反派創立新〈北京日報〉聯合委員會”一月二十四日〈通告〉》，1967年1月26日。

⑥首都井岡山兵團：《鄭重聲明》，1967年1月27日。

⑦《北京日報》革命造反委員會烈火戰鬥隊：《你們的大方向全然錯了！》1967年1月29日。

⑧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北京公社八八戰鬥隊駐《北京日報》聯絡站：《聲明》，1967年1月29日。

⑨北京師大井岡山公社駐北京日報大隊、北京郵電學院東方紅公社駐北京日報聯絡站、首都井岡山兵團、北京日報造反委員會：《堅持原則，堅持團結》，1967年1月30日。

⑩首都井岡山兵團：《社會上反康生同志的反動活動與“聯委會”無關嗎？》1967年1月30日。

二、聯委會及其支持者：

①首都革命造反派創立新《北京日報》聯合委員會：《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大奪權勝利萬歲！——〈北京日報〉奪權宣言》，1967年1月19日。

②北京政法學院“紅旗”戰鬥團、紅衛兵駐北京日報聯絡站：《戳穿新陰謀 打退新反撲 〈北京日報〉必須走徹底革命的

第九章 奪權案例：1966–1967年《北京日報》的群衆微觀政治道路》，1967年1月19日。

③紅色工人造反隊、東方紅兵團：《“編輯老爺”，堅決要打倒，必須靠邊站！！》1967年1月21日。

④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熱烈歡呼〈北京日報〉新生》，1967年1月21日。

⑤首都革命造反派創立新《北京日報》聯合委員會：《通告》和《通知》，1967年1月24日。

⑥《北京日報》紅色工人造反隊、長纓戰鬥隊、東方紅兵團：《所謂的“北京日報革命造反委員會”是什麼貨色？》1967年1月24日。

⑦《北京日報》東方紅兵團：《新生的〈北京日報〉在紅色的革命風暴中誕生！》1967年2月3日。

第十章 “兩個文革”，或一個文革？

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一次史無前例的事件。無論是在文革剛開始，還是在幾十年後的今天，這樣的評價都是恰如其分、毫不誇大的。另一方面，對文革實質內容的評價，從文革的開始，歷經重大轉折的一九七六年、一九七七年“十一大”和一九八一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直到今天，則經歷了數次逆轉；到今天，對文化大革命這一重大複雜事件的評價，儘管仍存有一小部分不同聲音，但從官方文革史學到大部分國內、海外文革研究，都趨同于一個主流答案，這就是廣為人知的“十年動亂、十年浩劫”的結論^[1]。出于特定歷史環境下“徹底否定”的政治需要，大部分文革史學對文革期間發生的大量極度複雜、層次繁多、交錯曲折的種種事件，以極度簡單化、概

[1] 所謂“官方文革史學”，是指：嚴家其、高皋：《中國“文革”十年史》，中國問題研究出版社，1987年，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一小部分不同聲音”，是指：劉國凱：《文化革命簡析》，《人民之聲》1980年12月特2期；楊曦光：《評〈中國“文革”十年史〉》，《爭鳴》，1990年8月號。楊小凱：《六四醒悟：為文革造反派翻案》，《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八月號；Chan, Anita: "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 Unger, Jonathan, "Whither China? Yang Xiguang, Red Capitalists, and the Social Turmoi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Vol 17 No.1, 1991. Gao, C.F. Moho. "Maoist Discourse and a Critique of the Present Assessment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念化和概括化的方式處理之。更有一部分有關文革的論著和文學作品，以刻板印象和操縱性的手法去評價和再現文革，另一方面有意或無意地壓制和篩除大量豐富的歷史資料、掩蓋歷史的他類敘述。更令人遺憾的是，在中國乃至海外的社會範圍內，漸漸地形成了一種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主導話語，在這種話語的支配下，公眾對文革的歷史事實知道得越來越少，對文革的成見却越來越深，“十年浩劫”一類簡便的代語和套話代替了人們對文革歷史事實的瞭解。

有鑑于這種情況，有必要關注一下那一小部分不同于這種主流評價的觀點。這些非主流觀點，注意到文革中事件脉絡的錯綜複雜，而不是以一種一元化的概括來下結論。早在八十年代初，劉國凱就已經在民間刊物《學友通訊》上提出“十年並非全是浩劫”的觀點。楊小凱亦指出“文革不是前後一致的‘十年浩劫’”^[1]。在這些觀點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有關“兩個文革”的論述。持這種觀點的人多曾親身經歷過文革運動，他們對文革期間從人民群衆中產生出的政治熱情和參與意識表示肯定，但他們現在已經無法認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八十年代初，王希哲也指出文革的上、下和前、後的不一致性，認為文革包括一個“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和一個“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相對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2]。“兩個文革”論的主要表述就是：

一個文革，統治者的文革：利用群衆運動，摧毀政敵，攫取權力；一個文革，被統治者的文革：利用合法條件，反抗封建特權和政治的壓迫。——這是兩個互相利用、

[1] 楊小凱：《再談“文革”》，《中國之春》一九九二年十月號。

[2] 王希哲：《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王希哲論文集》，七十年代雜誌社，1980年。

同時又互相衝突的文革。而共同的時、空把二者融為一體，就使得這融合體成了一個說不清、弄不懂的政治怪物……^[1]”

本章試圖通過對“兩個文革”論的分析，以期打破主導話語下對文化大革命評價的僵化、蒼白和概念化的傾向，從而能够開始對文化大革命進行真正有益的反思。在下面的分析中，將提出這樣的觀點，即：“兩個文革”論和一元化的“徹底否定”的主流觀點比較起來，注意到了精英之外的群衆和群衆政治，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也深受主流觀點的影響，在一定意義上，它是對主流觀點的妥協；實際上主流觀點形成的過程，也是“兩個文革”論形成的過程。

在分析到底是有一個文革還是有“兩個文革”、以及進一步探討評價文革的實質內容之前，有必要對另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即：“什麼是文革？”或者說，“文革是指什麼？”這一問題，進行探討。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在主導話語的影響下，“什麼是文革”、“文革是指什麼”的答案，早已從歷史上的“文化大革命”這一詞彙的正常約定的用法中蛻變出來，“文革”一詞已經產生了概念上的混淆和歧義。讀者大概都清楚，中國文化大革命，在現時的主流觀點和主導語言中，是指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間的“十年動亂”。對於這個定義，甚少有人提出質疑和爭議。正說

[1] 鄭義：《鄭義論兩個文革》，劉賓雁摘自《歷史的一部份——永遠寄不出的十一封信》第四封，《開放》，總第 66 期，1993 年。這裏還應提到文化大革命民間左派綱領性文件《中國向何處去》一文的作者楊曦光（楊小凱）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他認為：毛澤東和黨內文革派發動和支持了群衆造反派的反官僚、反迫害的運動，他們之間的關係是政治聯盟關係；所謂“互相利用”的說法是無意義的，因為政治的本質就是建立聯盟、互相“利用”。在這一點上，楊曦光是在所有參加過文革造反運動的人士中，自始至終堅持自己原來觀點的人。見楊曦光《評〈中國“文革”十年史〉》。

明在這個問題上，帶有強大力量的主導話語能够暢通無阻，却不為人們所知覺。同時，這個有關時間上的定義，很顯然關係到對“文革是不是一場前後一致的事件”這一問題的回答。

因此，本章首先討論“什麼是文革？”這一問題，并提出這樣的觀點：作為真正史無前例的事件——文化大革命群衆運動，只發生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八月這兩年間；將文革的定義拉長到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是由于政治上操縱和爭鬥的結果；從更有益地分析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的角度看，“十年”文革的定義缺乏內在的基礎，有片面改寫歷史之嫌。有了這樣一個對文革主題本身的限定，本章再對“文革是不是一場前後一致的事件”的問題做出回答。

文革是“十年”，還是兩年？

容易看到，歷史中的人一方面創造歷史，同時另一方面對自身歷史進行解說，這兩方面又互相交錯干涉、互相制約推動，是一個錯綜複雜過程。法國大革命所引發的階級和思想鬥爭，連同對法國革命的認識分析和毀譽評價，從十八世紀末革命發生時就開始糾纏在一起；直到今天，對法國大革命的終點時間的不同意見，也同時標識出對法國大革命本身意義的看法分歧^[1]。毫無疑問，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場政治鬥爭，而政治鬥爭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操縱與

[1] Furet, Francois. 1981.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79.

反操縱。衆所周知，“十年文革”這個詞彙，是一九八一年以後才正式產生的。這裏，筆者無意將“兩年文革”的定義說成是比“十年文革”的定義更客觀——在這個問題上也許很難存在一個客觀中立的“真實”定義。這裏只不過想說明，有關文革的起始日期，從文革的發生，到後來“十年文革”的主導話語最後的確立，這個過程，伴隨著各種政治力量的消長和變遷，也經過了多次反覆和人為的修改。

有必要先來簡單回顧一下文革的起始和終止歷程。很多文革史學將文革的起源上溯到反右、大躍進，更有人將它和延安整風甚至瑞金時代的肅反相聯繫。這些也許都有道理，但無限上溯搜尋起因的做法，又會產生其它有關起源的問題和疑問；文革畢竟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具有獨特的自身內在邏輯的事件。文革在很多方面和反右、大躍進大異其趣，將另撰文論述。文革最直接的導因，一般都從一九六五年底開展的文化批評算起，而一九六六年的《二月提綱》則是第一個正式的文革文件。三個月後的《五·一六通知》，否定了《二月提綱》所規定的文革運動的模式，提出了黨內激進派的文革綱領，發起對所謂“黑線專政”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全面攻擊。六月初，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在全國廣播發表，以更直接的方式發動基層。然而《五·一六通知》和第一張大字報沒有達到發動毛澤東所設想的文革運動方式，運動的形式和方向被地方黨委和中央派出的工作組所操縱，執行了五十多天的形“左”實右的路線。一九六六年八月，從八屆十一中全會和《十六條》的發表開始，各地才陸續進入了文化大革命所特有的運作方式，即共產黨組織不再能够控制群衆的自發運動，“四大民主”方式被群衆所廣泛運用，共產黨

之外的群衆政治組織迅速地普遍地出現在全國^[1]。

再來看文革的終點。一九六八年八月工宣隊、軍宣隊派駐進學校，群衆運動戛然而止，以本書觀點，這是文革運動的終點。一個月以後所謂的“全國山河一片紅”，即在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全部建立革委會，只是標誌著建立新政權機構的過程的結束。之後開展的“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運動，在很多地區又恢復到了類似一九六六年“五十多天資反路線”的恐怖時代。一九六九年四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上，對文革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宣布文革已經取得了“全面勝利”，此後的文革運動“進入鬥批改階段”。很多早期的文革史著以此刻作為文化大革命的終點。七一年的林彪事件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點。作為文革收尾工作的“鬥批改”運動至此不了了之。復員、復舊和復出的潮流，也從此開始在中國大地上蔓延。自然，黨內激進派和務實派的鬥爭一直在繼續；毛澤東也似乎一直在伺機再一次“發動群衆”。從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形勢發展，包括批林整風、批林批孔，國民經濟整頓、反擊右傾翻案等，就是兩派鬥爭導致政策搖擺的反映。然而鬥爭的焦點，都是圍繞著如何對待已經過去的文化大革命、能否對文革翻案的問題上展開的。一九七六年發生了逮捕“四人幫”的事件，當時對“四人幫”的指責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劉少奇、

[1] 由於在全國各省運動的進程發展不齊，比如在北京發動較早，六六年七月底就已進入了典型的文革運作方式，在一些邊遠省市則遲至六六年底，將《十六條》的發表作為文革運作方式開始尚有代表性。

林彪一類政治騙子”^[1]。一九七七年由華國鋒主持的中共十一大，一方面肯定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又另一方面宣告“歷時十一年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勝利結束”。這是由官方第一次和最後一次提出“十一年”文革的說法，它明顯帶著為了政治目的對歷史敘事任意操縱的痕迹：出于為“繼往開來”建立威信的需要，一方面要以維護文革的合法性來高舉毛澤東的旗號，另一方面又急于將“抓綱治國”的新局面和文化大革命以來激進派與務實派鬥爭膠著及早結束，才需要多此一舉地親手“勝利結束”文革，也才有了這個獨出心裁的“十一年文革”的說法。過了短短四年，新的政局又出于新的政治需要，對“十一年文革”的說法再做了修改^[2]：一九八一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文革歷時十年。其中微妙且具有諷刺之處却在於：《決議》否定了華國鋒所肯定的文革；而將文革結束時間提早到一九七六年十月（而不是華國鋒“勝利結束文革”的一九七七年“十一大”），却又肯定、褒揚了華國鋒的“結束文革”的歷史作用。把文革作為整整十年一起否定，是出于當時的各種政策和策略考慮：在各種各樣的翻案、平反和昭雪風潮中，“十年浩劫”成為承擔一切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和不公正的黑箱和控訴對象。

也有必要總結一下現有的文革史學對文革終點問題的處理。劉國凱所著的《文化革命簡析》是最早一部文革歷

[1] 本書在否定“十年文革”說的同時，毫不否認十月事件的重大意義。與其說它為一九六六年起的階段打下句號，不如說是一九四九年以來新中國發展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2] 同上。

史的著作^[1]，也是在極艱苦和困難的條件下寫作、出版的。這部文革簡史至今仍是較為客觀、真實地紀述文革歷史事件的著作之一。《簡析》中所明確記載的文革結束的時間是一九六八年八月。《簡析》成文于一九七六年以前，當時“十年文革”、“十年浩劫”的話語尚未泛濫，作者是文革運動的親身經歷者和參加者，“兩年文革”的看法是作為歷史親歷者對這個問題最明顯、最直接的判斷。在海外文革史學中，費正清認為作為“超級大革命”的文革，發生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六九年四月。而在費正清與麥克法克爾合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2]中，文革時期包括了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二年的十六年。幾乎所有史著都同意一九六六年夏到一九六八年夏是文革的核心階段（包括一九八一年的《決議》，也認為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是“全面內戰、打倒一切”階段），而根據不同的標準，文革的終點時刻則衆說紛紜。成為主流觀點和主導話語的“十年文革”說，用意是在全面否定“四人幫”集團、全面否定他們推行的毛澤東的“極左”路線，因此將文化大革命等同于“四人幫”集團和他們的當政期。嚴家其所著的作為中國半官方文革史的《中國“文革”十年史》^[3]，更是把“精英集團鬥爭代表一切”的治史方法發展到極致。

本章所提出的：文革實際發生在一九六六到一九六八年的兩年間的看法，與劉國凱《簡析》的提法相一致。它

[1] 劉國凱《文化革命簡析》，民間刊物《人民之聲》1980年12月特2期。

[2] 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John Fairbank. 199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 15. The People's Republic. 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198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嚴家其、高皋：《中國“文革”十年史》，中國問題研究出版社，1987年。

的最根本理由是：唯有從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八月這段時間內，政治運作的方式具有可說是文化大革命所獨有的性質和特點，那就是：全面開展大民主的實驗：人民群衆具有充分的結社、集會、出版、言論權利和四大自由，左傾激進的革命意識形態成為人民群衆手中的武器，而不再是空洞的教條或官僚手中的工具。而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前和一九六八年八月以後，政治運動的操作方式都不具備這些特點，而和文革前的十七年或一九七六年以後的作法大同小異。

首先來看為什麼把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條》的發表，而不是更早一些的《五·一六通知》或《二月提綱》的產生時刻作為文革的起點。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這三個文件迥然不同的傳達方式。《五·一六通知》和《二月提綱》的產生和傳播方式，與文革前共產黨開展運動的操作方式是大致類似的：兩個文件都是作為中央文件的方式（分別是中發〔66〕267號文件和提交中央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通過“內外有別”、等級分明的黨內傳播渠道，一步步地傳達給各級官員，然後再將其精神傳達給黨外群衆。儘管《五·一六通知》全面闡述了黨內激進派的文革綱領，但它又尊重、遵循舊的辦事程序，花了很多篇幅去具體糾正《二月提綱》的錯誤，還未提出“讓群衆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則。中央文件對先前的文件作糾正，已經是司空見慣，比如四清運動中《後十條》是對《前十條》的糾正，《二十三條》又是對《後十條》的糾正等等。在文革爆發的前夜，毛澤東越來越意識到黨內這個帶等級特色的傳播渠道已經無法防止黨內官僚慣性對群衆政治的主導、限制和壟斷，使毛澤東發動的群衆運動一旦到了基

層，總變質為形“左”實右的“運動群衆”，因而需要求助于黨外的更直接的傳播渠道、以及首都之外的傳播媒介來完成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任務。《五·一六通知》向下傳達的同時，劉少奇、鄧小平主持的工作組被派駐到各基層單位，來“引導”、控制群衆自發的政治參與熱情。即便是有聶元梓等的大字報在全國廣播發表為群衆運動鼓勁，工作組形“左”實右的統治仍然籠罩基層單位。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毛澤東從武漢回到北京發現了這種情況，憤憤說道：“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人鎮壓學生運動。誰才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到了八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破天荒地由北京院校的“革命小將”列席會議；《十六條》定稿第二天以廣播、報紙的方式發表，對舊有的內外有別、等級分明的傳播方式和官僚程序作了重大突破。也正是在這種重大突破之後，群衆對政治的參與，才第一次以公民政治的方式（言論、出版、結社等）在中國大地上出現。

再來看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時間，這也是本書和其它文革史學分歧最大的一個論點。首先，不妨先對歷史現場角色自身的解說進行考察。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並沒有一個精確的日程表，只是估計文化革命大約需要幾個月到一年。文化大革命進入到中期（大約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澤東曾根據形勢的發展透露出他當時的估計^[1]，即文革有“三個階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第一年是布局，第二年是爭取勝利，把臨時權力機構建立起來，搞思想革命化，第

[1] 《偉大戰略部署：毛主席在最近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大約 1967 年 8 月，見于多種群衆出版物。

三年是收尾。”從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中及毛澤東的講話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文化大革命作為一次由下而上地全面發動群衆、開門整黨的創造性實驗已經結束，“今後還要搞許多次”。一九七四年，是毛澤東唯一一次認真地考慮再一次發動群衆開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也是自一九六八年以來各地受壓抑的造反派群衆對運動訊號做出積極響應規模最大的一次^[1]。在某種程度上，各地受壓抑的造反派一直在等待上一次的文革造反運動死灰復燃；那樣的話，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就會真的跨越一九六〇年代、延續到一九七〇年代；然而，這個希望破滅了：在造反派一代人心中，文化大革命成為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永恒的歷史回憶。直到一九七七年以前，即華國鋒那個充滿矛盾的“十一年文革”出臺以前，在人們正常的詞彙使用中，文化大革命毫無疑問地指的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的群衆運動時代^[2]。

然而，“兩年文革”說最重要的根據，仍是在這兩年中前所未有的政治運作方式。毛澤東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衆來揭

[1] 見楊曦光：《牛鬼蛇神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24章；王紹光：《理性與瘋狂》，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20章。

[2] “文革”一詞本身具有一定的歧義性：文革的理論基礎，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作為新階段的文革是思想和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領域長期的鬥爭，有別於在操作上的“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衆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的具體動員過程。一九八一年中國官方對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正式否定，在一定意義上取消了這個“新階段”。

發我們的黑暗面。^[1]”這種形式和方式，在文革中找到了，在兩年間得到全面的運用。相比之下，從一九六八年九月開始的一系列後繼運動和事件，從清隊、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陳整風、批林整風、批林批孔、評法批儒、批判資產階級法權、評水滸、經濟整頓、教育整頓，直到反擊右傾翻案風、批鄧，無論是由上層激進派發難還是務實派發難，都不同程度地恢復到了自上而下、形“左”實右、“運動群衆”的形式；而毛澤東所倡導的“造反”的新形式——“反潮流”，沒有能夠促進形成類似文革中的群衆自發性造反運動。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這個時期在新中國歷史上，自然有其特殊性。我們可以用“後文革時期^[2]”稱呼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六年這個階段。在這個時期內，文化大革命前後出現的黨內激進綱領被部分地付諸實踐或實驗，如文藝革命、教育革命、衛生革命、五七道路、大寨大慶道路、鞍鋼憲法等等；同樣在這個時期內，也有整風、四個現代化、整頓等黨內務實派的政策綱領的實施，有一九七五年的右傾翻案，更有清隊、清除“五·一六”等清算文革造反派的迫害風潮。

這裏，有必要指出建立在“政治集團興衰”基礎上的“十年文革”論的不合理性。“十年文革”論的思路是：林彪集團、“四人幫”集團是利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兩年中的造反運動之亂，通過打倒老幹部篡權而崛起的，而他們

[1] 《和卡博、巴盧庫同志的談話》，（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年3月。

[2] 這裏後“文革時期”含義為文革之後的時期，而不是象有些將文革分為“前文革”和“後文革”的觀點中所指的“後文革”時期。

從上臺到倒臺前後共十年，因此，文革是“十年動亂”。這裏且不去評論其中缺少嚴密邏輯的聯想式推理，也不去分析滲透其中的“精英史觀”，只是著重指出：只有對歷史記錄作系統篩選，有意操縱，才會得出“四人幫”橫行了十年、是一切混亂的罪魁禍首的結論，進而推出文革是“十年動亂”的結論。

文化大革命的造反運動和奪權運動的結果，是使黨內務實派集團得到加強，而不是削弱。這主要是因為：兩年之後，很大一部分受衝擊的幹部很快就得到了“解放”，使黨內務實派集團的力量得到大大擴充。自然，經過文革運動，務實派的政治立場被迫向左移動，但同樣也應看到，以周恩來為代表的那些黨內領導人和幹部對文革運動的認同本來就比劉鄧和保守派的認同要多。文革運動後另一個得到加強的集團是地方軍人，比如分別以黃永勝、韋國清為首的廣州軍區和廣西省軍區。“十年”的後八年中，更有大批在造反運動中被“打倒”的官員官復原職或得到晉升。在很長一段時間，由周恩來和復出的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制訂的許多政策都是旨在消除和挽回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十年”中的後八年，正如同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一年之間的五年，實際上是不同的政治派別之間鬥爭膠著、往來拉鋸的八年。兩年的文化大革命造反運動沉重打擊了官僚體制，而為修復這個體制所進行的復員、復舊和復歸活動，直至對文革的否定、清算，是從六十年代末就開始的趨勢，只不過愈演愈烈，在八一年達到高潮。在這中間並不存在一個“十年浩劫”戛然而止的神秘時刻。

這裏，不妨作一些具體的比較，來說明一九六六到一九六八年的兩年才真正是新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時

期：首先來看充滿著復舊和復出氣氛的一九七二年，把它和“文革兩年”比較，再把它和同樣充滿恢復和復舊氣氛的一九六二年相比，就會發現一九七二年更像一九六二年，而完全不像文化大革命的兩年；同樣，一九七二年清除“五·一六”的官方運動，也更讓人想起一九八二年清除“三種人”的官方運動。相反，被排除在“文革十年”之外的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九年，倒更像所謂“全面動亂”的兩年——無疑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九年的事件和文化大革命是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的。總之，“十年浩劫”說法中的“十年”和“浩劫”無法同時并存：是十年，那就不是浩劫；假如是“浩劫”，那就不是十年——或者不够十年，或者是超過十年。在一些堅持反共觀點的人士心目中，共產主義的浩劫，既不始自一九六六年，直到今天也還沒有結束。

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對文革的歷史和關係越疏遠，對“十年浩劫”的看法就越堅定、越僵化。在一九六〇年代後期和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以前，人們對“文革”這個詞彙的理解一直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的文革”；親身參加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在今天也大多是這樣理解。在文革之後長大的一代，以及對文革歷史瞭解甚少的人群中，更多的是先入為主地接受了“十年文革”的官方口徑。滑稽的是，從更疏遠的觀點看，比如對在海外只能從間接渠道得到有關中國信息的人來說，到底有多少年浩劫並不清楚，反正那裏無時無刻不在運動和動亂。

“徹底否定”論和“兩個文革”論

在討論和限定了“什麼是文革”之後，我們可以轉向“兩

個文革”，還是一個文革的問題了。

應該看到，“兩個文革”論，是對“徹底否定”論的一元化觀點感到不能滿意、從而提出的修正理論。它對文革期間人民群衆能够積極參與政治給予一定的正面評價；另一方面，“兩個文革”論試圖將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與文化大革命中的群衆造反運動割裂開來，而不承認在中央的鬥爭和社會上造反派與保皇派之間的鬥爭有著比較清晰的聯盟和對立的關係。在怎樣解釋群衆運動性質上，出于某種意識形態上的成見，對來自群衆的自發的激進思想，和群衆對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的渴望，採取忽視的做法，反而一定要給文化大革命中的群衆大民主貼上自由主義的、“反對共產專制”的標籤。這其中還有一個很深刻的問題，那就是從左的方向對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改革和民主化的可能性。總之，“兩個文革”論者一方面盛贊文革運動期間的大民主、集會結社和反官僚運動，另一方面認為毛澤東和群衆在各說各話：毛澤東在追求“僵化的社會主義”，而群衆在追求“自由化”；甚或乾脆將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和官僚派的形“左”實右的整人手段混為一談，在一定程度上和主流觀點中的“群衆受騙、受操縱”的看法合流^[1]。

“兩個文革”的觀點，在親身參加過文革、特別是那些有過造反經驗的人們中較為流行；然而，不難發現，這個觀點，是在清算文革、保守復舊的風潮的影響和壓力下，有造反經歷的人在心理上對官方“徹底否定”的觀點讓步

[1] 凌魏：《文化大革命和第三代人》，《知識分子》1986年春季號，p54。值得一提的是還存在著另一種“兩個文革”理論，即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意圖有其正面的意義，但在執行中出現失誤。

和妥協的結果。實際上，從六十年代末開始，隨著文革運動的低落，轉向這種觀點的人越來越多。就在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那些對文化大革命極度反感的人就已經“看透紅塵”，把當時發生的一切都視為革命口號掩蓋下的一場精英利用群衆、進行爭權奪利的鬥爭。實際上，將革命歸結為“精英操縱群衆實現個人目的”的觀點，是有歷史傳統的：十八世紀英國保守思想家艾德蒙·伯克，就系統地發展了這個觀點，用來徹底否定當時的法國大革命^[1]。從那時起，近代史上的每一次革命，都伴隨產生出一個徹底否定該革命的理論，這些理論全都有如下這樣一種千篇一律的程式：一切革命的本質都是一小撮精英野心家欺騙利用頭腦簡單的群衆，因此群衆造反是違反群衆自身利益的；所以，群衆通過革命所能得到一切，本可以花小得多的代價通過統治階層的漸進改良來實現，而無需傷及統治階層的既得利益。在這些革命否定論中已經蘊涵著“兩個革命”的意味，即把一場革命看成是精英的爭權奪利和暴民的紅色恐怖的“融合體”。

“兩個文革”論對文革中群衆運動具有爭民主、反迫害的性質的評價，本書認為是基本正確的。在這方面，“兩個文革”論對一元化的“徹底否定”的主流觀點是很好的批判和糾正，有其深刻之處。十分遺憾的是，無論是現有的史學著作中還是現有的文學作品中，對文化大革命群衆運動的這一重大內容很少有所提及和表現。另一方面，“兩個文革”論對文化大革命其它層面，特別是精英鬥爭以及精英與群衆的關係問題上，不同程度地與主流觀點相一致。

[1] Burke, Edmund, Co.

本章以下部分將討論和分析“兩個文革”論中在這些方面的論點和論據。這些論點和論據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完全是出于私人權力鬥爭的目的，特別是因為擔心死後有人效仿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所以才藉反修為名發動文革；(二)毛澤東依靠陰謀或“陽謀”的方法發動文革，向一些人“交了底”，而沒向另一些人“交底”；(三)精英和群衆的關係：精英在幕後操縱了群衆“炮打”高級領導人的活動；(四)在思想理念層面，群衆反官僚、反迫害的運動與毛澤東的文革理論毫無關係。

下面就結合文化大革命的具體史實，包括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和過程，上層與群衆的關係、“繼續革命論”與血統論的關係、以及兩個司令部與兩大群衆派別之間的聯盟和對立關係的形成和演變等等，來說明官方文革史學和“兩個文革”論中將文革的主流看成是“精英權力鬥爭”的觀點，是有嚴重缺陷的。最後，將舉例討論文革中的三個議題，即“五十天”中的工作組、老紅衛兵和經濟主義，來說明文革在枝節和局部上的複雜和曲折，同時在主題、總體上又具有一致性和連貫性。

(一) 有關毛澤東的“斯大林”情結的神話

首先來看所謂的“毛澤東的斯大林情結”的理論。這個理論大意是說，因為赫魯曉夫揭露了斯大林的錯誤、批判了對他的個人崇拜，因此毛澤東引以為鑒，為了預防身後有人效仿赫魯曉夫，因而批判赫魯曉夫，并進一步進行反修鬥爭和文革。這個廣為流傳的說法，似乎推測的成份居多，而缺乏事實依據。更重要的是，它實際上顛倒了毛澤東與斯大林和蘇聯模式的關係。

中蘇兩黨分歧的原因，除了中共認為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無原則、無策略地全面詆毀斯大林之外，還有更重要、更深遠的原因。當時中共和蘇共的一個更主要的分歧是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路線問題：在當時美國圍剿中國的情況下，美蘇合作體制下的蘇聯愈來愈向美國搞妥協和緩和，成為“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其它分歧包括對南斯拉夫式社會主義改革的看法，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內部的不同政見等等。這些思想和路線上的分歧才是毛澤東與赫魯曉夫不可避免地決裂的真正原因。至于毛澤東對斯大林問題的態度，事實是：毛澤東對斯大林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錯誤最先有警覺，堅持中國應走出有所創新的、避免蘇聯弊病的道路；反而是蘇聯的新領導集團，只知道抓住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問題，却全盤繼承了斯大林遺留下來的僵化的經濟體制，和缺少群衆參與的政治社會制度，而從未想過作制度上的調整或革新。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所反對的那些中共黨內的保守派、親蘇派，是主張將蘇聯體制一成不變地全盤照搬到中國來的，在他們心目中，從來是對從斯大林到赫魯曉夫的一切都加以盲目崇拜的。毛澤東對斯大林在理論上、實踐上的各種錯誤，在各種場合下多次提到，對迷信蘇聯體制的人屢次提出警告^[1]。因此，將文化大革命看成是維護中國的“斯大林主義”、針對未來的“秘密報告”人的政治清洗，是在很多問題上搞顛倒了。

[1] 毛澤東：《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批語》，《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a)年。毛澤東：《關於〈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筆記》(一九六〇年)，《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b)年。

(二) 所謂陰謀和“陽謀”

有關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有一個流行說法，就是文革運動一開始就向有些人“交了底”，而沒有向另一些人“交底”，因此，知根知底的人在文革中沒有說錯話、辦錯事，因而沒有倒臺，而不知內情的人（劉少奇、鄧小平等），受騙上當，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工具。這種看法不僅是從精英式的宮廷政治角度看問題，更帶著陰謀論的色彩。以這種觀點看，中共內部一切政治鬥爭都是無原則的山頭派系之間為了私利的鈎心鬥角、爾虞我詐。那麼我們來看一下具體的歷史事實。

毛澤東開展文革的基本思想，進入一九六〇年代後開始漸漸形成；而毛澤東在思想方面一步步的變化，也是全黨共知的。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發生公開的分歧。劉少奇公開承認，對毛主席的思想開始感到跟不上了。一九六二年，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一九六三年在四清《前十條》中提出黨和國家有可能變色，一九六四年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同年提出“官僚主義者階級”的說法，一九六五年在《二十三條》中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等^[1]，這些新提法，雖然包含理論上的含混和矛盾，但都是在黨內公開提出的，對黨內所有人都有所交代。對毛澤東的這些近似異端思想，黨內大

[1] 以上分別見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前十條），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對陳正人同志蹲點報告的批示》，和《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二十三條）。

部分人不理解，一小部分人有所理解，這就是文革開始時黨內的狀況。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劉少奇、鄧小平派出工作組整群衆，引發了他們後來的倒臺。這成爲毛澤東沒有向他們交底的經典例證。這個問題，其實也似是而非。毛澤東在怎樣對待學生鬧事的問題上歷來的言論，如“不要怕鬧，鬧的越大越長越好”等等，劉少奇、鄧小平應該是清楚的。毛澤東六月十日在杭州還說過：“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當時黨內許多人，包括劉少奇、鄧小平的同情者陶鑄等都在場^[1]。劉鄧的工作組政策，並非是因爲沒有得到毛澤東的交底，而是在執行他們自認爲正確的黨的路線，有意識地抵制他們認爲有可能帶來混亂的毛澤東路線。

在多數有關文革的文獻中，只提“一大批老幹部”被打倒、靠邊站，却不注意這樣一個事實：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激進派人物也比比皆是，假如從被打倒的和沒被打倒的比例來看，激進派人物被打倒的比例更大。其中包括中央文革派的重要成員，如王力、關鋒、林杰、戚本禹、穆欣等，更有後文革時期被打倒的陳伯達。這說明兩個問題：假如有所謂交底的事，那麼對這些中央文革的核心人物反而沒有給交底，導致了他們的跨臺。另外，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激進派人物被大批地打倒，這恐怕是由於官僚保守派力量的强大，導致了激進派陣營的瓦解，說明作爲政治鬥爭的文化大革命，即使是在上層，也一樣是兩派力量消長起伏的過程，而不是單方面某一派的陰謀策劃。

[1]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46 頁。1967 年，北京。

（三）精英與群衆

以“兩個文革”的觀點看，中央的鬥爭和群衆運動的興起只有時間上的重合，而沒有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性，只有利用和被利用的關係，而不承認是政治聯盟的關係。這種說法不但無法解釋中央的政治鬥爭為何要捨近求遠到下層去點火，更無法誠實地、系統性地和全面地面對文革的歷史紀錄。持“精英操縱”觀點的文革史學所屢提不厭的一個例子就是康生與聶元梓等合謀製造了那張全國著名的反對北大黨委的大字報^[1]。然而，這一個孤零零的例子本身不但不具有代表性，反而是掩蓋了文革初始階段存在於全國的一個普遍的趨勢，那就是：反對黨委、反對工作組的自發性群衆抗爭在全國高校普遍存在，而這些自發性群衆抗爭後來是在意識形態的理念層次上和中央文革結成聯盟。一九六六年六月到八月間，在全國範圍內的高校中，工作組鎮壓學生的自發運動，各地學生與工作組對抗，形“左”實右式的整人運動在大中校園盛行，將學生打成反革命、學生被逼瘋、被逼自殺的現象衆多，全國各地都驚人地一致。中央文革反覆表態支持已經遍布全國各校園的反工作組的學生運動以後，造反的學生開始在精神上、理念上認同和支持中央文革。而各地造反派對中央文革的認同，反過來加強了中央文革的地位。這個聯繫不是靠政治交易或政治操縱建立的，而是建立在基本一致的政治觀點之上，是一種典型的政治聯盟。正因為這個聯盟是建立在反對官方運

[1] 聶元梓等：《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1966年5月25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報》。

動“打擊一大片”的共同觀點之上，而不是靠了任何行政命令性的權威，受毛澤東、中央文革支持的大學派別，直到一九六六年在北京及全國各地仍是少數派。

全面地看，文革中的鬥爭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關思想理念和體制的鬥爭。那些敢于“炮打”高層領導人的革命小將們，並非是因為有“內部情報”，或有“後臺”，而是出于追究思想和路線上的是非，以及對“造反精神”的追求，無論造反派或保守派都是如此。官方文革史學喜好列舉的兩個事例就是一九六六年剷大富等組織的反對劉少奇的游行是受中央文革的授意，而進行反中央文革活動的李洪山、依林·滌西等人被逮捕。似乎以此就能證明反對中央激進派的活動都是群衆自發的，而反對走資派的活動却全是受精英操縱的。事實是：中央文革和各地造反派以及各地造反派之間最主要的聯繫是對官方迫害的反對；相反，各地的保守派除了對血統論和舊體制在理念上的認同外，更有舊體制的當權派不同程度上在幕後的財力物力支持。就在上述兩個事件發生的同時，也有大批和地方黨委以和平方式抗爭的群衆被打成“反革命”。在首都之外的地方各省市，被逮捕的人中絕大多數是受中央文革支持、反對省委、反對省軍區當權派的造反派。以致于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澤東決定以全部釋放“聯動”分子為條件，要求各省市全部釋放在二月逆流中大批被捕的造反派學生和群衆^[1]。

（四）毛澤東與造反派，“繼續革命論”與反迫害

“兩個文革”論的最主要根據，是認為毛澤東的文革理

[1] 見楊曦光《牛鬼蛇神錄》9章。

論，和文革期間群衆中自發產生出來的造官僚的反的思想理念，是完全無關的。在很多人的思維定式中，毛澤東作為集“極左”思想之大成的人，是不會有真正的民主的思想的。另一方面，一時間成為群衆手中强大武器的大民主、集會結社、言論自由等，也不可能和“極左”的“社會主義新階段”有什麼必然聯繫。根據這兩條假定，推論出毛澤東利用了文革中的群衆運動，目的只是為了打倒上層集團中的政敵。然而，這種推論和文革歷程中和後文革時期的一系列發展事實不符。

首先，在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並沒有預先設定好的政敵。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以後的新思想，黨內大部分人都很不理解，然而，這並無法成為政敵的標準（劉少奇被打成叛徒一案，只能說是在文革期間舊秩序被打亂的特殊情況下橫生出的一個枝節，後來喧賓奪主，最後被當成是文革的主要成果^[1]）。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情況是：假如將反對造反運動的人算作所謂的“政敵”的話，那麼“政敵”不是越打倒越少，而是越來越多：反感文革的官僚勢力對文革的抵抗到後期越來越強烈。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反對群衆運動的“政敵”們還在頑強抵抗，大肆鎮壓，而遠遠未被都打倒。文化大革命，是在反對群衆的勢力仍然強大、打著“文革”的旗號搞形“左”實右鎮壓群衆的現象四處蔓延、有可能再次發生類似武漢政變或更嚴重的事件等等嚴峻形勢下，匆匆地鳴鑼收兵的。這也是為什麼毛澤東在文革結束時以“今後還要搞許多次”來暗示：這

[1] Gao, C.F. Mobo. "Maoist Discourse and a Critique of the Present Assessment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20.

一次文革並沒有完成任務。

這裏不能不簡單提及文革匆匆結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後半段（一九六七年八月以後）激進派聯盟發生了嚴重的破裂，不僅在中央的激進派內部發生離析，中央文革和地方造反派的關係也呈現緊張。這其中有三個主要原因：一是群衆造反派內部發生宗派主義糾紛；二是一小部分造反派左派在理論上超前發展，而有些省份的造反運動則嚴重滯後，全國的運動發展不平衡，各省的形勢不能互相支持；而更重要的一點，也是造成前兩個現象的原因，那就是還擁有强大實力和充足資源的官僚保守派對造反派陣營進行了有效的瓦解、分化和挑撥工作，這個十分重要的史實，在幾乎所有文革史著中都沒有提及^[1]。

“兩個文革”的論點所無法解釋的另一個史實是：後文革時期毛澤東並沒有收回他藉以發動文革、并在文革中支持造反派的那些思想理論。毛澤東在文革後反而更加信誓旦旦地強調要反對修正主義，認為當時中國的很多方面還“和解放前差不多”，強調反官僚、反特權。毛澤東在後文革時期提倡的“反潮流”精神，很顯然是“造反有理”的再版。假如按“權力鬥爭”的說法，僅僅從“維護文革成果”和防止被打倒的“政敵”翻案的角度出發，是沒有必要反覆強調社會主義還存在的“陰暗面”、“變修變色的危險”、以及“反潮流”的重要性。唯一合理的解釋是：無論在文化大革命中還是文化大革命後，毛澤東都是在“繼續革命、不斷革命”的理論層次上思考問題，而不是在打倒

[1] 見 Unger, Jonathan "Whither China? Yang Xiguang, Red Capitalists, and the Social Turmoil of the Culu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Vol 17 No.1, 1991. p21.

政敵、維護名譽的層次上。

最後應指出，“兩個文革”觀點試圖將毛澤東的理論思考與文化大革命中群衆的政治抗爭割裂開來，面臨著重大障礙。毛澤東帶有反精英和烏托邦色彩的思想，是在抽象、宏觀層次上為群衆的抗爭提供了闡釋框架；在造反派群衆中滋長出的反血統論、反特權情緒和行動，是在具體、微觀層次上，給“繼續革命”提供了活生生的社會學內容。毛澤東一九六〇年代以來在繼續革命和黨內資產階級問題上所發表的各種近乎異端的思想和言論，通過群衆組織的非官方出版物流傳到民間和社會，這對當時富有造反精神的青年們來說，具有極大的新鮮感和吸引力。可以說，在文化大革命中，產生了一種獨特的激進思想和鬥爭話語，它結合了反迫害、反血統論、激進民主等內容。文化大革命從下層到上層的一系列鬥爭，包括對當時社會中舊有的和新生的各種不平等關係的鬥爭，都被概括到這個雖然內容含混但特徵明顯的鬥爭話語上來。說它含混，是因為它不僅包括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國家陰暗面、對黨內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的激烈修辭，也包括以省無聯《中國向何處去》為代表的民間左派的思想創造（無論我們今天如何評價這些思想創造）^[1]；說它特徵明顯，是具有獨特的毛主義的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語境。

自從六十年代末世界範圍內的反體制的左傾浪潮衰落以來，人們習慣于將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反體制運動和“自由化”聯繫起來。蘇聯東歐體制內的民主運動，從捷克斯

[1] 楊曦光：《中國向何處去》，《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第六卷，明報月刊社，1972年。

洛伐克的“七七憲章”運動到蘇聯的薩哈洛夫和索爾仁尼琴，在批判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的同時，競相走向社會主義理念的對立面。在對蘇聯體制的批判上，和對現存的社會主義制度需要徹底改善的認識上，毛澤東和他們的看法有些是接近的。然而，對於社會主義制度所存在的弊病的根源，毛澤東却開出了和他們完全相反的診斷和處方：“資產階級雖然已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衆，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1]”毛澤東試圖另闢蹊徑，從左的方向去改革社會主義、實行社會主義民主。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文革和六十年代大約同時期的西方新左派運動不謀而合：即看清了以蘇聯為中心的“舊左派”已經失去了和現存體制作鬥爭的意志，反而轉變成現存體制的熱衷效仿者和忠實合作者。和中國文化大革命遙相呼應、在時間上也重合的一九六八年巴黎“五月風暴”，就是歐洲新左派的一次“文化革命”。在“五月風暴”中，左派學生和群衆突破了“舊左派”即法國共產黨對革命運動的壟斷，以自發的革命熱情對抗現存體制。而親蘇的法共害怕群衆運動，成為歷史的尾巴。從這種世界歷史的角度出發，我們能夠掂量出毛澤東和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群衆都在歷史的天平上的沉重，能够理解文化大革命作為世

[1]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過）》（即“十六條”）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人民日報》。

界“新左”實踐的唯一而獨特的一部分的重大意義。

文化大革命的複雜和曲折

“兩個文革”論點中所蘊涵的對一場大革命中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描繪，無疑有其真實的一面。然而，這是所有革命都無法避免的現象。不妨將世界革命史上兩個重要革命——法國大革命和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文革作比較。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頭緒紛繁、枝節橫生，直到今天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法國大革命。而中國自己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在舊制度垮臺後，各種不同的新舊勢力都在試圖以自己的政治想像來界定新秩序，導致頻繁的政權更迭，軍閥割據與混戰；然而，以政治使命、文化使命、階級聯盟等角度來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內在一致性，它的局限和不足等，都是很清楚的。

依照“兩個文革”的思路，文化大革命還可以分解成不止兩個，而是多個：它包括有空想家的文革，野心家的文革，有“極左”理想主義的文革，有“青春騷動”的文革，有老好人、隨大流的文革，有見風使舵、投機取巧的文革，有政治迫害的文革，還有打砸搶的文革。然而，機械的、割裂的觀點是無助于認識文化大革命的複雜歷史的。

現代性的首要特點，就是複雜和曲折。這裏以文化大革命中的三個具體議題為例，來說明文化大革命中充滿著複雜倒錯的因果關係和發展線索，但仍然構成了一個完整連貫的有一致主題的歷史事件。這三個具體議題就是：即“五十天”中的工作組、老紅衛兵，和奪權時期的“經濟主義”風潮。

假如說中國文化大革命有別于其它革命，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對立的兩大陣營在發動召喚各自的力量時，所使用的口號、旗幟有很大程度的重疊，同時又有很微妙、很尖銳的鬥爭。“打著紅旗反紅旗”，成爲文革的一大特色。然而，在這個特色掩蓋下，實際上發生著一個所有革命所共有的一個過程，那就是，早期的派別在完成了發動任務後，自己反而被革命的浪潮所吞噬^[1]。在法國大革命中，這個現象屢見不鮮：造國王反的火種是由貴族們點燃的，却很快燒到貴族自己身上；反對貴族和專制制度的斐揚派和吉倫特派，到後來轉向保守，成爲平民激進派的打擊對象。在文革中，起到這個點火發動作用、而後又被後來者打倒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早期的工作組和老紅衛兵。

共產黨的工作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起的是鎮壓運動的作用。在“五十天”期間，它把革命的調子唱得很高，用歷來的一套運動方式大搞形“左”實右。遭到學生的強烈反彈，也因此使受工作組迫害的學生產生對“資反線”的強烈仇恨。然而，工作組在“五十天”期間執行所謂“資反線”的同時，也把文化大革命的激進信息廣泛傳播到群衆中。政治嗅覺極度靈敏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開始察覺出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不是工作組在搞的那套“運動群衆”，而是讓群衆接過來激進的鬥爭武器，去完成自己解

[1] 亨廷頓在《變遷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提出了“西方革命”和東方革命兩種類型：在“西方革命”中，舊體制先行崩潰，然後一批批激進的革命派別遞次上臺，將革命的綱領和思想推向越來越激進。在“東方革命”中，在舊體制崩潰前，出現“雙重政權”，即現政府和一個挑戰它的準政權組織，互相爭奪領土及民意。按照這種分類，文化大革命不僅以城市和文化作為起點，也呈現出“西方革命”的特點。Huntington, Samuel P.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放自己的任務。工作組即是革命的鎮壓者，又是革命理念的傳播者。沒有工作組的形“左”實右，就不會有後來造反派的激進和反叛。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老紅衛兵，是比工作組更加矛盾、更加易于混淆的一個議題。老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九六六年八月到十一月）破四舊的主力。他們簡單機械地理解和執行毛澤東的“破舊立新”的思想，還搞了“紅海洋”、“革命化”等形式主義，更有以血統論為基礎的暴力恐怖。以革幹子弟為主組成的老紅衛兵的這些“革命行動”，實質上是出于對自身特權的驕傲和捍衛，本書前面章節已經分析，這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激進的反動”和“狂熱的保守主義”。隨著群衆運動的發展，這一批老紅衛兵最後演變成舊秩序的最堅定的維護者。另一方面，後來發展壯大起來的、由多種出身成份組成的造反派，採用了靜坐、請願、上訪等典型弱勢群體所採取的相對溫和的“公民不服從”行動。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老紅衛兵衝向社會，給暴力、武鬥等形式造成了一定合法性，同時也破壞了官僚管理下的社會穩定秩序和公檢法的權威，在這個意義上，保守的、“反動的”老紅衛兵也是群衆運動的點火者和傳播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凡初期的形“左”實右，無論是工作組還是老紅衛兵，出于其意圖外後果，都起到了發動群衆、把群衆推向左傾的作用。法國作家夏多布里昂評論法國大革命時說：“法國大革命貴族發難，而平民完成了它。^[1]”

第三個用來說明文化大革命的複雜和曲折的例子就是

[1] George Lefebvre,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奪權中出現的“經濟主義”。所謂“經濟主義”現象，根據當時的輿論宣傳，主要是指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七年初官僚當權派以停工停產、破壞交通等消極破壞文革，另一方面以經濟實惠收買群衆的現象。然而，也有一種完全不同的解釋。劉國凱在《文化革命簡析》中，認為：“在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民主空氣高漲的情況下，積鬱在廣大群衆胸前多年不敢講的話，不敢提的合理要求，此時都如開了閘門的洪水洶湧而出。工資長期凍結問題，合同工長期不轉正問題、勞保問題、福利補助問題、知青就業問題、宿舍分配問題、拖欠加班費問題等等。多年的積憤如堆積已久的乾柴，一點火星即成熊熊之勢。一個單位有群衆率先揭竿，消息傳開，其它單位的群衆立即效仿呼應。^[1]”這個解釋無疑具有很大的真實性。建立經濟民主，實行工人參與工廠管理，這本身就是文革綱領之一——《五七指示》的思想。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氣氛，把工人自治、經濟民主等重大問題自然地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楊曦光在《中國向何處去》中寫到：

“[一月革命後]……沒有了官僚，和官僚機構，生產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鐵道部垮了，運輸照常運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種工作照常進行，而且工人階級的生產熱情，主動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們在一月份後已管理工廠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動，工人第一次感覺到‘不是國家管理我們，而是我們管理國家’。第一次是感覺到為自己而生產，幹勁從來沒有這麼大，主人翁的責任感從來沒有這麼

[1] 劉國凱《文化革命簡析》，129頁。

強，長沙紡織廠等地還創造了造反班等無數新鮮東西。……城市在一個短時期內，處在一種‘武裝的群衆專政’的情況，大部分工業、商業、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權又從章伯森、華國鋒、龍書金、劉子雲之流手中轉到了武裝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從來沒有像八月那樣以創造世界歷史主人翁的姿態出現在歷史舞臺上。小學生自動充當交通警衛工作，指揮車輛的英姿，湘江風雷、紅中會等群衆組織直接控制部分財經大權的自豪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

經濟主義中有群衆爭取自治、要求經濟民主的成分，然而這並不等於否認經濟主義風潮中也有官僚當權派破壞文革、拉攏保守派、瓦解造反派的因素，恰是各種現象和鬥爭的混雜交錯，形成了文革的豐富歷程。作為後一種因素的主要例子，就是在奪權鬥爭關鍵時刻，鐵道部呂正操鼓動罷工、火車停開，以及石油部、大慶油田當局先壓制運動，壓制不了時又鼓動工人停產串連，作為向文革派的示威^[1]。

文革中經濟主義風潮至少可以歸結為以下四類現象：一、當權派操縱的停工停產、交通癱瘓；二、當權派以濫發補助、濫長工資來收買保守群衆、瓦解造反派；三、群衆組織為小團體利益索取物資；四、工人的經濟民主訴求。另一方面，對於經濟主義風潮的反應，各地也是不一樣的。對當權派的收買政策，有些群衆組織加以接受，而這個過程又和群衆組織對參與管理和改善工作條件的要求混合在一起。在中央極力反對經濟主義的同時，基層群衆也並非

[1]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58頁。

是一概擁護經濟主義。在上海十一個造反派單位《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發表的同時，也有其它地區的造反派組織自發地呼籲反對經濟主義的物質引誘^[1]。

至此，應該已經清楚，“十年文革還是兩年文革”與“兩個文革還是一個文革”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是同一個問題。這兩個表面分開的問題的內在聯繫就在于：將文革的定義拉長為十年，就已經用命名的權力把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兩年間文化大革命群衆運動的獨特意義一筆勾銷了——文化大革命不再是“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衆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的大民主運動，而變成了精英上層爭權奪利、中央政治派別和集團盛衰興亡、此消彼長、相互取代，下層群衆被欺騙、被利用、被玩弄的黑暗的十年。將文革界定為十年，起到了一箭雙雕的效果：它既將兩年群衆運動的任何正面經驗全部用後八年的“專制黑暗”加以抵消和否定，又將十年內的一切罪惡的責任都推給開始兩年中的群衆運動和大民主實驗，徹底否定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進行任何群衆大民主實驗和政治制度更新的“空想”。一九八〇年代初以來在“十年浩劫、十年動亂”的主流觀點和主導話語的影響下，將文革運動中群衆大民主的寶貴經驗和後文革時期鎮壓造反派等“封建法西斯”一同徹底否定，嬰孩和髒水一同倒進陰溝，將各種各樣的由於不同原因、甚至相反原因受迫害的罪責一概籠統地歸結為“毛澤東晚年錯誤”和“野心家的篡黨奪權”，一度確實起到了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的作用。然而，一些親身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實在無法接受在這種話語環境下所產生的那

[1] 趙聰：《文革運動歷程述略》，友聯研究所，1974年，438頁。

些明顯的倒錯和謬誤的結論。這就是為什麼劉國凱提出“十年并非全是浩劫”、楊小凱提出“文革不是前後一致的‘十年浩劫’”的原因。假如我們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在真正史無前例的那兩年，和那兩年內的群衆運動，“十年是否全是浩劫”、“文革是不是前後一致的‘十年浩劫’”等問題，就成為多餘的了。主流觀點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和“革命”都採取了否定的態度，這裏，我們對“十年浩劫”中的“十年”和“浩劫”也都提出疑問。

結語 精英、群衆和文化盟主權： 文革的理論與實踐

思想理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自始至終是被高度重視的，然而，在文革中處于指導地位的思想理論又經常被發現處在含混、矛盾和不確定之中。不過，一部豐富的思想遺產，通常是包含矛盾和歧義的，後人對它的闡釋也不會停止。在前面各章中，已經對一些特定問題作了簡要的理論討論。作為結語，本章將回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的元敘述和元理論，而這個元敘述和元理論就是有關精英、群衆與文化盟主權的理論。下面的討論，將要關係到文化大革命所涉及的所有關鍵主題：馬克思的學說中的精英與群衆，階級和階級盟主權，文化與權力，知識分子與文化盟主權，人民內部矛盾範式，等等。有關問題都是經典的，在這裏，我們必須回溯到馬克思和巴枯寧那裏，同時又要參考二十世紀的和當代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洞見。有關討論不僅要深入考察毛澤東晚年的政治思想，也將揭示毛澤東的思想和二十世紀另一位革命思想家葛蘭西有關文化盟主權學說的共通之處。在對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關鍵詞進行理論梳理後，可以發現它們之間的深刻聯繫，以及由它們所組成的一個理論結構，而群衆與文化這兩個概念又處于這個結構的中心。將這個高度理論化的發現，作為一部群衆的文化大革命史的結語，應該是很切題的。

馬克思與巴枯寧：政治與統治

先從馬克思與巴枯寧的分歧談起。

這裏，主要參考阿爾溫·古德納的文章《馬克思的最後一戰：巴枯寧和第一國際》，和保羅·托馬斯的著作《卡爾·馬克思和無政府主義者們》。^[1]

馬克思認為：資本的私人佔有制是壓迫的最終的根源。而國家只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權力和壓迫的來源問題，關係到階級消亡（或正在消亡）的社會應如何來組織、如何來管理的大問題。馬克思在世時所進行的最後一場重大論戰，就是圍繞這個問題，論戰發生在馬克思和巴枯寧之間。1864年，國際工人協會(IWA)，即後來的第一國際在倫敦成立。從成立之始，到1872年在海牙召開的第一國際最後一次代表大會，自始至終貫穿著馬克思和巴枯寧之間的激烈鬥爭，最後以巴枯寧被驅逐出協會而告終^[2]。

1866年在日內瓦舉行的國際工人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就發生了一場代表資格的爭論，矛頭指向像馬克思這

[1] Alvin Gouldner: "Marx's Last Battle: Bakunin an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in Theory and Society 11(1982)853–884. Paul Thomas: Karl Marx and the Anarchist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2] 有關巴、馬之爭，E.H. 卡爾所著的巴枯寧傳記是主要來源 (E. H. Carr: Michael Bakunin, New York, Vintage, 1961)，卡爾的敘述，傾向於兩個人的陰謀論；托馬斯強調觀點的不同，古德納則認為兩人其實很接近。

樣的知識分子。法國代表亨利·多蘭提出：只有體力勞動工人才有資格成爲代表，因爲“特權階級成員，無論其特權來自資本還是學歷，都是我們的敵人”。馬克思事先預料到這種情緒，他雖表示反對這個提議，但自己謝絕擔任德國代表，而推薦了一位工人，儘管馬克思是協會的成立宣言和章程的首要起草人。多蘭的提議以 20 : 25 的接近票數遭到否決^[1]。敵視知識分子的情緒，在當時以手工業工人爲主的工人運動中相當流行，從共產主義聯盟到第一國際都受到它的影響。對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稍有瞭解的讀者，立即就能辨認出來這是一場對我們非常熟悉的辯論。這個主題，不僅是馬克思、巴枯寧論戰的一個焦點，而且後來也成爲社會主義國家社會分裂的根源。

吉德納評論說，馬克思和巴枯寧兩個人其實有許多共同點：他們都自認爲繼承了黑格爾的思想，都尊崇科學，反對宗教、反對資本主義，主張革命。因爲巴枯寧有著和馬克思共同的暴力革命主張，使他成爲馬克思的競爭者，而與無政府主義運動內部的蒲魯東主義有所區別。

馬克思和巴枯寧之間的觀點差异，在表面看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個是德國人，另一個是俄國人，以及隨之而來的各自的民族偏見。馬克思歷來認爲：落後的俄國是歐洲反動派的大本營；在第一國際時期，馬克思還警覺到：像巴枯寧這樣的俄國人有企圖控制國際工人運動的趨向。在巴枯寧看來，馬克思帶著德國人所特有的對官方和權威的崇拜。這在馬克思的一些言論中有所反映。比如，普法

[1] Hal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Part I: The State and Bureaucracy.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戰爭開始時馬克思給恩格斯寫信：“如果普魯士贏得戰爭，那麼國家權力的集權化對將來工人階級的集中化能派上用場。”巴枯寧認為：德國才是反動勢力的中心，這個國家幾個世紀以來都是在專制之下。巴枯寧相信農民具有革命潛力，而馬克思把農民看作是小資產階級，認為他們沒有革命前途，最終將被掃進歷史的垃圾箱。

各自表面上的民族偏見，實際上反映了在理論問題上的深刻分歧。兩人都承認經濟基礎的首要性，都主張消滅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財產制度。但巴枯寧要消滅的，還不止這些，他還要把革命的矛頭同時對準“國家”。巴枯寧強調說：資本主義財產廢除了，但教育和知識上的不平等將很快又產生新的權力差別，製造出新的特權等級。

兩人在新社會何時建立、如何建立，建立後如何組織等問題上，有非常重大的分歧。馬克思、恩格斯的藍圖是：先要有一個新型的工人國家，對資產階級實行恐怖，粉碎反革命，其次，要領導對資產階級的資本剝奪。更重要的是，要暫時把一切權力、軍事和經濟，都集中到國家手中。

而巴枯寧認為，這個藍圖非常可怕，因為按照這個藍圖建立起的國家不可能是屬於工人的，而只能意味著強制性的集權，并最終形成國家對生產資料的佔有。巴枯寧自己則主張：未來新社會應以聯邦的、自願的方式為基礎。巴枯寧還認為：馬克思的思想不能代表無產階級利益，而是代表佔有科學的知識分子的利益。

巴枯寧批評說：按照馬克思的構想，社會主義有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佔有生產資料，那麼一個新的官僚、和受教育的特權階級就會形成，國家就會變得越來越强大，而廣大群衆只不過是送走了一個壓迫者，又迎來一個新的壓

迫者。因而巴枯寧認為馬克思、恩格斯許諾的“消滅資本，國家本身就會自行消亡”不過是德國知識分子所鍾愛的一個神話。

馬克思和巴枯寧之間的辯論，最生動地記載在馬克思的《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這篇著作裏。^[1]馬克思晚年開始學習俄語，作為練習，他抄錄了巴枯寧的俄文著作《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中的段落，并對所抄寫的段落用德語做出自己的評論。下面摘錄這個虛擬對話的精采部分^[2]：

巴枯寧：

如果有國家，就必然有統治，因而也就有“奴役”；沒有公開的或隱蔽的奴役的統治，是不可想像的，這就是我們要與“國家”為敵的原因。

“上升為統治階層的”無產階級是什麼意思呢？

馬克思回答：

這就是說，無產階級不再在個別的場合同經濟特權階級作鬥爭，它已經獲得了足够的力量和組織性，能够在同這些階級作鬥爭的時候採取一般的強制手段，但是，它只能採取這樣一些經濟手段，這些手段將消除它作為雇傭工人的特性，因而消除它作為階級的特性；隨著它獲得徹底勝利，它的統治也就結束了，因為它的階級性質已經消失了。

巴枯寧問：

難道整個無產階級都將成為統治者嗎？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p694-700。

馬克思答：

舉例來說，難道在工會中，它的執行委員會是由整個工會組成的嗎？難道在工廠中一切分工和由分工而產生的各種不同的只能都將消失嗎？難道在巴枯寧的“自下而上”的結構中，就一切都在“上面”嗎？如果那樣，豈不就沒有什麼“下面”了。難道公社的全體社員將同等地管理一個“區域”的共同利益嗎？如果那樣，公社和“區域”之間也就沒有任何差別了。

巴枯寧：

德國人大約有 4000 萬。難道 4000 萬人全都將成為政府成員嗎？

馬克思：

當然啦，因為事情是從公社自治做起的。

巴枯寧：

全民都將成為管理者，而被管理者也就沒有了。

如果人自己管理自己，那末按照這個原則，他就不是管理自己；因為他只是他自己，而不是任何別的人。

如果那樣，就將沒有政府，沒有國家，如果有國家，就會有被管理者和奴隸。

馬克思：

這只是說：階級統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義上的國家也就不存在了……

在另一段落，巴枯寧從另一個角度質問：

請問，如果無產階級將成為統治階層，它將統治誰呢？就是說，將來還有另一個無產階級要服從這個新的統治，新的國家。

馬克思回答：

這就是說，只要其他階級特別是資本家階級還存在，只要無產階級還在同他們進行鬥爭（因為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後無產階級的敵人還沒有消失，舊的社會組織還沒有消失），無產階級就必須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無產階級本身還是一個階級，如果作為階級鬥爭和階級存在的基礎的經濟條件還沒有消失，那末就必須用暴力來消滅和改造這種經濟條件，並且必須用暴力來加速這一改造的過程。

.....

巴枯寧：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以及民主學派的最新成就，——就是謊言，它掩蓋著少數管理者的專制，更危險的是，他好像是所謂人民意志的表現。……因此結果是：少數特權者管理大多數的人民群衆。但是，馬克思主義者說，這個少數將是工人。

是的，大概是過去的工人，但是一旦他們變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統治者，他們就不再是工人了。
馬克思反譏道：

就像目前的工廠主並不因為當了市政委員會的委員就不再是資本家了一樣。

巴枯寧：

他們將從“國家”的高度來看一切普通的工人：他們將代表的，已經不是人民而是他們自己和他們想管理人民的“野心”。誰懷疑這一點，誰就完全不瞭解人的本性。

馬克思反駁：

如果巴枯寧先生哪怕是對工人合作工廠的管理者的地位有所瞭解，他關於統治權的一切狂想就徹底破滅了。他會不得不問自己：在這種工人國家（如果他願意這樣稱呼它的話）的基礎上，管理職能能够採取什麼形式。

.....

巴枯寧接著詛咒：

所謂的人民國家不是別的，而是由真正的或冒牌的學者所組成的一個新的人數很少的貴族階級非常專制地管理人民群衆。人民是沒有學問的，這就是說，他們將完全從管理的操勞中解放出來，將完全被當作被管理的畜群。多麼美好的解放呵！

馬克思主義者感覺到了這個矛盾，由於意識到：學者的管理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難堪的、最令人屈辱的管理，它儘管具有一切民主的形式，但將是實實在在的專政，因此人們便想這個專政是臨時的、短暫的，以此來聊以自慰。

他們說，他們唯一的心願和目的是從經濟上和政治上教育人民，提高人民，使人民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任何管理很快都將變得不需要，而國家本身在喪失了政治的即“統治的”性質以後，也將變成一個經濟利益和公社的自由組織。這是一個明顯的矛盾。如果他們的國家真正是人民的國家，那末為什麼要把它廢除呢？如果為了人民的真正解放而必須廢除國家，那末他們又怎麼敢把它稱為人民的國家呢？

馬克思回答說：

由於無產階級在為摧毀舊社會而鬥爭的時期還是

在舊社會的基礎上進行活動的，因此還使自己的運動採取多少同舊社會相適應的政治形式，——所以，在這一鬥爭時期，無產階級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最終的組織，為了解放自己，它還要使用一些在它獲得解放以後將會失去意義的手段；由此巴枯寧先生便得出結論說，無產階級最好不採取任何措施，而只等待普遍清算的日子——末日審判的到來。

巴枯寧：

他們說，這種國家羈絆、專政是為了達到人民的徹底解放所必要的過渡手段：無政府狀態或者自由——是目的，國家或者專政——是手段。可見，為了解放人民群衆，首先必須奴役他們。我們的論戰就是以這個矛盾為基礎的。他們斷言，只有專政，當然是他們自己的專政，才能創造人民的自由；我們回答說：任何專政除了“使自己永世長存”以外，不可能有別的目的，它“能够在忍受這種專政的人民身上產生和培養的，只是奴役；自由只能夠由自由”，即“全民暴動”和群衆自下而上的自由組織來創造。而反國家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或無政府主義者的政治社會理論，則“堅決地”、直接地引導他們同一切政府、同一切形式的資產階級政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認為除了社會革命以外，沒有別的出路，……

馬克思揮筆批道：

除了空洞詞句以外，沒有任何社會革命的東西，

.....

馬克思和巴枯寧的論戰，在展示出他們理論上的深刻分歧的同時，還摻雜著對對方的社會、文化背景的偏見。

在馬克思眼裏，巴枯寧代表著東方的野蠻落後，比如，他說巴枯寧的論述是“野蠻的韃靼方言”（在另外場合下，馬克思曾把巴枯寧的追隨者稱作“哥薩克”），而在巴枯寧眼裏，馬克思是典型的德國式的國家崇拜者，特別是，把他看成“德國學者”，亦即壟斷著科學的學術權威。

從理論上說，他們的分歧來自於對政治、權力和統治等範疇的一些最基本看法：

馬克思認為：權力和政治屬於上層建築，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因此，權力不是發出指揮的，而是被指揮的。權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其他目的的手段。

而巴枯寧認為：權力本身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他指責馬克思沒有看到政治權力也可以成為產生階級特權的一個獨立的基礎。因此，人類解放不僅要消滅財產佔有基礎上的壓迫，而且還要反對一切形式的壓迫，包括在政治和教育差別基礎上的壓迫。

基本看法的差异來自於對人的本體論的不同認識。衆所周知，馬克思認為人是社會環境的產物，他不假設任何人的“天性”或“本能”。而巴枯寧斷言：“所有的人都具有追逐權力的天然本能”。因此，他認為：權力腐蝕所有人，甚至包括真誠的社會主義者和革命者。古德納評論道：巴枯寧對人的天性的看法，應和了達爾文的生存鬥爭哲學，以及尼采的人性。

站在二十世紀晚期的高度，古德納回顧馬克思、巴枯寧在三個判斷上的分歧，即：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是否也會成為壓迫的根源、作為新階級的知識分子精英角色，以及是德國還是俄國將成為十九世紀歐洲最反動的勢力，古德納認為：在這三個問題上，巴枯寧的判斷是更接近真實

的。

托馬斯的分析比古德納的更細緻一些。托馬斯區別出馬克思著作的兩大部分：一部分以《共產黨宣言》為代表，闡述了馬克思的“統治階級理論”，即把國家完全看成是統治階級的工具，這個理論很容易做出過于簡單機械的推論。在另一部分著作裏，馬克思對國家的看法要更複雜一些，也更接近現實，這部分著作首先包括馬克思對異化政治和國家官僚的研究，如《一八四四年哲學政治經濟學手稿》、《論猶太人問題》，其次包括馬克思對具體歷史事件的考察分析，比如《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法蘭西的階級鬥爭》、《法蘭西內戰》等。在這些中作中，馬克思不僅對作為公共生活的異化的國家官僚做出批評，還通過具體歷史事件的分析，說明了國家獨立于階級利益之外、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可能性。托馬斯似乎認為，巴枯寧對馬克思的批評如果是針對第一部分的“統治階級理論”，那麼是帶有一定合理性的。然而，馬克思在第二部分著作中，不但回答了無政府主義者所關心的中心問題，馬克思對異化政治的分析批判，不僅適用於當代資本主義，也適用於二十世紀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不是像無政府主義者所指控的那樣可以用來為官僚社會主義作辯護。

古德納和托馬斯對馬、巴論戰的介紹，給人印象特別深刻的，首先不是馬克思和巴枯寧之間的分歧，而是他們在某些問題上的一致，特別是他們的一個共同盲點，即：把政治的概念看得過分狹窄，認為政治只與國家、統治、壓迫有關。

是否參與政治是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之間的一個重大分歧。巴枯寧和蒲魯東都把拒絕參加國家政治作為一

個根本原則。而馬克思認為：爲了無產階級的利益，當然可以利用資產階級的工具來反對資產階級，包括“使用一些在它獲得解放以後將會失去意義的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國家。馬克思和巴枯寧都認爲政治就意味著國家，而國家就意味著壓迫；分歧在於：馬克思認爲“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是壓迫殘餘的資產階級的，而巴枯寧認爲“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稱呼本身就是矛盾的，其現實只能是“專無產階級的政”。

馬克思有關“使用一些在它獲得解放以後將會失去意義的手段”的論點對駁斥巴枯寧的“拒絕一切政治”是相當雄辯有力的；另一方面，巴枯寧質疑“無產階級成爲統治階級”也有其合理性；對這個問題，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作了忠實于馬克思精神的回答。然而，仍然有一個問題：在無產階級獲得解放以後，是否還有政治？馬克思和巴枯寧的回答，都是堅決的“否！”馬克思回答“否”的原因是：經濟壓迫已經消滅了，政治也就隨之消亡了。巴枯寧回答“否”的原因是：政治的存在正是無產階級不解放不自由的根源，因此“否”的回答不過是同義反復。

其實，同一個問題，可以完全以非虛擬形式提出：在無產階級內部，無論是無產階級政黨內部，還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內部，是否存在政治？按照馬克思和巴枯寧的定義，答案也是否定的。顯然，這個答案與當代的現實和常識相違。

馬克思和巴枯寧都把政治局限于國家政治、議會政治、壓迫政治，這一點具有鮮明的十九世紀特色。

二十世紀法國馬克思主義學者艾田·巴里巴爾在討論了馬克思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裏

賦予“政治”的負面含義，和晚期著作《哥達綱領批判》裏賦予“政治”的正面含義後，說：“要解決這個矛盾，可以對‘政治領域’和‘國家領域’作必要區分。”“國家領域可以看作是群衆外部的政治，由壓迫性的、操縱性的少數集團來執行，而在更強意義上的政治，是群衆的政治，不僅是為了群衆而進行，而且是由群衆來進行，因此，它和國家領域的對立就是題中應有之意了。^[1]”

二十世紀人類的政治實踐，特別是那些在馬克思的人類徹底解放的激進思想啟發下的政治實踐，早已衝破了把政治局限于國家政治、議會政治、壓迫政治這個純粹假想性的限制，這特別要歸功于女權主義和有關“日常生活的反抗”的主張和實踐等激進社會運動，它們告訴我們：政治存在於人們每日每時的實踐和日常生活之中，存在於所有制度化的人類經驗當中，如家庭生活、日常商品消費、性別關係、代際關係等等。只要不是沙漠，只要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會分左、中、右，就會有政治。

上述對馬克思和巴枯寧論戰的冗長的回顧，不僅是因為巴枯寧在挑戰馬克思時提出了“新階級”、“文化革命”、“學術權威”等等二十世紀中國社會主義歷史所熟悉的主題，更是因為上述主題在當代展開的同時，也帶著相當大的概念和理論含混與誤解，而這些理論上的不足可以溯源到十九世紀的導師那裏去。馬克思否定了無政府主義“拒絕政治”的立場，把政治重新交還到無產階級手中，這是他的功績；然而，這裏的看法是，馬克思作的還不够；政

[1] Etienne Balibar: *Masses, Classes, Ideas: Studie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Before and After Marx*. Routledge, 1994. p132

治的領域，還應該繼續擴大，也必須繼續擴大。還應該讓政治屬於無產階級群衆內部，甚至屬於無產階級獲得解放以後的全人類。必須這樣作的原因是：即使在無產階級內部，仍然存在著少數與多數的區別，存在著精英知識分子和普通群衆的區別，這正是巴枯寧所敏銳地察覺到的。

馬克思和巴枯寧的政治都是強迫的政治。然而他們對於同意的政治、共識的政治都缺少最基本的說明。不錯，壓迫社會的同意政治、共識政治無一例外是建立在強迫另一部分人的基礎之上的，然而正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強迫的政治也必須建立在同意政治、共識政治之上，才能穩定持久。

巴枯寧挑戰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觀點，認為政治是在經濟之外的一個獨立的、目的性的壓迫根源。然而，巴枯寧的二元論注定要訴諸“人的天性”這類自由主義哲學所特有的基本假定。這也是為什麼巴枯寧的國家觀，以及對群衆的暴力、顛覆潛力的關注，更接近斯賓諾莎和霍布斯。巴枯寧對知識分子精英和普通群衆的關係的觀察是深刻的，然而他不能以有效的概念框架和理論框架去說明它。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同時也表現出有別於經濟的、自身所特有的運動規律。特別是當政治是在同意、共識和自願的基礎上運作；在利益根本一致的階級聯盟內部或在同一階級內部，精英與群衆、少數與多數之間的談判、斡旋，就更加曲折、間接，這個廣義的“政治”就更加難以立即歸結為物質基礎的決定作用了。這裏，思想意識、文化觀念、道德、話語、討論就成為關鍵性因素，這樣，巴枯寧所關注的精英—群衆的問題，實際上和思想文化的相對自主性和能動性這個主題有深刻的聯繫。

精英——群衆問題，特別是精英對群衆的主宰，這是一個與階級和階級壓迫幾乎平行的主題，這兩個主題既有聯繫，又有區別。階級是以在經濟活動中的關係來定義的，而精英與群衆主要刻劃了數量上的對比。精英與群衆問題的實質，是少數與多數的矛盾。後面的討論將要說明，精英——群衆維度的確是一個可以獨立于階級維度之外的一個社會劃分——在同一個階級內部，仍然存在著精英與群衆的劃分。

馬克思討論精英與群衆問題的相對較少。到了列寧，群衆就成為一個重要的題目，而在毛澤東那裏，它就成為一個中心問題。下面的討論，就要轉向馬克思之後的馬克思主義在精英——群衆問題上的理論發展。

葛蘭西：盟主權、統一戰線與說服群衆

列寧在著名的《怎麼辦？》中指出：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必須從工人外部灌輸，工人自己只能產生工團主義。這是一個有關無產階級陣營內部精英和群衆關係的一個重大命題。顯然，這有違于當時的正統馬克思主義教義，深受列寧敬仰的俄國正統馬克思主義教義的看護者普列漢諾夫就開始批評列寧了，指責他犯了唯心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錯誤，脫離了無產階級。羅莎·盧森堡也攻擊列寧，說他是布朗基主義，搞小集團的密謀活動，而凌駕于群衆之上（諷刺的是：馬克思是被無政府主義者所攻擊，而列寧却被指責為布朗基主義——以最著名的一位無政府主義活動家來命名的罪名）；盧森堡認為，要讓無產階級在鬥爭中自己去克服自己的缺點。一定程度上托洛茨基也參加了對列寧的

圍攻^[1]。這反映出：在無產階級革命陣營內部，精英與群衆的關係問題開始突出地暴露出來，而這個矛盾又和“思想意識”緊密相關。

列寧的論斷後來體現在列寧主義政黨的制度形式中，它對無產階級解放運動帶來的歷史性影響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二十世紀初的那場辯論有了結論；有關精英與群衆、思想意識與革命運動之間的關係的理論問題並沒有因此解決，實際上，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實踐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就說明了這一點。

下面的討論將要展示：在兩種非常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同屬於列寧主義傳統的葛蘭西和毛澤東，各自獨立地對精英——群衆問題作了論述，他們的論述以迥然不同的語言風格和概念範式，達到了相當程度的內在一致。

人們經常把葛蘭西和“霸權”這個概念聯繫在一起。然而，較少關注的，是“霸權”一詞的歷史，特別是葛蘭西的用法和前人用法的傳承關係。佩里·安德森認為^[2]：“霸權”一詞早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俄國社會民主運動中就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口號了（俄語為 гегемония）。這個概念的含義最初在普列漢諾夫1883–1884年間的著作中被明確下來。而這個含義又是什麼呢？

當時普列漢諾夫認為：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要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張拿過來來反對沙皇專制，因為俄國的資產階級過于弱小，無法獨立完成反專制的任務。到了

[1] Jorge Larraín: Marxism and Ideology. Humanities Press. 1983.

[2] Perry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No.100, Nov. 1976.

九十年代，同為社會民主黨人的阿克雪羅德更進一步，他在 1898 年的兩份小冊子裏寫到：俄國工人階級能够也必須“在反對專制的鬥爭中扮演獨立的、領導的角色”，因為其他所有階級的軟弱無能，而使無產階級具有核心的重要地位。1901 年，阿克雪羅德給司徒盧威的信中寫到：社會民主派和自由派的區別在於：“由於俄國無產階級的歷史地位，在反對專制的鬥爭中，社會民主主義能够取得霸權。”年輕一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立即採納了這個概念。同一年，馬爾托夫在一篇文章中說：“‘批評學派’和‘正統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鬥爭，其實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主之間爭奪政治霸權的第一回合。”列寧在給普列漢諾夫的一封信中說：“要有一張政治報紙，作為爭取俄國工人階級‘真正霸權’的最有效工具。”這就是後來的《火星報》。

1905 年革命後，孟什維克派認為沙皇制度已經開始從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主義制度的轉變，因此無產階級霸權的口號過時了。列寧認為資產階級革命還遠未完成，因而激烈地譴責孟什維克派，并強調：“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一個階級，如果放棄霸權的概念，不理解它，就不成為一個階級，或還未成為一個階級，而只是一個行會，或各種行會的集合。”

這裏，列寧所說的“無產階級霸權”，更接近“無產階級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一切反沙皇專制的階級聯盟”的意思。而這和列寧後來提出的、尚不包含社會主義內容“工農民主專政”的綱領是一致的。衆所周知，托洛茨基對“工農民主專政”一直表示不贊同。托洛茨基後來在《俄國革命史》中寫到：“霸權這個被正式接受的流行概念……根本不意味著無產階級將利用農民起義、在農民

的支持下完成其歷史任務——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民主革命中的無產階級霸權，和無產階級專政是有鮮明的不同，兩種說法強烈對立。布爾什維克黨自 1905 年以來在這方面接受了很多教訓。”這裏，顯示出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夕對革命性質的認識分歧，但這不是本章的目的，這裏主要是說明：“霸權”在十月革命前的用法和真正含義，更接近“盟主權”，而非中文“霸權主義”裏的橫行霸道的含義，因此以下行文改用“盟主權”。

十月革命勝利後，“盟主權”一詞不再被用在蘇俄內部，但在共產國際的文件中開始采用它，使其原來在俄國的用法國際化了：共產國際的口號是：無產階級的義務是：在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和一切受剝削的社會集團結成階級聯盟，并對這個聯盟行使盟主權。但還提到：“在蘇維埃制度內部，這個盟主權將使得半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得到提高”。

提出“盟主權”的意義，在于防止工人階級的關門主義和工團主義，共產國際的一份文件說：“無產階級階級要成為革命的階級，就不能把自己局限在一個狹窄的工團主義框架內，而是在社會各個領域、各個方面，都領導全部勞動的和受剝削的人口。”

安德森指出：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葛蘭西不太可能讀到阿克雪羅德、馬爾托夫和列寧等人有關“盟主權”的討論。然而，葛蘭西對共產國際的文件應該是很熟悉的，他 1922—1933 年曾在莫斯科，參加了國際的第四次世界代表大會。因而，“盟主權”一詞從俄國傳到意大利，成為葛蘭西本人的詞彙。

與馬克思和巴枯寧不同的是，葛蘭西沒有去探究無產

階級取得政權的假想狀況，而是分析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複雜現實，從而在馬克思的框架內發展出一套具有意大利政治哲學傳統的階級分析的代數學。

1930 年代，葛蘭西在獄中寫筆記時，“盟主權”一開始仍然是指：無產階級和其他受壓迫階級（主要是農民階級）的聯盟，而聯盟顧名思義，也必須帶有一定的“妥協”，來換取對聯盟的領導權。在葛蘭西的用法中，更加強調文化、倫理維度：“不僅實現政治經濟目標，而且取得智識和道德上的統一，使鬥爭中的一切問題，都從普遍意義上提出，而不是從個別集團意義上提出。這樣就開創了一個主導集團對一系列被主導集團的盟主權。^[1]”

葛蘭西強調一個重要區別，即“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盟主權”，前者是針對資產階級的，以武裝和暴力為基礎，而後者是針對盟友的，特別是指農民，則只能以妥協、說服為基礎，因為盟友的主動和熱情是必須的，只有如此，才能將同盟的社會力量凝聚成一個“新的歷史性的組合”。

然而，葛蘭西對“盟主權”概念的真正獨創性論述，是把它應用到另一個不同的場合，也是同樣重大的領域上去，那就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從一個正面的概念——無產階級解放的手段，轉變為負面的概念——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延續統治的基礎。

葛蘭西討論“盟主權”的關注焦點，從俄國背景下無產階級領導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統一戰線反對沙皇專政，轉移到了西方資產階級社會的權力結構，與此同時，他還借用了馬基雅維利、克羅齊等意大利傳統的倫理—政治論

[1] 葛蘭西：《獄中筆記》意文版第三冊 p1584; 英文版 pp181-2。

述中的一系列二元範疇，葛蘭西的討論，始終圍繞著這一系列二元對立：

主宰	盟主權
強迫	共識
暴力	文明
東方專制	西方民主
敵我關係	聯盟內部關係
運動戰	陣地戰

一邊是形容以沙皇專制為典型的社會，那裏的統治是以暴力強迫為主，社會轉變的方法就是短促突擊式的運動戰，另一邊是西方議會民主為典型的社會，那裏的統治是以自願合作、文化道德的合法性為基礎，其社會轉變的方式則是持久的陣地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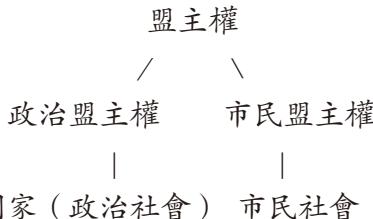
那麼強迫的和共識的空間場所在哪裏呢？葛蘭西在《獄中筆記》裏，給出了三種不同的答案。第一種，也是葛蘭西的首要答案，即國家、市民社會分別是強迫的場所和共識的場所。

然而，葛蘭西在另外一些地方，並不把“盟主權”完全當作“同意”的同義語和“強迫”的反義語，比如在評論法國的政治歷史時，葛蘭西寫到：“在典型的議會制度裏，盟主權實施的特點，是暴力和共識的結合，形成一個不斷變化的平衡，使暴力不至於過多地壓倒共識。^[1]”

另一處，葛蘭西提到：西方國家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機構是“政治盟主權的機關”。“盟主權”從原來的“同意”變成“同意—強迫”，運作的場所既在國家，也在市民社會（包

[1] 葛蘭西：《獄中筆記》意文版第三冊 p1638；英文版 p80。

括教會、學校等等），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區別仍然存在：



在《獄中筆記》裏，還可以找到第三個版本，即：國家包含了一切強迫和同意的範圍，葛蘭西寫到：“國家在完全的意義上，就是：專政+盟主權”。國家包含了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這裏實際上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區別完全消失了。阿爾圖塞繼承了這個觀點，仍為：教會、政黨、工會、家庭、學校、媒體、文化活動等等全都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同樣，法蘭克福學派對戰後西德的批評認為，家庭已經成為國家體系的一部分，充當了原來警察所擔任的權威專制功能。

這意味著：西方民主不僅是建立在群衆自願的基礎上，也建立在更有效的暴力機器之上，從這個角度說，西方國家要比沙皇制度强大得多。比如，西方軍隊和警察其實比沙皇的還忠誠、有紀律，西方資本主義的强大國家建立在雙重優勢之上。

綜合以上線索紛雜的討論，一個總結就是：儘管葛蘭西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十九世紀的把“政治社會”等同于國家的用法，但他有關“盟主權”的討論明顯意識到了階級鬥爭、權力鬥爭不僅存在于正式的“政治渠道”如政府、議會，也廣泛滲透在非政府、非正式的社會生活中，其功能和意義都是相同的，即主導階級聯盟的“歷史性的組合”對全社會取得文化、道德的領導權。這裏，國家和市民社

會的區別，只能是不同政治形式的區別，而不是政治與非政治的區別。

如何取得全社會的文化、道德的領導權，不同的策略會導致成功與失敗，這才是真正的本質區別。葛蘭西始終區分對敵策略和對盟友策略：前者是使用暴力消滅策略，後者使用指導、妥協的策略。他寫到：“一個社會集團在奪取國家政權之前，可以也必須起指導作用，之後，當它行使權力、掌握權力的時候，它成為主導者，要繼續起指導作用。^[1]”這種指導，葛蘭西稱之為“盟主權活動”。在政治上的表現形式，就是統一戰線策略，典型的如共產國際 1919 到 1927 年所主張的那樣。然而葛蘭西的貢獻，不在于對統一戰線重要性的強調說明，而在于他把統一戰線問題，和知識分子在盟主權活動中的地位、日常生活的意識形態意義，以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統治下的文化革命等主題聯繫起來，這是我們關心葛蘭西的主要原因。

文化、盟主權與人民內部矛盾學說

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鬥爭中，群衆始終是一個重要的概念。群衆的概念和人民的概念有很大關係，但也有重要區別。如果說，人民的概念包含著各階級統一戰線的含義，那麼，群衆的概念則構成了在人民內部不同于階級劃分的另一種劃分，群衆通常是和精英、先鋒隊相對立，有時候群衆又指涉人口中的絕大多數，比如：“組織千千萬萬的民

[1] 葛蘭西：《獄中筆記》意文版第三冊 p2010；英文版 p57。

衆，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1]，以及“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衆”^[2]。在毛澤東的文章和講話當中，群衆通常具有一些積極、能動的形象：“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3]在解放後，毛澤東則認為：“群衆中蘊藏了一種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4]”

群衆路線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領導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的集體智慧的結晶。而毛澤東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則在更大程度上是在 1949 年以後毛澤東個人的創造。這個理論的基礎，是根本利益相一致的階級所組成的人民這一概念，而下面試圖說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在本質內涵上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有關群衆的論述，更重要的是，它將群衆這一概念和人民內部矛盾，以及文化思想問題聯繫在一起。“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從實質上說，是在人民內部提出了一個新的劃分，它和階級劃分不同，這就是精英和群衆的劃分。儘管毛澤東並未使用“精英”這一詞彙，然而，作為和群衆組成二分法的另一面，通常是黨、幹部或者知識分子，他們構成了“精英”。

“人民內部矛盾”這個概念中，仍然包括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比如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然而，毛

[1] 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

[2] 毛澤東：《關心群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3]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4] 毛澤東：《這個鄉兩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語（一九五五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第五八七——五八八頁。

澤東似乎更關心那些階級理論所無法涵蓋、却體現在人民內部的矛盾，比如：黨群之間、國家官員和普通公民之間、先進與落後之間、不同思想看法之間、勞心者與勞力者之間，等等。總之，“人民內部矛盾”中的兩個方面，具有這樣的特徵：一方在數量上為少數，一方在數量上為多數；一方在信息、知識、權力上屬於優勢，一方在這些方面是劣勢。這樣，“精英”與“群衆”在數量和質量上，形成了差異和均衡，它們共存于非對抗性的矛盾當中，這個矛盾在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發展演變著。

這裏，作為群衆的對立面的“精英”，已經不再是和物質生產相聯繫的階級概念，而是和精神道德、和知識生產相聯繫的概念，而在毛澤東所處的歷史時代，從事精神生活和知識生產的，自然是少數精英，而從事物質生產勞動的，是工農勞動者，通常也被稱作“基本群衆”。在很多場合，“精英”與“群衆”確實是人數的多寡、和數字比例相聯繫的。“精英”與“群衆”也不是依靠官位級別能够劃分的。一些人，在某種情境下是精英，而在另一種情境下又成為群衆。比如：在七千人大會上，省委書記以下的幹部，也成為“群衆”。因此，“精英”與“群衆”有時又是由特定的情境和語境所建構的。

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首先明確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解決的方法也不同。毛澤東宣布：“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衆階級鬥爭基本結束，”因而“專政的制度不適用於人民內部”。這樣，民主革命時期階級鬥爭的辯證法，在很大程度上讓位給了“精英與群衆”的辯證法。這個辯證法，在形式上可以包括：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團

結——批評——團結”方法、思想改造、細緻的講理，等等。

如果說，毛澤東心目中的社會主義（以及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人民內部矛盾，其主要形式是精英與群衆之間的非對抗性交往，那麼，他仍然認為其本質是兩大階級之間的對抗和較量；這也許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的深刻之處，但恐怕同時也是後來該理論指導下的實踐誤入歧途的原因。毛澤東認為：“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鬥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影響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如果對於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鬥爭。”

因此，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思想鬥爭。這裏，毛澤東強調：“思想鬥爭同其他的鬥爭不同，它不能採取粗暴的強制的方法，只能用細緻的講理的方法。”思想鬥爭的主要參加者，通常是知識分子精英（儘管毛澤東後來鼓勵工農兵參加思想批判），而思想鬥爭的領域，則是：輿論宣傳、人文學術、文學藝術，甚至風俗習慣。這樣，毛澤東把人民內部矛盾的場域，提升到了上層建築和日常生活，而這種特殊的非對抗性矛盾的演化、解決過程，也不同于傳統的階級鬥爭方式，它是一種典型的精英與群衆的辯證法。

在這種內部矛盾的範式中，精英和群衆從來都不是簡單的強與弱、主動與被動的關係，而是複雜的強弱相互轉換、主動被動相互轉換的關係。在毛澤東的許多言論中，都強調“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邏輯，比如：“群衆

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瞭解這一點，就不可能得到起碼的知識。^[1]”又如：“我們共產黨員應該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群衆鬥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群衆鬥爭的大世面。^[2]”然而，這些是針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下勞動群衆普遍受壓抑、受忽視的情形而講的。

毛澤東並不是一位簡單的民粹主義者和反智主義者。他的出發點，仍然是精英對群衆的掌握和駕馭。毛澤東的戰略戰術的一個最大特點，是欲得先捨、欲擒故縱。毛澤東認為：精英對群衆的掌握，并不是簡單的、單向的，而且不花力氣的。因此，他認為：精英“‘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發議論，提意見”是注定要失敗的。毛澤東強調從“群衆中來”、向群衆學習、做群衆的小學生，最終目的是為了“到群衆中去”，即精英的政策和長遠目標到群衆中去掌握群衆（當然在無產階級政黨的情況下，這些政策和目標是符合群衆利益的）。在民主革命時期，能否關心群衆生活，組織千千萬萬民衆，意味著能否成功地建立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在社會主義時期，是否聯繫群衆，是否“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3]，則關係到政權的存亡：“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衆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衆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衆，不去解決群衆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

[1] 毛澤東：《“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七九〇頁。

[2] 毛澤東：《組織起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3] 毛澤東：《幹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

威，學生就要鬧事。^[1]”這就是說，在精英與群衆的辯證法中，存在著“三娘教子”和“子教三娘”的兩個信息“對流”過程。

類似地，和對精英與群衆的強調并重的，是對秩序與自由問題上的兩點論，主張“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在群衆和黨的關係上，似乎存在著一種二元論。毛澤東說：“我們應當相信群衆，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2]”毛澤東把相信群衆放在前，相信黨放在後，似乎暗示著某種最終信賴基礎與合法性來源，但何者是第一位，似乎是刻意保持含糊的。黨性和群衆性的矛盾，連同人民內部矛盾學說中並未闡釋清楚的階級鬥爭的問題，最終在實踐中暴露出來，造成極大的負面後果。

進入一九六〇年代以後，毛澤東開始從另一個方向接近“精英與群衆的辯證法”，那就是思考思想、文化、風俗、習慣對階級盟主權的重要影響。在經典意義下的階級表面上已經消滅的社會裏，階級的較量、談判與妥協似乎離開政權舞臺，而大規模地疏散到了文化藝術和日常生活領域中，而這兩個領域恰恰是精英與群衆發生最頻繁、最微妙的互動的場所。這樣，文化與階級的代數學，和精英與群衆的辯證法，在文化革命的實踐中相遇、匯合。毛澤東和葛蘭西都是二十世紀帝國主義戰爭與世界革命時代的領袖人物，他們生活戰鬥在極為不同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中，但

[1]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2]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一九五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九頁。

他們通過自己獨立的洞見，以各自不同的智識形式，理解了現代性條件下文化與階級的代數學，以及精英與群衆的辯證法。而他們的見解驚人的相似。

這樣看來，馬克思和巴枯寧所討論的政治與統治在未來世界的消亡的問題，葛蘭西的盟主權問題，以及毛澤東的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實際上是緊密相關的，它們都涉及暴力統治和說服政治的辯證法、精英與群衆的辯證法。

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革命鬥爭實踐已經使知識分子精英和無產階級群衆之間的複雜關係暴露出來。馬克思提出了無產階級消滅一切階級統治的路線圖。主要作為革命實踐家的巴枯寧，對馬克思忽視革命陣營內部精英與群衆的矛盾的問題，提出質疑。然而，巴枯寧的概念和理論框架不足以挑戰馬克思。

到了葛蘭西所生活的時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又經歷了長久的發展，其政治操作也變得成熟和穩定。馬克思和巴枯寧時代的“暴力統治”意義下的政治，已經不再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主要統治手段了。無論是為了解釋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穩固，還是探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道路，都需要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階級鬥爭的學說，需要精英與群衆的學說來補充和完善。這是葛蘭西試圖去做的事。

在葛蘭西那裏，盟主權與聯盟內部和階級內部的動力學有關，而這主要涉及到群衆和知識分子的互動：“群衆沒有組織，就不能認識到自己，就不能有獨立的主體，要有組織，就必須有知識分子”^[1]。群衆通過有機知識分子才會獲

[1] 葛蘭西：《獄中札記》，曹雷雨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0 年。

得覺悟，這是群衆與知識分子的辯證法；而知識分子闡明、發展和宣傳本階級的世界觀，最終使該階級取得盟主權，也是知識分子隊伍的重組和重新構成的曲折過程。

如果說，葛蘭西使盟主權的概念進入馬克思主義語彙，那麼，毛澤東的群衆路線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譜系裏則有著同樣突出的地位。而毛澤東的最獨特的貢獻，應該是他的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這個學說，將階級、群衆和思想文化領導權這些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概念貫穿在一起。

有同樣洞見的，還不止葛蘭西和毛澤東。這裏用法國馬克思主義學者艾田·巴里巴爾對群衆運動和階級鬥爭之間的關係論述，作為本書的結語，作為對文化大革命的總結，讓我們沉思和反省它的巨大的勇氣、巨大的悲愴和巨大的缺憾，也許是最恰當不過了：

存在兩種可能：或者是像馬克思對十九世紀革命的精采分析，階級對立最後將群衆運動兩極分化、錯位、激進化，或者，更為重要的，是像列寧、葛蘭西和毛澤東所清晰洞見的那樣，群衆運動對階級鬥爭起著決定因素，並為其提供具體內容，不然階級鬥爭只能是一個假設。我說“更為重要的”，是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采用歸約主義的階級鬥爭概念，導致了他們不能看到群衆和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他們在這兒沒講辯證法。這樣，他們沒有具體發展出有關歷史過程的重要思想：這個歷史過程的因果聯繫不是表現為預先設立好的主體（無產階級或其他），而是表現為群衆和階級互相矛盾的訴求，而這兩者從來不是一回事，即使從“最終意義上說”。可以用模仿康德的話來說：沒有群衆運動，階級鬥爭是空洞的（這就是說，只能

是統治者騙人的鬼話)。然而，沒有階級鬥爭，群衆運動就是盲目的(這就是說，不僅能導致革命，也能導致反革命，甚至法西斯主義)。^[1]”

[1] Etienne Balibar: *Masses, Classes, Ideas: Studie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Before and After Marx*. Routledge, 1994, p172. 譯文是筆者的。

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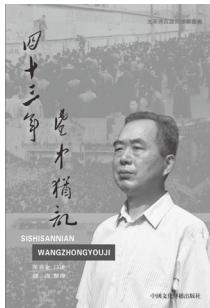
這本雖然不長的著作，凝結了相當長時間的激發和沉澱，並受到了許多朋友和親人的鼓勵與支持。首先，要感謝楊小凱博士和陳佩華教授對我最早的智識啓發和士氣的鼓舞。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圖書館及兩館工作人員給予了我必要的支持。我的很多朋友和支持者為我提供了寶貴的原始資料，他們每個人的慷慨和熱情都讓我銘記。電子雜誌《中國與世界》的編輯同事和讀者給我最初的寫作提供了評論和支持，我的謝意和敬意發至所有這些熟識及不曾謀面的朋友。我的父母親也屬於最早閱讀本書篇章的讀者群，他們的精神支持、對觀點和細節的批評，乃至自身經歷的口述，使我——一個非文革運動親歷者，有了想像歷史的能力。母親曾問及書稿的出版，至悲至憾的是，她未來得及親睹本書付印就病逝了。感謝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的柳陽編輯，他的耐心細緻的策劃和校對使本書的出版成為可能。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妻子戰洋，她是我最坦率、最具建設性的批評者，使得書稿在修改過程中，在理論嚴格、觀點平衡和風格近人方面，有了不少改進。依照我長久的心願，本書獻給她。

當然，本書的觀點和結論，以及其中難免包含的謬誤、含混和不足，都由我個人負責。

童小溪

2011年春 美國紐約州賓厄姆頓市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書目



書名：四十三年望中猶記

作者：吳焱金 口述 鍾逸整理

系列：文革回憶錄叢書

出版日期：2009年12月20日

簡介：吳焱金，武漢地區工人造反司令部（工造總）一號勤務員，三結合後任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文革結束後被判處八年徒刑。本書是作者的文革口述史。



書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組織

作者：[法]夏爾·貝特蘭

系列：文革研究叢書

出版日期：2010年1月20日

簡介：夏爾·貝特蘭，西方著名學者，經濟學家，曾任法中友好協會主席。本書拋開陰謀論、權力鬥爭論等模式，直面工廠文革。



書名：真實的張志新和遇羅克

作者：索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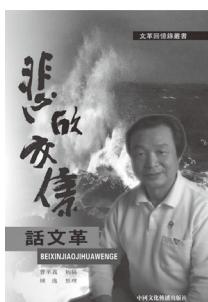
系列：歷史真相叢書

出版日期：2010年1月20日

簡介：張志新案件和遇羅克案件是文革結束之後轟動一時的大案，是否定文革的重磅炸彈。本書試圖揭開這兩個案件的真實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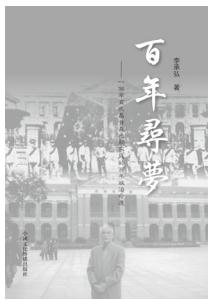
書名：毛澤東億萬稿酬之謎
作者：索 風
系列：歷史真相叢書
出版日期：2010年1月20日
簡介：毛澤東著作是全世界發行量最大的中文著作。網上風傳毛澤東稿酬總計1.3121億元。本書試圖揭開毛澤東稿酬之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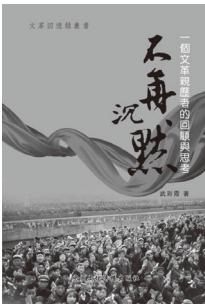
書名：悲欣交集話文革
作者：曹承義 初稿 鍾 逸整理
系列：文革回憶錄叢書
出版日期：2010年3月20日
簡介：曹承義，文革前任一冶施工處技術員。文革初期任造反派組織“新一冶”一號勤務員，親歷“六一七大屠殺”、七二〇等重大事件。



書名：改革開放年代的資本運動
作者：嚴 峰
出版日期：2010年3月20日
簡介：以歷史唯物主義視角，撥開主觀主義和唯心主義歷史觀的迷霧，分析資本運動的條件和要求，研究現存生產關係及其運動變化過程，以此為基礎來研究現實的階級矛盾，總結改革開放史。



書名：百年尋夢
作者：李承弘
出版日期：2010年6月17日
簡介：李承弘的父親李西屏是辛亥革命元老，李承弘文革初期是湖北最大造反組織“鋼工總”的發起、組建人之一，作者以平實的文筆，記述了父子兩代一百年的政治史和心路歷程。



書名：不再沉默

——一個文革親歷者的回顧與思考

作者：武彩霞

系列：文革回憶錄叢書

出版日期：2010年8月18日

簡介：武彩霞，文革期間在河南農學院就讀，親歷了河南省的整個文革過程。本書是作者的文革回憶及研究文章合集。



書名：奉獻——我經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作者：楊道遠

系列：文革回憶錄叢書

出版日期：2010年10月18日

簡介：楊道遠，文革初期任武漢鋼二司一號勤務員，三結合后任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本書講述了作者經歷的文革風風雨雨。



書名：敢死隊

作者：歐陽健

系列：文革回憶錄叢書

出版日期：2010年10月18日

簡介：歐陽健，一位中學語文教師，因為日記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他學生組織了一個名為“敢死隊”的組織，一心要為他平反昭雪。



書名：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

作者：徐海亮

系列：文革研究叢書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10日

簡介：“七二〇”事件是文革期間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本書博采眾多當事人回憶及歷史文獻，條分縷析，全方位揭示“七二〇”事件前因后果。



書名：機關——武漢市委機關文革回憶

作者：魏繩武

系列：文革回憶錄叢書

出版日期：2011年4月5日

簡介：魏繩武，文革中為中共武漢市委機關造反派“人民勤務員”一號頭頭、武漢市直機關紅司一號頭頭、武漢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曾被陳伯達、黃永勝打成“五一六在武漢的關鍵人物”。本書以獨特的視覺，記述了中共武漢市委機關的文革運動、機關造反派的命運，再現了宋侃夫、方銘等一批領導干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



書名：極端年代的公民政治

——群眾的文化大革命史

作者：童小溪

系列：文革研究叢書

出版日期：2011年4月5日

簡介：本書拋開陰謀論、宮廷斗争論等陳腐觀點，通過分析四清，文革初期50天的“運動群眾”與群眾運動，及其后的造反與鎮壓，理清了文革的大體脈絡，揭示了群眾在文革中的主體作用。

責任編輯：柳 陽

封面設計：胡 冬



A standard 1D barcode is positioned at the bottom left. Below the barcode, the ISBN number is printed vertically.

9 789881 970381

ISBN 978-988-19703-8-1

定價：HK\$90元